



策 划：树 旺
主 编：张迪杰
装帧设计：听 伊

总定价：港币\$26,800
ISBN: 978-988-12907-0-0

9 789881 290700

毛泽东全集

张迪杰 主编 第34卷 润东出版社



润东出版社

毛泽东全集

张迪杰 主编 第34卷



毛泽东全集

张迪杰 主编
第34卷

张迪杰 主编 第34卷

毛泽东全集

润东出版社

润东出版社

总定价：港币\$26,800
ISBN: 978-988-12907-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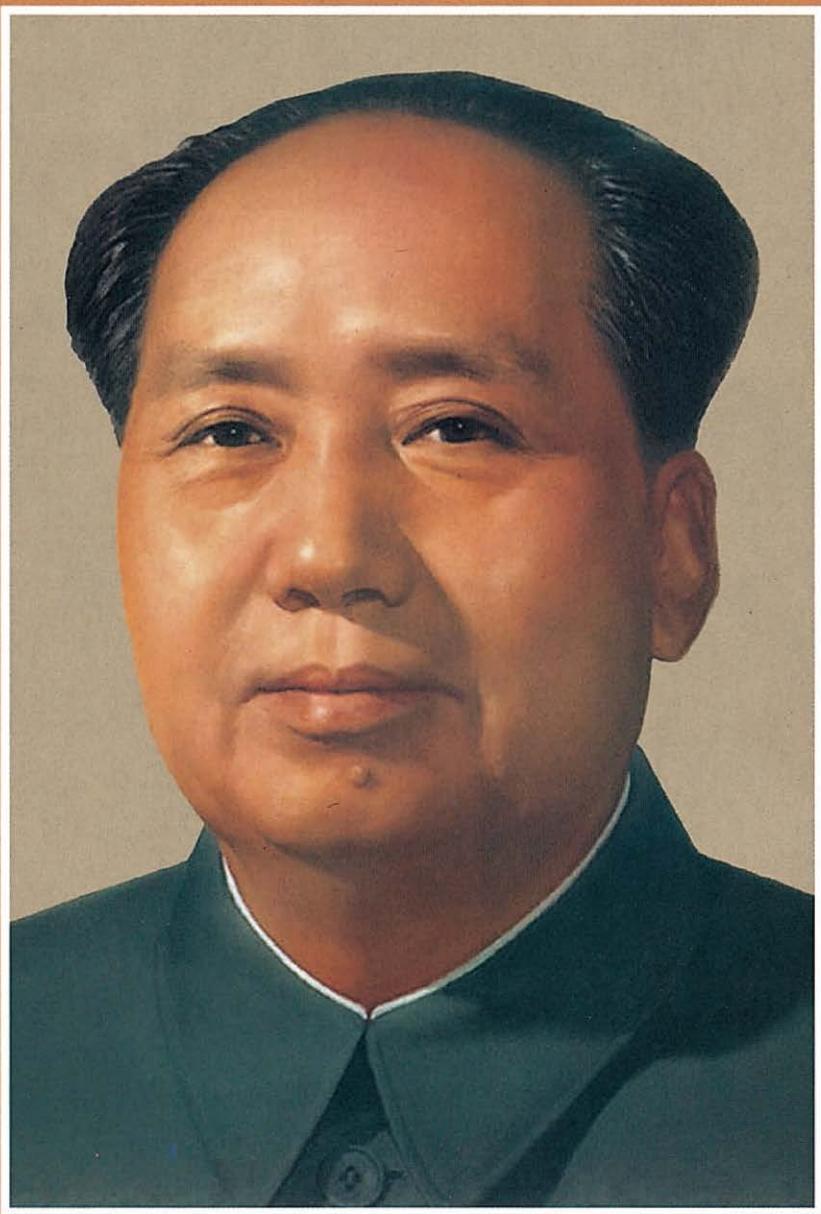
9 789881 290700



马恩百科（资料库）工作组
www.MEBK.org

收集 · 整理

感谢ZhuChengrui同志赞助购买本套《毛泽东全集》



毛 泽 东 同 志

毛泽东全集

张迪杰 主编 第34卷

润东出版社





MAO ZE DONG QUAN JI

毛泽东全集

主 任：流 星
策 划：树 旺
编 编 审：黄惠丽

主 编：张迪杰
副 主 编：宋 道 刘鸿玺 闫凤起
陆 苹 杨健桉 听 伊
责 任 编辑：范磊峰 张 颖 杨 泽
编 辑：李长富 张瑜原 胡禹颐
孟宪纲 张清斌 马豪帅
王中阳 李美艳 赵道洽

编辑委员会

版式设计：杨健桉

装帧设计：听伊

排 版：庞丽娟 郑俊艳

校 对：《毛泽东全集》校对组

调 图：李宏艺 李向阳

文字供稿：毛泽东著作博物馆

图片资料：毛泽东著作博物馆

凡例

张迪杰同志主编的《毛泽东全集》52卷，是他付出36年心血在世界上130多个国家收藏毛泽东著作10.2万册、1.5万种版本的汇集精选，是他被授予“毛著收藏吉尼斯世界之最”“中国毛著收藏第一人”等荣誉的集中体现，也是他与编委会同志潜心编纂20余年完成本书，填补党和国家文献空白，在毛泽东著作出版史上矗立的一座崭新的丰碑。本书内容全面系统，真实可信。收录了毛泽东自1901年至1976年的著作和反映他一生的照片、绘画等。其中，有30%的内容被大多数人熟知，有50%的内容仅在小范围公开，有20%的内容为首次发表。特别是张迪杰同志千辛万苦收藏的被专家学者称为“珍品、极品、罕品、孤品”的国宝文物，这次也编入本书，使本书的适用价值、研究价值和珍藏价值等巨幅攀升。正如中共中央组织部原部长张全景同志的题词：“雄文瑰宝，永放光芒。”

一、本书中毛泽东著作的收录标准：1. 凡是由毛泽东签名的，包括毛泽东本人签名和与其他人一起签名的，全部收录。2. 没有毛泽东签名的，有根据可以确定是毛泽东著作的，全部收录。3. 毛泽东相关的谈话、宣言、法令、电报、通讯、消息、评论、修改稿等，全部收录。4. 未公开发表的毛泽东著作，有其全文及摘要的，全部收录。

二、在收录过程中，广泛收集了每篇著作的各种版本，经考证

选择，以其中最好的作为底本。其原则为：1. 发表时间较早，后经毛泽东亲自修改、审定的版本优先。2. 最全面的版本优先。3. 最早的版本优先。

三、本书按时间顺序编排，分卷出版。毛泽东的著作原则上根据执笔、演讲的时间排列，不能确定执笔时间的，根据其发表日期。个别文章，无具体时间的，按其月份、年份放在当月、当年的最后；未能考证出时间的，放在全集的最后。照片全部按照时间顺序及所反映的内容排入相关的著作中；无具体时间的照片按其所表现的内容，排在相应的著作之后；无相关著作的照片，作为“资料图片”放在相应时间的文章之后。手迹包括诗词、题词、书信、文稿等，排到相应的著作之后，并注明名称。绘画类包括油画、中国画、宣传画等，都按照其所表现的内容和照片编辑在一起。

四、编排过程中，对已公开发表的权威版本和有毛泽东手稿的，均保持版本的原貌。讲话、谈话的记录稿，只作技术性的整理。某些主题相同的谈话、电报、书信，作了适当的编排，按照首篇的时间排序。

五、批注、谈话、修改稿中，毛泽东的内容采用宋体排印，其他内容采用楷体排印；诗歌、联句采用楷体排印。

六、编入本书的著作标题，一般按照原稿刊印；凡原件无标题或标题不确切的，重新拟定、修改，并加以说明；标题旁加*的表示根据编者的推测而收录。

七、对于某些著作的时间与作者以及文内的个别词句，作了初步考证，并作了注释。原稿中有标点的，一般照原样排印，只对明显有误的加以订正。无标点或标点不全的，由编者加了标点并加注释说明。同时，为了便于阅读，对著作中的一些文件、地名、人名

等作了注释。各种注释详略不一，根据排版需要排于当页下部或文后。

八、本书在编辑过程中，对原版本中的错字、漏字、模糊字、衍字等，尽可能根据权威资料加以更改和补充。更改方法：〈〉表示改误；〔〕表示补漏；□表示模糊字；『』表示去衍。另外，出版时不利于公开的人名和数字等用□代替。

九、本书使用中国统一制定的简化字排印，个别未明文废弃的异体字和在一定意义上可以通用的字，均按原件排印。

目 录

建议增加军委副主席和军委委员	1
(1954年2月26日)	
对周恩来在高岗问题座谈会上的发言提纲的批语和修改	2
(1954年2月28日)	
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批语	4
(1954年)	
关于乔冠华、黄华等回京参加日内瓦会议筹备工作的电报	12
(1954年3月1日)	
给田家英的信	14
(1954年3月2日)	
对一篇有关中国领导人的电讯稿的批语	15
(1954年3月4日)	
在邓小平等关于饶漱石问题座谈会的报告上的批语	19
(1954年3月12日)	
关于审阅黄炎培在上海工商界的讲话稿的信	20
(1954年3月12日)	
西藏自治机关的具体形式由西藏大多数人民的意愿决定	23
(1954年3月23日)	
在宪法起草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的插话	25
(1954年3月23日)	

关于发表德国统一社会党将反党反人民分子开除出党的新闻稿的批语	35
(1954年3月28日)	
给彭石麟的信	36
(1954年3月31日)	
关于修改“毛泽东军事思想”一处提法的批语	38
(1954年4月1日)	
关于帮助越南建立炮兵团、工兵团问题给彭德怀的信	39
(1954年4月3日)	
关于掘运朝鲜战争中军事人员尸体问题的电报	41
(1954年4月3日)	
对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条例草案的批语	43
(1954年4月15日)	
关于越南军事部署的批语	45
(1954年4月17日)	
对罗瑞卿在东北地区党的高级干部会议上的发言稿的批语	46
(1954年4月17日)	
给文平山的信	50
(1954年4月21日)	
关于游泳池建造费由稿费中支出给刘少奇等的信	52
(1954年4月25日)	
在《苏联宣传中对斯大林提法的改变》材料上的批语	53
(1954年4月28日)	
关于修建闽南铁路线路问题的信和批语	55
(1954年4月28日)	
奠边府作战最大可能发生的危险在后方交通线	58
(1954年4月28日)	

给毛少贤的信	59
(1954年4月28日)	
给石城乡党支部、乡政府的信	61
(1954年4月29日)	
报纸上的批评要实行“开、好、管”的方针	65
(1954年4月)	
给班禅额尔德尼的信	66
(1954年4月)	
给黄炎培的信	73
(1954年5月3日)	
对美方企图破坏停战协定活动应予以揭发	78
(1954年5月12日)	
为官厅水库建成题词	80
(1954年5月)	
对海军配属特种兵报告的批语	83
(1954年5月19日)	
致南非印度人大会电	84
(1954年5月28日)	
为育英学校教师王瑞珍题词	86
(1954年5月)	
对粟裕关于舟山群岛南部海面发现美舰的处理报告的批语	88
(1954年6月2日)	
关于达赖、班禅尽早起程赴京的批语	89
(1954年6月3日)	
检查同中立国监察委员会瑞典瑞士委员的关系	90
(1954年6月6日)	

对中央农村工作部关于第二次全国农村工作会议报告的批语和修改···	92
(1954年6月7日)	
关于印发宪法草案修正稿给刘少奇等的信 ······	94
(1954年6月9日)	
宪法起草委员会第七次会议讨论通过宪法草案记录 ······	95
(1954年6月11日)	
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	106
(1954年6月14日)	
关于宪法草案的修改问题·····	115
(1954年6月14日)	
关于越南人民军的作战规模的电报·····	118
(1954年6月20日)	
给毛泽荣的信·····	119
(1954年6月24日)	
关于国家预算的指示·····	120
(1954年6月)	
在宪法公布后的指示·····	121
(1954年6月)	
为中国福利会“少年宫”题名 ······	123
(1954年6月)	
对《苏联宪法草案的全民讨论》一文的批语·····	126
(1954年7月1日)	
对华东局统战部关于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情况报告的批语·····	127
(1954年7月6日)	
对西藏工委关于噶厦提出裁减藏军问题的处理意见的批语·····	128
(1954年7月6日)	

同一切愿意和平的国家团结合作.....	129
(1954年7月7日)	
采取积极方针建设远程轰炸机部队.....	134
(1954年7月10日)	
祝贺波兰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的电报.....	136
(1954年7月20日)	
对军委关于保卫领海主权及护航注意事项的指示稿的修改.....	137
(1954年7月23日)	
祝贺日内瓦会议达成印度支那停战协议致胡志明电.....	139
(1954年7月23日)	
给黎锦熙的信.....	141
(1954年7月23日)	
给李敏、李讷的信.....	145
(1954年7月23日)	
对攻击大陈港敌舰方案的批语.....	146
(1954年7月24日)	
关于复英照会给刘少奇的信和对照会稿的修改.....	147
(1954年7月25日)	
给许志行的信.....	149
(1954年7月25日)	
对中医工作的指示.....	150
(1954年7月30日)	
对《苏联纠正反世界主义斗争中某些偏向》一文的批语.....	152
(1954年7月31日)	
浪淘沙·北戴河	154
(1954年夏)	

给三二〇厂全体职工的信	165
(1954年8月1日)	
关于部队中急待解决的问题的批语	167
(1954年8月3日)	
关于不要通过给毛泽东以最高荣誉勋章提案的批语	168
(1954年8月6日)	
关于揭露美国拼凑“东南亚防御集团”的批语	169
(1954年8月6日)	
关于加强对蒋军作战政治工作指示稿的批语	170
(1954年8月10日)	
海空军强大起来了就能够收复台湾	171
(1954年8月11日)	
关于不同意英译本《毛泽东选集》第二卷所作删节的批语	174
(1954年8月13日)	
关于攻击上下大陈岛时机问题的批语	177
(1954年8月21日)	
祝贺罗马尼亚解放十周年的电报	178
(1954年8月21日)	
和英国工党代表团的谈话	181
(1954年8月24日)	
给伍如春的信	186
(1954年8月25日)	
给熊子容的信	189
(1954年8月26日)	
祝贺越南民主共和国成立九周年的电报	191
(1954年8月31日)	

对海军党委报告的批语	192
(1954年8月)	
关于高岗自杀问题给苏共中央的通报	193
(1954年9月1日)	
为庆祝抗日战争胜利九周年致马林科夫、莫洛托夫电	195
(1954年9月2日)	
接受保加利亚驻华大使迪莫夫呈递国书时的答词	197
(1954年9月2日)	
关于允许日本记者随日本社会党代表团访华的批语	198
(1954年9月5日)	
祝贺保加利亚解放十周年的电报	199
(1954年9月7日)	
关于通知周恩来等准备讨论宪法报告的便信	200
(1954年9月9日)	
对刘少奇《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报告（草稿）》的批语和修改	202
(1954年9月)	
接受瑞士驻华公使贝努义呈递国书时的答词	206
(1954年9月13日)	
接受阿尔巴尼亚驻华大使斯蒂·纳赛呈递国书时的答词	207
(1954年9月13日)	
关于辛亥革命的评价	209
(1954年9月14日)	
对再次炮击金门计划的批语	214
(1954年9月14日)	

为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	215
(1954年9月15日)	
关于修改周恩来《政府工作报告》给胡乔木的信	234
(1954年9月19日)	
接受匈牙利驻华大使希克拉丹呈递国书时的答词	235
(1954年9月22日)	
在国庆五周年酒会上的祝词	236
(1954年9月29日)	
祝贺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成立五周年的电报	244
(1954年10月5日)	
关于总参等部的称谓均冠以“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批语	246
(1954年10月8日)	
关于修筑新疆铁路及四个公司归中国独有问题给周恩来的信	248
(1954年10月11日)	
答谢苏联赠送机器设备和提供技术帮助的两封信	250
(1954年10月12日)	
关于安排叶恭绰、朱蕴山参加政协工作的批语	254
(1954年10月13日)	
关于严格保护尼赫鲁专机安全的批语	255
(1954年10月15日)	
对《文艺报》转载《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一文所加编者按的批注	256
(1954年10月)	
对《光明日报》刊载的《评〈红楼梦研究〉》一文的批注	258
(1954年10月)	

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	261
(1954年10月16日)	
对公安部转报的广州市公安局关于国庆节保卫工作报告的批语	263
(1954年10月16日)	
对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准备工作的批语	264
(1954年10月17日)	
在国防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	265
(1954年10月18日)	
和印度总理尼赫鲁的四次谈话	273
(1954年10月)	
关于邀集在京中央委员阅看同南斯拉夫建交文件的信	286
(1954年10月20日)	
在印度驻华大使为尼赫鲁访华举行的招待会上的祝词	287
(1954年10月21日)	
给三三一厂全体职工的信	289
(1954年10月25日)	
给二四七厂全体职工的贺信	290
(1954年10月25日)	
给一二七厂全体职工的贺信	291
(1954年10月25日)	
答谢金日成祝贺我志愿军入朝参战四周年的电报	292
(1954年10月25日)	
为苏联经济及文化建设成就展览会题词	293
(1954年10月25日)	
对陆定一关于展开《红楼梦》研究问题的批判的报告的批语	296
(1954年10月27日)	

对《质问〈文艺报〉编者》一文的批语和修改 （1954年10月27日）	298
给程潜的信 （1954年10月27日）	299
对蒋竹如来信的批语和复信 （1954年10月29日）	303
给郭梓材、刘天民的信 （1954年10月29日）	306
祝贺苏联十月革命三十七周年的电报 （1954年11月6日）	307
关于请各省市制定地方经济五年计划纲要的电报 （1954年11月10日）	309
对《〈文艺报〉编者应该彻底检查资产阶级作风》一文的批注 （1954年11月）	311
对冯雪峰《检讨我在〈文艺报〉所犯的错误》一文的批注 （1954年11月）	314
给刘少奇、周恩来等的信 （1954年11月18日）	316
对第二届全国政协会议筹备情况简报的批语 （1954年11月18日）	317
对越南要求救济灾民的电报的批语 （1954年11月19日）	318
对国防部关于颁发中国人民解放军有功人员勋章奖章的三个文件的批语 （1954年11月20日）	319
毛泽东等祝贺中朝经济及文化合作协定签订一周年的电报 （1954年11月22日）	321

给黄炎培的信.....	323
(1954年11月23日)	
关于征求对兵役法和勋章奖章条例的意见的批语.....	325
(1954年11月23日)	
开城工作今后交由朝鲜同志负责.....	326
(1954年11月24日)	
毛泽东等祝贺蒙古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周年的电报.....	327
(1954年11月25日)	
毛泽东、周恩来祝贺阿尔巴尼亚解放十周年的电报.....	330
(1954年11月28日)	
关于军委扩大会议的批语.....	331
(1954年11月30日、12月28日)	
对卫生工作的指示.....	333
(1954年11月)	
对周扬关于批判胡适问题组织计划的请示的批语	337
(1954年12月3日)	
在缅甸驻华大使为吴努访华举行的招待会上的祝词.....	339
(1954年12月4日)	
在中宣部关于毛泽东思想应如何解释的通知稿中加写的一段话	340
(1954年12月5日)	
对全国文联、作协主席团联席会议决议等的批语.....	341
(1954年12月8日)	
关于攻击一江山岛时机的批语.....	343
(1954年12月11日)	
和缅甸总理吴努的谈话.....	344
(1954年12月11日)	

为庆贺康藏、青藏两公路通车题词	384
(1954年12月)	
为苏联展览馆题名	387
(1954年)	
祝贺缅甸联邦国庆的电报	391
(1955年1月2日)	
对中央关于统一战线工作指示稿的批语和修改	392
(1955年1月10日)	
关于同意国家不为个人祝寿的建议的批语	394
(1955年1月12日)	
对中国作协关于公开印发胡风给中央报告的部分内容的说明的批语和修改	395
(1955年1月12日)	
关于不能由政府向党委下达内部命令的两个批语	397
(1955年1月13日、17日)	
在周扬关于同胡风谈话情况的报告上的批语	399
(1955年1月15日)	
对中央关于组织宣传唯物主义思想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演讲工作的通知的批语	401
(1955年1月24日)	
祝贺印度共和国国庆的电报	403
(1955年1月24日)	
关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报告稿给陈云的信	404
(1955年1月25日)	
对彭德怀在军委扩大会议上总结报告的批语	406
(1955年1月26日)	

对梁漱溟《告台湾同胞》一文的批语	407
(1955年1月27日)	
接受芬兰驻华大使孙士敦呈递国书时的答词	408
(1955年1月28日)	
原子弹吓不倒中国人民	410
(1955年1月28日)	
给杨树达的信	412
(1955年1月29日)	
给章士钊的信	414
(1955年1月30日)	
在金韫颖《自述》上的批语	416
(1955年1月)	
关于改善法院审判作风的批语	417
(1955年2月1日)	
关于蒋军从大陈岛撤退时我军不要向港口一带射击的批语	419
(1955年2月2日)	
对陆定一关于处理保加利亚文版《毛泽东选集》稿费问题的报告的批语	420
(1955年2月3日)	
给陈嘉庚的信	421
(1955年2月3日)	
对周敦祥来信的批语和复信	423
(1955年2月3日)	
对错发《华东军区首长电贺解放一江山部队》的新闻的批语	425
(1955年2月6日)	

关于请邓小平督促进行全党干部审查问题的批语	426
(1955年2月8日)	
关于公布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服役条例的命令	427
(1955年2月8日)	
给毛森品的信	428
(1955年2月10日)	
给张之江的信	429
(1955年2月11日)	
关于公布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中国人民革命战争时期有功人 员的勋章奖章条例的命令	431
(1955年2月12日)	
毛泽东等祝贺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五周年的电报	432
(1955年2月12日)	
在苏联驻华大使馆为庆祝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五周年举 行的宴会上的讲话	435
(1955年2月14日)	
关于第一个五年计划纲要给刘少奇等的信	437
(1955年2月20日)	
毛泽东等祝贺苏联军队建军三十七周年的电报	438
(1955年2月21日)	
对邓小平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报告稿的批语和修改	440
(1955年2月、3月)	
和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的谈话	443
(1955年2月23日)	
在达赖、班禅为庆祝藏历木羊年新年举行的宴会上的祝酒词	446
(1955年2月24日)	

关于注意处理群众自愿入社问题给林铁的信	448
(1955年3月5日)	
不能承认“两个中国”	449
(1955年3月5日)	
给周敦祜的信	453
(1955年3月6日)	
和达赖喇嘛的谈话	455
(1955年3月8日)	
和班禅额尔德尼的谈话	459
(1955年3月9日)	
对卫立煌《告台湾袍泽朋友书》的批语	465
(1955年3月13日)	
关于不要全国人大代表工作费的批语	466
(1955年3月14日)	
关于马祖等岛屿敌人撤走时我军不要攻击的批语	467
(1955年3月14日)	
给黄炎培的信	468
(1955年3月14日)	
对卫立煌来电的批语和复电	469
(1955年3月17日)	
对杨树达来信的批语和复信	472
(1955年3月17日)	
关于修改和印发《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开幕词》的批语	473
(1955年3月20日、21日)	
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	474
(1955年3月)	

为空军首届英雄模范功臣代表大会题词	495
(1955年3月)	
对陈毅在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的发言稿的批语	497
(1955年3月23日)	
关于在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印发两篇文章的批语	498
(1955年3月28日)	
对刘少奇在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的发言提纲的批语	499
(1955年3月)	
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结论的提纲	500
(1955年3月31日)	
关于同意王明继续请假治病的批语	505
(1955年3月、4月)	

建议增加军委副主席和军委委员^[1]

(1954年2月26日)

为加强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的领导，特建议增加下列七人为军委副主席，计：军委委员、军事学院院长刘伯承，军委委员、西南军区司令员贺龙，军委委员、华东军区司令员陈毅，总政治部主任罗荣桓，军委委员、总参谋长徐向前，军委委员、华北军区司令员、代总参谋长聂荣臻，军委委员、中南军区代司令员叶剑英。并建议增加徐海东为军委委员。可否，请审查任命。

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一九五四年二月二十六日

[1] 这是毛泽东以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名义向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提交的报告。

对周恩来在高岗问题座谈会上的发言提纲的批语和修改

(1954年2月28日)

—

少奇同志，并书记处各同志：

周恩来同志二月二十五日的发言提纲^[1]经胡乔木、陈伯达二同志作了一些修改，我同意这些修改，请你们考虑酌定。

毛泽东

一九五四年二月二十八日

[1] 指周恩来1954年2月25日在高岗问题座谈会上的总结发言提纲。提纲指出：在这次关于高岗问题的座谈会上，根据高岗的发言及其自杀未遂的行为，并综合四十三位同志的发言及其所揭发的材料，我们可得出这样一个认识，即高岗的极端个人主义错误已经发展到进行分裂党的阴谋活动，以图实现其夺取党和国家领导权的个人野心。在其野心被揭穿和企图失败之后，他就走上自绝于党和人民的绝望的自杀道路。提纲从十个方面揭露高岗分裂党、夺取党和国家权力的阴谋活动，分析了高岗所犯错误的思想根源、社会根源和历史根源，并总结了从高岗事件中应当记取的教训。

二

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高岗虽有其正确的有功于革命的一面，因而博得了党的信任，但他的个人主义思想（突出地表现于当顺利时骄傲自满，狂妄跋扈，而在不如意时，则患得患失，泄气动摇）和私生活的腐化欲长期没有得到纠正和制止，并且在全国胜利后更大发展了，这就是他的黑暗的一面。高岗的这种黑暗面的发展，使他一步一步地变成为资产阶级在我们党内的实际代理人。高岗在最近时期的反党行为，就是他的黑暗面发展的必然结果，同时也就是资产阶级在过渡时期企图分裂、破坏和腐化我们党的一种反映。^[1]

[1] 这是毛泽东在审阅周恩来的发言提纲时改得较多的一段。文中用宋体字排印的是毛泽东加写的文字。

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批语^[1]

(1954年)

—

序言应有说明。^[2]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是在毛泽东主持下起草的。他对历次宪法草稿作了多次修改，写了不少批语，并在宪法起草委员会、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讨论宪法草案的会议上作了多次讲话和插话。但是起草过程中的这些文献没有完整地保存下来。本篇收入的16条批语只是它的一部分。其中，前5条批语写在宪法草案的一个油印打字稿上，这个稿子中有些条文附有说明文字。第六至第九条批语写在附有修正说明的油印打字的第一次修正稿上。第十、十一两条批语写在封面印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初稿）”的油印打字稿上。这些稿子均未标明时间，初步分析，约在1954年一二月间。第十二至十六条批语则写在铅印初稿的1954年3月18、19日讨论修改稿上。

[2] 这条批语写在宪法草案油印打字稿第一章总纲的说明文字上方，是针对序言部分没有说明文字而写的。

二

此句好，宜采纳。^[1]

三

不甚妥？^[2]

四

宜单列一条。^[3]

[1] 宪法草案油印打字稿第二条“说明”，在引用《共同纲领》第五十条原文后说，现除删去其中“反对帝国主义和各民族内部的人民公敌”一语外，并将“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为各民族友爱合作的大家庭。反对大民族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两句的意思移到序言的第五段。毛泽东的这条批语是针对删去的一句而写的。

[2] 宪法草案油印打字稿第五条的“说明”中说：“本条中所说的‘资本家所有制’，包括富农在内”。毛泽东在“包括富农在内”旁画了竖线，并写了这条批语。

[3] 这条批语是针对宪法草案油印打字稿第十一条第二款而写的。第二款的原文是：“任何个人的私有财产不得用以反对和损害公共利益。”1954年9月20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的宪法中，这一款已单列为宪法总纲第十四条，文字改为：“国家禁止任何人利用私有财产破坏公共利益。”

五

什么是公民？
举行内乱，推翻政府。
包括严厉与非严厉。^[1]

六

国家主席的罢免。^[2]

[1] 这三条批语分别写在宪法草案油印打字稿第十六条及其“说明”的上方。第十六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维护人民民主制度，保护全体公民的安全和一切合法权益，镇压一切反革命活动，惩办一切勾结外国帝国主义、背叛祖国、危害人民、破坏人民民主制度和破坏国家建设事业的卖国贼和反革命分子。”毛泽东在其中“全体公民”旁画两条竖线，并在上方写有“什么是公民”5个字。又在其中“勾结帝国主义、背叛祖国”之后画一插入号，并在上方写有“举行内乱，推翻政府”8个字。这一条附有以下说明：“《共同纲领》该条中，原用有‘严厉惩罚’数字，那是对‘首要分子’说的，而本条现在的规定是指一切‘卖国贼和反革命分子’，故不用‘严厉’二字，以使规定较为灵活。”毛泽东在这一“说明”上方写有“包括严厉与非严厉”8个字。

[2] 这条批语写在宪法草案油印打字的第一次修正稿关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行使罢免权的第三十二条的上方，修正稿没有罢免国家主席的内容。1954年9月20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的宪法，对此增加了相应的内容，在第二十八条中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有权罢免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副主席。

七

主席有交议权，最高会议决议的性质。^[1]

八

需要。^[2]

[1] 这条批语写在宪法草案油印打字的第一次修正稿中国务院一节上方，修正稿没有提及国家主席的交议权和最高会议决议的性质。宪法草案（初稿）1954年3月18、19日讨论稿，在说明中对有关这一内容的条款提出两个修改方案，一个方案是：“在必要时召集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和其他有关人员举行最高国务会议”，另一方案是：“在必要时召集有关人员举行最高国务会议”。毛泽东在前一个方案旁写了“较妥”二字。1954年9月20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的宪法第四十三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在必要的时候召开最高国务会议，并担任最高国务会议主席。”“最高国务会议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国务院总理和其他有关人员参加。”“最高国务会议对于国家重大事务的意见，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提交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国务院或者其他有关部门讨论并作出决定。”

[2] 宪法草案油印打字的第一次修正稿第五十八条所附的修正说明提出：“民委提议，规定各民族自治区得组织本自治区的公安部队和民兵，需否可考虑。”毛泽东在这段文字上方批了“需要”二字。1954年9月20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的宪法第七十条规定：“自治区、自治州、自治县的自治机关依照国家的军事制度组织本地方的公安部队。”

九

较妥。^[1]

十

此条似应移至总纲。^[2]

[1] 宪法草案油印打字的第一次修正稿第七十七条规定：“国家保障公民的居住自由不受侵犯。公民的通讯秘密受法律的保护。”所附修正说明提出，此款另一方案为将“通讯秘密”改为“通讯自由”，毛泽东在“通讯自由”旁画一竖线，并批了“较妥”二字。1954年9月20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的宪法第九十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住宅不受侵犯，通信秘密受法律的保护。”

[2] 这条批语写在宪法草案初稿油印打字稿第五十八条上方，这一条的原文是：“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在执行其任务时，应经常保持同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广泛吸收人民群众参加和监督国家管理工作，不断地注意对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现象进行斗争。”1954年9月20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的宪法中，这一条已写入宪法总纲的第十七条，文字改为：“一切国家机关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经常保持同群众的密切联系，倾听群众的意见，接受群众的监督。”

十一

不写为好。^[1]

十二

田家英^[2]同志：

一些意见，请提交党组会上讨论。

毛泽东

副主席受委托得代行主席部分职权，此点必须加入。除“同时”外，所有的“时”均改为“的时候”。

十三

“土地改革”不成文，应加“制度的”。“镇压反革命”，下加

[1] 宪法草案初稿油印打字稿第八十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和信仰宗教自由的权利。”毛泽东在其中“游行、示威”旁画两条竖线，打一问号，并在上方写了这个批语。1954年9月20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的宪法中，仍然规定了公民有游行示威的自由。

[2] 田家英，当时任毛泽东的秘书，参加宪法起草小组的工作。

“分子”。^[1]

十四

此处不写“发布”为宜，免与主席职权分歧。^[2]

十五

此条应采纳周鲠生意见。^[3]

[1] 宪法草案（初稿）1954年3月18、19日讨论修改稿序言第二段有一句话：“我国人民在过去几年内已经很有成效地进行了土地改革、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完成经济恢复等项大规模的斗争”，毛泽东将这句话中的“土地改革”改为“土地制度的改革”，在“镇压反革命”后加了“分子”两字，并写了这条批语。

[2] 宪法草案（初稿）1954年3月18、19日讨论修改稿第三十六条关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职权的第四款为：“通过和发布具有法律效力的决议和条例”，毛泽东审阅时，删去了这一款中的“和发布”3个字，并写了这条批语。1954年9月20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的宪法中，这一款改为“制定法令”。

[3] 宪法草案（初稿）1954年3月18、19日讨论修改稿第三十六条关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职权中加了第十一款“批准和废除同外国缔结的条约”，毛泽东在这一款旁写了这个批语。周鲠生是当时宪法起草委员会聘请的法律顾问。1954年9月20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的宪法中，这一款改为“决定同各国缔结的条约的批准和废除”。

十六

此项恢复，可由副主席去办。^[1]



1954年3月，毛泽东和出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起草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的委员合影。

[1] 宪法草案（初稿）1954年3月18、19日讨论修改稿第四十一条关于国家主席的职权中删去了原有的第三款“授予国家的勋章、奖章和荣誉称号”，毛泽东在删去的这一款旁边批了这句话。1954年9月20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的宪法中保留了这一款的内容。

关于乔冠华、黄华^[1]等回京参加日内瓦会议筹备工作的电报

(1954年3月1日)

杜平^[2]、乔冠华同志，并告金首相、彭司令员^[3]：

二月廿八日电悉。

一、为了准备参加日内瓦会议，同意李克农^[4]同志意见，乔冠华、黄华等同志迅速回京，参加筹备工作。乔、黄过平壤时应向金首相报告工作并请示意见。

二、同意代表团党委改组，由丁国钰^[5]同志任党委副书记；以

[1] 乔冠华、黄华，当时均任朝鲜停战谈判中国人民志愿军代表团党委委员。

[2] 杜平，当时任中国人民志愿军政治部主任、朝鲜停战谈判朝中代表团代表、中国人民志愿军代表团党委副书记。

[3] 金首相，指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首相金日成。彭司令员，指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

[4] 李克农，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外交部副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朝鲜停战谈判中国人民志愿军代表团党委书记，负责主持朝鲜停战谈判朝中代表团的工作。

[5] 丁国钰，当时任朝鲜停战谈判朝中代表团代表、中国人民志愿军代表团党委委员。

后向北京、平壤的报告请示改由李相朝^[1]、杜平、丁国钰三同志署名。

三、因杜平同志尚不能完全离开部队工作，故在杜不在开城时，党委工作即由丁国钰同志负责（柴成文^[2]同志协助），向北京、平壤的报告请示即由李相朝、丁国钰二同志署名。在工作情况许可的条件下，丁国钰、柴成文二同志可以轮流回国休假。

毛泽东
一九五四年三月一日

[1] 李相朝，朝鲜人民军中将，当时任朝鲜停战谈判朝中代表团首席代表。

[2] 柴成文，当时任朝鲜停战谈判中国人民志愿军代表团党委委员、秘书长。

给田家英的信

(1954年3月2日)

家英同志：

(一) 杨秀生^[1]信请抄转长沙杨开智先生，询问信内所述情形是否属实，我完全不记得了。

(二) 今年寄杨家补助费1,200万元^[2]，上半年的600万元宜即寄去，请予办理。

(三) 李淑一女士，长沙柳直荀^[3]同志（烈士）的未亡人，教书为业，年长课繁，难乎为继。有人求我将她荐到北京文史馆为馆员，文史馆资格颇严，我荐了几人，没有录取，未便再荐。拟以我的稿费若干为助，解决这个问题，未知她本人愿意接受此种帮助否？她是杨开慧的亲密朋友，给以帮助也说得过去。请函询杨开智先生转询李淑一先生，请她表示意见。

毛泽东

三月二日

[1] 杨秀生，杨开慧的族兄。

[2] 这里是以当时流通的人民币计算的，按中国人民银行1955年3月1日起发行的新人民币折算，合1200元（新币1元等于旧币1万元）。

[3] 柳直荀，曾任湖南省农民协会秘书长、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军团政治部主任、中共鄂西分特委书记，1932年牺牲。

对一篇有关中国领导人 的电讯稿的批语^[1]

(1954年3月4日)

—

此件送林彪、陈伯达、胡乔木、谭政、陶铸^[2]五同志一阅。
退毛。

毛泽东
三月四日

[1] 这是毛泽东在合众社1954年2月26日发自东京的一篇电讯稿上写的三条批语。电讯稿对毛泽东退出政治舞台的可能性及继承人问题作了推测，其中还谈到对高岗的评价，说高岗“精明”，“曾由于治理满洲有成绩而得到当地领袖们的尊敬”。

[2] 林彪，当时任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书记。陈伯达，当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胡乔木，当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谭政，当时任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副书记。陶铸，当时任中共中央中南局常委、华南分局第四书记。

二

合众社传日本人论高岗^[1]，值得注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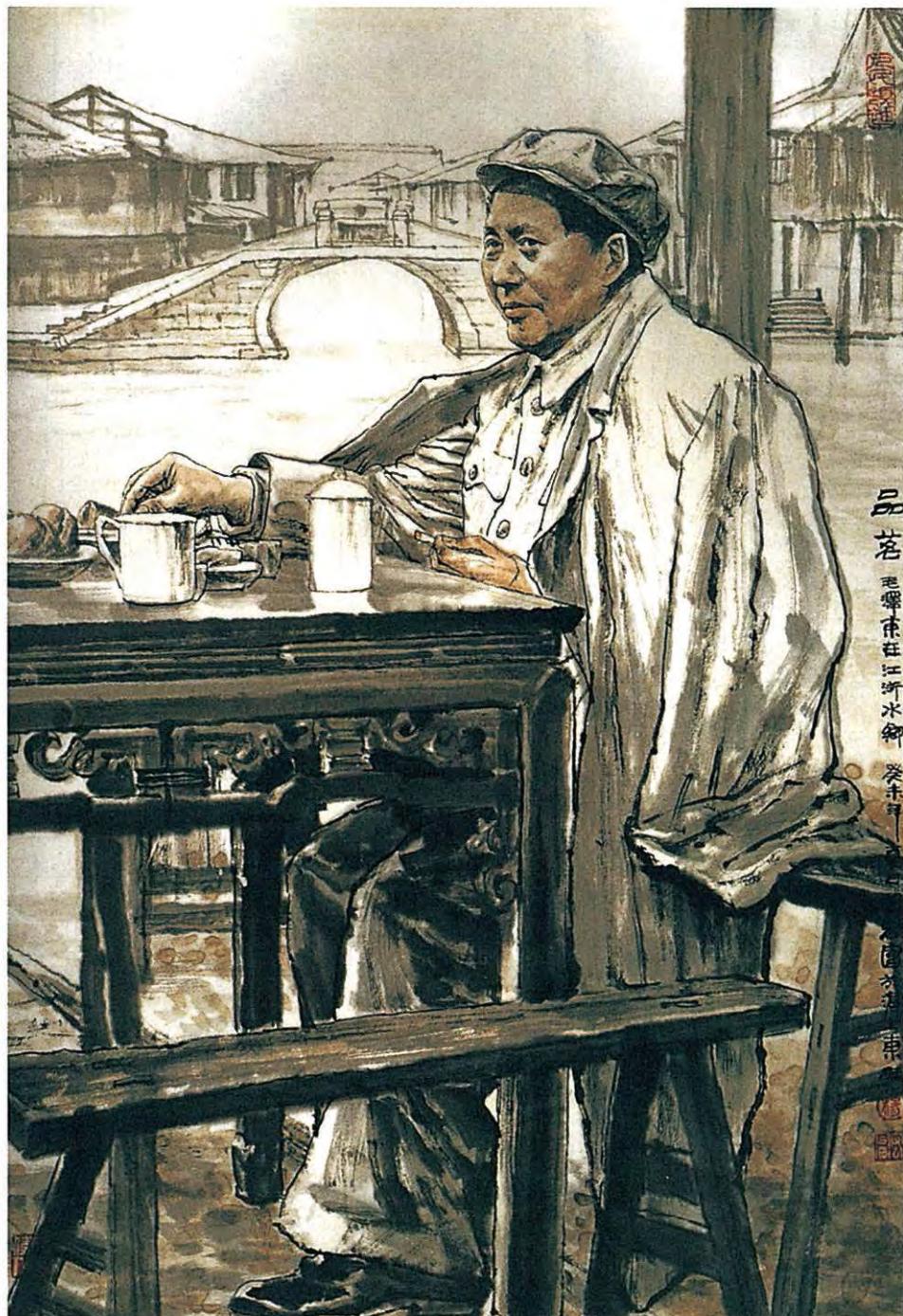
三

日本情报机关对高岗很熟悉，美日两情报机关是合作的。

[1] 高岗，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东北局书记、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1954年2月，中共七届四中全会揭露了他反党篡权的阴谋活动。



1954年，毛泽东和谭启龙在绍兴。



《品茗》(中国画)

在邓小平^[1]等关于饶漱石问题 座谈会的报告上的批语

(1954年3月12日)

此件^[2]送小平同志。

在第四页上“毛主席”改为毛泽东同志。其余均同意。

毛泽东
三月十二日

[1] 邓小平，当时任政务院副总理。

[2] 指邓小平、陈毅（华东局第二书记）、谭震林（华东局代理书记）1954年3月1日关于饶漱石问题座谈会情况给中央的报告。座谈会进一步揭发、查证了饶漱石在1953年全国财经会议和全国组织工作会议期间及其前后破坏党的团结、阴谋分裂党的错误活动的各项事实。

关于审阅黄炎培 在上海工商界的讲话稿的信

(1954年3月12日)

—

黄副总理：

三月八日惠书阅悉。附件^[2]已付周总理李维汉^[3]部长斟酌奉告。“人们”是指资产阶级和民主党派，不包括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即不是“包括一切的”。“无痛分娩法”一词最好不写在印刷品上，因实际上那些不甚觉悟的人们总会觉得有些痛苦的。支票开得多了，可能引起幻想，而不去加重教育和学习，不去提高政治觉悟，结果感觉痛苦的人就会对我们不满。尚请斟酌。敬颂大安

毛泽东

一九五四年三月十二日于杭州

[1] 黄炎培，当时任中国民主建国会主任委员、政务院副总理。

[2] 指黄炎培1954年3月1日对上海工商界的讲话稿。

[3] 李维汉，当时任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

二

恩来、维汉同志：

此件请审阅斟酌，并告黄副总理。“阶级消灭，个人愉快”似以改为“阶级消灭，个人存在”为适宜，亦可告以非正式发表的谈话不要他在印刷品中引用，请酌。如他的讲演不登报，又碍难修改，听其引用亦无不可。他所谓“无痛分娩法”亦不甚妥当，只作印刷品不登报，亦可不改。末了引我的话之后他说“人们”“是包括一切的”，我已复告他不是包括一切的，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不包括在内。我复黄信只说这一点和批评无痛分娩法一点，此外说他的信已付你们二位斟酌告他。

敬礼！

毛泽东

一九五四年三月十二日

复黄信请阅后送交。

和民主事上不無
地主小资产阶级和友派
肩挑一词最坏。体察
在印制上更宜
上所言无以复加

得体。刻印
请勿用挂图。如
前至指深表感谢。
此致。

予本拟于改悔，而
禁半城寒窗人
念之益深。有甚其
致。特此
士的
五
杭州

们终有此感。痛
苦的支票并口信，
可引起幻想，而不
如重教育初学相

毛泽东致黄炎培信的手稿。

西藏自治机关的具体形式由西藏 大多数人民的意愿决定^[1]

(1954年3月23日)

为了照顾少数民族特别是西藏的情况，在草案^[2]第六十一条中写了第三款，即：“各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的具体形式，按照实行区域自治的民族大多数人民的意愿规定。”现在西藏是达赖^[3]管事情，如按第六十一条第二款办，就要开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人民政府。这样办，恐怕达赖不干。他可以搬出我们和他订的十七条协议^[4]，质问我们。怎么办？可以按照第三款办事。搞人民政府不行，可以搞别的具体形式。达赖是活佛，是活神仙，不是人民选出来的。现在想马上选又不行，究竟搞个什么形式，由那里大多数人民的意愿决定。他们信达赖、土司^[5]比信我们信得厉害得多，你要

[1] 这是毛泽东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起草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的插话。

[2] 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

[3] 达赖，即达赖喇嘛·丹增嘉措，当时是西藏地方宗教和政治领袖之一。

[4] 十七条协议，指1951年5月23日在北京签订的《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共17条。

[5] 土司，是旧时在一些少数民族地区设置的由少数民族首领充任并世袭的官职，分多种等级。

动他是动不得的。好吧！就按照大多数人民的意愿办事吧！不这样，又有什么办法？我对西藏代表团说过，我们不强迫你们，你们搞不搞土地改革，搞不搞选举，由你们决定。十七条协议不实行可以不可以？不可以，一定要实行。但其中哪一条你们现在不愿实行，可以暂时不实行，可以拖。因为协议上并没有说哪年哪月哪天一定要实行。已经拖了三年，如要拖，可再拖三年。三年过去后，还可拖三年，拖它九年也可以。不能干人家反对干的事情，要等待人民的觉悟。我们相信人民一定会觉悟。我们曾发表过社论说：汉族干部不能干西藏人民所不愿干的事，要按大多数人民的意愿办事。第六十一条第三款，是否可和人民的意愿并列加个少数民族领袖人物的意愿？不加也可以，反正他们是绝对拥护他们的领袖的，认为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宪法中如加上，看起来就不那么冠冕堂皇，所以没有加。

在宪法起草委员会 第一次会议上的插话^[1]

(1954年3月23日)

(当谈到宪法草案的起草工作时)

毛泽东(以下简称毛)：宪法起草小组自一月七日开始工作，三月九日工作结束。起草小组进行了一度工作后，由董必武、彭真、张际春等同志组成了研究小组，还请了周鲠生先生和钱端升先生为法律顾问，叶圣陶先生和吕叔湘先生为语文顾问，又搞了个把月，同时中共中央也讨论了三次，每次都有很多修改。

(当谈到宪法必须根据国家性质和经济关系，充分表达我国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这一根本要求时)

毛：这个宪法，是以共同纲领为基础加上总路线，是过渡时期的宪法，大概可以管十五年左右。

(当谈到共同纲领中的一些根本原则在宪法草案中被肯定下来，共同纲领中有些已经过了时的东西没有再写进宪法时)

毛：如土地改革；又如镇压反革命，虽然现在还有反革命分子，但是很大一部分已经镇压过了。

[1] 这是毛泽东在陈伯达作关于宪法草案（初稿）起草工作的说明时的插话的一部分。

(当谈到宪法草案不仅采用了共同纲领规定的各项根本原则，而且还吸取了建国以来各项重要法令中的一些原则时)

毛：例如国家建设征用土地办法，共同纲领上就没有。

(当谈到保护各种所有制时)

毛：宪法草案上有个其他个体劳动者，这是指：摊贩、夫妻商店、船夫、戏班子等等，他们既是劳动者，也是私有者。比如梅兰芳，他也是劳动者，他的戏班子又是他个人的。

(当谈到毛泽东说过个体经济像个汪洋大海，把他们变为集体所有制很复杂很困难时)

毛：最困难。改造资本主义困难，比较说来，改造个体农业、手工业更困难。人多，分散，一万万一千万户农民，就有一万万一千万个单位，我们要指挥这么多单位好困难啊！征粮、购粮，是一万万一千万个单位，怎么得了？你干，他不干；你要买粮食，他不卖，怎么办？为什么我们没有肉吃？就是因为他们吃多了。福建省长汀县河田镇，解放前一天杀三头猪，现在杀十八头猪，还不够吃。

(当谈到采用过渡形式，逐步改造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使之向社会主义过渡时)

毛：我们的宪法，是过渡时期的宪法。我国的各种办法，大部分是过渡性质的。人民的权利，如劳动权、受教育权等等，是逐步保证，不能一下子保证。现在有人进不了学校，就打学校；说，什么人民政府！不让我进学校，我就打你。没有那么多的学校，怎能都进呢？我们的选举，也是过渡性质的选举。普遍，算是普遍了，但也有限制，地主没有选举权，也不完全普遍；平等，城市选的代表多，乡村选的代表少，如完全按人数平等选举，那人民代表大会就几乎成了农民代表大会，工人就变成了尾数；直接，我们只有基

层选举是直接的，其余都是间接的；无记名，我们一般是举手，还是有记名。总之，我们的办法不那么彻底，因为是过渡时期。怎样选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是不是乡村八十万人口选一个，城市十多万人口选一个，这些问题，在选举法上去做文章好了，这里就不写了。人民的权利和义务，也有过渡时期的特点。支票开得好看，但不能兑现，人民要求兑现，怎么办？还是老实点吧！

（当谈到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同国家主席与国务院总理的关系时）

毛：我们的主席、总理，都是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出来的，一定要服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不能跳出“如来佛”的手掌。资本主义国家名义上是议会选出政府，通过法律，实际上议会是政府的附属品。我们中央有个国务院，就是中央人民政府；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出的由主席、副主席、委员组成的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就是国家的地方各级管理机关，也是国家权力的地方机关。因此，地方上就没有常务委员会了。苏联叫最高苏维埃，我们叫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苏联叫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我们叫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苏联叫部长会议，我们叫国务院。我们就是多个主席。有个议长，还有个主席，叠床架屋，这个办法可以不可以？各人民民主国家中，捷克、民主德国是这样的制度，他们叫总统，我们叫主席。议会议好的东西，归主席发布；但他不能发布议会没有议过的东西；他也不能行，行是国务院的事。这个大家是不是赞成？可以讨论。

（当谈到下级人民代表大会服从上级人民代表大会，下级人民政府服从上级人民政府时）

毛：这里是母亲服从儿子。省、市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议出来的东西全国四十四个

省、市都要服从。假若某一个省人民代表大会议出的东西不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可以把它撤销。

（当谈到中央的统一领导和各地方、各民族的积极性可以相结合，这一点和苏联、各人民民主国家一样时）

毛：中央议事，地方办事。和专制时代不同。

（当谈到我们的国家主席与资本主义国家的总统不同，资本主义国家的总统是与国会对立的时）

毛：资本主义国家的总统可以解散国会。我们的主席不能解散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相反地，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倒可罢免主席。

（当谈到我们的国家实行集体领导，而以个人形式来表现时）

毛：主席也不是政府，国务院不向他报告工作。打屁股打国务院总理，不打主席。关于主席的职权，草案第四十条第五款规定，担任国防委员会主席，而国务院又有国防部，我们还是叠床架屋，这是从国务院分了一点工作。第六款规定，在必要的时候召开最高国务会议。议什么事没有讲，总之不能违反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必要的时候”，也就是说很少开，有紧急的大事情才开会商量一下。大家看这样规定妥当不妥当？第一、二、三、四款，都是例行公事。第二款是说可以提出建议，建议不起决定作用，人家愿理就理，不理拉倒，毫无办法。这两条是说，主席也有些事做，不是专门吃饭。这是为保证国家安全起见，设了个主席。我们中国是一个大国，叠床架屋地设个主席，目的是为着使国家更加安全。有议长，有总理，又有个主席，就更安全些，不至于三个地方同时都出毛病。如果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出了毛病，那毫无办法，只好等四年再说。设主席，在国务院与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之间有个缓冲作用。

（当谈到根据我国经验，设个主席有好处时）

毛：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的职权，大部移到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常务委员会去。现在没有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故政府委员有六十三人，以后这六十三人的委员会的工作就变成常务委员会的工作。

（当谈到国务院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执行机关，这和各社会主义国家的规定属同一类型，但有一些差别时）

毛：中央各部、各委员会列不列？我们没有列，苏联一九一八年的宪法也没有列。不列，伸缩性大。部、委员会可能经常变动，或增或减，如果列了，变动一次，就要修改一次宪法，这样，宪法就要年年修改了。

（当谈到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民族之间过去有矛盾时）

毛：所谓矛盾，主要是大民族压迫小民族。古代也有小民族压迫大民族的，如元朝蒙古人压迫汉人，如五胡十六国等等。但到后来就不同了，清朝是利用汉族压迫少数民族。到国民党时期，就更不同了。

（当谈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我国的民族关系一天天好起来时）

毛：还有不少毛病，主要是汉族干部中有大汉族主义，个别的还有地方民族主义；也出过不少乱子，但基本上是好的。有的地方，少数民族的人当主席，汉族的人当秘书，结果是秘书专政，少数民族的人当主席是做做样子，少数民族做官，汉族掌权。内蒙古大概要好点。这种情形是有的，要继续改良，继续教育。

（当谈到宪法草案的结构时）

毛：有人主张把第二章的六节变成六章。宪法起草小组考虑把这六部分列在一章，加个总题目叫国家组织系统，很清楚。如分列为六章，好像有些头绪纷繁。宪法可以随时修改，苏联增加一个

部，减少一个部，都要修改宪法。

(当谈到宪法草案文字尽量通俗，以便群众了解和掌握时)

毛：把什么什么“时”都改为“的时候”。讲话一般不说“我们在讨论宪法时”，而说“我们在讨论宪法的时候”。“为”字老百姓不懂，都改成了“是”字。什么什么“规定之”，“之”字在一句话的末尾，只是重复了上面的，毫无用处，也都去掉了。也许还有改得不彻底的地方，还可以改。



毛泽东十分关注祖国的文物古迹、历史遗产。图为1954年毛泽东在故宫参观出土文物。



1954年，毛泽东在故宫观赏汉代陶马。



《以史为鉴》(中国画)



1954年3月24日，毛泽东和蔡畅（左二）等在北京西郊。



1954年，毛泽东在北京郊区农村视察。

关于发表德国统一社会党 将反党反人民分子开除出党的 新闻稿的批语

(1954年3月28日)

退刘少奇同志：

此件^[1]可在人民日报发表，并写一社论^[2]，称赞德国党的正确措施，我们大家应提高警惕性。

毛泽东

三月廿八日

[1] 指《人民日报》送审的关于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第十七次全会决定将反党反人民分子开除出党的新闻稿。新闻稿说：《新德意志报》1954年1月25日发表了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第十七次全体会议的公报，宣布把进行分裂活动的反党分子海恩斯泰特（前德国统一社会党政治局候补委员、《新德意志报》总编辑）和蔡塞尔（前德国统一社会党政治局委员、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公安部长）二人开除出党，并对在反对海恩斯泰特——蔡塞尔反党集团的斗争中犯了原则错误的其他三名政治局候补委员阿克曼、颜德累茨基和史密特给予严重警告和警告的处分。这篇新闻稿载于1954年4月9日《人民日报》。

[2] 1954年4月9日《人民日报》社论的题目是《德国统一社会党捍卫党的团结和统一的成就》。

给彭石麟^[1]的信

(1954年3月31日)

石麟先生：

一九五四年三月九日函示敬悉。尊事已托毛蕊珠^[2]兄，我的斡旋可以不必了。我不大愿意为乡里亲友形诸荐牍，间或也有，但极少。李漱清^[3]先生、文运昌^[4]兄，以此见托，我婉辞了，他们的问题是他们自己托人解决的。先生生计困难，可以告我，在费用方面，我再助先生若干，是不难的。此复，祈谅是幸。顺致
敬意

毛泽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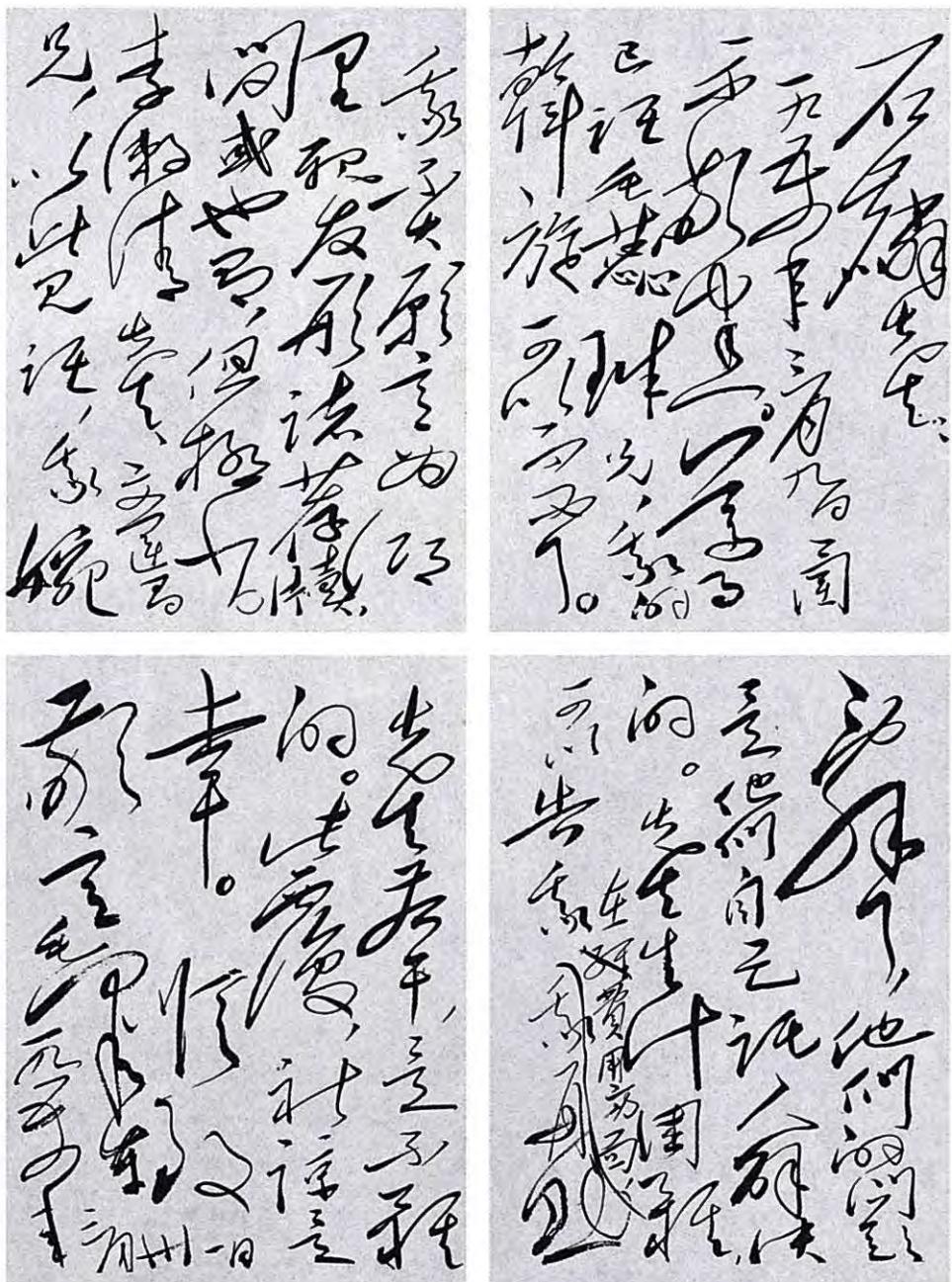
一九五四年三月三十一日

[1] 彭石麟，大革命时期曾任湘潭县清溪乡女子职业学校校长。毛泽东在清溪乡一带从事革命活动时得到过他的帮助。

[2] 毛蕊珠，即毛宇居，毛泽东的堂兄和少年时的私塾老师。

[3] 李漱清，毛泽东少年时的老师，大革命时期曾协助毛泽东在广州办过《政治周报》，建国后，曾任湖南省文史研究馆馆员。

[4] 文运昌，毛泽东的表兄。



毛泽东致彭石麟信的手稿。

关于修改“毛泽东军事思想” 一处提法的批语^[1]

(1954年4月1日)

“附件”中“在毛泽东军事思想基础上努力学习……”，应改为
“在毛泽东同志的号召下努力学习……”。

毛泽东
四月一日

[1] 这个批语写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院长兼政治委员刘伯承1954年3月27日关于呈请批准毕业证件的报告上。文内说的“附件”，指附在刘伯承报告后的对毕业证章制法的说明。毛泽东对其中关于“内容说明”的第三项作了修改。“附件”原来的文字是“毛主席题字：‘努力学习，保卫国防’是表示在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基础上努力学习苏联先进军事科学，建设现代化的国防。”

关于帮助越南建立炮兵团、工兵团问题给彭德怀^[1]的信

(1954年4月3日)

彭德怀同志：

越南必须增建四个炮兵团、两个工兵团，限期六个月内组成装备并训练成功，请计算是否可能。炮如不足，应从中国现有炮兵中抽调，让我们的一部分炮兵暂时变为徒手，以待将来补充。四个炮兵团两个工兵团的教员和顾问，应全部从去朝鲜打过仗的炮兵部队中抽调，应有师级和军级干部。训练地点最好在越南，否则广西亦可。六个月时间甚紧，如你同意，请饬参谋部会同炮司^[2]迅速作出计划，一方面电商越方取得同意，务须全力以赴。两个炮兵师，不是招新兵，要以正规步兵师团或独立团营改充。此两个炮兵师建成，连前一个炮兵师，再集中五个步兵师，共步炮八个师，就可攻击河内、西贡了。此外为三个炮兵师所需的充足的炮弹和工兵器材的供应，亦须立即筹备。高射炮应相应增加。奠边府必须坚决攻克，如机动顺利，确有把握，应提早总攻。为补充奠边府的兵员消耗，应立即至少动员五千至八千新兵，训练三个月，迅即补充缺

[1] 彭德怀，当时任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

[2] 炮司，即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司令部。

额。休整一个半月至多两个月即打琅勃拉邦和越曾（如无真正不可克服的困难，夏秋两季务必完成），冬季至迟明年初春即打河内。日内瓦和谈即使成功，上述炮兵建设不变。以上请酌处。

毛泽东
一九五四年四月三日

关于掘运朝鲜战争中 军事人员尸体问题的电报

(1954年4月3日)

李相朝、杜平、丁国钰^[1]三同志，并告金首相、彭司令员^[2]：

一九五四年三月二十日简报、三月二十二日十二时及三月二十八日十三时请示电^[3]均悉。一般同意来电所提各点意见。

(一) 对方提出自五月一起掘运尸体。鉴于我们的实际准备情况，掘运开始日期应予推迟。但在会议斗争中必须保持主动，以配合日内瓦会议。

(二) 对方在掘尸问题上存有弱点。首先，对方前后交来墓地材料自相矛盾，予我以质问对方要求交代的很好材料。其次，对方所提正在集中墓地的政策，严格地说，是与停战协定不符的。停战协

[1] 李相朝，朝鲜人民军中将，当时任朝鲜停战谈判朝中代表团首席代表。杜平，当时任中国人民志愿军政治部主任、朝鲜停战谈判朝中代表团代表。丁国钰，当时任朝鲜停战谈判朝中代表团代表。

[2] 金首相，指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首相金日成。彭司令员，指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

[3] 3月20日简报、3月22日12时及3月28日13时请示电，均为李相朝、杜平、丁国钰关于朝鲜停战各方前往对方地区掘运本方军事人员尸体问题的谈判情况，以及美方所提方案和我方意见、措施向毛泽东、金日成、彭德怀的请示报告。

定规定一方军事人员的尸体应由其本方人员在坟墓所在地掘出并运走。对方将我方人员尸体掘出、搬运、集中，已与停战协定不合，而且将我方人员尸体掘出、集中、重行埋葬，然后再由我方人员前往重行掘出运走，于理亦不合。尸体既已掘出应即送交我方，没有理由重行予以埋葬。根据这一理由，我们可以提出各自掘运本方地区内对方人员的尸体进行交换的办法，而对方将比较难以反对。

(三) 因此，我们的对策应该是一方面迅速提出对方地区内广泛分布的我方人员墓地的材料，要求对方交代其历次提出材料中自相矛盾之处，另一方面争取交换尸体而不必派人掘运，如争取不成，则将我方地区内的对方尸体亦加以集中。

在具体做法上，可首先提出墓地材料，要求对方证实与交代，然后提出交换尸体的办法，准备就此与对方讨论一个时期，而一时不必进入具体掘尸办法与成立机构的讨论，亦无须在会议上提出推迟掘尸时间。

(四) 来电所述关于召集有关方面的会议来汇报并搜集我方人员墓地材料、调查对方所提我区墓地材料、确定集中地点以及掘尸的具体安排等筹备工作，应立即抓紧进行。同时志司应即按你们所拟提纲，通知在朝鲜的和在东北的志愿军部队将材料搜集于四月下半月内送开城，人民军方面请金首相令有关方面搜齐送开城。在国内其他地区的前志愿军部队材料可于五月上半月内送开城。

毛泽东

一九五四年四月三日

对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条例 草案的批语^[1]

(1954年4月15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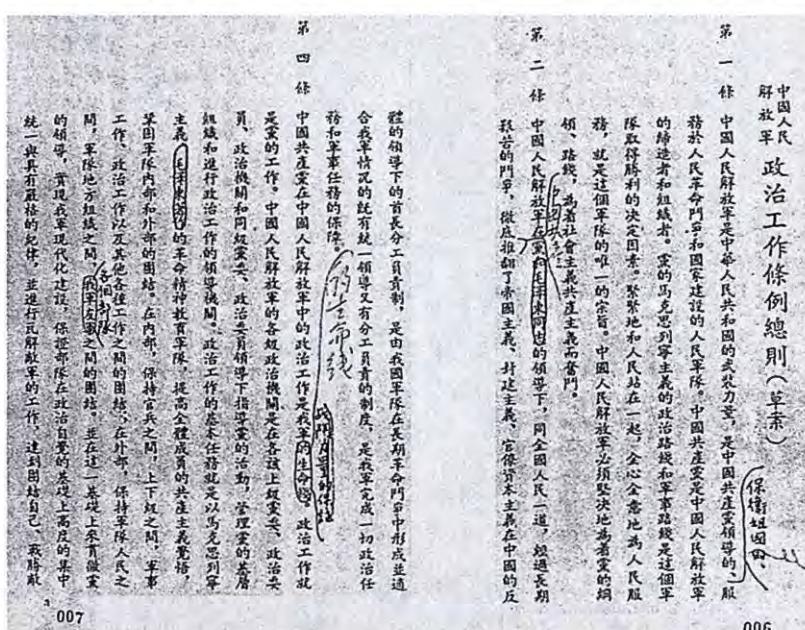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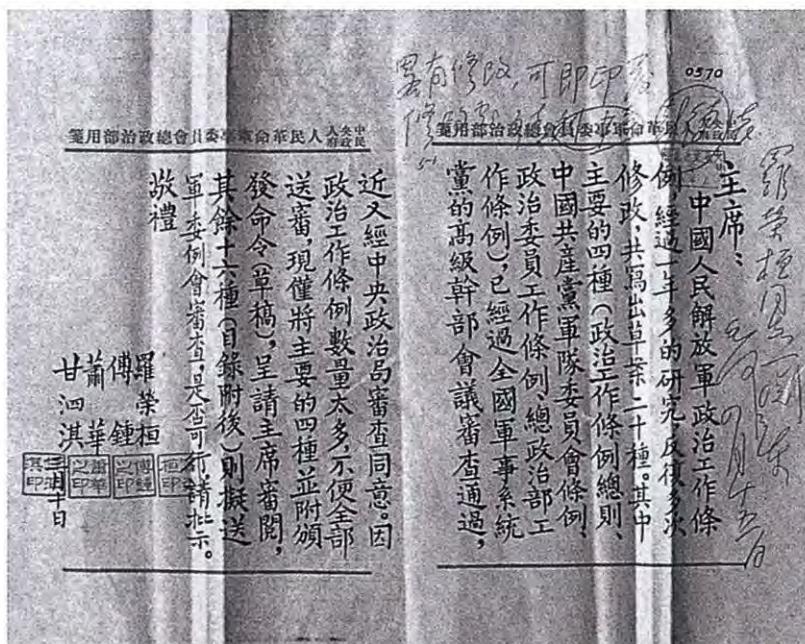
略有修改^[2]，可即印发。修改处请刘少奇、彭德怀^[3]、罗荣桓同志一阅。

毛泽东
四月十五日

[1] 这个批语写在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主任罗荣桓、副主任傅钟、肖华、甘泗淇1954年3月10日给毛泽东的报告上。报告中说：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条例，经过一年多的研究、修改，共写出各条例草案二十种，其中主要的四种，即：政治工作条例总则、中国共产党军队委员会条例、政治委员工作条例、总政治部工作条例。

[2] 毛泽东所作的修改，主要是把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条例总则草案第二条的首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党和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改写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同时把这一条的“积极地有步骤地建设自己成为世界上第二支最优良的现代化的革命军队”一句中的“世界上第二支最”7个字删去。

[3] 彭德怀，当时任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



1954年4月，毛泽东批准颁布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部中国军政工作条例，并在审阅时恢复了被陈伯达删去的关于政治工作是我军的生命线的表述。

关于越南军事部署的批语

(1954年4月17日)

黄、粟^[1]:

(一) 可照韦国清^[2]粟裕所提意见办理，彭电^[3]可不发；(二) 估计到越南有停战可能，新建炮兵训练不宜在我国境内，并宜将炮等早日运入越境，请商韦国清另作计划。

毛泽东

四月十七日

刘^[4]阅后，退黄克诚、粟裕办。

[1] 黄，指黄克诚，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总后勤部部长。粟，指粟裕，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

[2] 韦国清，当时任驻越南军事顾问团团长。

[3] 指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彭德怀为军委起草的给韦国清的电报。

[4] 刘，指刘少奇。

对罗瑞卿^[1]在东北地区党的 高级干部会议上的发言稿的批语

(1954年4月17日)

此件可用。略有修改。^[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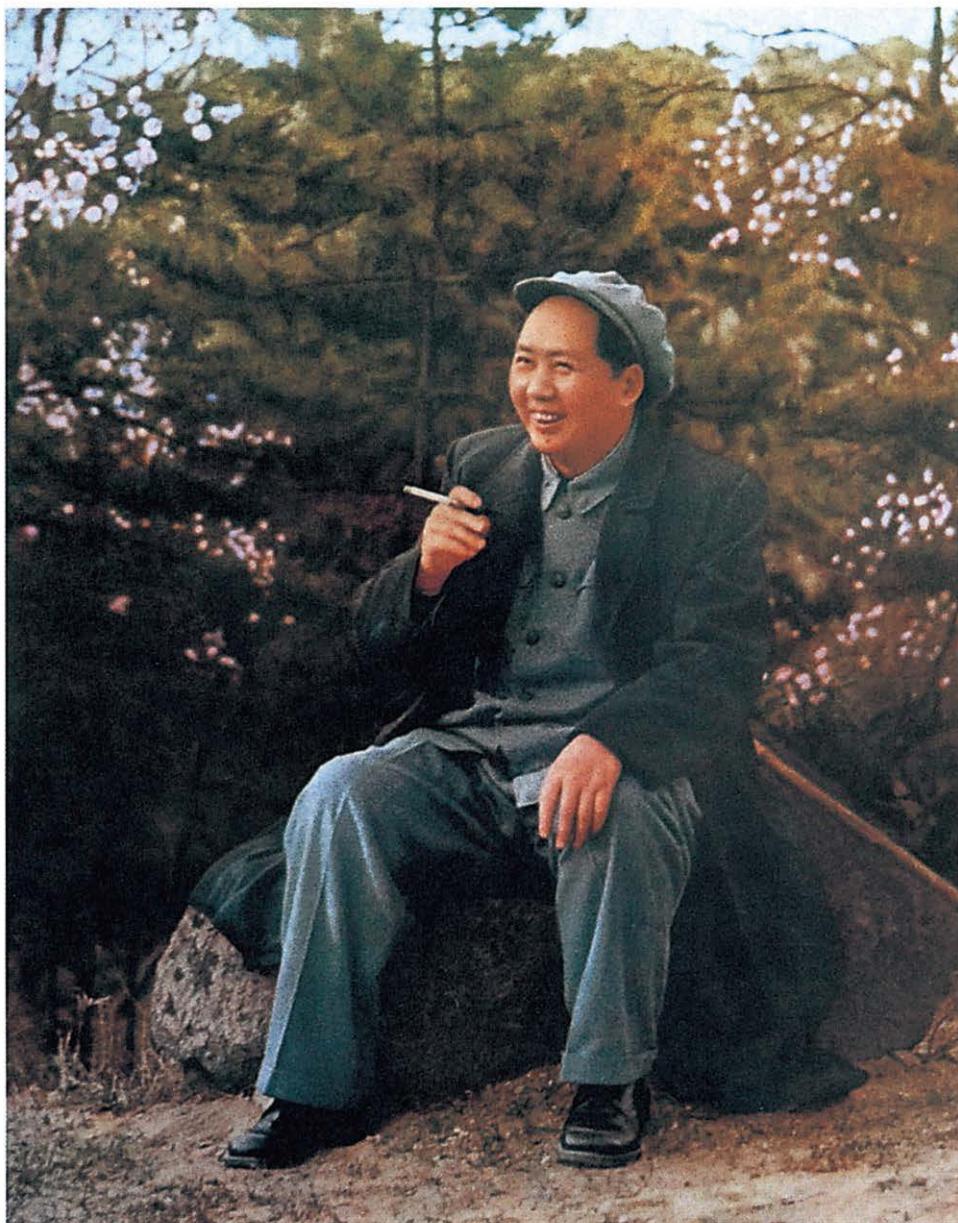
毛泽东
四月十七日

[1] 罗瑞卿，当时任政务院政治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兼公安部部长。

[2] 此件，指罗瑞卿在东北地区党的高级干部会议上的发言稿。毛泽东对发言稿所作的修改主要有：（一）将“依靠我们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的正确领导”一句改为“依靠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的中央委员会的正确领导”。（二）删去了“我们党在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以及“这与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正确领导与特别关心分得开吗？”两句中“和毛泽东同志”“和毛主席”的字样。



1954年，毛泽东在视察途中。



1954年，毛泽东在北戴河西山小憩。



1954年，毛泽东和江青、李讷、毛远新在北戴河合影。

给文平山^[1]的信

(1954年4月21日)

平山同志：

来信收到，甚为高兴。

和你祖母合照的像片，没有多的，故未寄你。

毛雪华^[2]同志在苏联学习，现时你不必和他通信。此复。祝你进步！

毛泽东

一九五四年四月廿一日

[1] 文平山，毛泽东的表兄文运昌的孙子。

[2] 毛雪华，毛泽东的堂侄。



1954年4月21日，毛泽东登上“天下第一关”山海关。

关于游泳池建造费 由稿费中支出给刘少奇等的信

(1954年4月25日)

刘、陈、邓、罗瑞卿、尚昆、汪东兴^[1]诸同志：

江青此信^[2]请阅。为补救计，建造费五亿^[3]由我的稿费中支出，游泳池封闭不用。

毛泽东

一九五四年四月廿五日

[1] 刘，指刘少奇。陈，指陈云，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政务院副总理兼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邓，指邓小平，当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财政部部长。罗瑞卿，当时任国务院政治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兼公安部部长。尚昆，即杨尚昆，当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当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警卫局局长。

[2] 指江青1954年4月20日给毛泽东的信。信中对她擅自提议给毛泽东修建游泳池一事作了检讨。

[3] 这里是以当时流通的人民币计算的，按中国人民银行1955年3月1日起发行的新人民币折算，合5万元（新币1元等于旧币1万元）。

在《苏联宣传中对斯大林提法的改变》材料上的批语

(1954年4月28日)

刘少奇同志：

此件^[1]，及去年冬季中宣部所辑关于反对个人崇拜反对教条主义的一个文件^[2]，都是重要文件，宜作为内部文件，印发给在京及

[1] 指中国驻苏联大使张闻天1954年3月27日报送中共中央办公厅的题为《苏联宣传中对斯大林提法的改变》的材料。这份材料指出：一年来，苏联宣传中对于斯大林的提法有了一些改变。这种改变从1953年4月已有些端倪，到7月后便已十分明显。主要表现在两个问题上：一是过去对于斯大林的功绩提得过高，有些个人崇拜的偏向，为了纠正这个偏向，目前对于苏联在各方面的成就，包括在国家工业化、农业集体化、文化革命、伟大卫国战争等方面所获得的成就，多强调群众的功绩，强调党的领导，强调包括有列宁其他学生在内的党中央委员会的集体领导，斯大林个人的功绩则很少提到，更不单独叙述。二是对列宁和斯大林两人的评价，过去往往把斯大林和列宁相提并论，甚至比列宁提得还多些，现在有所纠正，特别强调斯大林是列宁的继承者。今年苏联各报纪念斯大林逝世周年的文章，多以“斯大林是列宁事业的伟大继承者”为标题。材料还介绍了苏联报刊对斯大林在革命运动与理论贡献方面一些具体问题的提法的改变。

[2] 指中共中央宣传部编印的《宣教动态》1954年第三、四期刊载的中国驻苏联大使馆研究室1953年12月25日报送中央宣传部的两个参考材料，一个是《苏联宣传工作中的几个问题》，另一个是《苏联共产党反对宣传工作中的教条主义》。

在各地的中委，候补中委，在京每〈某〉些应当『年』阅读的同志（如李维汉，安子文^[1]），请考虑酌定。

毛泽东
一九五四年四月廿八日

[1] 李维汉，当时任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安子文，当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

关于修建闽南铁路 线路问题的信和批语

(1954年4月28日)

—

陈委员^[1]:

一月二十二日惠书^[2]收到。所提建议，已交铁道部研究。此复。顺祝
健康

毛泽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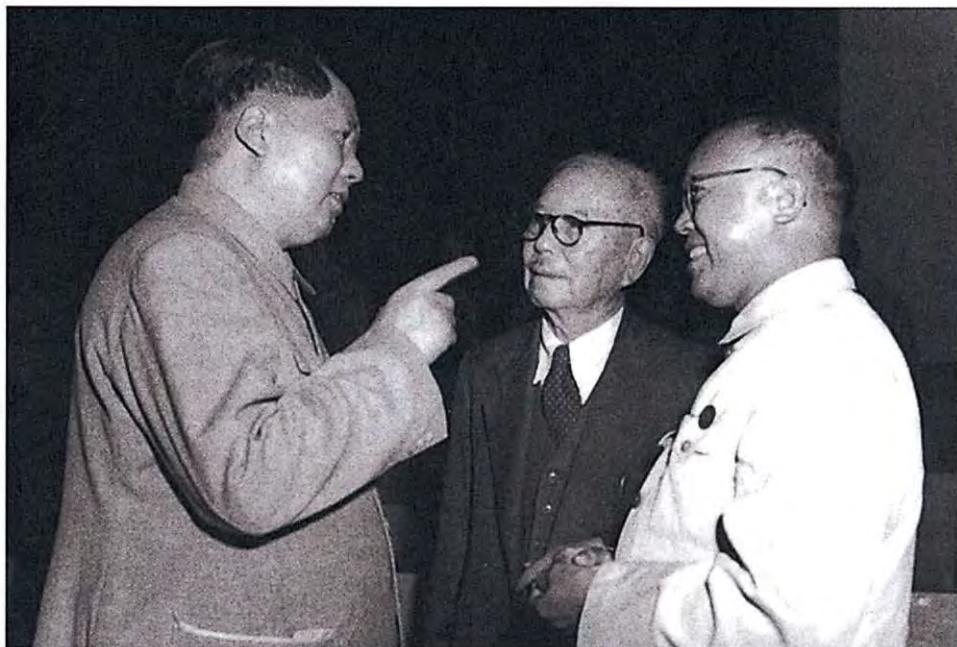
一九五四年四月廿八日

[1] 指陈嘉庚，爱国华侨领袖，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华侨事务委员会委员。

[2] 指陈嘉庚1954年1月22日给毛泽东的信。信中报告了他向周恩来提出的关于修建闽南铁路的线路的建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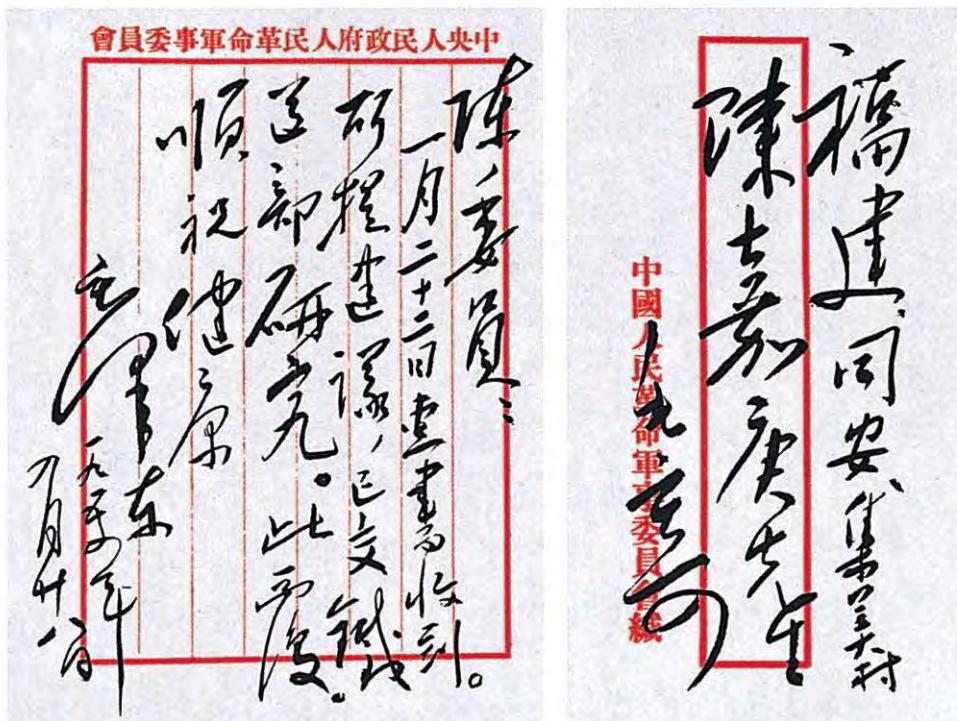
—
—

抄送铁道部研究，原信退我待复。^[1]



1954年，毛泽东和爱国华侨领袖陈嘉庚等亲切交谈。

[1] 这是毛泽东写在陈嘉庚1月22日来信上的批语。



毛泽东致陈嘉庚信的手稿。

奠边府作战最大可能发生的危险 在后方交通线^[1]

(1954年4月28日)

彭德怀、黄克诚同志：

目前越南最大可能发生的危险，似乎不在奠边府以南，而在我军的后方交通线。如敌以两个伞兵营降落在我后方交通线上最扼要的地点，筑堡据守起来，整个交通将为之切断，如我军不能迅速歼灭此敌，旷日持久，奠边府我军即有被迫撤退之可能。军委去电已估计到敌有袭占交通线可能，但强调不够，并以之与郎勃拉邦方向并列。请你们再加考虑，叫越方迅调必要兵力位于适当地区，专门对付此种意外事变，以免奠边府作战功亏一篑。

毛泽东

四月二十八

[1] 这是毛泽东写给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彭德怀、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总参谋长兼总后方勤务部部长黄克诚的信。

给毛少贤^[1]的信

(1954年4月28日)

少贤同志：

去年十二月的信收到，感谢你的好意。眼病以就近医治为宜，出外不容易。此复。

顺祝健康

毛泽东
一九五四年四月廿八日

[1] 毛少贤，毛泽东的远房亲属。



1954年，毛泽东在江苏视察。

给石城乡党支部、乡政府的信

(1954年4月29日)

石城乡支部、石城乡政府诸同志：

毛月秋^[1]同志来北京，带来你们的报告，甚为感谢。

我的亲戚唐家圫文家，过去几年常有人来北京看我。回去之后，有些人骄傲起来，不大服政府管，这是不对的。文家任何人，都要同乡里众人一样，服从党与政府的领导，勤耕守法，不应特殊。请你们不要因为文家是我的亲戚，觉得不好放手管理。我的态度是：第一、因为他们是劳动人民，又是我的亲戚，我是爱他们的。第二、因为我爱他们，我就希望他们进步，勤耕守法，参加互助合作组织，完全和众人一样，不能有任何特殊。如有落后行为，应受批评，不应因为他们是我的亲戚就不批评他们的缺点错误。

现有文炳璋^[2]同志的一封信，付给你们看，我是同意文炳璋同志的意见的，请你们加以处理。并请你们将我这信及文炳璋的信给唐家圫的人们看，帮助他们改正缺点错误。我相信，只要我和你们都采取正确的态度，只要他们不固执成见，他们的缺点错误是可以改正，并会进步的。

[1] 毛月秋，大革命时期曾在韶山任中共慈悦支部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韶山毛泽东旧居做过接待工作。

[2] 文炳璋，毛泽东的表侄，当时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某部工作。

此致
同志的敬礼！

毛泽东
一九五四年四月二十九日

石城鄉支部 諸君
在城鄉政府請恩
有秋風來北京
帶來你們的敬告，甚
為感謝。

毛泽东致石城乡党支部、乡政府信的手稿。



毛泽东致石城乡党支部、乡政府信的手稿。

报纸上的批评要实行 “开、好、管”的方针^[1]

(1954年4月)

关于报纸上的批评，要实行“开、好、管”的三字方针。

开，就是要开展批评。不开展批评，害怕批评，压制批评，是不对的。

好，就是开展得好。批评要正确，要对人民有利，不能乱批一阵。什么事应指名批评，什么事不应指名，要经过研究。

管，就是要把这件事管起来。这是根本的关键。党委不管，批评就开展不起来，开也开不好。

[1] 这是毛泽东和胡乔木等的一次谈话。

给班禅额尔德尼^[1]的信

(1954年4月)

班禅额尔德尼先生：

感谢你一九五三年八月一日的来信和礼物。知道你身体很好并经常为团结努力，我很高兴。

西藏每年有些人来内地参观是很好的。此外，每年还可以选送一些青年来内地学习，长期学习和短期学习都好。因为这样可以更多地培养一些建设西藏的民族干部。

随函附上牛奶分离机一部，扩音机一部，两用无线电收音机一台。顺祝

健康

毛泽东

一九五四年四月

[1] 班禅额尔德尼，即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西藏宗教领袖之一。



1954年5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向群众挥手致意。



1954年5月1日，毛泽东、朱德等在天安门城楼上向群众挥手致意。



1954年5月1日，毛泽东出席首都庆祝五一劳动节大会。



1954年5月1日，毛泽东和献花儿童在天安门城楼上。



1954年5月1日，毛泽东、彭真等在天安门城楼上检阅队伍。



1954年5月1日，北京少先队员给毛泽东等献花。



1954年5月1日，毛泽东和董必武等在天安门城楼上。

给黄炎培^[1]的信

(1954年5月3日)

任之先生：

五月一日惠书并大作^[2]一册收到，甚为感谢！爱国热忱，溢于言表，足征孟进〈晋〉。大作尚待暇时从容研究。敬复。

顺问日安

毛泽东

一九五四年五月三日

[1] 黄炎培，字任之，当时任中国民主建国会主任委员、政务院副总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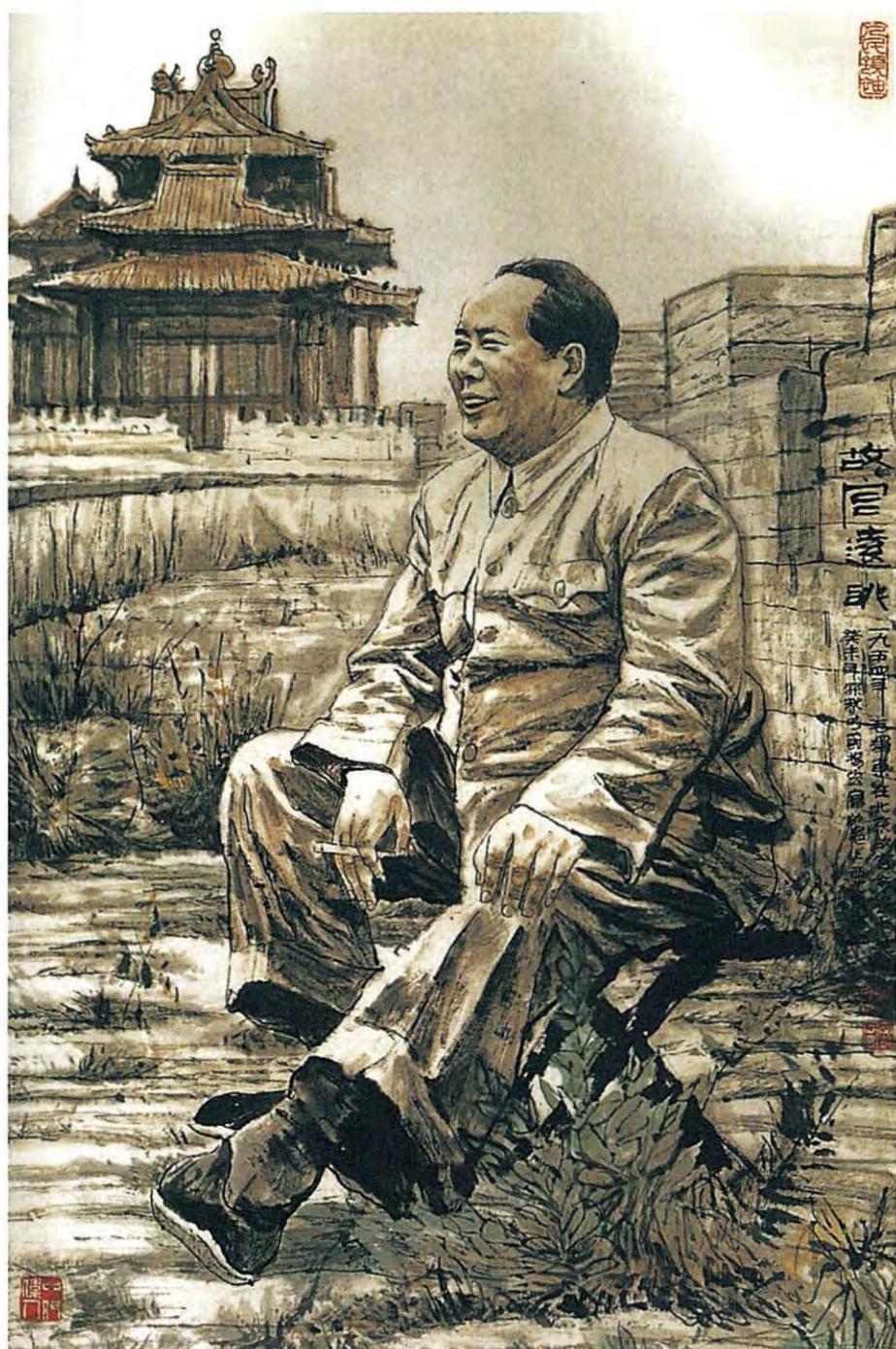
[2] 惠书，指黄炎培1954年5月1日给毛泽东的信。信中谈了他参加检阅“五一”群众大游行的感想，对中国革命的认识以及学习《资本论》第一卷的情况。大作，指黄炎培写的《读〈资本论〉第一卷》一书。



毛泽东致黄炎培的信的手稿。



1954年5月，毛泽东在北京故宫城墙上。



《故宫远眺》(中国画)



1954年5月，毛泽东和中华全国工商联合会主任委员陈叔通在一起。

资料图片



《荣辱与共 肝胆相照》(中国画)

对美方企图破坏停战协定活动 应予以揭发^[1]

(1954年5月12日)

李相朝、丁国钰二同志，并告金首相^[2]、志司^[3]并周总理：

五月九日十一时来电悉。对方指使两瑞^[4]建议修改停战协定，改换我方三个指定口岸，估计其用意除一般诬蔑我方并为美方辩护外，还在于为进一步破坏中监会^[5]制造根据，并将责任归于我方。这是美方近一时期的活动中心。因此，我们应挑出维护停战协定、维护中监会的旗帜，对美方企图破坏停战协定和中监会的活动在会内会外予以揭发，并由波捷^[6]配合行动。在两瑞委员尚未公开攻击我们之前，暂不对之作公开抨击，而由波捷出面与之斗争。

根据这个方针，我们应主动召开军停会^[7]，就波捷关于美方运

[1] 这是毛泽东给朝鲜军事停战委员会朝中方面首席谈判代表李相朝、朝鲜军事停战委员会中国人民志愿军代表团党委副书记丁国钰的电报。

[2] 金首相，指金日成，当时任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首相。

[3] 志司，即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

[4] 两瑞，这里指参加中立国监察委员会的瑞典、瑞士委员。

[5] 中监会，即中立国监察委员会。

[6] 波捷，这里指参加中立国监察委员会的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委员。

[7] 军停会，即朝鲜军事停战委员会。

入增援物资向军停会提出的报告进行反击，并提严重抗议。如果美方就两瑞的建议提出要求修改停战协定，我们应作总结性发言予以痛斥，并指出正在日内瓦会议期间美提出这一要求，是有意制造紧张气氛，影响日内瓦会议。如果他们不提此事，我们也不要主动提出，而由波捷向军停会提一声明，对两瑞来信加以批评，并视情况争取将波捷这个声明发表，同时由我记者对两瑞的来信作一评论报道（但口气必须平和说理，不要谩骂）发表。

我对中监会关于两瑞来信的复信可暂缓发出。

毛泽东

一九五四年五月十二日

为官厅水库建成题词^[1]

(1954年5月)

庆祝官厅水库工程胜利完成。

毛泽东

[1] 1954年5月13日，官厅水库建成。毛泽东亲临官厅水库视察，并且题词：“庆祝官厅水库工程胜利完成”。

毛泽东为官厅水库建成题词。 水利发电工程局
官厅水库管理局

毛泽东为官厅水库建成的题词。



1954年，毛泽东和李敏、李讷及身边工作人员在官厅水库工地。

对海军配属特种兵报告的批语^[1]

(1954年5月19日)

退黄克诚^[2]、粟裕照办。^[3]

毛泽东

五月十九日

[1] 这是毛泽东对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总参谋长粟裕1954年5月18日报告的批语。

[2] 黄克诚，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总参谋长兼总后方勤务部部长。

[3] 粟裕的报告说：由于蒋军不断对我东南沿海进行袭扰，致使该海区渔业生产受到很大影响。为使我海军训练与实战相结合，将华东海军主力推进到定海、石浦海区，并为加强今后海军的发展基础和海上对敌斗争，以转变闽浙沿海敌我斗争形势，应给予海军配属有关之特种兵部队以加强海军之战力。为此拟调部分装甲兵、野战炮兵、高射炮兵及部分空军部队归海军建制。

致南非印度人大会电^[1]

(1954年5月28日)

南非印度人大会联合名誉书记卡查利亚、米斯特里先生：

我代表中国人民完全支持南非的非白色人民（包括印度人及其他亚、非人民）争取民主权利、反抗种族歧视和压迫的正义主张。祝大会在团结印度人和所有的南非人民——白色和非白色人民——争取和平、自由、民主与进步的事业中获得成功。

毛泽东

一九五四年五月二十八日于北京

[1] 这是毛泽东给南非印度人大会联合名誉书记优素福·卡查利亚和米斯特里的复电，表示支持南非印度人争取民主权利、反抗种族歧视和压迫的运动。



1954年5月28日，毛泽东等接见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代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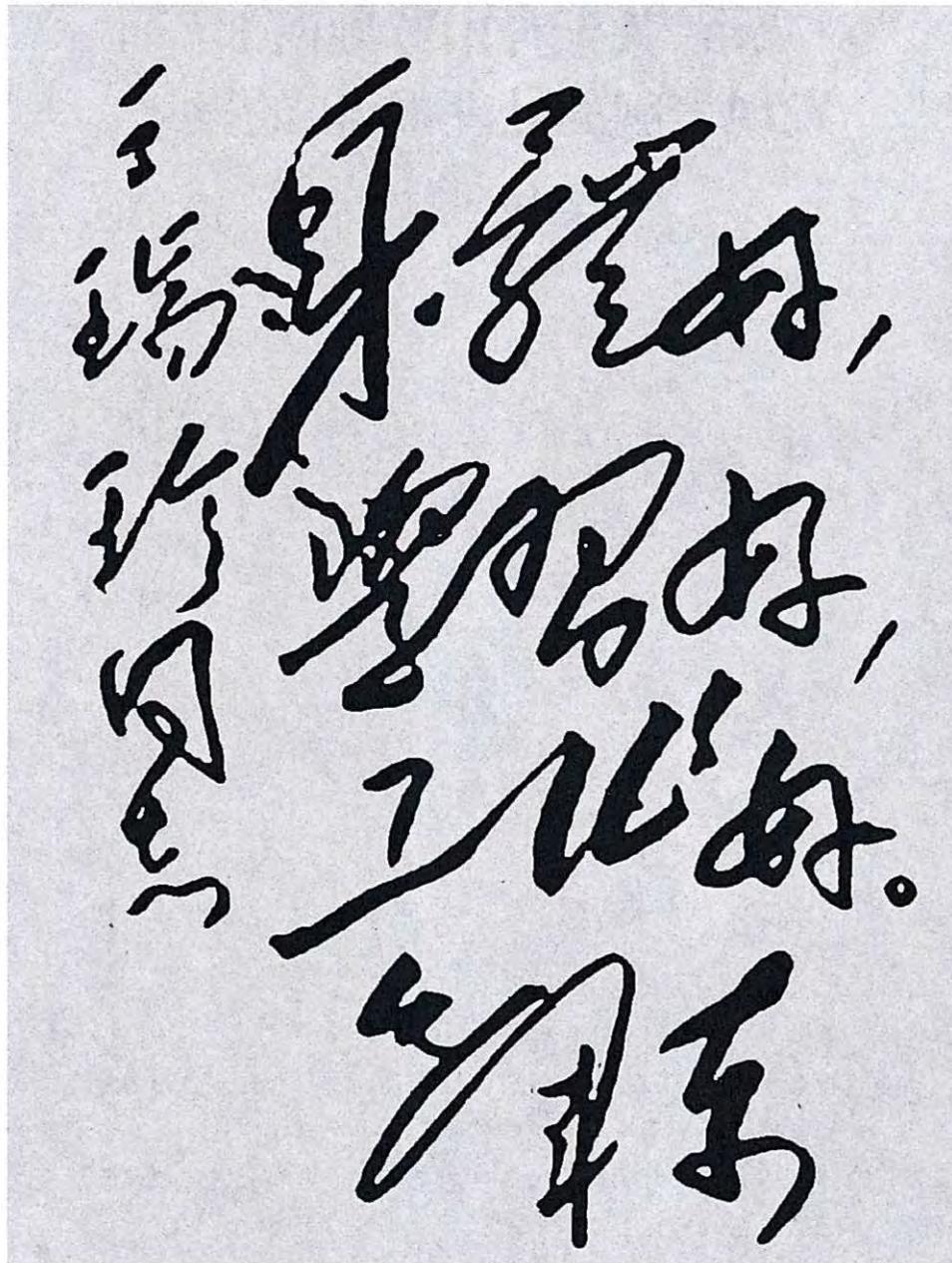
为育英学校教师王瑞珍题词

(1954年5月)

王瑞珍同志：

身体好，学习好，工作好。

毛泽东



毛泽东为育英学校教师王瑞珍的题词。

对粟裕^[1]关于舟山群岛南部海面发现美舰的处理报告^[2]的批语

(1954年6月2日)

处理正确，不要先向美军开炮，只取守势，尽量避免冲突。

毛泽东

六月二日

[1] 粟裕，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

[2] 指粟裕1954年6月1日关于舟山群岛南部海面发现美舰的处理情况给刘少奇、朱德并转呈毛泽东的报告。报告说，今晨接华东军区电话称，舟山群岛南部朱家尖岛东南至上下大陈以北之海面，发现敌巡洋舰及驱逐舰共八艘，并有飞机在该海区上空盘旋飞行。似此显系美帝向我军进行挑衅。当即要华东军区转告该区我军陆海空部队，对当面之敌应严密注意监视，随时报告。如敌不向我炮击或轰炸，我军不得向其射击，以免引起冲突。如大陈岛的蒋军乘机向我守岛部队进攻，则应予以坚决回击。

关于达赖、班禅^[1] 尽早起程赴京的批语^[2]

(1954年6月3日)

刘、邓、李维汉^[3]同志：

达赖、班禅等藏族代表应尽早起程，九月五日前（最好九月一日前）务必到达北京，请即作部署。

毛泽东

六月三日

[1] 达赖，即达赖喇嘛·丹增嘉措，西藏宗教领袖之一。班禅，即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西藏宗教领袖之一。

[2] 这个批语写在中共西藏工委1954年6月1日关于达赖为庆祝中印谈判成功宴请我驻藏干部的情况报告上。报告请中央尽早将达赖、班禅等藏族代表去北京开会的时间和人选下达布置。

[3] 刘，指刘少奇。邓，指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政务院副总理。李维汉，当时任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中央人民政府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

检查同中立国监察委员会 瑞典瑞士委员的关系^[1]

(1954年6月6日)

李相朝、丁国钰两同志，并告金首相^[2]、志司^[3]：

朝鲜中立国监察委员会已成为目前日内瓦会议的焦点，我们对于中监会^[4]的方针已电告你们，关于我们（朝、中、波、捷）对两瑞^[5]的关系请你们作一总的检查，在检查中望注意以下各点：

（一）在新义州和满浦应坚持事前报告和抽查的总方针，但对抽查方面不妨放松一些，无论波捷^[6]或朝中方面皆应注意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务使两瑞无可借口。

（二）在清津、兴南和新安州三地因无轮换与替换，在原则上自可不必容许抽查，但因对抽查限制过严反而启两瑞的疑心，不如适当增加一些抽查的机会使其无所得而退。

[1] 这是毛泽东给朝鲜军事停战委员会朝中方面首席谈判代表李相朝、朝鲜军事停战委员会中国人民志愿军代表团党委副书记丁国钰的电报。

[2] 金首相，指金日成，当时任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首相。

[3] 志司，即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

[4] 中监会，即中立国监察委员会。

[5] 两瑞，这里指参加中立国监察委员会的瑞典、瑞士委员。

[6] 波捷，这里指参加中立国监察委员会的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委员。

(三) 在我方各口岸对两瑞人员日常生活上予以适当照顾是对的，但对其一般活动上亦可在无大妨碍的情况下予以适当放宽。

(四) 应说服波捷同志在中监会中努力与两瑞共同确定一些事实，不必事事做结论，在日常生活中亦应尽可能地有些来往。

(五) 对于对方可能提出的特别调查应根据对方所有要求的具体性质予以考虑，如确实符合停战协定即不应以其麻烦而拒绝之。

(六) 对对方在南方口岸提出的新办法应根据前电精神予以处理。以上各点务必根据每一地每一事的实际情况逐步改进，切忌突然放松反而予对方（美、韩、两瑞）以示弱的印象。

(七) 以上各点请加注意。

(八) 你们关于我后方口岸的请示电已悉。同意来电所提各点意见。

毛泽东

一九五四年六月六日

对中央农村工作部关于第二次全国农村工作会议报告的批语和修改

(1954年6月7日)

—

刘少奇、邓子恢^[1]同志：

在第三页上作了一点修改^[2]，请酌定。

毛泽东

六月七日

—

这种有计划地大量增产的要求和小农经济分散私有的性质以及农业技术的落后性质之间的矛盾是越来越明显了，困难越来越多了。这是两个带根本性质的矛盾。解决这些矛盾的第一个方针，就是实行社会革命，即农业合作化，就必须把劳动农民个人所有制逐

[1] 邓子恢，当时任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

[2] 见本篇二、三两部分。

步过渡到集体所有制，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第二个方针，就是实行技术革命，即在农业中逐步使用机器和实行其他技术改革。

三

提高单位面积产量，是目前农业增产的主要出路。但要发挥这种增产潜在力，靠小农经济是有限的，靠在农业中实行大规模的机械化是工业发展以后的远景，在最近几年之内必须依靠大力发展农业合作化，在合作化的基本上适当地进行各种可能的技术改革。

关于印发宪法草案修正稿 给刘少奇等的信

(1954年6月9日)

少奇同志阅后，交李维汉^[1]同志：

此件^[2]可即印发有关各人（宪法起草委员、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并要他们于六月十一日带到会场。

毛泽东
六月九日

[1] 李维汉，当时任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政协全国委员会秘书长、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起草委员会委员。

[2] 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修正稿。这个修正稿在1954年6月11日举行的有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列席参加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起草委员会第七次会议上讨论通过，并批准公布，在全国范围内征求意见。在这次会议上还讨论通过了准备向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提交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起草委员会关于宪法起草工作经过的报告》。

宪法起草委员会第七次 会议讨论通过宪法草案记录

(1954年6月11日)

毛泽东：宪法起草委员会已经开了六次会议，今天是第七次会议，也可说是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开会前的最后一次会议。宪法起草委员会应当把它所做的工作向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报告，并把这个宪法修正稿作为草案批准公布，在全国人民中间进行讨论，收集意见。那时，起草委员会还要做工作。宪法草案公布以后，估计意见不会很多，但是尽管意见不多，总还会有些意见。在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作报告以前，宪法起草委员会还要开会，同时要准备一个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报告。因为宪法是起草委员会起草的，收集了意见后，还要修改；修改成了最后稿，还要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作报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则要根据这个报告进行讨论，这是它职权范围内的事。

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将要在最近开会。宪法草案大概在十五日以前公布，在全国人民中间还要进行两个半月到三个月时间的讨论。宪法草案公布后，要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广泛的解释，组织讨论。今天的会议是对宪法草案的全部条文作最后的审查。虽然大家对条文都很熟悉了，但是今天要表决通过，为了慎重起见，还是把它读一遍吧。

(齐燕铭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全文)

李维汉：第二章第四节的第五十三条第三款，第五十四条第二款，第五节的第六十七条、六十八条、六十九条、七十条、七十二条、七十二条和第三章的第一百条都有一些修改，并删去了一条，现在的全部条文共一百零六条。

毛泽东：说明一下，为什么这样改？

李维汉：第五节的改动，是因为没有照顾到前面，条文有点乱，所以在第五十三条增加了一款。

毛泽东：什么叫“民族自治地方”，需要解释清楚，在第五十三条加一款，就有交代了。民族自治地方不包括民族乡。

李维汉：第五十四条是讲自治区、自治州、自治县设立自治机关。另外，还把“按照宪法第六十七条的规定”改为“由宪法第二章第五节规定”。

毛泽东：改成这样比较清楚。第二章第五节有许多条，不只是第六十七条，它全部是讲民族自治机关的组织和工作的，你们讨论过没有？

李维汉：民族事务委员会扩大会议已经讨论过了。

毛泽东：第五节第六十七条的意见已经移到前面去了，这里可以把它删去，好不好？

第五节的修改都是属于文字性的。“各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都改为“自治区、自治州、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因为在第四节第五十三条已经把民族自治地方交代清楚了，所以，在第五节不应再笼统地提“各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

第六十七条加了“的组织”三个字。因为这一条是讲组织的，没有这三个字就不那么好。

第六十八条只是文字的修改。

第六十九条，把“第五十八条……第六十条”删掉，改为“第二章第四节”。因为这一条是讲职权的，而一切自治机关也都行使第四节规定的地方国家机关的职权。这一条的改动是不是这个意思？

李维汉：是。第六十七条是讲组织，第六十九条是讲职权，照现在的改法，就同第六十七条在形式上统一起来了。

毛泽东：为了节省文字起见，第四节规定的地方国家机关的职权，可以不必列举。如果列举了，好处是人家一看就很清楚，但缺点是这样写了，第六十七条也要列举。照现在的写法，要让人家自己去翻找，不知能不能翻得出来？

陈叔通：不难翻出来。

李维汉：将来可以在单行法中规定。第六十七条写的是根据第二章第四节规定的基本原则，不好具体列举。

邓小平：第六十七条不好列举具体条文。

李维汉：各民族情况也不同，不好列举。

毛泽东：既然第六十七条不列举，那么第六十九条也不列举。

第七十条、七十一条、七十二条都是文字性的修改。

大家对第四节和第五节的修改还有什么意见？草案公布以后总还会有修改的。

刘伯承：第二十一条和第四十九条十四项都写的是“武装力量”，第四十二条也应改成“统率全国武装力量”。

毛泽东：譬如军事仓库、国防工事、兵船、飞机、汽车、大炮、炮弹等等都算不算武装部队？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能不能统率？照原文的写法，主席只能统率部队，炮队就不能统率了。

邓小平：武装力量包括人民武装在内，如果人民武装也归主席

统率，可以改为“武装力量”。

毛泽东：民兵是不是归主席统率？那应该是政府的事。部队医院、军人休养所叫不叫部队？说“统率武装力量”是可以的，譬如“使用武力”不就是“使用武装力量”的简称吗！

陈叔通：还是照原文好。

毛泽东：初稿上原来写的是“武装力量”，后来怎么改成“武装部队”了？

钱端升：“武装力量”和“武装部队”两个名词翻译成俄文是一个词。当初所以把“武装力量”改为“武装部队”是认为部队可以统率，力量不好统率。我们法律小组的意见，可以考虑改成“武装力量”。

聂荣臻：第二十一条讲的就是武装力量。

毛泽东：武装力量分两部分，一部分是部队，一部分是部队以外的武装力量。如果照原文的写法，好像部队以外的武装力量不归主席统率了。恐怕还是将军们的意见对。语文顾问同志，你们看哪个意见好？

叶圣陶：还是改成“武装力量”好。武装力量能不能统率呢？我们看看第四条，这个问题就解决了。第四条写“……依靠……社会力量”一句话，既然社会力量可以依靠，为什么武装力量就不可以统率呢？

毛泽东：改成“武装力量”好不好？

黄炎培：武装力量包括人和物。语文专家的意见是可以采纳的。但是第二十三条的“武装部队”恐怕不能改成“武装力量”。

邓小平：可以改成“军队”。

刘少奇：改成“军队”好。

李立三：军队包括不包括警察？

毛泽东：警察是怎样进行选举的？

刘伯承：警察的选举是同政府在一起进行的。

张奚若：第五十四条第二款的“由”字是否改为“按照”？因为“由”字有点未确定的意思，既然在宪法的第二章第五节已经把自治机关的组织和工作规定得清清楚楚，还是用“按照”好一些。

周鲠生：“由”字含有将来的意思，用“按照”也不太好。索性用“在”字倒好一些。

毛泽东：“在”字不那么妥当吧。

黄炎培：用“按照”好。

李立三：还是用“由”字好，“按照”好像下面的话没有说完。

李维汉：当初是为了避免“按照”的字样过多，第四节“按照”第五节的规定，第五节又“按照”第四节的规定，不太好，才用了“由”字。意思是说，关于自治机关的组织和工作这里不规定了，由那里去规定。

毛泽东：“由”字比“在”字好，也比“按照”好。“由”字不一定解释为现在没有将来才有的东西，比如：“这件事我办不了，由他去办。”张先生的意见怎么样？三个字比较，恐怕还是“由”字好。

张奚若：我没有什幺意见。

张治中：第五节的标题“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的“民族”是指少数民族。原第六十七条和现在的第七十二条都标出了“少数”二字，第二十三条也有“少数”二字。第五节的标题是否也标明“少数”二字，或者在第五十三条新增加的最后一款中加“少数”二字。当然，不加也不会发生误会，但加上去更明确些。总纲

第三条也有“少数”二字。

毛泽东：总纲第三条第四款也用了“各民族自治地方”的字样，实际上是讲“各少数民族自治地方”，把“少数”二字省略了。

李维汉：“民族自治地方”是一个专门名词，不要把它拆开来讲。如果这里写作“少数民族自治地方”，则将来所有的文件都要写作“少数民族自治地方”了。

毛泽东：这是“省文”。第三条的“民族自治地方”本来可以加“少数”二字，但省略掉了，这样写人家可以看清楚。

张治中：第五节是讲少数民族自治的单独一节，是否加上“少数”二字，明确些。

毛泽东：如果要加，则“民族乡”要改为“少数民族乡”才算完全正确；“自治区”“自治州”“自治县”也都要改为“少数民族自治区”“少数民族自治州”“少数民族自治县”了。

张治中：条文里可以省，标题不要省。

李维汉：最近几年来都是用“民族自治地方”，比如“民族区域自治实施纲要”就没有“少数”二字，大家都明白是指少数民族。

赛福鼎：我的意见，“民族自治地方”即代表了“少数民族自治地方”，因为前面在第三条已经规定了：“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实行区域自治”，这里可以不写“少数”二字。

乌兰夫：第三条已经讲清楚了，第五节可以不写“少数”二字。

刘少奇：这是省文。比如“直辖市”，由什么地方直辖？是讲“中央直辖市”，把“中央”二字省掉了。因为除了中央直辖市就没有别的直辖市，不会误会。“民族自治地方”也是这样，因为只有少数民族自治，不会误会为别的。

毛泽东：其实哪一个民族都是自治，比如汉族，难道不是“自

治”，而是被别人治？只不过把“自治”二字省掉了。我看，再过上几百年几千年以后，大概就可以不要讲什么“民族自治”了。说“民族乡”，哪一个乡都是民族乡，难道你（指邓子恢同志）那个龙岩县白头乡不是民族乡，而是种族？部落？难道你那个乡不是自治而是被治？现在所以要特别标出少数民族自治，是因为少数民族过去是被汉族统治者治的，现在是实行自治，所以要标出来。汉人的地区就不要标出“自治”了，因为汉人从来就是自治的，只有好人治与坏人治的不同罢了。张治中先生，经过这样解释，可以清楚了吧？

张治中：我撤销这个意见。

毛泽东：第一百条，把“遵守公共生活规则”改为“遵守公共秩序，尊重社会公德”。因为有人研究了，说苏联的所谓“公共生活规则”的主要内容是讲社会公德。

黄炎培：改得很好。

毛泽东：还有什么地方要改的？能想得起来吗？如果想不出来，恐怕就差不多了。

宪法的起草，前后差不多七个月。最初第一个稿子是在去年十一、十二月间，那是陈伯达同志一个人写的。第二稿，是在西湖，花了两个月时间，那是一个小组写的。第三稿是在北京，就是中共中央提出的宪法草案初稿，到现在又修改了许多。每一稿本身都有许多修改。西湖那一稿，就有七八次稿子。前后总算起来，恐怕有一二十个稿子了。大家尽了很多力量，全国有八千多人讨论，提出了五千几百条意见，采纳了百把十条，最后到今天还依靠在座各位讨论修改。总之，我们是反复研究，不厌其详。将来公布以后，还要征求全国人民的意见。宪法是采取征求广大人民的意见这样一个

办法起草的。这个宪法草案大体上是适合我们国家的情况的。将来全国讨论以后，会有好的意见提出来，会有所修改，但总的方面不会有什改动了。

黄炎培：关于国歌问题。有人觉得现在的国歌是一个抗日战争时期的歌曲，已经过时了，有一个人还作了一首国歌，寄给我（昨天刚收到），要我送到中央来。我个人的意见，倒是觉得现在的国歌好。在这次讨论宪草中，也没有人提出要改国歌。

毛泽东：国歌不必规定在宪法上。不喜欢现在的国歌的人，主要是不喜欢“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一句，但是如果说“我们国家现在是太平无事的时候”，那也不好。苏联采用“国际歌”作为国歌，也有那么一句“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苏联人民从十月革命起一直唱到一九四一年，唱了二十四年的“饥寒交迫的奴隶”。我们的国歌有一句“最危险的时候”，有些人就觉得不舒服，现在帝国主义包围得还很厉害，唱一句“最危险的时候”，也没有什么坏处吧。

国歌没有写。还有什么没有写的？各部没有定。还有领土没有具体写。

黄炎培：还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是什么，没有写。

毛泽东：对了，主席不是国家元首。我看还是不用元首好。

何香凝：要加强中央的力量，“中央人民政府”的名称还是保留好。因为国务院的职权里没有讲到军事方面。

毛泽东：有的。国务院的职权里有一项是“领导武装力量的建设”（第四十九条第十四项）。

何香凝：中央要集权，才能迅速及时处理国家大事。要加强中央的权力，“中央人民政府”还是要，对外宣传有作用。

毛泽东：你这个意见是很好的。中央的权力宪法中规定得很够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国务院、最高法院、最高检察机关都是国家机关，规定得很充分了。我们和帝国主义国家不同，我们是把权力的主要首脑放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政府是它的执行机关。政府的权力也是很大的，并不是权力小。我们是中央集权，不是地方分权。一切法律都要中央来制定，地方不能制定法律。中央可以改变地方的决定；下级要服从上级，地方要服从中央。

何香凝：如果遇到紧急关头，比如帝国主义侵略我们，中央要能及时采取办法才行。

毛泽东：你的意见很对，我赞成你的意见。就是要集中权力，要能灵活使用。遇到紧急关头，别人打进来了，常务委员会就可以决定问题（第三十一条第十五项），无须等着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我们是靠第三十一条第十五项吃饭。这是讲“宣布”战争状态。如果敌人打来了，我们的军队当然立即就打。敌人打上海，我们上海的军队当然立即就打，“兵来将挡，水来土掩”，不是等到宣布了战争状态再开枪，而是先打后宣布。常务委员会也可以立即开会，白天接到消息，当晚就可以开会；晚上得到消息，第二天早上就可以开会。国务院总理也可以立即下命令行动起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可以立即指挥军队，立即下命令：打。根据宪法草案第二十条，我们的军队的任务是“保卫国家的安全和领土主权的完整”，哪个打来我们就打他，讨论也不要讨论。至于宣布战争状态，那是常务委员会的事了。

何香凝：帝国主义侵略我们，我们应该无条件地打。

毛泽东：那很对，外国打来我们立即打。

何香凝：“中央人民政府”的名字还是要好。

毛泽东：“中央人民政府”的名字不要了，太长了。这是上次会议议的。也是反复了几次：初稿是“国务院”，后来改作“中央人民政府”，最后又改回来叫“国务院”。按照外国的习惯，一个国家只有一个政府，我们现在的政府多得很，省、县、乡都叫政府，现在宪法草案上规定地方都改叫“人民委员会”。

何香凝：我们的“长”字也很多，省长、县长、乡长，也多得很。我不坚持自己的意见。

毛泽东：我们大家研究了一下，觉得这样可以。全国只有一个政府，即国务院。大家对“中央人民政府”的名字有了感情，很喜欢它，不愿意改，但改了我看也可以。苏联叫部长会议，我们叫国务院，也就是部长会议。地方叫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人民委员会。中国古代也没有地方政府，叫作“布政司”，地方称政府也是最近若干年的事。别的国家的地方不叫政府，就是我们这个国家古怪，政府多得很。其实我们在古代也是只有一个政府。你看这样改可不可以？

何香凝：可以，可以。我没有什幺意见，我只是想到这一点，随便说说。

毛泽东：我们和你一样，也喜欢“中央人民政府”这个名字，喜欢“人民政府”的字名，所以在宪法草案初稿里，地方还是叫地方人民政府，国务院也解释作“即中央人民政府”，也是舍不得这个名字，和你一样。后来经过大家讨论，反复研究，才舍得了，才改了。

何香凝：我不坚持这个意见。

毛泽东：那好。如果大家没有意见，就付表决。赞成这个宪法

草案全文和今天的修改的，请举手。（全体一致通过）

毛泽东：还有一个报告。请齐燕铭同志把报告读一下。

陈叔通：报告中“一百零七条”要改为“一百零六条”。

（齐燕铭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起草委员会关于宪法起草工作经过的报告）

毛泽东：“一百零七条”改为“一百零六条”。报告准备发表。
赞成者请举手。（全体一致通过）

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1]

(1954年6月14日)



1954年6月11日，宪法起草委员会举行第七次全体会议。这次会议通过了宪法草案。6月14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人民政府第三十次会议，讨论通过了宪法草案和公布宪法草案的决议。

[1] 这是毛泽东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上的讲话。

这个宪法草案，看样子是得人心的。宪法草案的初稿，在北京五百多人的讨论中，在各省市各方面积极分子的讨论中，也就是在全国有代表性的八千多人的广泛讨论中，可以看出是比较好的，是得到大家同意和拥护的。今天很多人讲了话，也都是这样讲的。

为什么要组织这样广泛的讨论呢？有几个好处。首先，少数人议出来的东西是不是为广大人们所赞成呢？经过讨论，证实了宪法草案初稿的基本条文、基本原则，是大家赞成的。草案初稿中一切正确的东西，都保留下来了。少数领导人的意见，得到几千人的赞成，可见是有道理的，是合用的，是可以实行的。这样，我们就有信心了。其次，在讨论中搜集了五千九百多条意见（不包括疑问）。这些意见，可以分作三部分。其中有一部分是不正确的。还有一部分虽然不见得很不正确，但是不适当，以不采用为好。既然不采用为什么又搜集呢？搜集这些意见有什么好处呢？有好处，可以了解在这八千多人的思想中对宪法有这样一些看法，可以有个比较。第三部分就是采用的。这当然是很好的，很需要的。如果没有这些意见，宪法草案初稿虽然基本上正确，但还是不完全的，有缺点的，不周密的。现在草案也许还有缺点，还不完全，这要征求全国人民的意见了。但是在今天看来，这个草案是比较完全的，这是采纳了合理的意见的结果。

这个宪法草案所以得人心，是什么理由呢？我看理由之一，就是起草宪法采取了领导机关的意见和广大群众的意见相结合的方法。这个宪法草案，结合了少数领导者的意见和八千多人的意见，公布以后，还要由全国人民讨论，使中央的意见和全国人民的意见相结合。这就是领导和群众相结合，领导和广大积极分子相结合的方法。过去我们采用了这个方法，今后也要如此。一切重要的立法

都要采用这个方法。这次我们采用了这个方法，就得到了比较好的、比较完全的宪法草案。



1954年6月14日，中央人民政府第三十次会议，讨论通过了宪法草案的决议。图为工人在阅读宪法草案。

在座的各位和广大积极分子为什么拥护这个宪法草案呢？为什么觉得它是好的呢？主要有两条：一条是总结了经验，一条是结合了原则性和灵活性。

第一、这个宪法草案，总结了历史经验，特别是最近五年的革命和建设的经验。它总结了无产阶级领导的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反对官僚资本主义的人民革命的经验，总结了最近几年来社会改革、经济建设、文化建设、政府工作的经验。这个宪法草案也总结了从清朝末年以来关于宪法问题的经验，从清末的“十九信

条”^[1]起，到民国元年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2]，到北洋军阀政府的几个宪法和宪法草案^[3]，到蒋介石反动政府的《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一直到蒋介石的伪宪法。这里面有积极的，也有消极的。比如民国元年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在那个时期是一个比较好的东西；当然，是不完全的，有缺点的，是资产阶级性的，但它带有革命性、民主性。这个约法很简单，据说起草时也很仓卒，从起草到通过只有一个月。其余的几个宪法和宪法草案，整个说来都是反动的。我们这个宪法草案，主要是总结了我国的革命经验和建设经验，同时它也是本国经验和国际经验的结合。我们的宪法是属于社会主义宪法类型的。我们是以自己的经验为主，也参考了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宪法中好的东西。讲到宪法，资产阶级是先行的。英国也好，法国也好，美国也好，资产阶级都有过革命时期，宪法就是他们在那个时候开始搞起的。我们对资产阶级民主不能一笔抹杀，说他们的宪法在历史上没有地位。但是，现在资产阶级的宪法完全是不好的，是坏的，帝国主义国家的宪法尤其是欺骗和压迫多数人的。我们的宪法是新的社会主义类型，不同于资产阶级类型。我们的宪法，就是比他们革命时期的宪法也进步得多。我们优越于他们。

第二、我们的宪法草案，结合了原则性和灵活性。原则基本上是两个：民主原则和社会主义原则。我们的民主不是资产阶级的民

[1] 指清政府1911年11月发布的《重大信条十九条》。

[2] 《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是孙中山在辛亥革命后担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时颁布的。

[3] 指袁世凯政府1913年的天坛宪法草案、1914年的约法，曹锟政府1923年的宪法和段祺瑞执政府1925年的宪法草案。

主，而是人民民主，这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人民民主的原则贯穿在我们整个宪法中。另一个是社会主义原则。我国现在就有社会主义。宪法中规定，一定要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这是原则性。要实行社会主义原则，是不是在全国范围内一天早晨一切都实行社会主义呢？这样形式上很革命，但是缺乏灵活性，就行不通，就会遭到反对，就会失败。因此，一时办不到的事，必须允许逐步去办。比如国家资本主义，是讲逐步实行。国家资本主义不是只有公私合营一种形式，而是有各种形式。一个是“逐步”，一个是“各种”。这就是逐步实行各种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以达到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是原则，要达到这个原则就要结合灵活性。灵活性是国家资本主义，并且形式不是一种，而是“各种”，实现不是一天，而是“逐步”。这就灵活了。现在能实行的我们就写，不能实行的就不写。比如公民权利的物质保证，将来生产发展了，比现在一定扩大，但我们现在写的还是“逐步扩大”。这也是灵活性。又如统一战线，共同纲领中写了，现在宪法草案的序言中也写了。要有这么一个“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广泛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可以安定各阶层，安定民族资产阶级和各民主党派，安定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还有少数民族问题，它有共同性，也有特殊性。共同的就适用共同的条文，特殊的就适用特殊的条文。少数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上都有自己的特点。少数民族经济特点是什么？比如第五条讲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生产资料所有制现在有四种，实际上我们少数民族地区现在还有别种的所有制。现在是不是还有原始公社所有制呢？在有些少数民族中恐怕是有。我国也还有奴隶主所有制，也还有封建主所有制。现在看来，

奴隶制度、封建制度、资本主义制度都不好，其实他们在历史上都曾经比原始公社制度要进步。这些制度开始时是进步的，但到后来就不行了，所以就有别的制度来代替了。宪法草案第七十条规定，少数民族地区，“可以按照当地民族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特点，制定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所有这些，都是原则性和灵活性的结合。



1954年6月14日，中央人民政府第三十次会议，讨论通过了宪法草案的决议。图为农民在阅读宪法草案。

这个宪法草案所以得到大家拥护，大家所以说它好，就是因为有这两条：一条是正确地恰当地总结了经验，一条是正确地恰当地结合了原则性和灵活性。如果不是这样，我看大家就不会赞成，不会说它好。

这个宪法草案是完全可以实行的，是必须实行的。当然，今天

它还只是草案，过几个月，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就是正式的宪法了。今天我们要准备实行，通过以后，全国人民每一个人都要实行，特别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要带头实行，首先在座的各位要实行。不实行就是违反宪法。

我们的宪法草案公布以后，将会得到全国人民的一致拥护，提高全国人民的积极性。一个团体要有一个章程，一个国家也要有一个章程，宪法就是一个总章程，是根本大法。用宪法这样一个根本大法的形式，把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原则固定下来，使全国人民有一条清楚的轨道，使全国人民感到有一条清楚的明确的和正确的道路可走，就可以提高全国人民的积极性。

这个宪法草案公布以后，在国际上会不会发生影响？在民主阵营中，在资本主义国家中，都会发生影响。在民主阵营中，看到我们有一条清楚的明确的和正确的道路，他们会高兴的。中国人高兴，他们也高兴。资本主义国家中被压迫被剥削的人民如果看到了，他们也会高兴的。当然也有人不高兴，帝国主义、蒋介石都不会高兴的。你说蒋介石会不会高兴？我看不需要征求他的意见就知道他是不高兴的。我们对蒋介石很熟悉，他决不会赞成的。艾森豪威尔总统也不高兴，也要说它不好。他们会说我们这个宪法是一条清楚的明确的但是很坏的道路，是一条错路，什么社会主义、人民民主，是犯了错误。他们也不赞成灵活性。他们最喜欢我们在一天早晨搞出个社会主义，搞得天下大乱，他们就高兴了。中国搞统一战线，他们也不赞成，他们希望我们搞“清一色”。我们的宪法有我们的民族特色，但也带有国际性，是民族现象，也是国际现象的一种。跟我们同样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压迫的国家很多，人口在世界上占多数，我们有了一个革命的宪法，人民民主的宪法，有了一

一条清楚的明确的和正确的道路，对这些国家的人民会有帮助的。

我们的总目标，是为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我们是一个六亿人口的大国，要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要实现农业的社会主义化、机械化，要建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究竟需要多少时间？现在不讲死，大概是三个五年计划，即十五年左右，可以打下一个基础。到那时，是不是就很伟大了呢？不一定。我看，我们要建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大概经过五十年即十个五年计划，就差不多了，就像个样子了，就同现在大不一样了。现在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壶，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牛皮不要吹得太大，尾巴不要翘起来。当然，我不是讲能造一辆，尾巴就可以翘一点，能造十辆，尾巴就可以翘得高一点，随着辆数的增加，尾巴就翘得更高一些。那是不行的。就是到五十年后像个样子了，也要和现在一样谦虚。如果到那时候骄傲了，看人家不起了，那就不好。一百年也不要骄傲。永远也不要翘尾巴。

我们的这个宪法，是社会主义类型的宪法，但还不是完全社会主义的宪法，它是一个过渡时期的宪法。我们现在要团结全国人民，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和应当团结的力量，为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这个宪法就是为这个目的而写的。

最后，解释一个问题。有人说，宪法草案中删掉个别条文是由于有些人特别谦虚。不能这样解释。这不是谦虚，而是因为那样写不适当，不合理，不科学。在我们这样的人民民主国家里，不应当写那样不适当的条文。不是本来应当写而因为谦虚才不写。科学没有什么谦虚不谦虚的问题。搞宪法是搞科学。我们除了科学以外，

什么都不要相信，就是说，不要迷信。中国人也好，外国人也好，死人也好，活人也好，对的就是对的，不对的就是不对的，不然就叫做迷信。要破除迷信。不论古代的也好，现代的也好，正确的就信，不正确的就不信，不仅不信而且还要批评。这才是科学的态度。

关于宪法草案的修改问题^[1]

(1954年6月14日)

宪法草案有两个地方要修改，这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们提出的意见，改了比较好。一个地方是序言第三段：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下面加“第一次会议”五个字。下面的年月日也填起来，写成“一九五四年九月 日”。年月日前面没有“于”字，因为当初我们的两位语文顾问（语文专家）一致反对加“于”字，提出几次都通不过，我们多数只好服从他们少数。下面“我国的第一个宪法”改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这些修改都是属于文字性的，但不改不行。过去中国的宪法有八个（草案不在内）：清朝的“宪法大纲”，孙中山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袁世凯的《中华民国约法》，曹锟的《中华民国宪法》，蒋介石的《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中华民国宪法》，瑞金中央工农民主政府颁布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说这个宪法是“我国的第一个宪法”，不妥；说它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则名符其实。这是属于文字性质的但是重要的修改，不改就不那么妥当。

另一个地方是第三条第三款：“各民族……都有保持或者改革自

[1] 这是毛泽东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临时会议上，修正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时的讲话。

己的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的自由。”问题出在“和宗教信仰”五个字上。代表中有人提出，说改革“宗教”可以，改革“信仰”则不妥，并且第八十八条已经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宗教信仰的自由”。所谓“有宗教信仰的自由”，就是说：你信仰宗教也可以，不信仰宗教也可以；你可以信这种宗教，也可以信那种宗教；信了，又可以不信；本来不信，后来也可以信。既然有了第八十八条的规定，第三条再讲“改革宗教信仰的自由”，就重复了。这是西藏代表提出的意见，说这样写法不好，似乎是不要宗教了。说“改革宗教”还可以。历史上的宗教改革很多，比如天主教、基督教、佛教、喇嘛教的改革等等。我看这一条意见是有理由的，把“和宗教信仰”五个字删掉，改为“都有保持或者改革自己的风俗习惯的自由”。因为有第八十八条，删掉这一句没关系，免得误会，免得重复，也免得文字不通。语文学家反对这样写，说“改革信仰”不通。这一条完全是抄共同纲领的。可见，共同纲领还不是也有缺点。这一点，刘少奇同志的宪草报告中应当提到。

今天开会就是为着改这两处地方。这样改法行不行？有意见吗？

此外还有人提出：第七十四条，法院院长任期是第一款，法院的组织放在了第二款，说要改。我们觉得不改也可以。还有人说第五条“生产资料所有制现在主要有下列各种”的“主要”二字不要，我们考虑恐怕还是保留好，不要改了。

宪法不是天衣无缝，总是会有缺点的。“天衣无缝”，书上是这样说过。天衣，我没有看见过，也没有从天上取下来看过，我看到的衣服都是有缝的，比如我穿的这件衣服就是有缝的。宪法，以及别的法律，都是会有缺点的。什么时候发现，都可以提出修改，反正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一年一次，随时可以修改。能过得去的，

那就不要改了。

如果没有意见，就付表决。（全体通过）

宪法草案的本子，今天不再重印了。当然在大会通过之前还要重印一次。请各代表组组长负责召集各代表组开个会，把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临时会议这两点修改，给大家讲一下。这次临时会议和这两点修改，报纸上都不发表。

这是一个比较完整的宪法了。最先是中共中央起草，然后是北京五百多位高级干部讨论，全国八千多人讨论，然后是三个月的全国人民讨论，这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一千多名代表又讨论。宪法的起草应该说是慎重的，每一条每一个字都是认真推敲了的，但也不必讲是毫无缺点，天衣无缝。这个宪法是适合我们目前的实际情况的，它坚持了原则性，但是又有灵活性。

关于越南人民军的作战规模的电报

(1954年6月20日)

广西省委转周恩来同志：

在日内瓦会议有进展并可能在七月达成停战协议^[1]的情况下，越南人民军的作战规模以不要扩大也不要缩小即保持现在的规模似较适宜。前些日子韦国清^[2]同志电告越军作了一个新部署，准备在七月内把战争规模略为扩大。我们认为可以照韦电增加一部分军队于红河三角洲区域，以威胁法国人，但七月不要大打。何时可以大打，应完全依日内瓦会议情况作决定。以上意见是否妥当，请与胡、武、韦^[3]三同志酌定。

中央

六月二十日

[1] 日内瓦国际会议于1954年7月21日就印度支那停战和恢复和平问题达成了协议。

[2] 韦国清，当时任驻越南军事顾问团团长。

[3] 胡，指胡志明，当时任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主席。武，指武元甲，当时任越南民主共和国国防部部长兼越南人民军总司令。韦，指韦国清。

给毛泽荣^[1]的信

(1954年6月24日)

胜五弟：

你给我的信都收到了，很高兴。江青病况略有进步，她对你的关怀，甚为感谢。孩子们都好。你们都好吗？

祝进步

毛泽东

一九五四年六月廿四日

[1] 毛泽荣，又名胜五，毛泽东的堂弟。

关于国家预算的指示

(1954年6月)

增产、节约、多留后备力量，是巩固国家预算的可靠的三道防线。



1954年，毛泽东在杭州。

在宪法公布后的指示

(1954年6月)

我们要纠正领导上的机会主义、官僚主义错误，革命人民一定要有请愿、罢工、罢课的自由，我们是社会主义阶段，还要前进嘛！领导上有错误允许人民公开批评嘛，小字报、大字报、大辩论、大批判都是很好的形式。



1954年，毛泽东在浙江。

为中国福利会“少年宫”^[1]题名

(1954年6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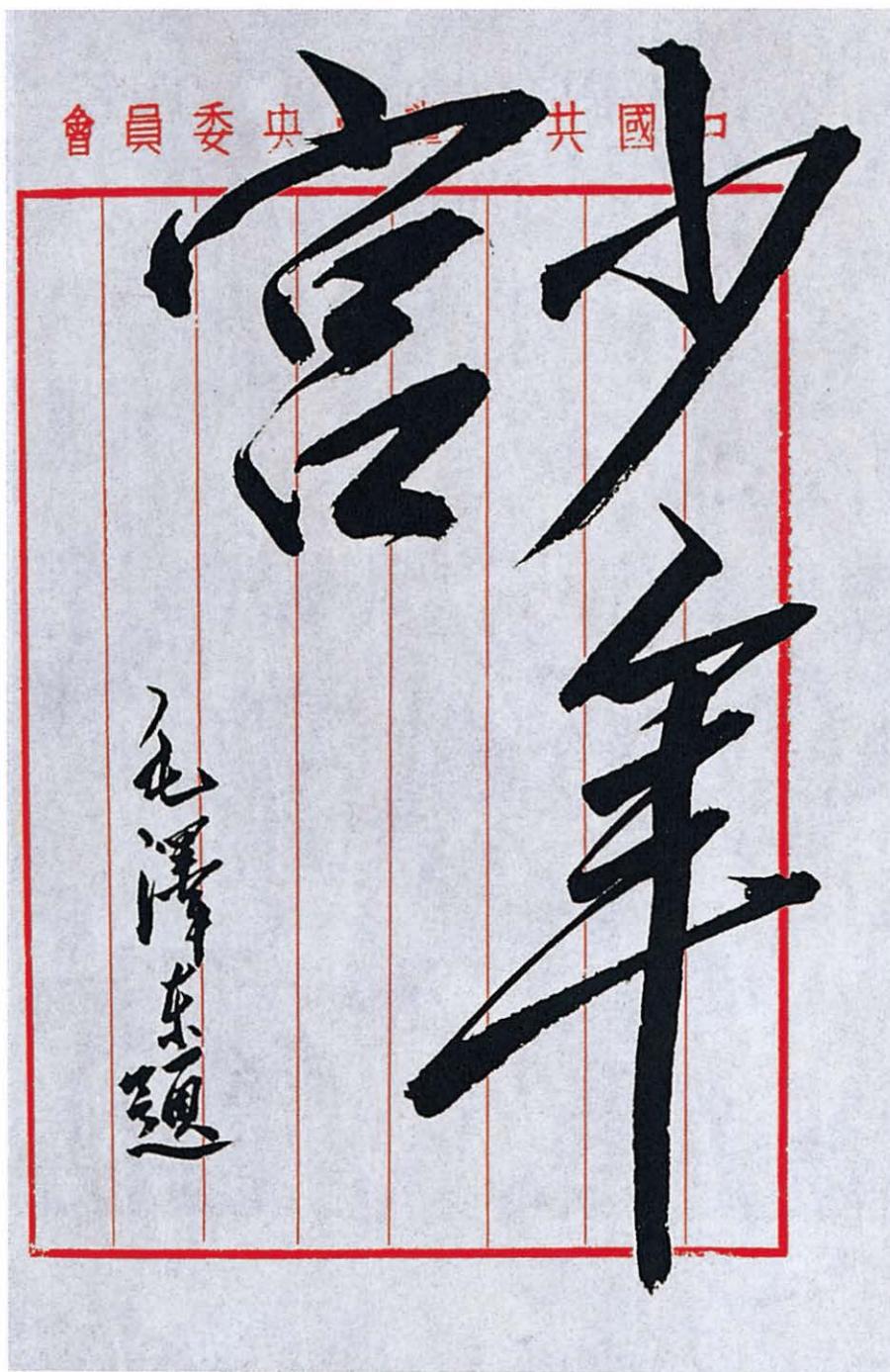
少年宫

毛泽东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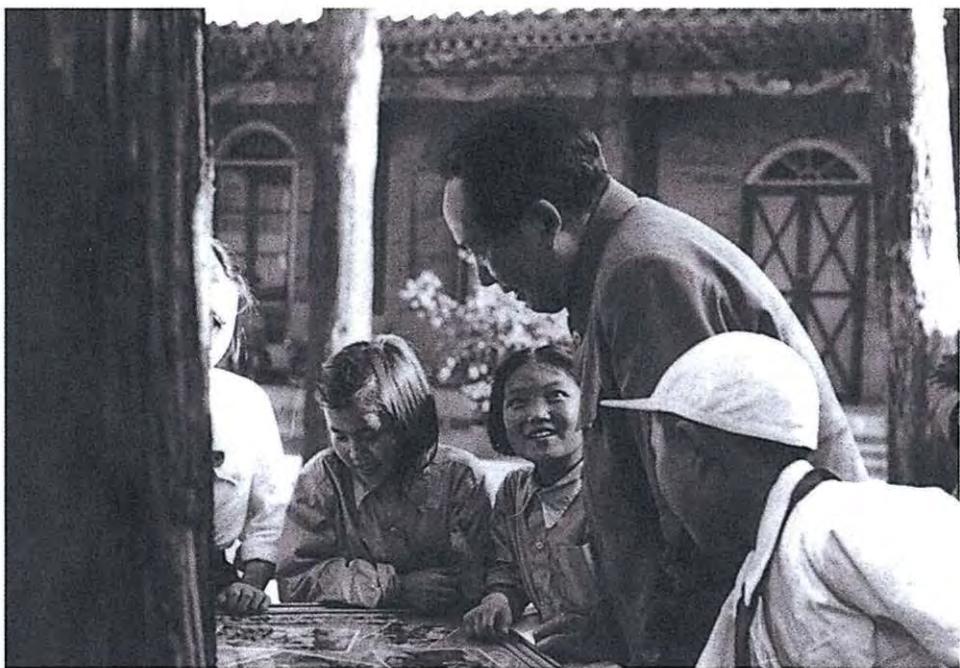


1954年6月，毛泽东和孩子们在一起。

[1] 1954年6月，毛泽东应宋庆龄之请，欣然提笔为中国福利会“少年宫”题写官名。



毛泽东为中国福利会“少年宫”题写的宫名。



1954年，毛泽东和“八一”小学的孩子们在一起。



1954年，毛泽东和少先队员在一起。

对《苏联宪法草案的全民讨论》 一文的批语

(1954年7月1日)

刘、朱、小平、李维汉、彭真^[1]同志：
此件^[2]值得看一下。

毛泽东
七月一日

送田家英^[3]同志阅，退毛。

[1] 刘，指刘少奇。朱，指朱德。小平，即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政务院副总理。李维汉，当时任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彭真，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国务院政治法律委员会副主任。

[2] 指中国政治法律学会《政法研究》编辑部翻译的苏联《历史问题》杂志1953年第九期刊载的《苏联宪法草案的全民讨论》一文。

[3] 田家英，当时任毛泽东的秘书。

对华东局统战部关于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情况报告的批语

(1954年7月6日)

李维汉^[1]同志：

此件^[2]似可转发各中央局、各省市〔委〕统战部（除华东）仿照办理。

毛泽东
七月六日

[1] 李维汉，当时任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

[2] 指中共中央华东局统战部1954年6月30日关于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的情况给中央统战部、华东局并告各省市委统战部的报告。报告汇报了座谈会讨论公布宪法草案、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撤销大行政区等问题的情况。

对西藏工委关于噶厦^[1]提出 裁减藏军问题的处理意见的批语

(1954年7月6日)

尚昆^[2]同志：

这类问题^[3]应由统战部拟处，是属于政治性质的，军委不好处理。

毛泽东
七月六日

[1] 噶厦，即西藏地方政府。

[2] 尚昆，即杨尚昆，当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

[3] 中共西藏工委1954年7月5日给中央并军委的电报中说，噶厦今天提出，拟将现有藏军除保留警卫代本1500人外，其余全部解散还乡，态度十分急迫，想在达赖离藏前解决。我们估计他们所以提出此项意见，主要是由于财政困难所致。我们意见当达赖离开西藏的时候，突然裁减藏军，殊非时宜，拟向噶厦进行说服，争取在达赖离藏期间，不裁减藏军，一切维持现状。如他们提出财政困难，则以中央名义给以一部分补助，其他问题仍由噶厦负责。

同一切愿意和平的国家团结合作^[1]

(1954年7月7日)

周恩来同志的报告^[2]很好，我们应当同意他所讲的这些方针，并且批准代表团过去这些活动。过去两个半月的活动是很好的。我们几个国家，苏联，中国，还有朝鲜和越南，是团结得很好的，方针是正确的，活动是有成绩的。在日内瓦，我们抓住了和平这个口号，就是我们要和平。而美国人就不抓这个东西，它就是要打，这样，它就很说不过去了，没有道理了。现在要和的人多了，我们要跟一切愿意和平的人合作，来孤立那些好战分子，就是孤立美国当局，主要还是那里头急于要打仗的那一派。美国抓住印度支那这样一个地方，这样一个战争，对这一点，我们国内有许多人还看不大清楚。为什么这样一个小地方的战争牵动全世界？就是因为美国要借这个地方做文章，借这个地方扩大战争，继续打下去。这个问题是牵动很大的，牵动了东南亚，牵动了亚洲、欧洲、美洲（比如加拿大）和澳洲。所以，有很多人就同意和平。至于说具体步骤，就

[1] 这是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2] 指周恩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所作的关于出席日内瓦会议以及访问印度、缅甸和举行中越会谈等问题的报告。周恩来说在日内瓦会议我们采取的方针是联合法国、英国、东南亚国家、印度支那三国，即团结一切能够团结的国际力量孤立美国，限制和打破美国扩大世界霸权的计划，其中关键的问题是促成印度支那的和平。

是恩来同志所讲的，过去跟胡志明同志他们达成一致去做的和这一次谈好的那些东西。在谈判中该让的就必须让，该坚持的就必须坚持。根据总方针，这些具体活动做得恰当，是可以和下来的，就可以达到联合多数、孤立少数（就是美国人）的目的。所以我们应当批准过去这些活动。今后是会议的最后一个阶段了，继续执行这个方针，并且在有些具体问题上抓紧一点，估计可以达成协议，就可以开展一个局势。

现在总的国际形势就是美国人相当孤立。这个东南亚的问题——印度支那问题解决之后，估计它的孤立会要继续发展。现在英国一大帮、法国、东南亚各国、加拿大、墨西哥，还有一些南美的国家，都是不喜欢美国的。所以，这个局势很有希望。现在，门要关死已经不可能了，而且很有一种有利的局势，需要我们走出去。比如丘吉尔在华盛顿同美国谈判，他们发表联合宣言^[1]，写了六条，就不能不写那个第一、第二条，这两条就是说要跟我们拉手。这是艾森豪威尔答应了要拉手。对什么国家、在什么条件下拉手，他们说什么要有确实的保障，有很好的行动。我们有五项原则^[2]，那不

[1] 指英国首相丘吉尔和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1954年6月29日在华盛顿发表的联合宣言。宣言共六条，第一条规定：“我们将本着亲密友爱的精神继续共同努力，在我们重新肯定下来的大西洋宪章原则的基础上，谋求世界和平。”第二条规定：“我们共同地并各个地继续向任何和一切以庄严的保证和切实的行动表明它们希望参加一个公正和公平的和平的国家伸出友谊之手。”

[2] 指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包括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1953年12月至1954年4月，中国政府代表团同印度政府代表团关于两国在中国西藏地方的关系在北京举行谈判。这五项原则是谈判开始时周恩来总理同印度代表团的谈话中提出的，后来正式写入双方达成的《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的序言中。

是很好的保障吗？我们参加日内瓦会议^[1]不是很好的行动吗？所以，可以进一步分化帝国主义国家相互之间的关系。美国内部也是有矛盾的。恩来同志所讲的，艾森豪威尔同史密斯以及他的财政部长、国防部长，对现在要打是不赞成的；杜勒斯、诺兰、尼克松、雷德福^[2]这些人，就比较更冒险一点。所以，对美国这样的国家也不是没有文章可做。

现在美国同我们关系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台湾问题，这个问题是个长时间的问题。我们要破坏美国跟台湾订条约^[3]的可能，还要想一些办法，并且要作宣传。我们要组织一些宣传，要大骂美国

[1] 日内瓦会议，指1954年4月26日至7月21日在瑞士日内瓦举行的讨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和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的国际会议。中、苏、美、英、法五国参加所有两项议题的讨论。朝鲜北南双方及美、英、法以外的其他12个侵略朝鲜北方的国家参加了朝鲜问题的讨论，越南民主共和国、老挝、柬埔寨和南越政权参加了印度支那问题的讨论。关于朝鲜问题没有达成任何协议；关于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分别达成关于在印度支那三国停止敌对行动的协议和《日内瓦会议最后宣言》（总称日内瓦协议），实现了印度支那的停战。

[2] 杜勒斯（1888—1959），当时任美国国务卿。诺兰（1908—1974），当时任美国国会参议员、参议院共和党领袖。尼克松（1913—1994），当时任美国副总统。雷德福（1896—1973），当时任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

[3] 1954年12月2日美国政府不顾中国政府和人民的反对，与台湾当局签署了《共同防御条约》。该条约规定：美国帮助台湾当局维持并发展武装部队；台湾遭到“武装攻击”时，“美国将采取行动”，对付“共同危险”；美国有在台湾、澎湖及其附近部署陆、海、空军的权利，还可扩及到经双方协议所决定的“其他领土”。1955年3月3日条约生效。1978年12月15日，美国政府就美利坚合众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发表的声明宣布，美台《共同防御条约》将予以终止。1980年1月1日起该条约正式废除。

搞台湾，蒋介石继续卖国。另外，在外交方面要有一种适当的表示，比如在侨民问题上的接触，目的就是迫使美国跟台湾不要订条约。我看，美国跟台湾订条约，英国也怕，也反对，法国也可能是反对的，对于它们也没有什么好处，就会成为很长时期的僵局嘛。

缓和国际紧张局势，不同制度的国家可以和平共处，这是苏联提出来的口号，也是我们的口号，现在变成艾登^[1]他们口里的话了，变成尼赫鲁^[2]他们口里的话了，他们也讲缓和国际紧张局势。这就是很大一个变化。这种变化，估计再有一个时期，只要东南亚这个问题和下来之后，会有个促进。所以，整个形势应当说是比较过去大为好转。因此，我们要对许多国家，比如英国、法国、加拿大这一类国家，比如印度、缅甸这一类国家，凡是有可能的，都要进行工作。甚至像泰国这样的国家，它在我国附近，也是怕我们的，也要进行工作。同时对美国要使它分化，使它孤立，孤立以后它总要分化的。在目前世界上这样四分五裂的形势下，一块铁板那样的事情是不可能的。它们反苏，反共，反对中国，反对人民民主国家，反对我们这个阵线，那是真的；但是，它们那个资本主义世界是很不统一的，四分五裂的。美国现在主要的最大的目的，还是整这个中间地带，就是从日本到英国这些地方，整得这些国家哇哇叫。这一点，我国许多民主人士是不了解的，他们就是相信那些宣传，总是讲，你看它们就是团结得很好。所以，明天要讲一讲这个问题，说明实际上不是这样。美国现在往往就是利用反对共产主义这个旗帜来把它那些朋友的地方占领起来。你看我们这个东方，它把日本占去了，把南朝鲜占去了，把台湾占去了，把菲律宾占去

[1] 艾登（1897—1977），当时任英国外交大臣。

[2] 尼赫鲁（1889—1964），当时任印度总理。

了，泰国变成它的了，巴基斯坦变成它的了，还有土耳其、澳大利亚、新西兰，所以把英国整得下不得地。日本是什么国家呢？过去英日同盟，日本是英国的同盟国。中国这个国家，过去是英国为主的一些国家的半殖民地，后来被美国抢去了。我们的胜利不是得之于英国而是得之于美国。今天中国胜利了，英国一则以惧，就是怕共产；一则以喜，就是我们把美国赶跑了，英国可以钻进来做生意，趁着我们和美国还闹别扭的时候，钻进来做生意。中国是一个很大的可以做生意的地方。所以情况是很好的。

总之，国际上我们就是执行这个方针，只要在和平这个问题上能够团结的，就和他们拉关系，来保卫我们的国家，保卫社会主义，为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

采取积极方针建设远程轰炸机部队^[1]

(1954年7月10日)

德怀同志：

此件经中央讨论，认为应采积极方针，分为四年建设远程轰炸机部队四个师（一百二十架），外汇方面，已交周总理便道与苏方商量可否借款问题，俟得结果再行决定。^[2]

毛泽东

一九五四年七月十日

[1] 这是毛泽东给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彭德怀的信。

[2] 1954年7月16日，经毛泽东修改审定以中共中央的名义给周恩来发了电报。电报指出：关于苏方帮助我们建设远程轰炸机部队问题，在你离京后，我们又作了进一步的考虑。如果苏方准备给我们的不是杜4式轰炸机（活塞式的），则以不建为宜，因此种飞机现在已经落后，速度慢（最高时速558公里），遇到敌人喷气式驱逐机即处于极不利的地位；我们现在没有与此种飞机相适应的护航驱逐机（杜4式轰炸机活动半径为2500公里，米格15驱逐机活动半径为230至260公里），仍然困难执行远程轰炸的任务，并且此种飞机的机场设备及日常维护保养均耗费甚大，建设一个师除需外汇1亿5千万卢布外，国内尚需开支1万亿人民币（人民币旧币）。如果苏方给我们的不是杜4式，而是比依尔28式更新的喷气式远程轰炸机，或者是装有喷气与活塞两种发动机的飞机，则准备先建立一个师，以便培养干部，以后再考虑建立第二个师。请于返莫时向苏方询问清楚后，再与其商谈。



1954年，毛泽东在北京。

祝贺波兰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的电报

(1954年7月20日)

波兰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会主席亚历山大·萨瓦茨基同志：

值此波兰人民共和国十周年国庆之际，我代表中国人民、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并以我个人名义谨向波兰人民、波兰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您致以衷心的祝贺。

十年以来，波兰人民在波兰统一工人党领导下，在巩固人民民主制度和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方面，均已获得了辉煌的成就。人民波兰已成为以苏联为首的世界和平、民主、社会主义阵营中的重要力量。

中国人民谨祝波兰人民在继续致力于社会主义建设和维护世界和平的斗争中获得更大的成就。

毛泽东

一九五四年七月二十日于北京

对军委关于保卫领海主权 及护航注意事项的指示稿的修改^[1]

(1954年7月23日)

—

当我海空军巡逻公海或直接护航的时候，对一切外国的飞机军舰均不得攻击。只有在经查明确认是国民党匪帮的飞机军舰向我护航目标（商轮或油船）有敌对行为（攻击或行劫掠）的时候，则坚决攻击之，以达到我护航之目的。除护航外，经确实查明是国民党匪帮的飞机军舰者，均坚决攻击之。

二

凡国民党匪帮飞机军舰为我击毁坠落海上时，应予停止攻击，我附近舰艇有将其救护、俘虏之责。

目前我护航任务仅限于防止国民党匪军抢劫行为，对其他任何

[1] 本篇一至三是毛泽东对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关于保卫领海主权及护航注意事项指示稿所作的修改。文中用宋体字排印的是毛泽东加写和改写的文字。

外国海空军因在和平时期不会发生抢劫行为，故不发生自卫问题，一律不得采取攻击行动。又因双方速度较快，而蒋匪海空军均为美帝转让，稍一不慎则有击错可能，因此我护航作战原则：应以护航目标安全第一，如发现可疑国民党海空军未对我攻击而国徽又辨别不清我无十分把握时，不得攻击；如系一般运输机，而非军事运输机，即使是国民党所有亦不应攻击。

因我护航使我海空军已进入国际活动公海中，我各级干部、驾驶员、艇长均应学习公海规则，详尽地研究本指示，俾能圆满地达成护航任务，并成为遵守公海规则模范。

三

望你们严格布置执行，并加反复多次教育检查，将其情况上告。如有违犯此规定者，当受到应得的处分。

祝贺日内瓦会议达成印度支那 停战协议致胡志明电^[1]

(1954年7月23日)

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主席胡志明同志：

当印度支那停战问题和政治问题达成协议之际，我代表中国人民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向兄弟般的越南人民、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和您致以最衷心最热烈的祝贺。

越南民主共和国代表团在日内瓦会议上，代表着为民族独立和自由而英勇斗争并已取得辉煌胜利的越南人民的和平愿望，努力争取恢复印度支那和平，终于达成协议，这是越南人民的又一重大胜利，这一胜利有助于促进亚洲的集体和平与安全，有助于进一步缓和国际紧张局势。

全中国的人民将与越南人民一道为保证与争取协议的彻底实现，为维护和巩固亚洲及全世界的和平与安全而努力。

毛泽东

一九五四年七月二十三日于北京

[1] 这是毛泽东为祝贺日内瓦会议达成印度支那停战协议给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主席胡志明的电报。



1954年4月至7月，周恩来率团出席日内瓦会议。会议达成了《关于和平解决印度支那问题的协议》，从而结束了长达8年的印度支那战争。图为日内瓦会议的会场。

给黎锦熙^[1]的信

(1954年7月23日)

邵西先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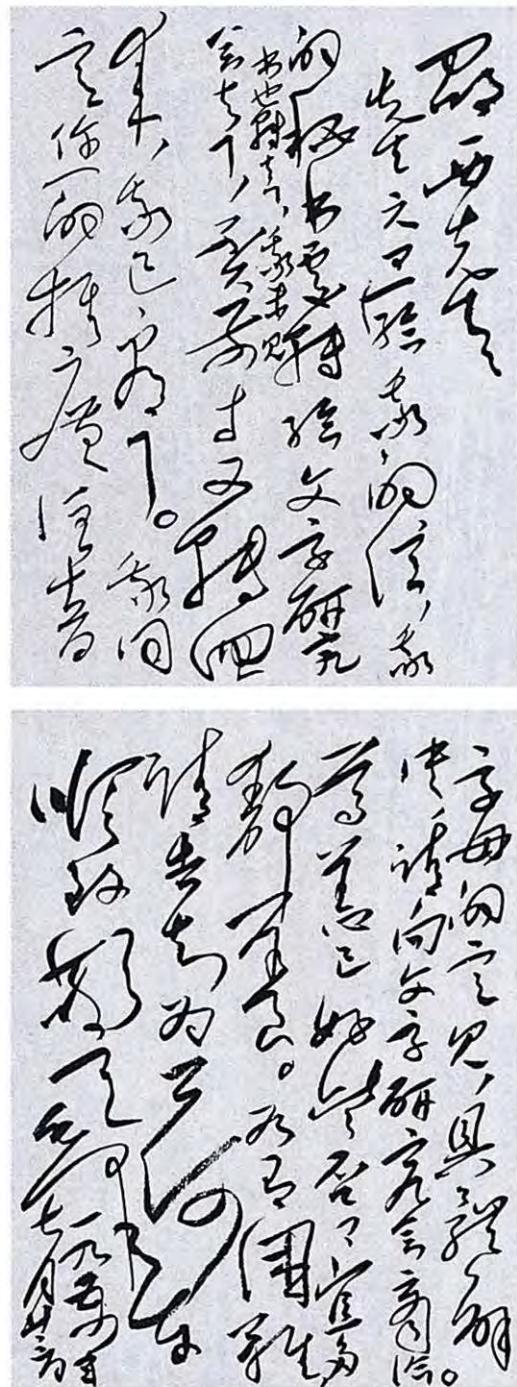
先生元旦给我的信，我的秘书处转给文字研究会去了，书也转去了，我未见，不久前才又转回来，我已看了。我同意您的推广注音字母的意见，具体解决，请向文字研究会商洽。尊恙已好些否？宜多静养。如有困难，请告知为荷。

顺致敬意

毛泽东

一九五四年七月廿三日

[1] 黎锦熙，又名邵西，当时任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主任、教授，中国大辞典编纂处总主任。



毛泽东致黎锦熙信的手稿。



1954年，毛泽东和北京师范大学校长陈垣亲切握手。



《重托》(中国画)

给李敏、李讷^[1]的信

(1954年7月23日)

李敏、李讷，我的亲爱的女儿：

你们的信都收到了，很欢喜。北戴河、秦皇岛、山海关一带是曹孟德（操）到过的地方。他不仅是政治家，也是诗人。他的碣石诗是有名的，妈妈那里有古诗选本，可请妈妈教你们读。我好，勿念。

亲你们！

爸爸

一九五四年七月廿三日

[1] 李敏，毛泽东的长女，贺子珍所生，1936年生，原籍湖南湘潭，生于陕西延安。1940年从延安赴莫斯科随贺子珍一起生活。1943年开始读苏联五年制小学，1948年秋毕业。同年冬，随贺子珍从莫斯科回哈尔滨，1949年春随姨母贺怡到北京，入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后考入北京师范大学。毕业后，1959年和孔令华结婚。后在国防科委院校局、办公厅、总政所属机关工作。李讷，毛泽东的次女，江青所生。

对攻击大陈港敌舰方案的批语

(1954年7月24日)

德怀、克诚^[1]同志：

请考虑是否须调华东军区，福建、浙江、上海三军区的负责人各一人来京讨论此问题。此电^[2]内所提卅天准备时间是必要的，必要时还可延长至四十天。

毛泽东

七月廿四日

[1] 德怀，即彭德怀，当时任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克诚，即黄克诚，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总后勤部部长。

[2] 指华东海军司令部1954年7月21日关于攻击大陈港敌舰的方案给海军司令部的电报。方案提出空军和水面舰艇联合打击，单兵种寻机打击和布雷相结合，并说为了做好联合打击的协同，需3周至1个月的准备时间。

关于复英照会^[1]给刘少奇的信 和对照会稿的修改

(1954年7月25日)

—

少奇同志：

请你召集陈、彭、邓^[2]及章汉夫在你处一谈这两文件，考虑其措词是否适当。两件我均作一些修改，请你们再加斟酌。复英照会原稿第二段，措词极不适当，故作了修改^[3]。

毛泽东

七月廿五日

复英照会，以廿六日交出并广播廿七日登报为适宜。

—

据我军事机关收到来自海南岛方面的报告：七月廿三日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巡逻飞机在海南岛榆林港上空执行巡逻任务之际，

曾经与一架蒋匪帮的飞机在该地上空遭遇，发生战斗等语。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得此消息后，即行多方面调查，始知该项飞机，实系英国所有的运输机，被我巡逻飞机误认为国民党匪帮飞机侵袭我榆林港军事基地者。发生此项不幸事件，实完全出于意外。

[1] 指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副部长章汉夫1954年7月26日复英国代办杜维廉的照会。英国代办杜维廉曾就一架英国运输机7月23日遭受袭击事提出照会。章汉夫在复照中指出，这架英国运输机被我巡逻飞机误认为国民党军飞机侵袭我榆林港军事基地而遭到袭击，发生此项不幸事件，实完全出于意外。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对此表示遗憾，并正在采取适当措施予以处理。对于在此次事件中伤亡者及其亲属表示同情、关怀与慰问。对于有关生命及财产损失愿意考虑给予适当的抚恤与赔偿。这份照会经毛泽东审阅修改后发出，并在1954年7月27日《人民日报》发表。

[2] 陈，指陈云，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政务院副总理。彭，指彭德怀，当时任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邓，指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政务院副总理。

[3] 毛泽东对复英照会原稿第二段的修改，见本篇第二部分。

给许志行^[1]的信

(1954年7月25日)

志行兄：

三月的信，早已收到，迟复为歉。知你仍在做教育工作，甚为高兴。此复。

顺问近安

毛泽东

一九五四年七月廿五日

[1] 许志行，1919年冬和毛泽东在汉口相识，当时在上海市格致中学任语文教师。

对中医工作的指示^[1]

(1954年7月30日)

中医对我国人民的贡献是很大的。中国有六万万人口，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我们人民所以能够生衍繁殖，日益兴盛，当然有许多原因，但卫生保健事业所起的作用必须是其中重要原因之一。这方面首先应归功于中医。

中西医比较起来，中医有几千年历史，而西医传入中国不过几十年。直到今天，全国人民疾病的诊疗依靠中医的仍占五万万以上，依靠西医的则仅数千万（而且多半在大城市里）。因此，若就中国从有史以来的卫生保健事业来说，中医的贡献与功劳是很大的。

祖国医学遗产，若干年来，不仅未被发扬，反而受到轻视与排斥（如对中医进行考验，内容有生理、病理等课程，考不及格就不发给证书。另外，还有中医条例，中医进不得医院等）。对中央关于团结中西医的指示未贯彻，中西医的真正团结也还未解决，这是错误的。这个问题一定要解决，错误一定要纠正。首先就要各级卫生行政部门的思想改变。

今后最重要的是首先要西医学中医，而不是中医学西医。

一、要抽调一百名到二百名医科大学或医学院毕业生交给有名

[1] 这是毛泽东对中医工作的指示。1954年7月，刘少奇向中央文委传达了毛泽东的这个指示。

的中医，去学习他们的临床经验，而且学习应当抱着很虚心的态度。西医学中医是光荣的，因为经过学习与提高，就可以把中西医界限取消，成为中国统一的医学，以贡献于世界。

二、各医院要有计划地请中医来院看病和会诊，允许住院病人用中药，并提出尊重中医的各种制度，从制度上加以保证，使中医到医院里坐诊工作不感到困难和顾虑。

三、中药应当很好地保护和发展。我国的中药有几千年历史，是祖国宝贵的财产。如果任其衰落下去，那就是我们的罪过。所以对各省生产药材应加以调查保护，鼓励生产，便利运输，改进推销。譬如，有些药材因培植时间较长，由种植到培植收获需二、三年以上，如白芍为四年生植物，黄连为六年生植物，个体农民往往没有力量种植，又如有利产药地区，如甘肃、青海交通不便，生产的药材不能及时运出，农民往往把药材当作燃料了。过去一些中药因加工制作的技术不良，浪费很大，包装和贮藏方法不好，霉烂损坏的现象很严重，亦应加以改进。从事这些工作的机构，今后应采取公私合营，制药人员应按技术水平分别给予技术干部看待。至于对中药研究，光做化学分析是不够的，应进而做药理实验和临床实验，特别是对中药的配合作用更应注意。

四、中医书籍应进行整理，过去由于难懂，再加不重视，无人整理。中医医书如不整理，就将绝版，应组织有学间的中医，有计划有重点地先将那些有用的从古文译成现代文：时机成熟并组织他们（总结）自己的经验，编出一套系统的中医书来。

为了实现以上种种工作，首先在于纠正那种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宗派主义思想。只要思想上有改变，上述各种工作才能贯彻。

今后哪一级卫生行政部门如做不好这个工作，就将被撤职。

对《苏联纠正反世界主义斗争中 某些偏向》一文的批语

(1954年7月31日)

—

此件^[1]值得一看，请少奇同志考虑是否转发地委以上各级党委。

毛泽东
七月卅一日

[1] 指中国驻苏联大使馆研究室整理的《苏联纠正反世界主义斗争中的某些偏向》一文（载中共中央宣传部编印的《宣教动态》1954年第十七期）。该文主要介绍苏联报刊最近批评思想文化战线个别部门对于历史遗产和现代外国科学技术成就持全盘否定的错误态度的情况。这种错误首先表现在对于马克思主义诞生以前的哲学持一概否定的态度，同时还表现在拒绝接受外国科学技术成就，否认各民族间精神上的交往和相互影响。1954年8月5日，中共中央向各地转发了这个材料。

二

陈云、彭真、李富春、陈伯达、田家英^[1]诸同志阅，并留待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朱、彭、董^[2]诸同志阅后，退江青。

[1] 陈云，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政务院副总理。彭真，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李富春，当时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陈伯达，当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田家英，当时任毛泽东的秘书。

[2] 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政务院副总理。朱，指朱德。彭，指彭德怀，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董，指董必武，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务院副总理。

浪淘沙·北戴河^[1]

(1954年夏)

大雨落幽燕^[2]，
白浪滔天，
秦皇岛外打鱼船。
一片汪洋都不见，
知向谁边？

往事越千年，
魏武挥鞭，
东临碣石有遗篇。^[3]
萧瑟秋风今又是，
换了人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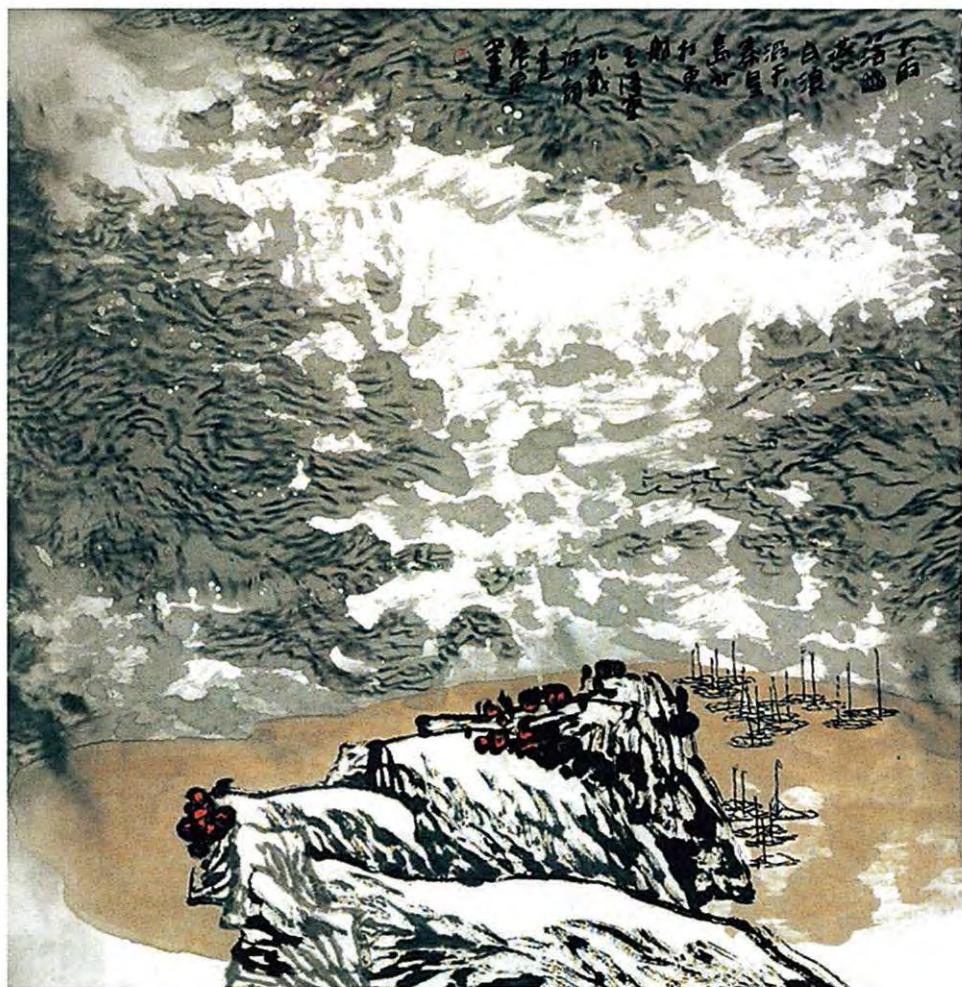
[1] 北戴河，在河北省东北部渤海边港口秦皇岛西，是著名夏季休养地。

[2] 幽燕，泛指河北省。我国古代的幽州和燕国，都在今河北省北部一带。

[3] 往事越千年，魏武挥鞭，东临碣石有遗篇。公元207年（汉献帝建安十二年），曹操（后被尊称魏武帝）和乌桓族作战凯旋，曾经路过这一带。曹操的《步出夏门行》诗中有《观沧海》一章：“东临碣石（据近年来考古发现，碣石在今辽宁省绥中县西南的海滨，西距山海关约30里），以观沧海。……秋风萧瑟，洪波涌起。……”

浪淘沙 北戴河
大雨落幽燕，白浪滔天，
秦皇岛外打渔船。一片
汪洋都不见，知向哪里？
往事越千年，魏武挥
鞭，东临碣石有遗篇。
萧瑟秋风今又是，換
了人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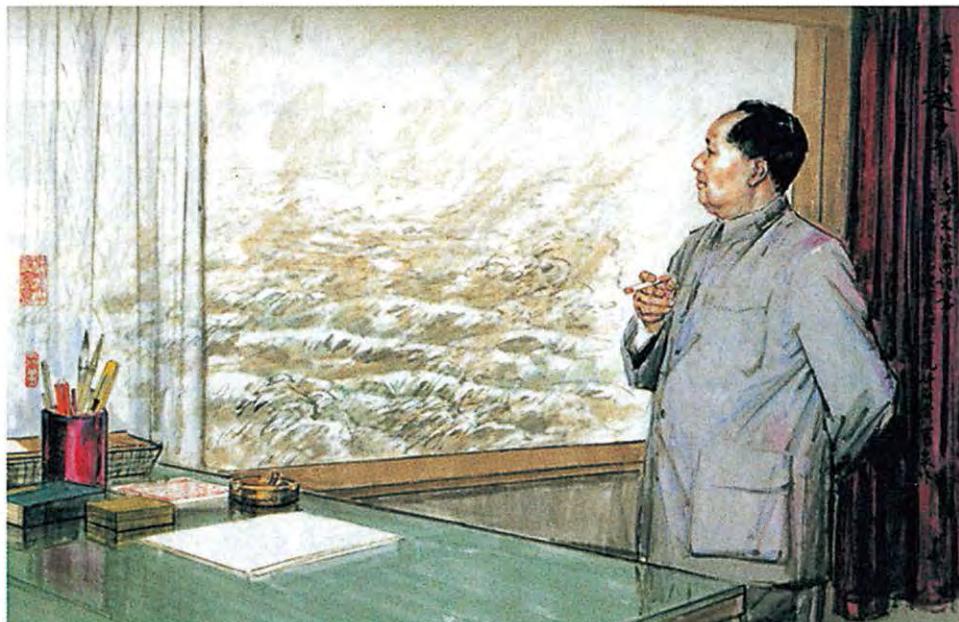
毛泽东手书《浪淘沙·北戴河》。



《北戴河》(诗意图)



《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中国画）



《北戴河》(诗意图)



1954年，毛泽东在北戴河。



1954年，毛泽东在北戴河海滨散步时和刘少奇亲切交谈。



1954年，毛泽东在北戴河海滨。



1954年，毛泽东、周恩来等在北戴河海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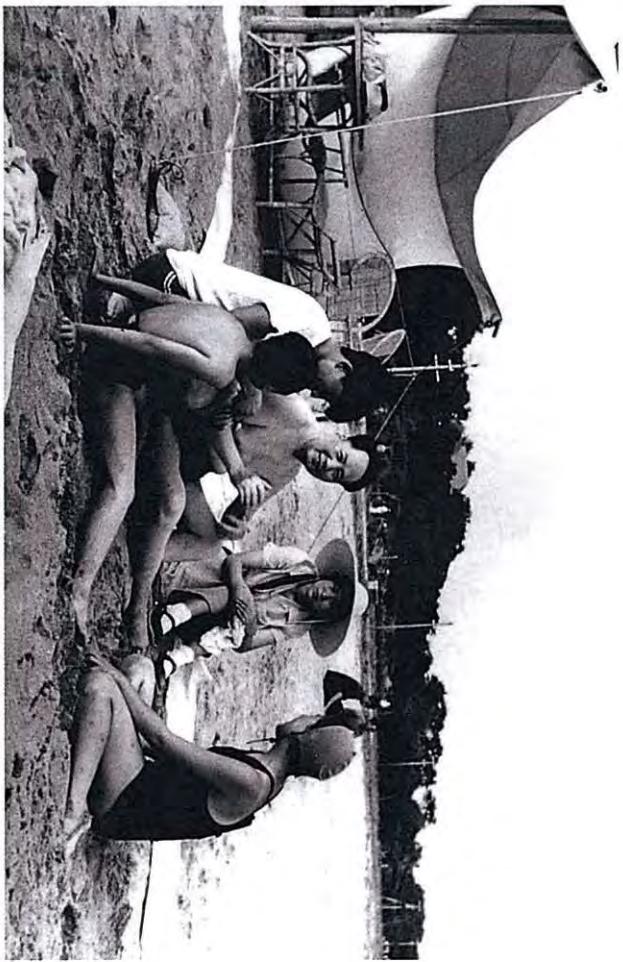


1954年，毛泽东和李敏、刘松林等在北戴河海滨。

资料图片



1954年，毛泽东和李敏、毛远新等在北戴河。



1954年，毛泽东和李敏、李纳等在北戴河。



1954年，毛泽东和孩子们在风浪很大的北戴河游泳。



1954年，毛泽东在北戴河游泳。



1954年，毛泽东和陈云在北戴河。



《毛泽东在北戴河》(中国画)

给三二〇厂全体职工的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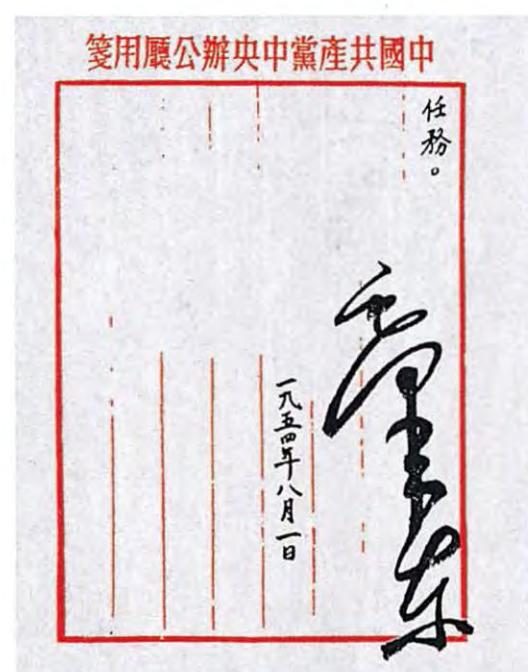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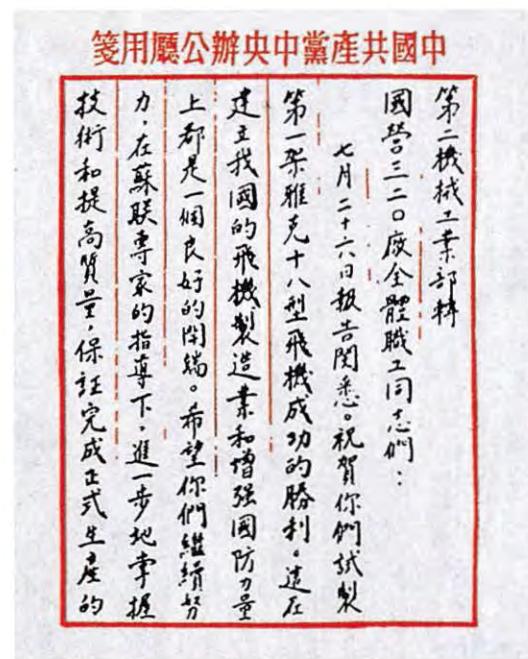
(1954年8月1日)

国营三二〇厂全体职工同志们：

七月二十六日报告阅悉。祝贺你们试制第一架雅克十八型飞机成功的胜利。这在建立我国的飞机制造业和增强国防力量上都是一个良好的开端。希望你们继续努力，在苏联专家的指导下，进一步地掌握技术和提高质量，保证完成正式生产的任务。

毛泽东

一九五四年八月一日



毛泽东致电祝贺新中国第一架飞机试制成功。

关于部队中急待解决的问题的批语^[1]

(1954年8月3日)

少奇同志：

此件^[2]似应在中央会议讨论作出决定^[3]。

毛泽东
八月三日

[1] 这是毛泽东在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彭德怀1954年7月28日报告上写给刘少奇的批语。

[2] 指彭德怀的报告。报告说：最近部队中存在几个急待解决的问题：（一）自三反运动以后，在一部分高级干部中，仍滋长着若干个人享乐、腐化堕落的恶劣现象。（二）1954年上半年，发生两件最严重的失密事件。（三）兵员太老，全军现80%的兵，都是参军3年以上的老兵。（四）下层干部的结婚限制，再不宜继续下去。

[3] 中共中央政治局1954年8月27日会议决定：（一）关于在一部分干部中滋长着若干个享乐、腐化堕落的恶劣现象和严重的失密事件，必须开展适当的斗争和严格执行纪律，由军委在1954年冬或1955年春召开一次解放军全军党代表会议，提出讨论并做出决定。（二）关于兵员问题和下级干部的婚姻问题，待中央讨论兵役法时再行讨论。

关于不要通过给毛泽东 以最高荣誉勋章提案的批语^[1]

(1954年8月6日)

邓小平^[2]同志：

请即复不要通过此项提案。

毛泽东
八月六日

[1] 这个批语写在中共中央华南分局1954年8月4日给中央的电报上。电报说，广东省人民代表大会有代表提出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给予毛主席以最高荣誉勋章的提案，该大会是否可以通过此提案并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提出，请速指示。

[2] 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政务院副总理。

关于揭露美国拼凑 “东南亚防御集团”的批语

(1954年8月6日)

周总理阅。你的报告^[1]和各党派联合声明^[2]，均应就此问题^[3]加以批评。

毛泽东
八月六日

[1] 指周恩来准备在1954年8月11日举行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三十三次会议上作的外交工作报告。报告介绍了1954年4月26日至7月21日举行的日内瓦国际会议的情况，阐述了我国的外交政策。这个报告后来在1954年8月14日的《人民日报》全文发表。

[2] 指《中华人民共和国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为解放台湾联合宣言》。这个宣言在1954年8月22日召开的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委会第五十八次扩大会议上通过，并于1954年8月23日在《人民日报》发表。

[3] 指美国拉拢英国、法国及西太平洋和东南亚等地区的某些国家组织所谓“东南亚防御集团”。

关于加强对蒋军作战政治工作 指示稿的批语^[1]

(1954年8月10日)

少奇同志：

此件^[2]请连同军委作战计划一并在政治局会议上讨论通过。

毛泽东

八月十日

[1] 这是毛泽东在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1954年8月5日关于加强对蒋军作战政治工作指示稿上写给刘少奇的批语。

[2] 指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的指示稿。指示稿说：近来美国公然叫嚣要与蒋介石残余匪帮订立“共同安全双边条约”，全军必须警惕地严重地注视这一问题，必须认识到收复台湾是全国人民，特别是我人民解放军的神圣任务。为了完成这一神圣任务，我军政治工作必须：（一）在全军广泛深入地进行准备收复台湾的政治动员。（二）加强沿海部队的政治工作，保证沿海部队对敌作战的胜利。（三）加强沿海城市、基地防空的政治工作。（四）开展对蒋军的强大政治攻势，结合军事斗争、瓦解和歼灭敌人。（五）加强部队外交政策和国际法规的教育。（六）各级党委、政治机关应加强对海防、边防部队的领导。

海空军强大起来了就能够收复台湾^[1]

(1954年8月11日)

我谈一点解放台湾的问题。我们和苏联不同，苏联建国以后，几十年没有国内战争。我们在国内战争结束以后，有过朝鲜战争，现在还有个台湾战争。解放台湾，这件事好不好？要说好，天天要打仗；要说不好，但总比不打好。战争可以锻炼军队，可以提高人民的觉悟，可以加强团结。当然，这个方针不是今天才提出的，它是早已就提出过了。现在把它提出来，是为了强调它。从前在抗美援朝的时候，我们讲过边打边建。现在是不是就只建不打了呢？应当说，还是边打边建，在现在更应该是建。这个方针是不是要在报纸上提出？我看可以不必了。

解放台湾的时间也不会很短。今年是台湾脱离祖国的六十年，如果今年能够收复了当然很好，如果不能够，就再加上一年，加上一年还不行，就再加上一年。边打边建的方针对于我们并不是不利，它对我们的军队、国内的人民和各阶级的团结都有好处。我们能不能解放台湾？是不是就那么不得了？要知道，我们的敌人是蒋介石。蒋介石有两种，一种是过去在南京大陆上的蒋介石，一种是在水里的蒋介石。过去在没有水的地方打仗，我们有经验，但是在水里打仗的经验就缺乏了。蒋介石是钻在水里的敌人。因此，我们

[1] 这是毛泽东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三十三次会议上讲话的一部分。

不应该轻视现在的蒋介石，说蒋介石算什么！可是蒋介石钻在水里就是不上来，假使他上来了，事情也就好办一点。因此，我们要搞海军、空军。台湾能不能收复？我想是能够收复的。海、空两军搞强大起来了，就能够收复台湾。这里面有军事工作、外交工作、宣传工作、政治工作。政治工作，主要是讲团结，特别是沿海各省的团结。宣传也是件很大的工作，各民主党派都要做。同时，收复台湾也是个经济工作，如修建铁路。现在福建的经济和对国外的通商，因为有蒋介石，是个很大的障碍。这次政府委员会开会以后，还要召开一个政协全委常委扩大会议，有各大城市的人参加。在那个会上要通过一个联合宣言^[1]。因为这不是一件小事，而是很复杂的，它包括有军事问题、政治问题、经济问题等，是个艰巨的工作。最后我们估计是可以收复台湾的，因为台湾是我们的，美国在这个问题上是最孤立的。

[1] 1954年8月20日至22日召开的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五十八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为解放台湾联合宣言》。



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工农兵联合起来一定要解放台湾（宣传画）

关于不同意英译本《毛泽东选集》 第二卷所作删节的批语^[1]

(1954年8月13日)

[1] 1954年3月29日，英国共产党总书记波立特给中共中央来信，提出他们在翻译《毛泽东选集》第二卷时，准备将《战争和战略问题》一文的第一、第二两节从英译本中删去，并附来了负责《毛泽东选集》英译本出版的英国劳伦斯出版社负责人摩里斯·柯恩佛斯给他的信，信中说明了需要删节的理由。5月，中共中央宣传部替中央起草了给波立特的复信稿，认为可以同意波立特的意见。这封复信稿送中央审阅时，受到毛泽东的批评。本篇一、二、三就是毛泽东对中宣部在这个问题上的错误的批语，其中一写在中宣部1954年5月11日给中央的报告上，二写在随中宣部报告附送的波立特1954年3月29日给中共中央的信上，三写在中宣部替中央起草的给波立特的复信稿上。8月，由中联部重新替中央起草了复波立特的信，明确表示：我们不能同意在《毛泽东选集》英译本中把《战争和战略问题》头两节删去的提议，“因为毛泽东同志在该文件中所说到的原则，是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并不因为国际形势的变化，而须要作什么修正。而且《毛泽东选集》已经出版俄文版及其他外国文版，都没有作什么修改。至于《毛泽东选集》在美国出版发行的困难问题，可以采取下列的办法解决：出版能在美国发行的选集，某些文章或演说如被美国反动法律禁止出版时，可不包括在选集内，但是《毛泽东选集》的美国版的目录事先应当征得作者的同意。”这封复信经毛泽东审阅后于8月23日发出。本篇四是毛泽东在中共中央联络部部长王稼祥1954年8月13日关于复波立特信稿的报告上写的批语。

陆定一同志：

中宣部在这个问题上犯了错误——同意英国党的错误提议——应当注意。

毛泽东

八月十三日

—

这样提问题^[1]似不妥当。

三

这样答复^[2]，似不妥。

[1] 指波立特在给中共中央的信中所说的在《毛泽东选集》第二卷英译本中删去《战争和战略问题》一文头两节的理由：“我相信这个决定是正确的，因为假使我们发表了这一节，就会给我们在美国的同志招致很多困难，而且因为这一节也不符合1951年2月出版的我们的纲领——《英国到社会主义之路》，对于若干公式经过极端认真的考虑之后，纲领认为，鉴于变化了的国际形势，苏联夺取政权的方式并不适用于英国。”

[2] 指中共中央宣传部原先替中央拟的复波立特的信。信中同意波立特来信提出的将《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中《战争和战略问题》一文的头两节从英译本中删去的提议。

四

刘、朱、陈、小平^[1]、陆定一同志阅，退王稼祥同志照办。

毛泽东

八月十三日

[1] 刘，指刘少奇。朱，指朱德。陈，指陈云，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小平，即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

关于攻击上下大陈岛时机问题的批语^[1]

(1954年8月21日)

刘、周、陈、邓^[2]阅后，送彭德怀、黄克诚^[3]同志：

请注意，需确实查清没有美舰美机的时机，方可对上下大陈进行攻击，否则不要攻击。

毛泽东

八月廿一日

[1] 这个批语写在军委防空司令部1954年8月20日关于大陈岛地区美国空军活动情况及我机起飞情况给总参谋部的报告上。

[2] 刘，指刘少奇。周，指周恩来。陈，指陈云，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政务院副总理。邓，指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政务院副总理。

[3] 彭德怀，当时任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黄克诚，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

祝贺罗马尼亚解放十周年的电报

(1954年8月21日)

罗马尼亚人民共和国国民议会主席团主席格罗查同志：

值此罗马尼亚解放十周年之际，我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人民并以我个人名义向罗马尼亚人民和您致以衷心的祝贺。

十年来，罗马尼亚人民在罗马尼亚工人党的领导下，在巩固人民民主政权和建设社会主义方面已获得辉煌的成就。这些成就使罗马尼亚人民获得日益繁荣幸福的生活，并加强了以苏联为首的世界和平民主力量。

中国人民谨祝罗马尼亚人民在建设社会主义和维护世界和平的事业中获得更大的成就。

毛泽东

一九五四年八月二十一日北京



1954年8月21日，毛泽东和刘少奇、周恩来、彭真等在北京市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当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1954年8月，毛泽东和电影艺术家舒秀文、著名桂剧演员尹羲等在一起交谈。



1954年8月，毛泽东和许广平等在一起。

和英国工党代表团的谈话

(1954年8月24日)

人民政府、各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都欢迎你们来访问，把你们当自己的朋友看待。请你们在这里像在自己的家里一样吧。你们到中国来看看是很好的。

我们彼此一定还有很多的不了解。但是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以来，中英关系已经根本改变，虽然并不是说我们之间没有争论，没有不同意见，也不是说我们两国的制度没有不同之处。过去日本统治过中国，这是若干年前的事了；对日战争胜利以后，美国又代替了日本，帮助蒋介石欺负我们。在这两个阶段，英国都改变了对中国的态度。在我们和你们之间，基本的争论是不多了，是不是？这是基本问题。我们和法国的关系同样是这样。

过去是日本人的问题，现在是美国人的问题。我们同美国之间也有一个洋，叫太平洋，可是太平洋不太平。有些问题我们不了解。例如：澳大利亚和美国签订了一个条约^[1]，声明说是为了反对

[1] 指美国与澳大利亚、新西兰1951年9月1日在美国旧金山签订的《美澳新安全条约》。这是一个军事同盟条约。1952年4月29日生效，并无限期有效。主要内容是：缔约国将单独地和共同地采取自助和互助方式保持和发展单独和集体的军事能力；缔约国任何一国受到“威胁”时应进行协商，受到“武装进攻”时应采取共同行动。

共产党，说我们要侵略澳大利亚，因此有必要同美国和新西兰一起签订这个条约，一齐反共。反共的声浪在世界相当高哩，特别在前一个时期。据说，中国人犯了大罪，主要是把一个很好的人叫蒋介石给赶走了，这个人好极了，他有完全的道德和全部的真理。我们就做了这一件“坏事”。我读过比万^[1]先生的一篇文章，他说，美国人发明了一种新逻辑，说中国人自己侵略了自己。



1954年8月24日，毛泽东在北京会见英国工党领袖、前首相艾德礼，并强调“不同社会制度国家是可以和平共处的”。

美国说我们犯了大罪，现在这个问题也还没有完结。关于蒋介石究竟是好人还是坏人，有两种议论。在美国看来，蒋介石比我们好。你们的看法不同些，因为你们早已不承认蒋介石了，所以我说

[1] 比万，英国工党领袖，当时是英国工党访华代表团成员，毛泽东会见时在场。

和你们没有根本分歧。我们彼此在日本问题上也没有根本分歧，因为对日本问题，英国今天管不了了。因此我们看见你们觉得很高兴。

我有点意见想谈一下。所谓反共，这事并不是完全真实的。据我看，美国反共是把它当作个题目来做文章，以达到他们另外的目的，首先是占据从日本到英国的这个中间地带。美国在北美洲处在这个中间地带的那一边，苏联和中国处在这一边。美国的目标是占领处在这个广大中间地带的国家，欺负它们，控制它们的经济，在它们的领土上建立军事基地，最好使这些国家都弱下去，这包括日本、德国在内。

你们问，我们和你们所代表的社会主义能不能和平共处？我认为可以和平共处。这里发生一个问题，难道只能和这种社会主义共处，不可以和别的事物共处吗？和非社会主义的事物，像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封建王国等能共处吗？我认为，回答也是肯定的，只需要一个条件，就是双方愿意共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认为，不同的制度是可以和平共处的。

我们和你们也可以合作。我们之间首先就不会打仗。何必打仗呢？我们不仅不会和工党开仗，也不会和保守党开仗。

你们问，国际形势可能怎样发展？我看现在的国际形势是好的，日内瓦会议以后有了一些改变。有些人批评说，你们到中国来会上当，主要是美国这样说。我看你们以不听他们的话为好。历史是以若干年为单位来计算的，不能以一时的议论为准，不能听那么多。中国是一个正在开始改变面貌的落后国家，经济上、文化上都比西方国家落后。但是现在正在开始改变面貌，已经取得了改变的可能性。中国是农业国，要变为工业国需要几十年，需要各方面帮助，首先需要和平环境。经常打仗不好办事，养许多兵是会妨碍经

济建设的。如果诸位同意的话，我们要继续创造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我想，这也是英国、法国所需要的。我们的国家现在还很穷，如果能得到几十年和平就好了。你们赞成吗？如果赞成，就让我们订一个条约，当然不是今天下午订，订个几十年不打仗的条约。谁要打仗，就反对他。我们没有别的本钱，只有一桩，就是老百姓。人多，地大，是我们的两桩本钱。至于建设近代化的国家，那需要很多的时间、精力。我们这类国家，如中国和苏联，主要依靠国内市场，而不是国外市场。这并不是说不要国外联系，不做生意。不，需要联系，需要做生意，不要孤立。有两个基本条件使我们完全可以合作：一、都要和平，不愿打仗；二、各人搞自己的建设，因此也要做生意。和平、通商，这总是可以取得同意的，对不对？

我认为，英国工党朋友们对苏联的了解是不恰当的。英国是个大国，苏联也是大国，这两个国家的关系不搞好，世界和平就成问题。问题不在于中国应和苏联离开，而是英国应该和苏联靠拢。我劝你们和苏联靠拢，这是我们的建议。为什么你们这样不喜欢苏联呢？

中国、苏联、英国和其他各国彼此都靠拢些，观点不要一成不变，情况就可以改善。怎么样？再说一句，这也包括美国在内，希望美国也采取和平共处的政策。美国这样的大国如果不和平，我们就不得安宁，大家也不得安宁。这个工作英国人好做，因为我们和美国人彼此对骂得很厉害。我想，反对中国的不是美国多数人，而只是少数人。东南亚条约^[1]，美国为什么不要中国参加？我们要

[1] 东南亚条约，全称是《东南亚集体防务条约》，又称《马尼拉条约》，是美国、英国、法国、澳大利亚、新西兰、菲律宾、泰国和巴基斯坦于1954年9月8日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签订的军事同盟条约。

参加，他们却不要我们。中国、苏联、英国、美国、法国都参加有什么不好呢？

美国人做的事太不像样子，他们支持蒋介石差不多每天都骚扰大陆。所以你们最好劝劝美国人把第七舰队拿走。几条船好办，一拿就走了。他们是违反国际形势、违反历史的。他们只是美国的少数人，如杜勒斯^[1]之流。我们希望工党朋友们劝劝美国人：

一、把第七舰队拿走，不要管台湾的事，因为台湾是中国的地方；

二、不要搞东南亚条约，这也是违反历史的，要搞就搞集体和平公约；

三、不要武装日本，武装日本的目的是反对中国和苏联，最后会害自己和西南太平洋各国，这是搬石头打自己的脚，这种可能性是有的；

四、不要武装西德，武装结果不是好事，也会是搬石头打自己的脚。

让我们大家统统解除武装，我们自己的几个兵也都不要了。让我们中国、苏联、英国、法国这些亚洲和欧洲的国家倡议一下，向美国提出这个建议。

[1] 杜勒斯，当时任美国国务卿。他在国际活动中，鼓吹“冷战”，推行“战争边缘”政策，威胁要实行“大规模核报复”以及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和平演变”等战略。1950年他参与策划美国政府利用朝鲜战争的机会武装侵占中国领土台湾。1954年他又策划美国政府同台湾当局签订《美台共同防御条约》，企图使霸占台湾的行为合法化，将台湾长期作为美国的军事基地。

给伍如春的信

(1954年8月25日)

如春学兄：

惠书敬悉。困难甚念。寄上人民币叁百万元，聊助杯水。如有急需，尚望续告。此复。

顺祝康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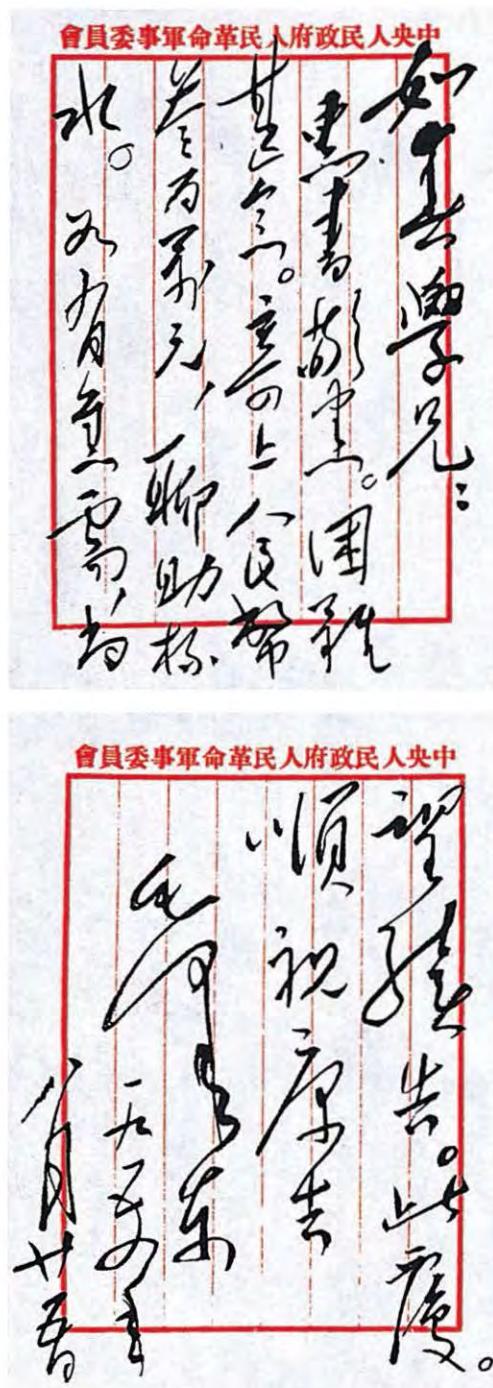
毛泽东

一九五四年八月廿五日

胡
南
來
陽
城
縣
牌
樓
鄉
松
林
庄
伍
如
春
毛
澤
東

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印

毛泽东致伍如春信的信封。



毛泽东致伍如春信的手稿。

给熊子容^[1]的信

(1954年8月26日)

子容兄：

七月三十日的信收到。进步甚慰。当选为人民代表，可为祝贺。工作问题，似以仍在原地为宜，易地则了解你的人可能不如原地多。

顺颂教祺

毛泽东

一九五四年八月廿六日

[1] 熊子容，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的同学，当时任南京师范学院教授。

子容先生：

七月三十日。函已收。甚望。幸勿为人民失望。近
有税款。毛又。毛又。毛又。毛又。毛又。毛又。
在毛又。毛又。毛又。毛又。毛又。毛又。毛又。
行。毛又。毛又。毛又。毛又。毛又。毛又。毛又。
顺。毛又。毛又。毛又。毛又。毛又。毛又。毛又。
此。毛又。毛又。毛又。毛又。毛又。毛又。毛又。

毛泽东致熊子容信的手稿。

祝贺越南民主共和国 成立九周年的电报

(1954年8月31日)

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胡志明同志：

在印度支那和平已经开始恢复的时候，我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中国人民以极愉快的心情向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和越南人民热烈地祝贺越南民主共和国的国庆九周年。

越南人民多年来争取民族的独立和自由的英勇斗争已获得重大的成果。我深信：越南人民在巩固和平、实现统一、完成独立和民主的事业中必将获得更大的胜利。在这个事业中越南人民将得到中国政府和全中国人民的深切关怀和积极支持。

毛泽东

一九五四年八月三十一日于北京

对海军党委报告的批语^[1]

(1954年8月)

此件^[2]很好。

刘、周、朱、陈、邓^[3]同志阅。

[1] 这是毛泽东对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总参谋长兼总后方勤务部部长黄克诚1954年8月3日呈送的海军党委报告的批语。

[2] 指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党委1954年7月30日报告。报告说：我们在7月29日上午召开党委会，由苏振华同志传达毛主席关于加强对敌斗争和准备解放台湾的指示，并进行了讨论，一致认识到今后进一步加强海上斗争和解放台湾战争的长期性，进一步明确了边打边建的方针，特别是在准备解放台湾的战争中建设海军。在展开对台湾的军事、政治、外交斗争中正确地掌握政策，感到海军担负着重要的责任。因此，我们决定在8月9日召开一次海军党委扩大会议，传达毛主席的指示，研究海军今后的作战任务和政治工作。毛主席指示要在准备解放台湾的战争中建设海军，这对我们鼓励很大，同时也是艰巨的任务。拟作专门研究提出一个计划报中央、军委，以加强海上战斗力量，进一步展开海上对敌斗争。

[3] 刘，指刘少奇。周，指周恩来。朱，指朱德。陈，指陈云，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副总理。邓，指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副总理。

关于高岗自杀问题给苏共中央的通报

(1954年9月1日)

苏共中央：

现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高岗最近自杀身死的事，正式通知你们。关于高岗进行反党反中央及阴谋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活动事实，今年三月间我们曾经告诉过你们。

在最近半年，根据中共各个地方党的组织所揭发的材料，更加证实了高岗的罪行。但是，高岗在被管教的这一期间，却仍毫无悔悟表现，反于八月十七日实行第二次自杀，充分暴露了他的坚持仇恨党的立场和自绝于中国人民。

高岗死后，我们进行了一系列的调查，以便确切查清他的死因。根据医生所作的临床诊断、尿便化验、病理剖检的各项结果和公安工作同志的调查、现场检查情形等，可以肯定高岗确是自杀，是服用多量安眠药致死的。同时，从其他各方面所作的进一步调查，亦证实了高岗在他的阴谋被揭穿后，早就有意识地积存安眠药和准备用这种办法实行自杀。

对于高岗自杀事，中共中央决定对外暂不公布。同时，中共中央决定将高岗及另一中共中央委员饶漱石的反党反中央及阴谋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罪恶行为，向中共全体党员和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全体团员进行传达，对中国国内的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

在政府机关工作的党外干部，亦作适当的通知。中共中央还决定将高饶事件通知各兄弟国家的党的中央，并以书面向苏共中央作如上的通知。

中共中央主席 毛泽东

一九五四年九月一日

为庆祝抗日战争胜利九周年 致马林科夫、莫洛托夫电

(1954年9月2日)

苏联部长会议主席马林科夫同志，
苏联外交部部长莫洛托夫同志：

当此战胜日本军国主义的第九周年之际，我们谨向苏联政府、苏联武装部队和伟大的苏联人民致以热烈的祝贺和深切的感谢。

最近日内瓦会议达成关于恢复印度支那和平的协议，进一步地和缓了国际紧张局势，这是和平力量的巨大胜利和战争力量的严重失败。

但是，美国侵略集团不甘心于它的失败，正在积极复活日本军国主义，策动组织西太平洋和亚洲的战争集团，并加紧指使和帮助蒋介石卖国集团对中国大陆和沿海岛屿不断进行骚扰性和破坏性的战争，以扩大对远东及世界的战争威胁。

中国人民坚决反对美国侵略集团的这种战争政策，一定要解放台湾，以保障中国的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以维护远东及世界的和平和安全。

恢复远东各国与日本之间的正常关系，防止日本军国主义的复活，已成为亚洲所有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的迫切任务。中国人民愿为这一任务的实现而努力。

中苏两国的友好同盟是巩固远东及世界和平和安全的坚强保证。
中苏两国之间伟大的、牢不可破的、日益增进的友谊万岁！

中华人民共和国
中央人民政府主席 毛泽东
中华人民共和国
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
总理兼外交部部长 周恩来
一九五四年九月二日

接受保加利亚驻华大使迪莫夫 呈递国书时的答词

(1954年9月2日)

大使同志：

我很高兴地接受您所呈递的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国民议会主席团的国书，并衷心地感谢您的祝贺。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之间兄弟般的友谊，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密切合作，已获得了极大的发展。这不但促进了两国人民的繁荣和幸福，并加强了以伟大苏联为首的世界和平民主力量。

保加利亚人民在解放后的十年中，在保加利亚共产党的领导下，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所获得的光辉成就，鼓舞了正在从事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的中国人民的劳动热情。

大使同志，我热烈地欢迎您出任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驻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特命全权大使。在您为巩固和加强中保两国的友好合作的工作中，您将得到我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全力支持。

我谨祝您在工作中获得完全的成功。

关于允许日本记者随日本社会党 代表团访华的批语^[1]

(1954年9月5日)

送周总理酌处。

要求派十名记者似可照办。

毛泽东
九月五日

是否还要增加自由党代表？

[1] 这个批语写在中国人民外交学会秘书处1954年9月4日转报的日本社会党外交局长佐多忠隆1954年8月23日给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会长张奚若的来信上。佐多忠隆在信中说：日本社会党的代表已经到达了可以访问贵国的阶段，这是非常值得欢喜的。近来我党得到了舆论的支持，其中特别是与新闻报道有关的人员，均积极主张打开中日两国外交为当前的急务，并表明愿借我党访问贵国的机会也派遣其本身具有代表性的新闻记者一同前往的强烈希望。我们虽然知道若将希望者全部派去诚有困难，但至少也希望能允许派去约十名记者，在我党代表访问贵国时同时前往。

祝贺保加利亚解放十周年的电报

(1954年9月7日)

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国民议会主席团主席格奥尔基·达米扬诺夫同志：

值此保加利亚解放十周年之际，我谨向您并通过您向保加利亚人民和政府致以衷心的、热烈的祝贺。

十年来，保加利亚人民在保加利亚共产党的领导下，遵循着季米特洛夫同志的教导，巩固了人民民主制度，并在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中获得了光辉的成就。这不仅鼓舞了正在从事社会主义建设的中国人民，而且增强了以苏联为首的世界和平民主力量。

祝保加利亚人民在建设社会主义和维护世界和平的斗争中获得新的更大的胜利。

毛泽东

一九五四年九月七日北京

关于通知周恩来等准备 讨论宪法报告的便信

(1954年9月9日)

高智^[1]用电话通知：请周、朱、陈、小平^[2]四位同志，今日下午五时以前及下午七时以后，看少奇同志宪法报告的头两章^[3]，以便晚上十一时左右，和少奇、伯达^[4]一起，到我处谈一下这两章中的有些问题。

毛泽东

九月九日上午二时

[1] 高智，当时任毛泽东的秘书。

[2] 周，指周恩来。朱，指朱德。陈，指陈云，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政务院副总理。小平，即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政务院副总理。他们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起草委员会委员。

[3] 刘少奇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报告的第一章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是历史经验的总结”，第二章是“关于宪法草案基本内容的若干说明”。

[4] 伯达，即陈伯达，当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起草委员会委员。



1954年9月9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三十四次会议，讨论通过了经修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图为委员们举手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

对刘少奇《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 宪法草案的报告（草稿）》的 批语和修改

（1954年9月）

—

此件送陈伯达^[1]同志阅后，送交刘少奇同志：

又作了一些修改^[2]，请阅酌。拟于晚上谈一下。

毛泽东

九月十三日上午四时

—

辛亥革命使民主共和国的观念从此深入人心，使人们公认，任

[1] 陈伯达，当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起草委员会委员。

[2] 毛泽东从1954年9月7日至15日对刘少奇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报告稿作过多次修改，其中比较完整的见本篇收入的6段文字。

何违反这个观念的言论和行动都是非法的。但是当时的革命派是有缺点的。他们没有一个彻底的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纲领，没有广泛地发动和组织可以依靠的人民大众的力量，因此他们不能取得对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彻底胜利。这次革命终于失败了，袁世凯领导的反动派篡夺了国家权力。

三

在过去相继统治中国的几个反动政府中，蒋介石国民党政府是最后的一个反动政府，它是从来不要宪法的。但当它垂死的时候，也想用一个伪宪来救自己的命。这个伪宪受到中国共产党、中国各民主党派和全国人民的坚决反对，结果和过去的反动政府一样，在蒋介石公布他的伪宪以后不到三年的时间，他的统治就彻底垮台了。同时，拥护这个伪宪的中国青年党、国家社会党等反革命党派也受到了人民的唾弃。这件事，在座的各位代表都是清楚地记得的。

四

现在美国帝国主义还侵占着台湾，蒋介石卖国集团还盘踞在台湾继续作恶，并且时刻企图回到大陆上来。反动派的复辟仍然是一个实际的危险。如果有人看轻这种危险，那就要犯错误。

五

在我国过渡时期，工人阶级领导的包括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具有重要的作用。这是以工农联盟为基础而又较工农联盟更为广泛的联盟，即劳动人民同可以合作的非劳动人民之间的一种联盟。

六

帝国主义者和台湾蒋介石卖国集团非常不喜欢我们建设社会主义，他们每天都在攻击我们。这有什么奇怪呢？原来我们是做对了。

有些外国资产阶级报纸失望地发现，在我们的宪法草案中所宣布的道路，“就是苏联所走过的道路”。是的，我们所走的道路就是苏联走过的道路，这在我们是一点疑问也没有的。苏联的道路是按照历史发展规律而为人类社会必然要走的道路。要想避开这条路不走是不可能的。我们一向认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普遍的真理。

为了破坏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狡猾的敌人还特别雇用了一些人，如像托洛茨基陈独秀分子，他们装成“左”的面孔，攻击我们的社会主义改造事业的具体步骤和具体措施。他们说，我们做得“太不彻底”“太妥协”“离开了马克思主义”。他们想用这些胡说混淆人们的视听。他们要我们破裂同民族资产阶级的联盟，立即剥夺民族资产阶级。他们又嫌我们的农业政策“太慢了”，他们要我们破裂同农民的联盟。这些难道不是完全的胡说吗？我们如果照这样作，当然只有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卖国贼最为高兴。

七

我们的国家所以能够关心到每一个公民的自由和权利，当然是由我国的国家制度和社会制度来决定的。任何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民群众，都没有也不可能有我国人民这样广泛的个人自由。



1954年，毛泽东在北京。

接受瑞士驻华公使贝努义 呈递国书时的答词

(1954年9月13日)

公使先生：

我很高兴地接受阁下所递交的瑞士联邦委员会的国书，并对您所转达的瑞士联邦主席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及我个人的祝贺表示感谢。

五年来，中、瑞两国间的友好关系在和平共处的基础上已经有了增进。在日内瓦会议期间，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受到了瑞士政府和人民的款待和协助，我借此机会表示谢意。今后中、瑞两国之间的经济联系和文化交流将更加增进，这不仅有利于两国人民友谊的发展而且亦有助于世界和平的巩固。

我热烈地欢迎阁下出任瑞士联邦驻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特命全权公使，在您为加强中、瑞两国友好合作的工作中，定将获得我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协助。

我预祝阁下在工作中获得成功，并祝贵国人民幸福及元首健康。

接受阿尔巴尼亚驻华大使斯蒂·纳赛 呈递国书时的答词

(1954年9月13日)

大使同志：

我非常愉快地接受您所呈递的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人民议会主席团任命您为驻中华人民共和国首任特命全权大使的国书，并衷心地感谢您的祝贺。

阿尔巴尼亚人民是勤劳勇敢的人民，它具有光荣的革命的历史传统。阿尔巴尼亚人民解放后十年来，在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的领导下，粉碎了国内外敌人的一切破坏阴谋，满怀信心地建设着自己的美好生活，并取得了光辉的成就。阿尔巴尼亚人民在社会主义建设和捍卫祖国的独立和安全的斗争中所表现的爱国主义精神和无比的劳动热情，使中国人民感到钦佩。

中、阿两国人民在历史上第一次建立了友好的外交关系。五年来，我们两国人民已结成了兄弟般的友谊。我深信：在互派大使之后，我们两国之间的真诚的友好合作关系必将获得进一步的发展，这不但有利于我们两国人民幸福的增进，并有助于以苏联为首的的世界和平民主力量的加强。

大使同志，我热烈地欢迎您出任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驻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任特命全权大使。在您为巩固中、阿两国友好合作

的工作中，您将得到我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全力支持。

我谨祝您在工作中获得完全的成功。



1954年，毛泽东在北京。

关于辛亥革命的评价^[1]

(1954年9月14日)

利用这个机会，讲一点对于辛亥革命的评价问题。有相当一部分朋友对我们讲“辛亥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觉得不妥，在感情上有些过不去。但从社会发展历史上说，辛亥革命确实是一次资产阶级性质的民主革命。

在人类历史上，有过几次性质不同的大的革命。

第一次，是奴隶主推翻原始共产主义社会，使人类的生产和社会大进一步。那时的原始共产主义社会，不是我们现在讲的共产主义社会，而是一些氏族部落组成的原始社会，他们互相打仗，捉到了俘虏就通通杀掉。奴隶主就不把俘虏杀掉，而是拿俘虏做奴隶，虽然刺瞎他一只眼，或者弄伤他一只手，但总还是要让他做工。是把人杀掉好呢，还是不杀掉让他做工好呢？还是奴隶制好，奴隶制可以积累财富。原始共产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很低，奴隶制就大进一步。现在一讲奴隶制，人们就觉得它很坏，其实奴隶制的产生在当时是一个伟大的进步。

第二次，是封建地主革掉奴隶主的命。这次革命，在中国大概是在春秋战国时代。关于这个问题，历史学家们还在争论不决，有

[1] 这是毛泽东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临时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后的讲话。

人说西周就是封建社会了。我想，今天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对这个问题可以不去作结论。我个人是比较相信郭沫若^[1]副总理的在春秋战国时代产生封建制的主张的。郭沫若曾经用很多材料证明，孔夫子^[2]所以成为圣人，是因为他是革命党，到处参加造反。说孔夫子著春秋“而乱臣贼子惧”，那是孟子讲的^[3]。其实当时孔夫子周游列国，就是哪里造反他就到哪里去，哪里想革命他就到哪里去。所以此人不可一笔抹煞，不能简单地就是“打倒孔家店”。总之，在春秋战国时代，发生了激烈的变化，发生了大的阶级斗争、革命斗争，从那时起，开始允许土地私有，允许土地收租。大概是在鲁宣公时代“初税亩”^[4]，第一次开始收地租。鲁哀公还说过什么“二，吾犹不足，如之何其彻也？”^[5]，彻，即十分之一。可见当时收地租大概是收百分之二十左右。这证明当时的社会制度已经开始变革，不再是实行井田制，而是采用收土地税的办法了。过去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6]，这个时候是搞私有了。私有制曾经是一个很好的东西。有人说过这样的话：人类历史有五十万年^[7]，但其中四十九万五千年就不懂得私有制这一条，因而没有进到文明社会。

[1] 郭沫若（1892—1978），四川乐山人，当时任政务院副总理兼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

[2] 孔夫子，即孔子（公元前551—前479），名丘，字仲尼，陬邑（今山东曲阜）人，春秋末期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儒家的创始人。

[3] 参见《孟子·滕文公下》，原文是：“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

[4] 参见《春秋·鲁宣公十五年》，鲁宣公十五年，即公元前594年。

[5] 参见《论语·颜渊》。

[6] 参见《诗经·小雅·北山》。

[7] 迄今为止的考古发现证明，人类的历史至少有200万年。

第三次，是资产阶级革封建地主阶级的命，也就是民主主义革封建主义的命。在中国，就是辛亥革命。

孙中山及其一派人领导的辛亥革命，是人类历史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一次。在辛亥革命以前，中国还有过改良派。对改良派也应该估计有进步的一面。戊戌变法^[1]在当时受压迫，为什么？就是因为它有进步性，它受到顽固派的仇恨。孙中山比改良派又更进一步，他公开号召实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推翻了清朝的统治，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建立了中华民国和临时革命政府，并制定了一个《临时约法》。辛亥革命以后，谁要再想做皇帝，就做不成了。所以我们说它有伟大的历史意义。我本人也曾经参加了这次民主革命，当了一名战士，吃七块二^[2]。当时程潜^[3]先生就参加了，他是师长，虽不是我的顶头上司，但地位比我高。

辛亥革命没有成功，失败了。为什么失败？就是因为孙中山的领导集团犯了错误，有缺点。关于这一点，孙中山有过自我批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宣言上曾经说，当时向袁世凯妥

[1] 戊戌变法，又称戊戌维新，指1898年（戊戌年）发生的变法维新运动。当时，中国面临被帝国主义列强瓜分的严重危机。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人，在清朝光绪皇帝的支持下，企图通过自上而下的变法维新，逐步地在中国推行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联合统治的君主立宪制度，发展民族资本主义，以挽救民族危亡。但是，这个运动缺乏人民群众的基础，又遭到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派的坚决反对。变法3个多月以后，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幽禁光绪皇帝，杀害谭嗣同等6人，变法遭到失败。

[2] 指当时通用的银元。

[3] 程潜，早年加入同盟会。辛亥革命爆发时，任武昌龟山炮兵阵地指挥，后任湘军都督府参谋长、湖南军事厅厅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

协是不对的^[1]。国民党在第一次代表大会上都做了批评，现在我们就不能批评吗？

我们在座的各位是不是圣人？要是说是圣人嘛，圣人就多得很；要说不是圣人嘛，我看圣人也就一个没有。人总是有缺点的，总是要犯错误的，只是不要错得太多就是了。比如当主席，说十句话错了六句，错了百分之六十，那他的主席就当不成了。要说一句话都不错，没有那回事。写文章，总是改来改去，如果不错，何必改呢？做一篇文章，往往要犯很多错误。过去我到过上海，上海那个地方很复杂，我经常走错路，总是犯错误。凡是我有了错误，希望能及时得到朋友们的批评和纠正。一个人总是会有许多缺点的。如果觉得自己一点缺点也没有，“老虎屁股摸不得”，那就不好了。要做到“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我们是靠老实吃饭，不靠摆架子吃饭。当然，在帝国主义面前，在艾德礼等人面前，还是可以“摆摆架子”的，但靠摆架子吃饭就不好了。如果共产党的领袖人物就说不得，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的领导人物就说不得，那就不好了。对孔夫子，自董仲舒^[2]以来就说不得了，“非圣诬法，大乱之殃”^[3]。我们不能这样，我们要实事求是。我们对一切事情都要加

[1] 《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说：“革命虽号成功，而革命政府所能实际表现者，仅仅为民族解放主义。曾几何时，已为情势所迫，不得已而与反革命的专制阶级谋妥协。此种妥协，实间接与帝国主义相调合，遂为革命第一次失败之根源。夫当时代表反革命的专制阶级者，实为袁世凯。”

[2] 董仲舒（公元前197—前104），广川（今河北枣强东北）人，西汉思想家，是孔子学派在西汉的主要代表。他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为汉武帝采纳，确立儒学的正统地位。

[3] 参见《汉书·金日䃅传》。

以分析；好，就肯定；不好，就批评。

在第三十次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上，我曾经提到《联共党史》结束语第二条对马克思、恩格斯就批评过。恩格斯有个别原理是错误的，应该抛弃，拿新的原理来代替它。比如，恩格斯主张无产阶级革命胜利以后采取议会制共和国的形式，但是列宁根据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认为采取苏维埃共和国的形式比较好。可见恩格斯的看法是错误的。此外，马克思和恩格斯当时都曾经说过，英国的革命可以采取和平革命的方式，并且估计英国革命将会早日到来。马克思、恩格斯都很想革命快点胜利，但实际上革命却总是没有胜利，又有什么办法。古语说“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我看这句话要改一下。人，包括圣贤在内，总是有过的，有过必改就好了。我在上次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上还说过，不要造成偶像，就是不要说谁不能批评，而要说可以批评，但批评要正确，对于批评要分析。

以上是我贡献给大家的一点意见，是否妥当，请诸位考虑。

对再次炮击金门计划的批语^[1]

(1954年9月14日)

照发^[2]。

毛泽东
九月十四日

[1] 这是毛泽东对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1954年9月14日关于同意福建军区再次炮击金门计划给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军区电报的批语。

[2] 中国人民解放军福建军区1954年9月14日呈送的作战计划说：9月3日以来，我们在炮击金门和对空作战中已取得了重大战果，为报复敌海空轰炸，根据华东军区电示精神，我们同意三十一军在本月20日前后，选择有利目标对大小金门组织第二次集中炮击。

为建设一个伟大的 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1]

(1954年9月15日)

各位代表：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今天在我国首都北京举行。

代表总数一千二百二十六人，报到的代表一千二百十一人，因病因事请假没有报到的代表十五人，报到了因病因事今天临时缺席的代表七十人。今天会议实到的代表一千一百四十一人，合于法定人数。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负有重大的任务。

这次会议的任务是：

制定宪法；

制定几个重要的法律；

通过政府工作报告；

选举新的国家领导工作人员。

我们这次会议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这次会议是标志着我国人

[1] 这是毛泽东同志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的开幕词。

民从一九四九年建国以来的新胜利和新发展的里程碑，这次会议所制定的宪法将大大地促进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

我们的总任务是：团结全国人民，争取一切国际朋友的支援，为了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为了保卫国际和平和发展人类进步事业而奋斗。

我国人民应当努力工作，努力学习苏联和各兄弟国家的先进经验，老老实实，勤勤恳恳，互勉互助，力戒任何的虚夸和骄傲，准备在几个五年计划之内，将我们现在这样一个经济上文化上落后的国家，建设成为一个工业化的具有高度现代文化程度的伟大的国家。

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正义的事业是任何敌人也攻不破的。

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

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

我们有充分的信心，克服一切艰难困苦，将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共和国。

我们正在前进。

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

我们的目的一定要达到。

我们的目的一定能够达到。

全中国六万万人团结起来，为我们的共同事业而努力奋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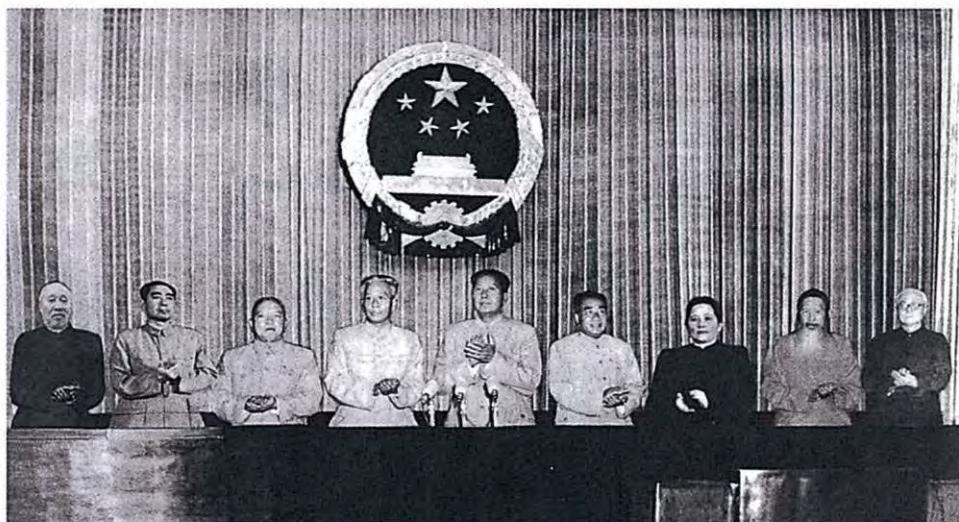
我们的伟大的祖国万岁！



1954年9月15日，毛泽东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致开幕词。



1954年9月15日，毛泽东、周恩来、宋庆龄在一届人大一次会议上。



1954年9月15日，毛泽东等在一届人大一次会议主席台上。



1954年9月15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中南海怀仁堂举行。图为步入会场的代表。



1954年9月15日，毛泽东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致开幕词。



1954年9月，毛泽东和周恩来在一届人大一次会议上填写选票。



1954年9月，毛泽东和周恩来等在一届人大一次会议上。



1954年9月，毛泽东在一届人大一次会议上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朱德当选为副主席，刘少奇当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全场起立鼓掌。



1954年9月19日，毛泽东和中华全国总工会主席赖若愚在一届人大一次会议上亲切交谈。



1954年9月20日，一届人大一次会议一致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毛泽东和全体代表起立鼓掌。



1954年9月27日，毛泽东在一届人大一次会议上和代表谈话。



1954年9月21日，毛泽东接见出席一届人大一次会议的西藏自治区代表达赖喇嘛·丹增嘉措和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



1954年9月21日，毛泽东在中南海勤政殿接见西藏自治区出席一届人大一次会议的代表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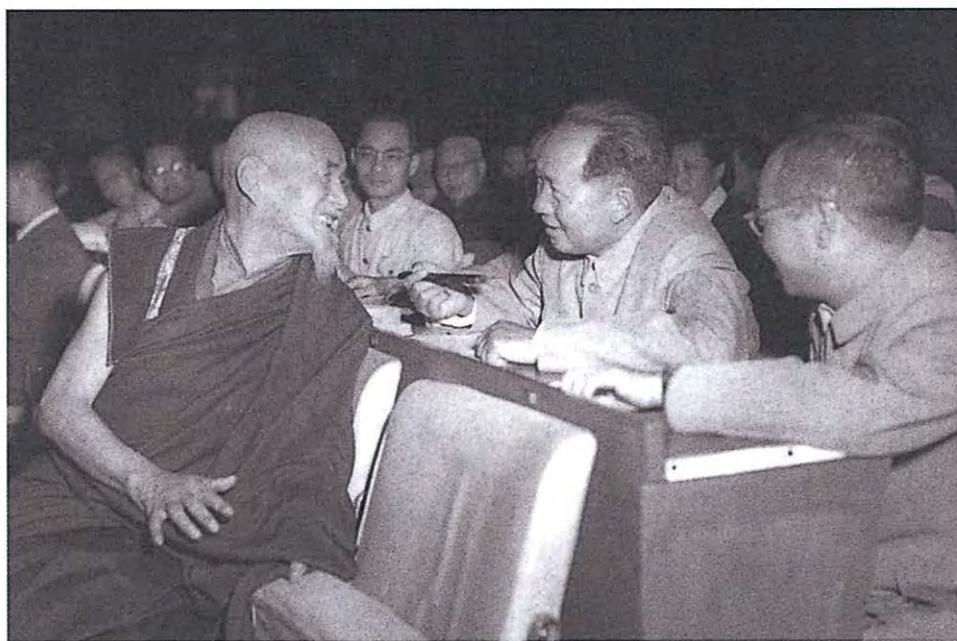
1954年9月，毛泽东和达赖喇嘛·丹增嘉措在宴会上。



《与班禅在一起》(中国画)



1954年9月，毛泽东在一届人大一次会议上和少数民族代表交谈。



1954年9月，毛泽东和佛教协会代理会长喜饶嘉措交谈。



1954年9月，毛泽东接见喜饶嘉措等少数民族来京带表。



1954年9月，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陈云在中南海紫光阁。



1954年9月，朱德、毛泽东、陈云、周恩来在中南海紫光阁。



1954年9月，毛泽东在中南海。



1954年9月27日，毛泽东在人大会议上和工业劳动模范王崇伦、农业劳动模范李友秀交谈。



1954年9月，毛泽东接见中共中央新疆分局第四书记赛福鼎·艾则孜。



1954年9月，毛泽东和一届人大一次会议代表们在一起。



1954年9月，毛泽东和刘少奇、朱德、宋庆龄等和与会代表合影。



1954年9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做出关于成立党的军事委员会的决议，毛泽东当选为中共中央军委主席。图为1954年的毛泽东。

关于修改周恩来《政府工作报告》 给胡乔木^[1]的信

(1954年9月19日)

胡乔木同志：

此件^[2]看了一遍。有些觉得不妥处作了记号，有些处改了几个字，请你斟酌。

毛泽东

九月十九日下午八时

[1] 胡乔木，当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毛泽东的秘书。

[2] 指周恩来准备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作的政府工作报告稿。

接受匈牙利驻华大使希克拉丹 呈递国书时的答词

(1954年9月22日)

大使同志：

我很愉快地接受您所呈递的匈牙利人民共和国主席团任命您为驻中华人民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的国书，并衷心地感谢您的祝贺。

九年来，匈牙利人民在匈牙利劳动人民党的领导下，胜利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从而根本改变了自己国家的面貌。中国人民怀着欢欣与赞佩的心情注视着兄弟的匈牙利人民在国家建设工作中所获得的巨大成就。

五年以来，中匈两国人民的友好关系，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亲密合作已获得了很大的成就。这种兄弟般的友好关系的不断发展，不但将进一步增进中匈两国的繁荣和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并且将加强以伟大苏联为首的世界和平民主的力量。

大使同志，我热烈地欢迎您出任匈牙利人民共和国驻中华人民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在您为进一步发展并巩固中匈两国友好合作的工作中，您将得到我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全力支持。

我谨祝您在工作中获得完全的成功。

在国庆五周年酒会上的祝词^[1]

(1954年9月29日)

周总理：

刚才我说的几句话如下，如发表，请照此文句。

毛泽东
九月廿九日

欢迎各位朋友来到中国！

对于各位朋友带来的友谊，我们表示感谢！

祝贺各位朋友身体健康！

祝贺我们相互间的友谊更加增进！

祝贺世界和平更加巩固！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部长周恩来1954年9月29日晚举行盛大酒会，招待应邀来我国参加国庆活动的各国外宾。毛泽东参加了这次酒会并在会上致词祝贺。



1954年9月29日，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率领苏联政府代表团来中国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五周年纪念活动。图为毛泽东在欢迎赫鲁晓夫的到来。



1954年9月30日，首都各界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五周年庆祝大会。图为毛泽东等和应邀参加庆典的各国政府代表团在主席台上。



1954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五周年庆祝大会上。



1954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向游行的群众答礼。



1954年10月1日，毛泽东、布尔加宁、朱德、金日成等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五周年庆祝大会上。



1954年10月1日，毛泽东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首相、朝鲜劳动党总书记金日成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五周年庆祝大会上。



1954年10月1日，毛泽东和金日成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五周年庆祝大会上。



1954年，毛泽东在北京。

祝贺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成立五周年的电报

(1954年10月5日)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总统威廉·皮克同志

敬爱的总统同志：

值此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成立五周年之际，我谨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并以我个人的名义，向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爱好和平的全德人民和您致以衷心的、热烈的祝贺。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人民在德国统一社会党和您的领导下，在伟大苏联的真诚援助下，在巩固人民民主政权、发展国民经济和提高人民生活方面，都已获得了辉煌的成就。五年来，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团结着德意志人民中一切进步爱国力量，为了争取一个统一、和平、民主和独立的德国，为了建立欧洲集体安全和保障世界和平，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赢得了欧洲和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热烈支持。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这些成就和努力，鼓舞了所有爱好和平的德意志人民，并增强了他们为和平统一德国的斗争信心。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之间的兄弟友谊和在经济上、文化上的密切合作正在越来越发展。德意志人民为争取建立统一、和平、民主和独立的德国而进行的正义事业，得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国人民的深厚同情。一九五四年七月二十五日，我国总

祝贺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成立五周年的电报

理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总理的会谈公报，表现了我们两国人民在伟大和平事业中的互相关怀和支持。

总统同志，祝您在领导德意志人民为实现自己祖国的统一和保卫世界和平的伟大斗争中获得更大的成就，并祝您身体健康！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毛泽东

一九五四年十月五日

关于总参等部的称谓均冠以 “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批语

(1954年10月8日)

退彭德怀^[1]同志。中央书记处已批准照此^[2]办理。

毛泽东

十月八日

[1] 彭德怀，当时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部长，主持军委日常工作。

[2] 指彭德怀1954年10月6日关于军委直属的总参等部的称谓问题给毛泽东的报告中提出的意见。报告说：军委直属之总参、总政、总干、总后等部原隶属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现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名义已经撤销，而国防委员会则为咨询机关性质，军委系党的组织，许多问题不能公开署名。如隶属于国防部，则成为政府系统，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均不得兼职。为此昨与伯承、贺龙、荣桓、荣臻、剑英诸同志共同考虑，拟均冠以中国人民解放军，称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等等，请予批准。



1954年10月，毛泽东在中南海参观解放军通信装备展。

关于修筑新疆铁路及四个公司 归中国独有问题给周恩来的信

(1954年10月11日)

周总理：

(一) 关于修筑新疆铁路及四个公司归中国独有等事^[1]，请你于今日抽一时间（或要小平^[2]）告诉赛福鼎^[3]同志一声（他事也可告知一些）。

(二) 各文件^[4]及消息发表时，要写社论^[5]一篇，在同日或第二日发表。

毛泽东

十月十一日

[1] 指中苏两国政府将于1954年10月12日签订修建兰州—乌鲁木齐—阿拉木图铁路的联合公报和将新疆省开采有色及稀有金属公司等4个公司的苏联股份移交中国的联合公报等事。这天签订的《中苏关于修建兰州—乌鲁木齐—阿拉木图铁路并组织联运的联合公报》规定：在中国境内的铁路，将由中国政府负责修建，苏联给予技术援助。同日签订的《中苏关于将各股份公司中的苏联股份移交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联合公报》规定：新疆省开采有

色及稀有金属公司、新疆省开采和提炼石油公司、大连建造和修理轮船公司、组织和经营民用航空路线公司将自1955年1月1日起完全移交中国，苏联股份的价值将用中国供应苏联通常出口货物的办法数年内偿还。

[2] 小平，即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国务院副总理。

[3] 赛福鼎，即赛福鼎·艾则孜，当时任新疆省人民政府副主席。

[4] 指《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联合宣言》《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关于对日本关系的联合宣言》《中苏关于苏联军队自共同使用的中国旅顺口海军根据地撤退并将该根据地交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完全支配的联合公报》《中苏关于将各股份公司中的苏联股份移交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联合公报》《中苏关于签订科学技术合作协定的联合公报》《中苏关于修建兰州—乌鲁木齐—阿拉木图铁路并组织联运的联合公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和蒙古人民共和国政府关于修建从集宁到乌兰巴托的铁路并组织联运的联合公报》。这些文件均发表于1954年10月12日《人民日报》。

[5] 1954年10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无比深厚的伟大友谊》的社论。

答谢苏联赠送机器设备 和提供技术帮助的两封信

(1954年10月12日)

—

亲爱的赫鲁晓夫^[1]同志并苏联政府代表团：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五周年的時候，苏联政府代表团代表苏联人民贈給中国人民以组织拥有两万公顷播种面积的国营谷物农場所必需的机器和设备。在组织国营谷物农場时期和熟悉农場生产的第一年，苏联政府为了在建设和管理国营谷物农場方面給中国以组织上和技术上的帮助，准备派遣一批专家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充任顾问，使领导这个国营谷物农場的中国工作人员能够同苏联专家一起在最短期间内掌握技术和大型谷物农場的管理方法。我謹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国人民对苏联政府和人民这一重要的、巨大的、友谊的援助表示热烈的欢迎和衷心的感謝。

无疑地，这个国营谷物农場不仅在推動中国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方面会起重要的示范作用，而且也会帮助中国训练农业生产方面

[1] 赫鲁晓夫，当时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委员，正率领苏联政府代表团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五周年的庆祝活动。

的技术人才和学习苏联开垦生荒地和熟荒地的宝贵经验。中国人民从苏联人民这次慷慨的援助中再一次看到苏联人民对中国人民深厚友谊和对中国人民的建设事业的关怀和支援。

伟大的中苏兄弟友谊万岁！

毛泽东

一九五四年十月十二日

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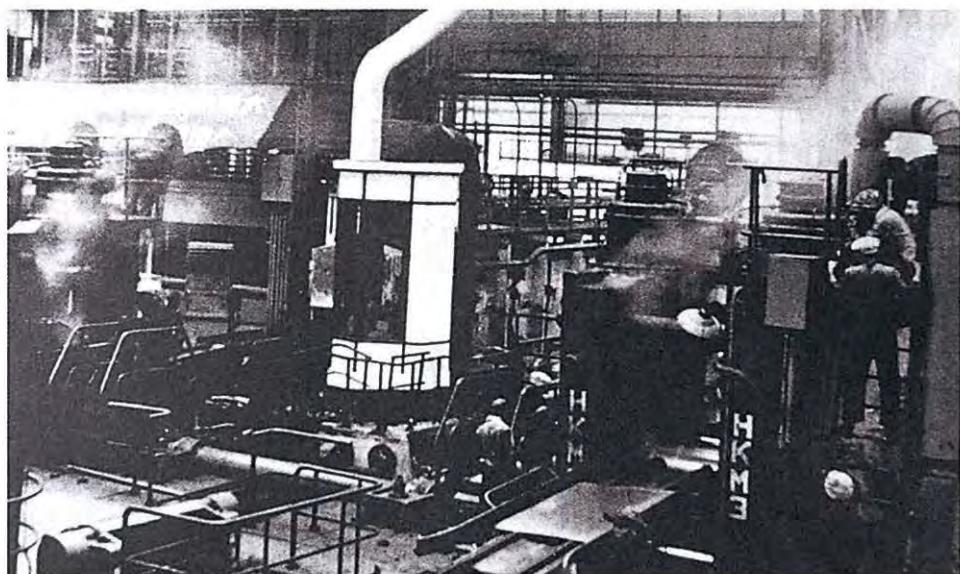
亲爱的赫鲁晓夫同志并苏联政府代表团：

苏联政府代表团一九五四年十月五日来信敬悉。

承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将现在北京举行的苏联经济及文化建设成就展览会的机床和农业机器等八十三件展品赠给我国，我谨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国人民向苏联政府致以衷心的感谢。中国人民将把这次慷慨的赠礼看作是苏联人民对中国人民的亲密友谊的具体表现。

毛泽东

一九五四年十月十二日于北京



新中国成立初期，苏联决定援助中国经济建设，帮助中国建设许多大的工厂。图为中国第一座机械化、自动化薄板厂于1954年在鞍钢建成投产。



中国第一座现代化纺织机械制造厂——国营经纬纺织制造厂于1954年8月1日投产。



1954年，建设中的第一拖拉机制造厂。

关于安排叶恭绰、朱蕴山^[1]参加 政协工作的批语

(1954年10月13日)

李维汉^[2]同志：

叶恭绰、朱蕴山似应在政协方面予以安排。

毛泽东

十月十三日

[1] 叶恭绰，曾任孙中山大元帅府财政部部长、国民党政府铁道部部长。1950年由香港回北京，任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委员。全国人大一届一次会议决定撤销文教委员会后尚未安排其职务。朱蕴山，当时任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委员会常务委员兼组织部部长。

[2] 李维汉，当时任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政协全国委员会秘书长。

关于严格保护尼赫鲁专机安全的批语^[1]

(1954年10月15日)

周总理：

请迅即令知我空军及有关方面，注意严格保护，不得发生任何微小的误会和不便。

毛泽东

十月十五日

[1] 经中、印两国政府商定，印度总理尼赫鲁于1954年10月19日至31日访问中国。10月14日，中国驻印度大使馆临时代办申健致电外交部，通报了印度外交部关于尼赫鲁专机飞行路线的安排。这个批语写在申健的来电上。

对《文艺报》转载《关于 〈红楼梦简论〉及其他》一文 所加编者按的批注

(1954年10月)

—

青年团员，一个二十三岁，一个廿六岁。^[1]

—

不过是小人物。^[2]

[1] 这句话批在《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一文作者署名“李希凡、蓝翎”的旁边。

[2] 这句话是针对《文艺报》编者按中“它的作者是两个在开始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青年”一句而写的。

三

不过是不成熟的试作。^[1]

四

对两青年的缺点则决不饶过。

很成熟的文章，妄加驳斥。^[2]

五

不应当承认俞平伯的观点是正确的。

不是更深刻周密的问题，而是批判错误思想的问题。^[3]

[1] 《文艺报》的编者按中说：“他们试着从科学的观点对俞平伯先生在《〈红楼梦〉简论》一文中的观点提出了批评。”毛泽东在其中“试着”二字旁画了两道竖线，并写了这句话。

[2] 这两句话是针对《文艺报》编者按中“作者的意见显然还有不够周密和不够全面的地方”一句而写的。

[3] 《文艺报》编者按中有一处说：转载这篇文章“希望引起大家讨论，使我们对《红楼梦》这部伟大杰作有更深刻和更正确的了解”，另一处又说“只有大家来继续深入地研究，才能使我们的了解更深刻和周密”。毛泽东在“更深刻和更正确的了解”与“了解更深刻和周密”旁边，画了两道竖线，打了一个问号，并分别批了这两句话。

对《光明日报》刊载的 《评〈红楼梦研究〉》一文的批注^[1]

(1954年10月)

—

不过是试作?

不过是一些问题和意见?

不过可供参考而已?^[2]

[1] 这是毛泽东阅读1954年10月10日《光明日报》“文学遗产”栏中发表的李希凡、蓝翎《评〈红楼梦研究〉》一文时的批注。

[2] 《光明日报》为发表李希凡、蓝翎文章所加的编者按说：“目前，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科学观点去研究古典文学，这一极其重要的工作尚没有很好地进行，而且也急待展开。本文在试图从这方面提出一些问题和意见，是可供我们参考的。同时我们更希望能因此引起大家的注意和讨论。又与此文相关的一篇‘关于《〈红楼梦〉简论》’的文章业已在第十八期《文艺报》上转载，也可供大家研究。”毛泽东的批语是分别针对编者按中“试图”“提出一些问题和意见”和“供参考”这3个提法而写的。

二

这个问题值得研究。^[1]

三

这一点讲得有缺点。^[2]

四

这就是胡适哲学的相对主义即实用主义。^[3]

[1] 这个批语是针对李希凡、蓝翎文章中下面一段话而写的：“贾氏的衰败不是一个家庭的问题，也不仅仅是贾氏家族兴衰的命运，而是整个封建官僚地主阶级，在逐渐形成的新的历史条件下必然走向崩溃的征兆。”

[2] 李希凡、蓝翎在文章中说：“这样的豪华享受，单依靠向农民索取地租还不能维持，唯一的出路只有大量的借高利贷，因而它的经济基础必然要走向崩溃。”毛泽东在这段话旁画了竖线，打了一个问号，并写了这个批语。

[3] 李希凡、蓝翎在文章中引用了俞平伯在《〈红楼梦〉研究》中的一段话：“原来批评文学的眼光是很容易有偏见的，所以甲是乙非了无标准。”即“麻油拌韭菜，各人心里爱”。毛泽东在“甲是乙非了无标准”“麻油拌韭菜，各人心里爱”两句旁分别画了竖线，并写了这个批语。

五

这里写得有缺点，不应该替俞平伯开脱。^[1]

[1] 这个批语是针对李希凡、蓝翔文章中的最后一段而写的。这段话是：“俞平伯先生这样评价《红楼梦》也许和胡适的目的不同，但其效果却是一致的。即都是否认《红楼梦》是一部伟大的现实主义杰作，否认《红楼梦》所反映的是典型的社会的人的悲剧，进而肯定《红楼梦》是个别家庭和个别的人的悲剧，把《红楼梦》歪曲成为一部自然主义的写生的作品。这就是新索隐派所企图达到的共同目标。《〈红楼梦〉研究》就是这种新索隐派的典型代表作品。”

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1]

(1954年10月16日)

各同志：

驳俞平伯的两篇文章付上，请一阅。这是三十多年以来向所谓《红楼梦》研究权威作家的错误观点的第一次认真的开火。作者是两个青年团员。他们起初写信给《文艺报》请问可不可以批评俞平伯，被置之不理。他们不得已写信给他们的母校——山东大学的老师，获得了支持，并在该校刊物《文史哲》上登出了他们的文章驳《〈红楼梦〉简论》。问题又回到北京，有人要求将此文在《人民日报》上转载，以期引起争论，展开批评，又被某些人以种种理由（主要是“小人物的文章”“党报不是自由辩论的场所”）给以反对，不能实现；结果成立妥协，被允许在《文艺报》转载此文。嗣后，实现《光明日报》的《文学遗产》栏又发表了这两个青年的驳俞平伯《〈红楼梦〉研究》一书的文章。看样子，这个反对在古典文学领域毒害青年三十余年的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也许可以开展起来了。事情是两个“小人物”做起来的，而“大人物”往往不注意，并往往加以拦阻，他们同资产阶级作家在唯心论方面

[1] 这是毛泽东写给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同志和其他有关同志的一封信。

讲统一战线，甘心作资产阶级的俘虏，这同影片《清宫秘史》^[1]和《武训传》放映时候的情形几乎是相同的。被人称为爱国主义影片而实际是卖国主义影片的《清宫秘史》，在全国放映之后，至今没有被批判。《武训传》虽然批判了，却至今没有引出教训，又出现了容忍俞平伯唯心论和阻拦“小人物”的很有生气的批判文章的奇怪事情，这是值得我们注意的。

毛泽东
一九五四年十月十六日

俞平伯这一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当然是应当对他们采取团结态度的，但应当批判他们的毒害青年的错误思想，不应当对他们投降。

[1] 《清宫秘史》是一部污蔑义和团爱国运动，鼓吹投降帝国主义的反动影片。刘少奇把这部卖国主义影片吹捧为“爱国主义”影片。

对公安部转报的广州市公安局 关于国庆节保卫工作报告的批语

(1954年10月16日)

刘、周、朱、陈、邓、彭^[1]阅。

此件^[2]值得注意。请彭对广州的防空加以布置。

毛泽东
十月十六日

[1] 刘，指刘少奇。周，指周恩来。朱，指朱德。陈，指陈云，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邓，指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国务院副总理。彭，指彭德怀，当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部长。

[2] 指公安部1954年10月12日向周恩来、中央转报的广州市公安局关于国庆节期间保卫工作的综合报告。报告主要汇报了国庆节期间广州市的敌特活动情况和我公安部门采取侦察破案，组织机关、工厂、企业内部群众防范，充分发挥民警部门管理、控制作用等公开和秘密相结合的办法，进行保卫工作的情况。其中谈到国庆期间敌机共入侵3批4架次，有一次飞至增城东面离广州市60公里空域，被我机追击逃跑。

对全国人大常委会 有关准备工作的批语^[1]

(1954年10月17日)

刘、周、陈、邓小平、彭真^[2]阅。

此件最后一页^[3]注意，应有所准备。

毛泽东

十月十七日

[1] 这个批语写在中共中央统战部的一个内部材料上。

[2] 刘，指刘少奇。周，指周恩来。陈，指陈云，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国务院副总理。彭真，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3] 指中共中央统战部一个内部材料最后一页刊载的一则简讯。内容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陈叔通准备向人大常委会提出两个问题：第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许多代表提出的带有原则性的意见，应加以归纳，由常委会加以研究；对其中的具体意见，应分别情况，可行的由政府加以推行。第二，全国人大决定，过去几年颁布的法律和条例与宪法不相抵触的都有效。但根据宪法的规定看，中央和地方颁布的法令中，有问题的不少，对这些有问题的法令，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处理还是由政府处理，应加以确定。

在国防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

(1954年10月18日)

开幕词

今天到会的有一部分人，我们过去是不认识的，只是闻其名而没有见过面。过去不认识的人，今天可以坐在一起开国防委员会会议，这种情形是很可以想一下的。今天是大敌当前，敌人很强大，他们包围我们、威胁我们，我们应当团结起来。今天在座的，有人民解放军的骨干，有社会上有名望的以及过去做军事工作有经验的人，都是在各方面联系群众的，对于实现我们的共同目标是能起作用的。

美国帝国主义侵略集团，很不满意我们，仇视我们。美帝国主义的走狗蒋介石卖国集团，现在还盘踞在台湾，全国解放战争在台湾这一部分还没有完成，还没有胜利。

我们国家的国防任务很大。除了工业问题以外，还有建军问题和作战问题。建军和作战，联系到各个方面。我们现在的作战任务是解放台湾。将来的作战任务是防御帝国主义的侵略。建军中各方面的问题很多，比如兵役制度，现在有一个文件已经发下去了，请大家提意见，有些文件还没有发下去。我们军队要提高，编制、装备要改进，训练要改进，而军队的训练是同国民军训相联系的。

国防委员会今后的任务是：团结起来，训练我们的军队和人民，逐步建设一支近代化的革命军队。除苏联军队外，我们要建设世界上第二支强大的近代化的革命军队。现在我们的经济建设有计划，文化建设有计划，军事建设也应当有计划，以便有步骤地达到我们建设强大的近代化的革命军队的目标。这是人民的目标，是宪法规定的目标。

讲话

中国军队的近代化，我看可以分作三个阶段。

第一代是清朝末年搞的新军^[1]。新军有三十六镇，就是三十六个师。今天在座的有相当多的人参加了那个军队，里面有日本士官学校的；有云南讲武堂的，我们的朱德副主席就是云南讲武堂的；有湖南讲武堂的；有保定军官学校的，唐生智^[2]委员就是保定军校的。这个新军和孙中山建立的革命党，在人民拥护的基础上，完成了推翻清朝的任务，但后来腐化了，脱离了人民，四分五裂，各人筹各人的饷，各搞各的地盘，被人民所唾弃。

第二代是黄埔军^[3]。它曾经是一个革命军，革了前面所说的那

[1] 指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后清朝政府仿照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军制编练的新式陆军。

[2] 唐生智（1889—1970），湖南东安人。曾参加辛亥革命和反袁护国战争，1923年任湘军第四师师长。1926年北伐时任国民革命军第八军军长兼北伐军中路前敌总指挥。1954年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国防委员会委员。

[3] 黄埔军，指1925年广东革命政府组织的以黄埔军校校军为主干的国民革命军，到1926年6月发展为8个军。

个军队的命。今天在座的中间，有许多人，共产党的非共产党的，都是亲眼看过、亲身经历过的。我还曾经在上海为黄埔军校招过一期学生，地址是上海环龙路四十四号。周恩来总理是当时黄埔军校的政治部主任。以黄埔军为主干的国民革命军起初成立了八个军，黄琪翔、蔡廷锴^[1]是四军的，程潜、李明灏^[2]是六军的，唐生智是八军的。黄埔军也曾受到了人民的拥护，北伐时势如破竹，但也有一个缺点，就是脱离人民。共产党那时候犯过一个错误，就是不要军队，只在军队里派党代表。后来蒋介石把党代表一驱逐，进行清党，在共产党直接控制下的军队就只有叶挺^[3]的一个独立团。南昌起义后，党所领导的军队变成了游击队，这个游击队一直打了二十二年。

现在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是第三代。人民解放军的前身是红军。

这三代，代表了中国近代军队的三个阶段。中国要搞一部军事史，把这三个时代的进步写一下就好。

我们的军队，首先是游击队，以后比较正规一些，现在更好一

[1] 黄琪翔（1898—1970），广东梅县人，1926年北伐时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第十二师第三十六团团长，1954年任国防委员会委员、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委。蔡廷锴（1892—1968），广东罗定人，1926年北伐时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第十师第二十八团团长，1954年任国防委员会副主席、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委。

[2] 程潜（1882—1968），湖南醴陵人，1926年北伐时任国民革命军第六军军长，1954年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防委员会副主席。李明灏（1897—1980），湖南醴陵人，1926年北伐时任国民革命军第六军第十七师第五十四团团长，1954年任国防委员会委员。

[3] 叶挺（1896—1946），广东惠阳人，北伐战争前期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独立团团长。

些，但严格地说来，距现代化还相差很远，因此必须努力学习。原子武器出现以后，军队的战略战术和装备都有很大的变化，而在这一方面我们一点都不懂。



1954年10月18日，毛泽东在国防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讲话。

从历史上看，我们的建军目标是能够达到的，我们的事业是有希望的。我们的军队距离现代化很远，但是在朝鲜打败了美帝国主义。北伐战争末期，蒋介石和帝国主义搭上了线，不久国共两党分裂，北伐军队变更了方向，我们单独地搞。天下是蒋介石的，我们只有几支烂枪，可是，我们的斗争代表着人民的方向，我们能把游击队集合起来，成立了军团、方面军，以后又进行了二万五千里长征。二万五千里长征是不简单的，假定我们这里在地球上对钻一个洞，从美国钻出来，恰好是一万二千五百公里多一点。长征结束

时，我们的军队没有剩下多少。一方面是因为蒋介石打我们，另一方面是因为我们在政治上军事上都犯了错误，才被迫来了个大搬家。到了遵义，进行了自我批评，才纠正了错误。

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后，我们的八路军、新四军和游击队集中起来一共有一百二十万人。重庆谈判前，蒋介石请我们一定要去商量国是，国是者全国之是也，不能不去。其实到了重庆，蒋介石毫无准备，只临时召集几个人商量了一下，他们一面谈一面发兵。我们几个人在重庆也商量了。古语说，水来土掩，兵来将挡。我们也发兵，只要把蒋介石打得越痛，就越好谈。高树勋^[1]委员就是在这个时候起义的。打到一九四八年冬天，局面就差不多了，到一九四九年春天，局面就定下来了。现在来算算这笔账，我们所以能获得胜利，基本的条件是我们代表着人民的希望和方向。日本投降后，当时全国人民希望休息，哪怕是两三年也好。结果只休息了一年，但就是在这一年里也打了不少的仗。

人民的希望，人民所需要的方向，再加上我们自己的各种努力，过去可以北伐，可以解放全中国，可以开始进行国家的建设。今后，在人民拥护的基础上，加上我们的努力，就一定能够战胜帝国主义的侵略和解放台湾，也一定能够建设一支现代化的革命军队。

我们现在工业、农业、文化、军事还都不行，帝国主义估量你只有那么一点东西，就来欺负我们。他们说“你有几颗原子弹？”但他们对我们的估计有一条是失算的，就是中国现在的潜在力量将来发挥出来是惊人的。

[1] 高树勋（1898—1972），河北盐山人。1945年10月率领一个军和一个纵队在邯郸起义。起义时任国民党军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兼新八军军长。1954年任国防委员会委员。



1954年10月18日，毛泽东和出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的委员合影。

中国是个大国，要有强大的陆、海、空军。我国有那样长的海岸线，一定要建设强大的海军。全国人民都希望我们有空军，开始的时候我们只有一支小小的空军，就像在天安门阅兵时看到的那样。一九五四年，我们国家自己出产了一架飞机，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如今，这是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虽然还只是一架教练机。

中国是一个庞然大国，但工业不如荷兰、比利时，汽车制造不如丹麦。有一句俗话，叫做“夹起尾巴做人”，做人就是做人，为什么还不能翘尾巴呢？道理很简单，我们现在坦克、汽车、大口径的大炮、拖拉机都不能造，还是把尾巴夹起的好。希望大家一面努力工作，一面保养身体，一来是为了继续工作，二来是为了看一看将

来我们自己造的飞机、坦克、大炮、拖拉机。

为了我们共同的目标，应当搞出些名堂来，使国家像个样子。能不能办到？能够的，只要我们有信心。我们所有干部，都要努一把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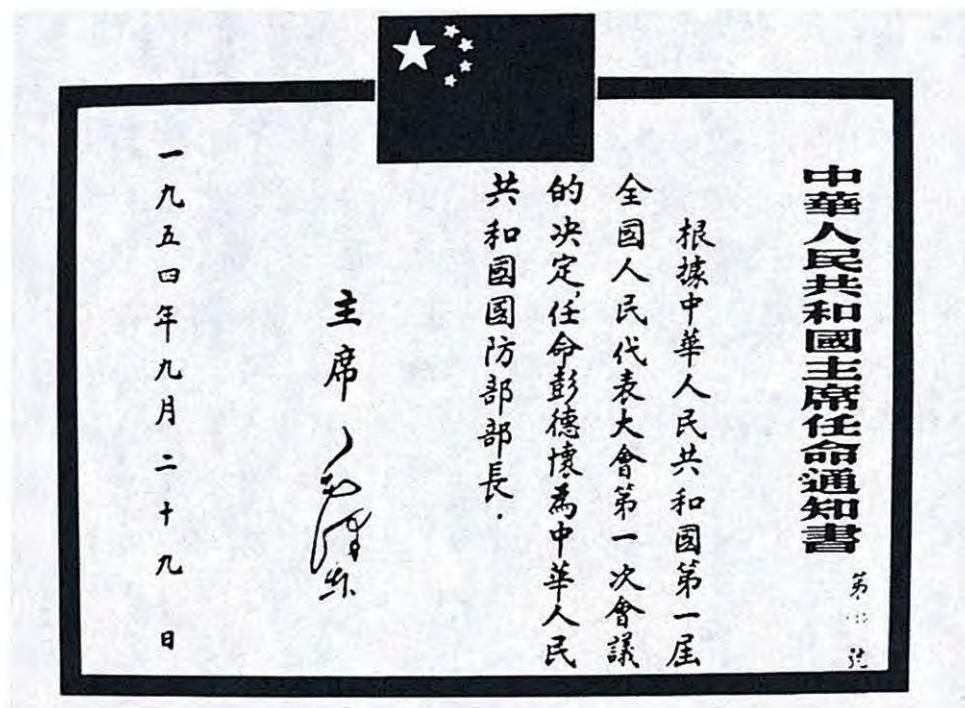
今天，国防委员会有各方面的人，具有各个时代经验的人，大家为爱国主义所鼓舞，为着一个共同的目标，这一点是很可宝贵的。在座许多人是老前辈，你^[1]当师长时，我还在当兵。我们有一条是好的，就是我们所做的事，使全体人民都知道。过去蒋介石有什么意见，人家要猜摸一番，过了一个时期就变了。现在对我们用不着猜摸，我们的方向就是人民的方向，这是载于宪法的。现在常常听到有人说要摸底，有什么底？宪法就是底。共产党的底就是发挥一切有用的因素，破坏阻碍的因素。有用的因素是建设性的力量，包括各种知识分子，旧军队出身的将军和士兵。共产党的将军们，很多也是从旧军队来的，像贺龙^[2]副主席就是当过湘西镇守使的。没有天生下来就是共产党人的。一个人初生下来并没有什么任务，母亲生儿子也并不是要他当军人，当将军，这是社会历史条件造成的。

我们的海军，目前还只是一点萌芽。去年我还坐过一次军舰，从汉口到南京，在南京还看过鱼雷快艇演习，海军战士都是十九到

[1] 指程潜。

[2] 贺龙，1926年北伐时先后任国民革命军第八军第六师师长兼湘西镇守使、第九军第一师师长、独立第十五师师长。1954年任国防委员会副主席。

二十三岁的青年，见了他们就忘了我们是老朽。当时也看到林遵^[1]委员，你们变成先生了。建设工业要有工程师，办学校要有教授，要团结他们，没有他们是不行的。当然，没有新人也不行。割断历史是不行的，好像什么都是我们白手起家，这种看法是不对的。



1954年，毛泽东任命彭德怀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长的通知书。

[1] 林遵（1905—1979），福建福州人，原国民党海军第二舰队司令。1949年4月23日率领所部二十五艘舰艇起义，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1954年任国防委员会委员。

和印度总理尼赫鲁的四次谈话

(1954年10月)

—

我们所有东方人，在历史上都受过西方帝国主义国家的欺侮。日本虽然是一个东方国家，但是过去它又是一个帝国主义国家，它也欺侮别的东方国家，可是现在连日本都受欺侮了。中国受西方帝国主义国家的欺侮有一百多年。你们的国家受欺侮的时间更长，有三百多年。现在日本人也处在受压迫的境地。因此，我们东方人有团结起来的感情，有保卫自己的感情。赖嘉文大使在中国已经几年了，一定懂得中国人民爱国的感情和中国人民对印度人民及其他东方国家人民的感情。尽管我们在思想上、社会制度上有不同，但是我们有一个很大的共同点，那就是我们都要对付帝国主义。尼赫鲁总理不要以为中国已经完全独立，没有问题了，我们还有很大的问题，台湾就还在美国和蒋介石的手里。离开大陆几公里的地方，我们有三十多个岛屿，其中大的有三个。这些岛屿都被美蒋盘踞着，我们的船不能通过，外国船也不能通过。美国飞机飞到我们内地的上空，空投特务。这些特务以七人到十人为一组，带有电台。到现在为止，已经有几十组这样的特务空投到我们内地各省。在四川和靠近西藏的青海，美国飞机都曾空投过特务，并且空投武器给那里

的土匪。这就说明，美国当局中的一小部分人，一有机会就要整我们的。

此外，尼赫鲁总理知道，我们的国家不是一个工业国，而是一个农业国。我国的工业水平比印度还低。我们要努力十年二十年之后才能取得一些成绩。帝国主义国家现在是看不起我们的。我们两国的处境差不多，这也是东方国家的共同处境。我读了尼赫鲁总理上月二十九日的演说，尼赫鲁总理所表示的情绪同我们的差不多。

我们两国人民对互访的两国领导人所表示的欢迎，说明他们着重的不是思想和社会制度方面的不同，而是我们的共同点。

应当把五项原则^[1]推广到所有国家的关系中去。尼赫鲁总理在上月二十九日的演说中就说过，应当按五项原则来受约束，承担义务。如果一个国家说了不做，那末就有理由来指责它，它在人们眼中就输了理。问题是有些大国不愿受约束，不愿像我们两国那样，根据五项原则订立协定。不知道它们有什么想法？据我知道，美国和英国也说，它们要求和平，不干涉他国内政。但是，如果我们要同它们根据五项原则发表声明，它们又不愿意干。

不能设想任何国家会开军队到美国去。至于说美国怕丧失它在世界各地占据的地方，可是我好像听说美国是反对英、法殖民主义

[1] 指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包括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1953年12月至1954年4月，中国政府代表团和印度政府代表团关于两国在中国西藏地方的关系在北京举行谈判。这五项原则是谈判开始时周恩来总理同印度代表团的谈话中提出的，后来正式写入双方达成的《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的序言中。1954年6月周恩来总理和印度尼赫鲁总理的联合声明以及此后的许多国际性文件中都采用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提法。五项原则作为国与国之间关系的准则，已在世界上得到广泛的承认和使用。

的。美国的恐惧也实在太过分了。它把防线摆在南朝鲜、台湾、印度支那，这些地方离美国那么远，离我们倒很近。这使得我们很难睡稳觉。

美国做事是不管别人能不能受得了的。例如，搞东南亚条约，它就没有问问中国和印度。亚洲有许多国家，但是它只问了三个：巴基斯坦、泰国、菲律宾。

尼赫鲁总理说东南亚条约是美国对日内瓦协议的一个反应，这很对。日内瓦会议^[1]做了好事，美国就来破坏。

艾登曾经建议搞一个亚洲洛迦诺公约^[2]，但是后来又放弃了，反而接受东南亚条约。这样的大国，竟这样胆小。我们两国就不

[1] 日内瓦会议，指1954年4月26日至7月21日在瑞士日内瓦举行的讨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和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的国际会议。中、苏、美、英、法五国参加所有两项议题的讨论。朝鲜北南双方及美、英、法以外的其他十二个侵略朝鲜北方的国家参加了朝鲜问题的讨论，越南民主共和国、老挝、柬埔寨和南越政权参加了印度支那问题的讨论。关于朝鲜问题没有达成任何协议；关于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分别达成关于在印度支那三国停止敌对行动的协议和《日内瓦会议最后宣言》（总称日内瓦协议），实现了印度支那的停战。

[2] 洛迦诺公约，全称《洛迦诺保证条约》，1925年10月16日英、法、德、意、比、波、捷（捷克斯洛伐克）七国代表在瑞士洛迦诺会议上通过，同年12月1日在英国伦敦正式签字。公约包括一个议定书和七个条约，其中最重要的《德国、比利时、法国、英国和意大利相互保证条约》（又称《莱茵保安公约》）规定，签约国相互保证德法、德比边界不受侵犯；遵守《凡尔赛和约》中关于德国莱茵区非军事化的协定；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一切争端。1936年3月德国法西斯政府毁约进军莱茵区，1939年4月宣布废止洛迦诺公约。20世纪50年代初，英国外交大臣艾登曾主张在东南亚地区搞一个类似洛迦诺公约的集体安全体系，后因美国的反对未能实现。

怕。美国邀请印度参加马尼拉会议，印度就有胆量不去。在恢复中国在联合国中的地位问题上，印度也有胆量投票赞成。但是像英、法这样的大国却如此胆小。我们向它们建议，把它们的大国地位给我们，好不好？

英国常说是他们不承认我们；我们对英国说，是它不承认我们。我们劝英国学印度，果真如此，英国就能同我们建立正式外交关系。北欧的一些国家，例如挪威，也敢于投票赞成恢复我国在联合国中的地位，因此我们同挪威也建立了正式外交关系。

澳大利亚说怕我们，说共产党要去侵略它。可是我们连船都没有，怎样去法呢？澳大利亚参加马尼拉条约，说是为了防御。但是我们向它提出五项原则，同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它又不干。

我有两点怀疑：

第一，美国叫着反共的口号，它反对共产党倒是实在的事。但是，它是否真的害怕中国共产党呢？中国只有几枝烂枪，我们有的只是人、农业和手工业。我看美国不是真怕中国共产党，而是以此为题目，另有其他的目的。

第二，像英国、法国、澳大利亚这些国家，为什么要跟着美国走，而印度、印尼、缅甸和北欧的一些国家却不一定跟着美国走呢？我看这是因为英国、法国、澳大利亚这些国家把它们的利益套在美国车子上，美国火车头下一个命令，它们不得不服从。印度、印尼、缅甸和北欧的一些国家没有把它们的利益套在美国车子上，或者套得不紧，因此没有必要跟着美国走。

（十月十九日）

二

我们在合作方面得到一条经验：无论是人与人之间、政党与政党之间、国与国之间的合作，都必须是互利的，而不能使任何一方受到损害。如果任何一方受到损害，合作就不能维持下去。正因为这个原因，我们的五项原则之一就是平等互利。

中国古代的圣人之一孟子曾经说过：“夫物之不齐，物之情也。”^[1]这就是说，事物的多样性是世界的实况。马克思主义也是承认事物多样性的，这是同形而上学不同的地方。

国与国之间不应该互相警戒，尤其是在友好的国家之间。像我国同美国这样互相警戒着是不好的。

(十月二十一日)

三

我们不赞成过去希特勒^[2]德国的说法，希特勒德国和日本过去曾说，它们是“无”的国家，要向“有”的国家取得东西。日本在过去，在十年前，倒的确是“黄祸”。

我们现在需要几十年的和平，至少几十年的和平，以便开发国内的生产，改善人民的生活。我们不愿打仗。假如能创造这样一个

[1] 参见《孟子·滕文公上》。

[2] 希特勒（1889—1945），德国法西斯首领，纳粹党党魁。1933年在德国垄断资产阶级支持下出任总理，次年总统兴登堡死后，自称国家元首，实行法西斯统治。1939年9月派德军入侵波兰，挑起第二次世界大战；1941年6月大举进攻苏联。1945年4月在苏军解放柏林时自杀。

环境，那就很好。凡是赞成这个目标的，我们都能同它合作。毫无疑问，印度是赞成的，印尼和缅甸也是赞成的。

我想泰国也不会怀疑中国要大举进攻它。我们是想同它搞好关系的，但是泰国政府古怪得很，不理我们。

菲律宾说怕我们侵略，但是我们要同它搞好关系，它又不干。既然怕侵略，那末我们就交朋友吧，互不侵犯，并且像中印两国一样，发表一个声明。但是它又不干，它不愿意承认我们国家的存在。我们想不出这是为了什么，唯一的理由就是它听美国的话，同美国走一条轨道上，美国说什么，它就做什么。

说到美国，我们上次还有一个问题没有谈完，那就是战争问题。尼赫鲁总理说，美国想打仗，想用战争的办法得到更大的利益。关于战争是否有好处，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我们可以看一看两次世界大战究竟对谁、对哪些国家有好处。可以说两次大战对三类国家有利，对其余的国家都是有害的。

第一类国家是美国帝国主义，它在两次大战中获得了利益，得到了发展。

第二类是在两次大战以后建立起来的、由共产党和工人阶级领导的国家。

第三类是被压迫的民族和国家，这些不是共产党领导的，而是由爱国的团体和政党领导的，像印度、印尼、缅甸、叙利亚和埃及这样的国家属于这一类。

要搞战争的话，就要动员人民，就要使人民处于紧张状态，并且使他们学会打仗。但是，人民结合起来以后，势必会产生革命。例如，中国革命就是这样，印度的革命也是这样。我们两国的独立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果，没有第二次大战，很难取得独立。

另外一些国家被战争削弱了，例如德国、意大利、日本；英国、法国虽然是战胜国，但是也削弱了。在中国，由于日本和蒋介石削弱了，我们就起来了。由于英国削弱了，印度、缅甸和埃及起来了。由于法国削弱了，越南、叙利亚起来了。由于荷兰削弱了，印尼起来了。

如果再要打仗的话，不知道美国军事集团是怎样的想法。他们过去的经验是在两次大战中得到利益和发展，他们希望通过再一次战争得到更大的利益和发展。他们是根据自己的经验这样想的，但是，这只是一方面的经验；另一方面，两次大战以后还建立了共产党领导的国家和爱国党派领导的国家。如果再打大战，我看美国不一定得利，而且美国本身就会发生问题。如果再打大战，西亚和非洲的大部或全部、整个拉丁美洲都会脱离帝国主义。

人民革命力量是要得到机会才能起来的。布尔什维克^[1]如果没有得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机会，那末十月革命就会有困难。我们在中国打了二十二年仗，但是胜利还是在最后几年取得的。第二次大战以后，我们得到了机会才起来的。这是共产党领导的国家方面。

爱国党派领导的国家方面，我们在东南亚和西亚也可以看到一些例证。各人有各人的看法，但是我看，再打大战，对美国来说是划不来的，整个世界或世界的绝大部分将处于革命状态。我这样说，并不是故意危言耸听，而是根据两次大战的实际情况。如果再打大战，我看对美国没有任何好处，只能使它的统治范围缩小。

在武器方面，美国以为它有原子弹和大炮，以为它的海、空军强大，因此它依靠这些东西。我想武器虽然有变化，但是除了杀伤

[1] 布尔什维克，指布尔什维克党，原苏联共产党的前身，1912年正式建立。

的人数增多以外，没有根本的不同。古代使用的是冷兵器，例如刀、枪等。后来使用热兵器，例如步枪、机关枪、大炮等。现在又加上原子弹。但是基本的差别就是，冷兵器杀伤的人较少，热兵器杀伤的人多一些，原子弹杀伤的人更多。除了死伤的人数以外，没有什么差别。过去，冷兵器和热兵器双方都有，现在苏联和美国也都有原子弹。因此随着武器的变化，无非是死伤的人数更多而已。

如果打第三次世界大战，那末死伤的人数恐怕就不是以千万计，而是要以亿万计。中国现在没有原子弹，不知道印度有没有。我们正在开始研究，原子弹是要花本钱的，我们一下子还搞不起来。

如果打第三次世界大战，那末这一方有死伤，另一方也有死伤，因此就平衡了。最后决定战争胜负的还是人，看谁拿着武器，看掌握着武器的战士们认为什么对他们最有利，看谁会打仗，而主要的还是前二者。至于说武器的多少，印度国大党和中国共产党在开始的时候都是没有武器的，现在我们都有了武器。

此外，还有一条经验。在两次世界大战中，都是防御者胜利，进攻者失败。第一次大战中，德国军队在西边打到巴黎，在东边几乎打到彼得格勒，但是结果进攻者还是失败了。第二次大战中的进攻者，德国、意大利、日本也都失败了。而防御的一方取得了胜利，虽然在防御这一方面的一些国家被战争削弱了，例如英国、法国。

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不应该再打大战，应该长期和平。再打大战的结果，是对侵略者不利的。

我们双方的分析虽然有些地方相同，有些地方不同，但是结论是相同的。尼赫鲁总理在对美国进行分析时说，一方面美国从战争中得利，另一方面又遇到了困难。这种分析是很好的。至于战争工

具，我们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弓箭、大炮和原子弹。尼赫鲁总理说有性质上的不同，这是对的。我刚才谈武器时，只是就战争的结果而言。

不管用什么武器，不管是哪一个时代进行的战争，不管战争的规模是地方性的或是世界性的，结果多是一方摧毁另一方。固然，战争也有不分胜负而讲和的，例如三八线战争^[1]和十七度线的战争^[2]。在这种战争中，没有任何一方根本打败另一方。但是在大多数的战争中，总是一胜一败，败者的力量被摧毁得更多些。所谓力量，不仅包括有生命的力量，而且包括物质力量。因此归根结底，还是看力量损毁的范围和大小来决定胜负。

当然，我是指战争的最后结果而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果是德国的军队被全部毁灭，而苏联的军队不但没有毁灭，而且还打到柏林。德国、意大利、日本的军队都被解除了武装。尼赫鲁总理推想，第三次大战会使全世界处于混乱时期，这种推想是可能的。原

[1] 三八线战争，指朝鲜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临近结束时，美国和苏联商定在朝鲜国土上以北纬38度线作为对日本采取军事行动和受降范围的临时分界线，这条界线通称“三八线”。1950年6月，朝鲜半岛三八线南北两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韩国）发生战争。随后，美国打着联合国的旗号出兵干涉，并越过三八线向中朝边境大举进犯，严重威胁中国的安全。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中国人民志愿军同朝鲜人民军并肩作战，沉重打击了美国的侵略，迫使它于1953年7月在朝鲜停战协定上签字。

[2] 指1946年至1954年越南人民抗击法国侵略的战争。1945年9月，越南宣布独立，建立越南民主共和国。法国为在印度支那重建殖民统治，随即入侵越南。越南人民为保卫民族独立进行了长达8年多的抗法战争。1954年5月，越南人民经奠边府战役取得抗法斗争的决定性胜利。7月，根据日内瓦协议，越南人民军和法军以北纬17度线为临时军事分界线实行停火；法国承认越南独立并撤出印度支那。

子弹不仅会毁灭人，而且会毁灭物质，但是，是否许多国家就会没有政府呢？不会的。只要有人存在，总是会有政府的。一个政府被摧毁了，另一个政府又会起来。人类总是要找出路的，剩下来的人也是会求生的。还应该估计到，现在的人比过去的人有很大的变化，他们要求解放和独立的觉悟已经大大提高，这在无论哪个国家都是如此，包括美国在内。

归根一句话，不打仗最好。如果我们能替艾森豪威尔^[1]当个参谋长，那末他就可以听我们的话，而不受他的顾问的包围了。尼赫鲁总理做这件工作会比我们顺利些。如果我们去做这个工作，他就会说我们以革命来恐吓他，并且说他不怕革命。我想，不仅战争，就是紧张局势也使制造紧张局势的人一方面得利，另一方面又受到损害。我想问问，究竟是使人民感到安全有利呢，还是使人民每天处于紧张有利？紧张局势会促进人民觉悟，使他们做好准备，抵抗压力。这是有助于革命的。

很明显，中印之间没有紧张局势，我们互相之间也不进行神经战，也不每天戒备着，像我们同美国之间以及苏联同美国之间那样。

尼赫鲁总理到中国来已经有几天了，一定已经知道了我们的情况。我们现在正执行五年计划，社会主义改造也正在开始。如果发生战争，我们的全盘计划就会打乱。我们的钱都放在建设方面了。如果发生战争，我们的经济和文化计划都要停止，而不得不搞一个战争计划来对付战争。这就会使中国的工业化过程延迟。但是把中国全部毁灭，炸到海底下，是有困难的，中国人是会永远存在的。印度也是这样。几千万年前有一种大动物叫恐龙，它在冰河时

[1] 艾森豪威尔，当时任美国总统。

期就消灭了。但是后来又出现了别的动物，最后出现了人类。现在在中国还可以看到冰河的遗迹。

总之，我们应该共同努力来防止战争，争取持久的和平。

(十月二十三日)

四

大约两千多年前，中国的一个诗人屈原曾有两句诗：“悲莫悲兮生别离，乐莫乐兮新相知。”^[1]

我曾经在一次宴会上对尼赫鲁总理谈起我们对印度的感觉，我说我们同印度不需要互相防备着。我们没有感觉到印度要损害我们。

我曾经问，我们两国总理兼外长在谈话中如果说错了话，能不能改？我想是能改的。但这是在我们两国之间如此，在别的一些国家可能是会抓住我们说错的话的，我们也会抓住别的一些国家说错的话。中国有一句话，叫做“抓辫子”。但是我们同印度是不互相抓辫子的，我们并不互相防备，说错了话也不要紧。

印度是一个有希望的民族，是一个伟大的民族。我听袁仲贤^[2]大使说，印度南部的人民在农业方面精耕细作，把一切可利用的土地都利用了，这有点像我们成都附近的情况。印度的每一个好消息都使我们高兴。印度好了，对世界是有利的。

我很高兴能有这几次会谈，使我们相互交换了意见。同时尼赫鲁总理又同周恩来总理进行了会谈。我们两国的外交是很容易办

[1] 参见屈原《九歌·少司命》。

[2] 袁仲贤，当时任中国驻印度大使。

的，不需要吵架。朋友之间有时也有分歧，有时也吵架，甚至吵到面红耳赤。但是这种吵架，和我们同杜勒斯^[1]的吵架，是有性质上的不同的。

尼赫鲁总理这次来访，一定会看出来，中国是很需要朋友的。我们是一个新中国，虽然号称大国，但是力量还弱。在我们面前站着一个强大的对手，那就是美国。美国只要有机会，总是要整我们，因此我们需要朋友。这是尼赫鲁总理可以感觉到的。我想印度也是需要朋友的。这一点可以从我们这几次会谈，从过去几年我们的合作，从周总理访问印度时受到的欢迎和进行的恳谈看得出来。

尼赫鲁总理主张建立和扩大和平区域，并且表示希望赞成和平的国家日益增多。建立和扩大和平区域是一个很好的口号，我们赞成。为此目的，就需要去除一些足以引起怀疑、妨碍合作的因素。中印签订了关于西藏的协定^[2]，这是有利于消除引起怀疑、妨碍合作的因素的。我们共同宣布了五项原则，这也是很好的。华侨问题也应该适当地解决，免得有些国家说我们要利用华侨捣乱。如果华侨保持侨民身份，他们就不应该参加所在国的政治活动；如果取得了所在国的国籍，那末就应该按该国的法律办事。华侨也应该遵守所在国的法律。

[1] 杜勒斯，当时任美国国务卿。

[2] 1954年4月29日，中国和印度两国政府在北京签订了《中印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协定明确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指导两国关系的准则，并以此确定了促进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贸易及便利两国人民互相朝圣往来的各项具体办法。主要内容是：双方互设商务代理处；双方商人、香客在指定地点进行贸易和按惯例朝圣，并经一定山口、道路往来；关于两国外交、公务人员及国民过境事宜的规定等。协定1954年6月3日生效，有效期8年，1962年6月期满失效。

凡是足以引起怀疑、妨碍合作的问题，我们都要来解决，这就能达到五项原则中的平等互利。合作不能对任何一方有害，否则就不能持久，一定会破裂。不论是朋友之间、国与国之间或是政党与政党之间的合作，都是如此。合作一定要有利，否则谁还干呢？

(十月二十六日)



1954年10月，毛泽东接见印度总理尼赫鲁。

关于邀集在京中央委员阅看 同南斯拉夫建交文件的信

(1954年10月20日)

周总理：

给张大使电报^[1]发后，请将这整套文件交少奇、尚昆^[2]同志，邀集（已阅过者不邀）在北京的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及个别工作同志，到西楼轮阅一遍（不要印刷，或者还要加上第一次赫鲁晓夫的来信^[3]）。

毛泽东
十月廿日

[1] 指中共中央1954年10月18日关于同南斯拉夫进行建交谈判等问题给中国驻苏联大使张闻天的电报。电报中说：中央同意即与南斯拉夫建立外交关系，并决定由你代表中国政府在莫斯科同南斯拉夫驻苏大使进行建交谈判。1955年1月2日，中国同南斯拉夫正式建立了外交关系。

[2] 尚昆，即杨尚昆，当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

[3] 指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赫鲁晓夫1954年9月23日关于苏联及东欧各人民民主国家同南斯拉夫关系问题给中共中央、毛泽东的电报。

在印度驻华大使为尼赫鲁访华 举行的招待会上的祝词

(1954年10月21日)

中印两国人民都是坚决主张和平的。我们两国人民像全世界人民一样坚决为和平而努力。

为中印两国人民的合作和两国人民的繁荣，
为世界和平，
为印度共和国总统普拉沙德的健康，
为尼赫鲁总理到中国访问和他的健康，
为今天的宴会主人——赖嘉文大使的健康，干杯！



1954年10月21日，毛泽东和印度共和国总理尼赫鲁在印度驻华大使举行的招待会上。



1954年10月21日，毛泽东和尼赫鲁在招待会上。

给三三一厂全体职工的信

(1954年10月25日)

第二机械工业部转国营三三一厂全体职工同志们：

八月二十八日报告阅悉。祝贺你们试制第一批爱姆一十一型航空发动机成功的胜利。这在建立我国的飞机制造业和增强国防力量上都是一个良好的开端。希望你们继续努力，在苏联专家的指导下，进一步地掌握技术和提高质量，保证完成正式生产的任务。

毛泽东

一九五四年十月廿五日

给二四七厂全体职工的贺信

(1954年10月25日)

第二机械工业部转国营二四七厂全体职工同志们：

八月十二日报告阅悉。祝贺你们试制第一批七六公厘野炮成功的胜利。这对建立我国的国防工业和增强国防力量上都是一个良好的开端。希望你们继续努力，在苏联专家的指导下，进一步地掌握技术和提高质量，保证完成正式生产的任务。

毛泽东

一九五四年十月廿五日

给一二七厂全体职工的贺信

(1954年10月25日)

第二机械工业部转国营一二七厂全体职工同志们：

九月二十七日报告阅悉。祝贺你们试制第一批一二二公厘榴弹炮成功的胜利。这对建立我国的国防工业和增强国防力量上都是一个良好的开端。希望你们继续努力，在苏联专家的指导下，进一步地掌握技术和提高质量，保证完成正式生产的任务。

毛泽东

一九五四年十月廿五日

答谢金日成祝贺我志愿军 入朝参战四周年的电报

(1954年10月25日)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内阁首相金日成同志：

我收到了您一九五四年十月二十四日的来电。我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并以我个人的名义对全体朝鲜人民、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您表示衷心的感谢和敬意。

英雄的朝鲜人民和中国人民在反抗侵略、保卫和平的正义斗争中已经结成了血肉相关的战斗友谊。这种友谊是维护远东和平的重要因素。在为争取朝鲜的和平统一和维护亚洲和平的奋斗中，我们两国人民的这种友谊必将得到进一步的巩固和发展。

谨祝朝鲜人民在迅速恢复自己祖国国民经济的庄严事业中获得更大的成就。

毛泽东

一九五四年十月二十五日于北京

为苏联经济 及文化建设成就展览会题词^[1]

(1954年10月25日)

参观了苏联经济及文化建设成就展览会以后，我们觉得很满意，很高兴。这个展览会用真凭实据表现了苏联工农业经济的突飞猛进，苏联技术科学的高度发展，苏联教育事业和文化艺术事业的繁荣，和苏联人民生活的幸福。通过这一切，展览会也生动地说明了苏联人民在劳动中所表现的无限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说明了苏联共产党、苏联政府和苏联各族人民的团结一致，说明了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领导的正确。我们以有这样强大的盟邦而自豪。苏联的强大是争取和平民主阵营各国经济文化普遍高涨的重要条件，是争取世界和平和人类进步的重要条件。

苏联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的光荣成就大大地鼓舞中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热情，并且使中国人民得到学习的最好榜样。苏联政府和苏联人民在我们的建设事业中给了我们多方面的一贯的巨大的援助，这种援助经过最近的中苏会谈是更加扩大了，而苏联经济及文化建设成就展览会的举行，也正是苏联对我国热情援助的一种表

[1] 1954年10月2日，苏联经济及文化成就展览会在北京展览馆开幕。10月25日，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参观了展览会，并为其题词。

现。我们代表全中国人民对于这种情同手足的友谊表示感谢。

毛泽东 刘少奇 周恩来

朱 德 陈 云 林伯渠

董必武 彭德怀 彭 真

邓小平^[1]

一九五四年十月二十五日



1954年10月，周恩来和米高扬在有关苏联援助中国的建设项目协定上签字。毛泽东等出席签字仪式。

[1] 陈云，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林伯渠，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董必武，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彭德怀，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部长。彭真，当时任中共中央候补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国务院副总理。



1954年10月，毛泽东和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等一起参观苏联经济建设展览。



1954年10月，毛泽东等参观苏联经济建设展览。

对陆定一关于展开《红楼梦》 研究问题的批判的报告^[1]的批语

(1954年10月27日)

[1] 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陆定一1954年10月27日关于展开《红楼梦》研究问题的批判给毛泽东并中央的报告中说，作家协会古典文学部于本月24日召开了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讨论会，到会的有古典文学研究者、作家、文艺批评工作者和各报刊编辑等60多人，俞平伯在上午也到了会。会上，一致认为李希凡、蓝翎二人关于《〈红楼梦〉研究》和《〈红楼梦〉简论》的批评具有重要意义，并且认为消除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主义观点在古典文学研究界的影响，是一场严重斗争，经过这个斗争，将使古典文学研究工作开始进入一个新的阶段。许多人准备写文章参加讨论，但也有一些古典文学研究者在发言中为俞平伯的考据劳绩辩护，主要是担心自己今后的考证工作会不被重视。关于这一点，我们在发言中适当地作了解释。这次讨论的目的，是要在关于《红楼梦》和古典文学研究方面与资产阶级唯心论划清界线，并进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对《红楼梦》的思想性和艺术性作出较全面的分析和评价，以引导青年正确地认识《红楼梦》。报告提出，在讨论和批评中必须防止简单化的粗暴作风，允许发表不同的意见，只有经过充分的争论，正确的意见才能真正为多数人所接受。对那些缺乏正确观点的古典文学研究者，仍应采取团结的、教育的态度，使他们在这次讨论中得到益处，改进他们的研究方法。这次讨论不应该仅停止在《红楼梦》一本书和俞平伯一个人上，也不应仅限于古典文学研究的范围内，而应该发展到其他部门去，从哲学、历史学、教育学、语言学等方面彻底地批判胡适的资产阶级唯心论的影响。

刘、周、陈、朱、邓^[1]阅，退陆定一照办。

毛泽东

十月廿七日

[1] 刘，指刘少奇。周，指周恩来。陈，指陈云，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朱，指朱德。邓，指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

对《质问〈文艺报〉编者》^[1] 一文的批语和修改

(1954年10月27日)

—

即送人民日报邓拓^[2]同志照此发表。

毛泽东
十月廿七日

—

文艺报在这里跟资产阶级唯心论和资产阶级名人有密切联系，跟马克思主义和宣扬马克思主义的新生力量却疏远得很，这难道不是显然的吗？

[1] 《质问〈文艺报〉编者》一文，载于1954年10月28日《人民日报》，作者是袁水拍。毛泽东在审阅此文时，除加写了本篇二这一段文字外，还有一些零星的文字修改。

[2] 邓拓，当时任《人民日报》总编辑。

给程潜^[1]的信

(1954年10月27日)

程主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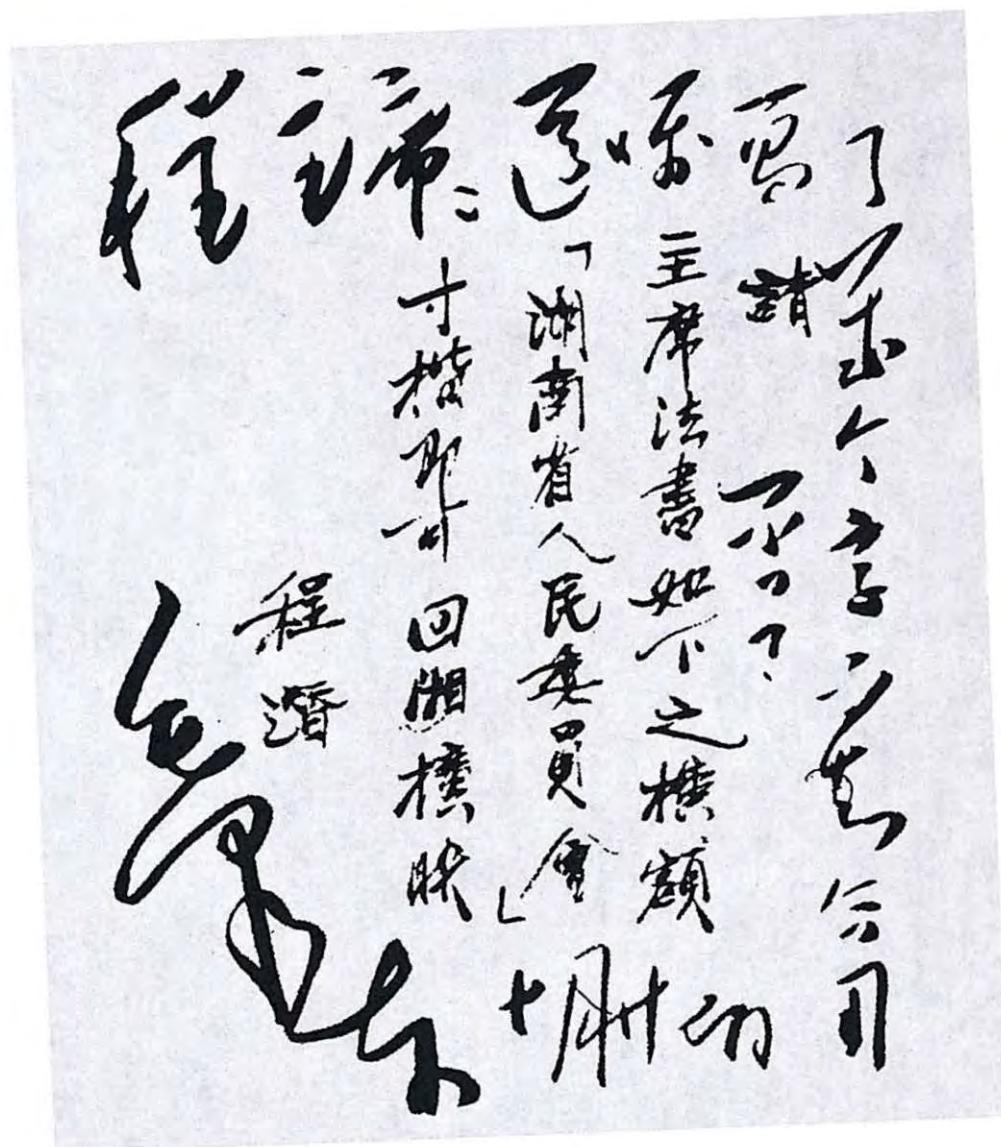
遵嘱写了几个字^[2]，不知合用否？

毛泽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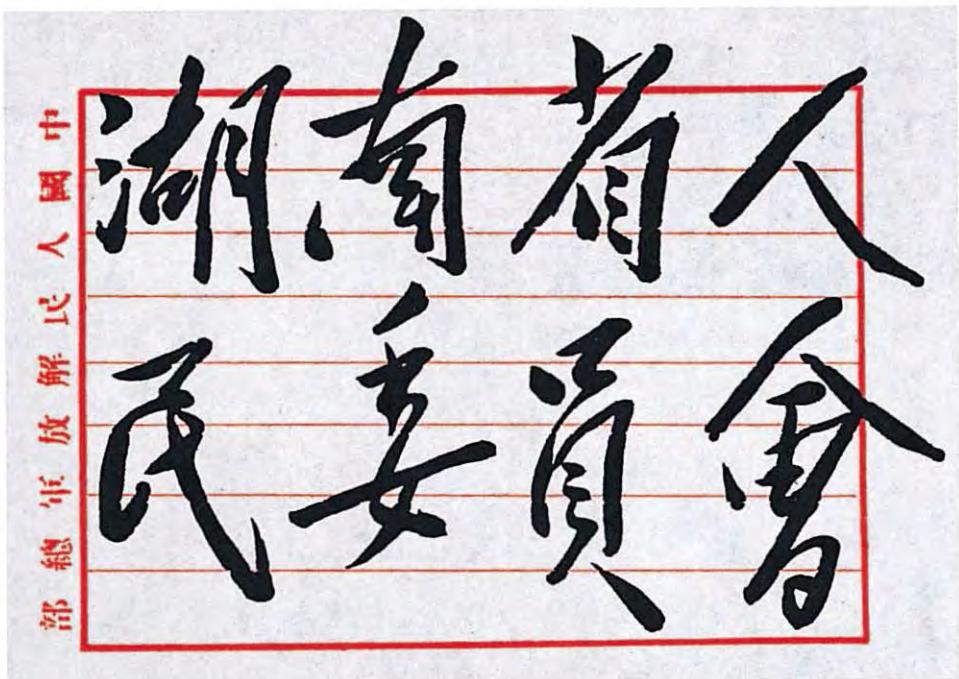
十月廿七日

[1] 程潜，当时任湖南省人民委员会主席。

[2] 指毛泽东应程潜的请求而写的“湖南省人民委员会”横额。



毛泽东复程潜信的手稿。



毛泽东应程潜的请求而写的“湖南省人民委员会”横额。



1954年，毛泽东和程潜等游明长陵。



1954年，毛泽东和程潜、程星龄、王季范等在北京十三陵。

对蒋竹如^[1]来信的批语和复信

(1954年10月29日)

—

此信附件建议四点^[2]，值得注意，请陈云、小平^[3]二同志一阅。

[1] 蒋竹如，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的同学，当时在长沙市女子师范学校当教员。

[2] 指蒋竹如1954年8月9日给毛泽东的信后所附的四点建议：（一）关于购粮工作，似应禁止超额竞赛办法。地方干部在执行政策时，互相挑战，争取超额，似乎不妥。因为农民收获有限，国家所取愈多，则农民所留愈少。去年购粮工作中，各乡互相挑战，争取超额完成，于是某些地方提升粮户地位，有的缺粮户升为保粮户，保粮户升为余粮户，这样一来，使若干农民的情绪不安，减低了生产兴趣，影响国家的增产计划。（二）洪水为灾，似应准备大建水库。今年湖南水患特大，不仅滨湖受害，山区、丘陵地区也有极大损失。今后防御的方法，惟有在扼要的山谷中大建水库，一则预防洪水，二则预抗旱灾，一举两利。（三）特殊的教育制度似应加以改进。湖南的育才幼儿园、省幼儿园、军区幼儿园在教育界中显得特殊，组织庞大，管理人员众多，耗费巨大，一则给群众不好的印象，二则那些幼儿，过惯了优裕生活，也没有好处。（四）对铁路工作人员的免票似应加以限制。现在各业工人的待遇，都是以各人的工薪去维持各家的衣食住行的费用，但铁路工人的家属，却能享受免票乘车权利，这种特殊优待，似不合理。一则妨碍了国家收入，二则形成了特殊制度，给人民群众以不好的心理影响，似应只能限于工作人员本身享有免票权利。

[3] 陈云，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小平，即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国务院副总理。

写信人是一个中学教员，过去我的同学。

毛泽东
十月廿九日

二

竹如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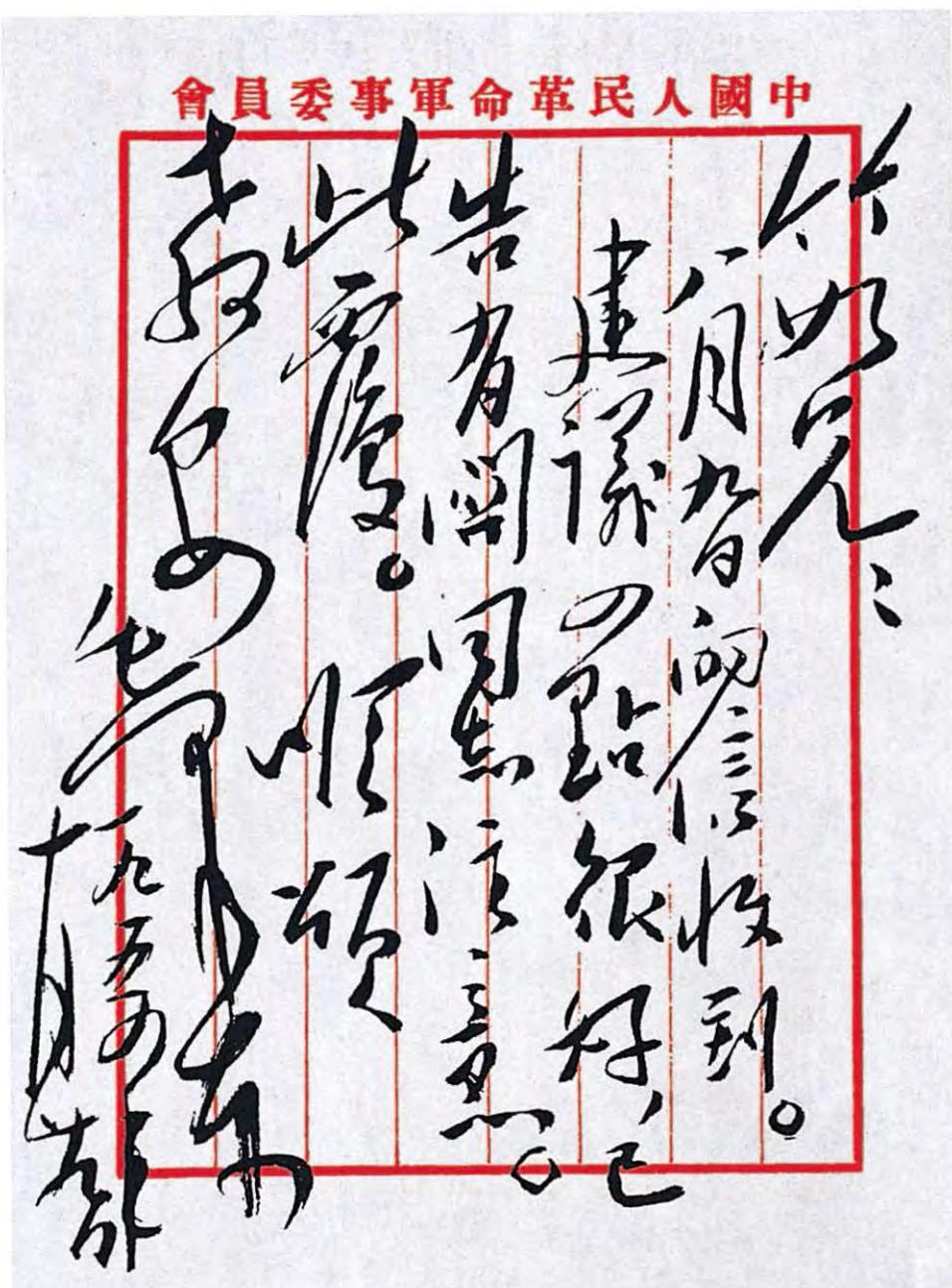
八月九日的信收到。

建议四点很好，已告有关同志注意。

此复。顺颂

教安

毛泽东
一九五四年十月廿九日



毛泽东致蒋竹如信的手稿。

给郭梓材、刘天民^[1]的信

(1954年10月29日)

梓材、天民二兄：

十月十五日来信收到。

寄上人民币叁百万元^[2]，为补助日用之费。嗣后有困难，尚可设法帮助。不要来京，以省往返之劳。此候
双安

毛泽东

一九五四年十月廿九日

[1] 郭梓材，幼年曾与毛泽东在井湾子私塾读书，又一起在长沙参加新军，解放后曾在湘潭建中猪鬃厂任会计。刘天民，郭梓材的妻子，大革命时期曾在毛泽东、杨开慧的影响下参加革命工作，解放后长期从事小学教育工作，曾任湘潭市政协委员。

[2] 这里是以当时流通的人民币计算的。按中国人民银行1955年3月1日起发行的新人民币折算，合300元（新币1元等于旧币1万元）。

祝贺苏联十月革命三十七周年的电报

(1954年11月6日)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同志，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部长会议主席马林科夫同志，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兼外交部长莫洛托夫同志：

值此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三十七周年之际，我们代表中国人民和中国政府谨向你们并通过你们向伟大的苏联人民和苏联政府致以衷心的热烈的祝贺。

三十七年来，伟大的苏联人民在建设共产主义社会的事业中所获得的辉煌成就，对于促进人类进步和维护世界和平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全世界进步人类为苏联人民所取得的历史性胜利而欢欣鼓舞，并把伟大苏联当作前进道路上的灯塔。

最近几年来，以苏联为首的全世界保卫和平的力量日益强大和发展。赞成和平共处的人越来越多。复活德国军国主义和日本军国主义的战争阴谋不断遭受德国人民、日本人民和各国人民的坚决反对。反对建立侵略性的军事集团，要求禁止原子武器、氢武器和其他大规模毁灭性武器，以及普遍裁减军备的斗争正在普遍展开。这一切使我们相信，只要各国人民将维护和平的事业担当起来，并且把这一事业坚持到底，世界和平就能够保持和巩固。

中苏两国的伟大同盟对促进两国的共同繁荣和维护远东与世界和平事业日益明显地发挥着极其巨大的作用。最近以赫鲁晓夫^[1]同志为首的苏联政府代表团与中国政府的会谈，标志着两国人民伟大友谊的新发展，并再一次表现了中苏八亿人民的一致愿望和共同利益。这种友谊将加速中国人民的社会主义建设和促进远东及世界和平的更加巩固。

伟大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万岁！

中苏两国永恒的、牢不可破的友谊万岁！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毛泽东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

院总理兼外交部长 周恩来

一九五四年十一月六日于北京

[1] 赫鲁晓夫，当时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委员。

关于请各省市制定地方经济 五年计划纲要的电报

(1954年11月10日)

一

中央：

现在亟须要有各省市的地区计划，我们代中央起草了一个指示电报^[1]，如同意，请即发出为盼。

毛 刘 周^[2]
十一月十日

二

各省、市委，国务院所属各部、委党组：

中央已将《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草案（初稿）》发给你们，除请你们于十一月底以前提出意见报告中

[1] 即本篇第二部分。

[2] 毛，指毛泽东。刘，指刘少奇。周，指周恩来。这时他们都在广州。

央外，并请各省、市委召集本地区的计划工作会议，根据草案的精神和主要指标，结合当地的特点和具体情况，定出各省、市地方经济的五年计划纲要，于十二月十日送中央，在编制这一纲要时请注意以下各点：

(一) 计划指标包括的范围：工业生产计划（包括地方国营、合作社营、公私合营和私营），手工业生产计划，农业生产计划，林业生产计划，地方交通运输计划，国内贸易计划（各种经济类型），基本建设计划，劳动计划，文化教育卫生事业计划，地方财政计划。在上述计划中，请各省委特别注意发展本省的农业生产的计划。

(二) 在编制上述计划时，可参考十一月初国家计划委员会所发的五年计划草案的分省指标。所用表格，一律按照一九五三年底国家计划委员会所发表格填列，将一份报中央，五份报国家计划委员会，在编制过程中的具体问题，请直接与国家计划委员会联系。

(三) 各省、市如已编过五年计划的轮廓草案，亦请重新加以审查和订正报告中央。

中央

一九五四年十一月十日

对《〈文艺报〉编者应该彻底检查资产阶级作风》一文的批注^[1]

(1954年11月)

—

首先不是有没有自我批〔评〕的问题，而是是否犯了错误的问题。^[2]

二

不但几年，永远都是有冲突的。^[3]

三

读者不明情况，说错了话。^[4]

四

不是骄傲的问题，而是编辑部被资产阶级思想统治了的问题。^[5]

五

不是丧失敏锐感觉，而是具有反马克思主义的极敏锐的感觉。^[6]

六

不是这些问题，而是他们的资产阶级反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问题。^[7]

[1] 这是毛泽东在阅读1954年11月10日《人民日报》刊载的署名黎之的《〈文艺报〉编者应该彻底检查资产阶级作风》一文时写的6个批注。黎之是李曙光的笔名。

[2] 黎之的文章批评《文艺报》编者“滋长了一种骄傲自满的情绪。这种情绪的最明显的表现，是这个以文艺批评为主要任务的刊物，它本身却简直没有自我批评的精神”。毛泽东在“它本身却简直没有自我批评的精神”一句旁画了竖线，打了一个问号，并写了这个批注。

[3] 《文艺报》1951年第五卷第三期曾发表《评〈葡萄熟了的时候〉》的文章，文内说：“现在的中国，已经不是蒋介石匪帮统治的中国，而是共产党领导下的新中国，……这个社会已经没有滋长旧意识的社会基础，而正相反，在新的生产关系中，人们的思想意识以及他们的品格只会一天比一天提高，不管他们发展变化的程度如何不一致，但他们在新社会影响与教育下，都具有与旧社会人物性格根本不同的特点，却是无疑的了。”黎之的文章引用了这段文字后反驳道：“原来蒋介石匪帮被赶出大陆不过两年，中国就没有滋长旧意识的社会基础了。”毛泽东这个批注，是针对这一段文字而写的。

[4] 1951年5月10日出版的《文艺报》发表了由编辑部自己整理的《读者对第三卷〈文艺报〉的意见》。这篇文章集中了读者来信中对《文艺报》的赞美的词句，却没有提到任何缺点和错误，黎之的文章就此事指出：“显然地，《文艺报》编者是陶醉在这一片赞扬的歌声中了，他们真以为自己是十全十美，好到‘卓越’的程度了。当然，读者的意见是真诚的。”毛泽东的这个批注，是针对黎文中的这段话而写的。

[5] 黎之的文章批评《文艺报》“正是这种骄傲自满的情绪，使《文艺报》逐渐地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对新鲜事物越来越失去了感觉”。毛泽东在这句话旁边打了问号，并写了这个批注。

[6] 黎之在文章中批评《文艺报》“在许多问题上，表现出《文艺报》编者已丧失对当前重大政治问题的敏锐感觉，他们钻在冷冰冰的公式主义的套子里，对新鲜的事物和新鲜的思想缺乏热情”。毛泽东针对这段文字写了这个批注。

[7] 黎之在文章中说：“《文艺报》编者的骄傲自大的情绪，也表现在这个刊物的老大的作风上面。”毛泽东在“骄傲自大”与“老大的作风”旁分别画了竖线，并写了这个批注。

对冯雪峰《检讨我在〈文艺报〉所犯的错误》一文的批注^[1]

(1954年11月)

—

限于古典文学吗？

应说从来就很注意，很有认识，嗅觉很灵。^[2]

二

一点没有失去，敏感得很。^[3]

[1] 冯雪峰，当时任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文艺报》主编。他的《检讨我在〈文艺报〉所犯的错误》，发表在1954年11月4日《人民日报》上。毛泽东对这篇检讨所作的批注，写在11月14日《南方日报》转载的这篇检讨上。

[2] 冯雪峰在检讨中说：“我犯了这个错误，不是偶然的。在古典文学研究领域内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长期地统治着的事实，我就一向不加以注意，因而我一直没有认识这个事实和它的严重性。”毛泽东的这个批注是针对这段话而写的。

[3] 毛泽东这个批注是针对冯雪峰检讨中所说的“这完全说明我对于资产阶级的错误思想失去了敏锐的感觉，把自己麻痹起来，事实上做了资产阶级的错误思想的俘虏”一句而写的。

三

不是“某些”，而是浸入资产阶级泥潭里了。

不是“缺乏”的问题，是反马克思主义的问题。^[1]

四

应说自觉的。

不是潜在的，而是用各种方法向马克思主义作坚决斗争。^[2]

五

应以此句为主题去批判冯雪峰。^[3]

[1] 冯雪峰在检讨中说：“检查起来，在我的作风和思想的根柢上确实是有与资产阶级思想的深刻联系的。我感染有资产阶级作家的某些庸俗作风，缺乏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战斗精神，平日安于无斗争状态，也就甘于在思想战线上与资产阶级唯心论‘和平共处’。”毛泽东针对这段话写了这个批注。

[2] 冯雪峰在检讨中说：“我平日当然也做过一些帮助青年的工作，例如替他们看原稿，设法把他们的作品发表或出版。但虽然如此，仍然可以不自觉地在心底里存在着轻视新生力量的意识。”毛泽东在这一段中的“可以不自觉地”和“在心底里存在着”几个字旁画了竖线，并分别写了批注。

[3] 冯雪峰在检讨中说：“在这次错误上，我深深地感到我有负于党和人民。这是立场上的错误，是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错误，是不可容忍的。”毛泽东在“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错误”几个字旁边画了竖线，并写了这个批注。

给刘少奇、周恩来等的信

(1954年11月18日)

刘、周、李、陈、罗、陶铸^[1]各同志：

《人民日报》十一月十三、十四两日载有苏联新作《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二十二章的译文，请你们看一下，足见所谓“在社会主义全部或大部建成以前不可能有社会主义经济法则”的说法是错误的。

毛泽东
十一月十八日

请伯达同志将《新建设》及《学习》上论过渡时期经济法则的文章看一下，看有无错误。

[1] 刘，指刘少奇。周，指周恩来。李，指李富春，当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陈，指陈伯达，当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罗，指罗迈，即李维汉，当时任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陶铸，当时任中共中央华南分局书记。他们这时都在广州参加会议。

对第二届全国政协会议筹备情况 简报的批语

(1954年11月18日)

周总理：

章程与名单^[1]数日内即宜大体确定，否则十二月二十日以前开会恐来不及。

毛泽东
十一月十八日

[1] 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章程和第二届全国政协委员名单。政协全国委员会工作会议1954年11月3日讨论筹备第二届政协问题的情况简报中说：关于修改政协组织章程的工作，一致同意不必另写共同纲领，在政协组织章程前面加总纲一章，并推定13人组成起草小组，于10日内提出初稿，交工作会议讨论。关于第二届全国政协的参加单位，一致同意定为29个，即11个党派，17个团体以及特别邀请人士。政协各参加单位的名额，由各单位根据实际情况和需要进行安排，不搞平均主义。各党派、团体的人选，于10日内提出名单草案，先交工作会议协商，并加以平衡。

对越南要求救济灾民的电报的批语

(1954年11月19日)

刘、周^[1]:

此件^[2]是否已处理，似宜满足越方要求。

毛泽东

十一月十九日

[1] 刘，指刘少奇。周，指周恩来。

[2] 指越南劳动党中央1954年10月27日由越南驻中国大使黄文欢转给中共中央的电报。电报提出，由于天灾连续发生和敌人长期破坏的影响，部分地区已面临饥荒，要求中国方面迅速救济1万吨大米，同时还要求救济500万米粗厚布匹，解决今冬100万人的穿着问题。

对国防部关于颁发中国人民解放军 有功人员勋章奖章的三个文件的批语^[1]

(1954年11月20日)

—

照办。删掉了几个字。

毛泽东

十一月廿日

—

应将“和毛泽东主席”六字删去。

毛泽东

十一月廿日

[1] 本篇一是毛泽东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1954年11月3日印送的关于颁发中国人民解放军有功人员勋章、奖章的三个文件的批语。在毛泽东

审阅前，1954年11月16日，杨尚昆向周恩来报送这三个文件时附有一封信，提出决议草案和条例草案中有一个问题须考虑，原件中的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提法，在政治局讨论时，认为可能引起关于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问题，故提议改为：中国工农红军时期、解放战争时期。11月19日，周恩来将经他审阅修改的这些文件转送毛泽东、刘少奇审定。这些文件中的“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提法，已分别改为“中国工农红军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在批语一中所说的“照办”，就是指这件事。其中所说删掉了几个字，是指在审阅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颁发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中国人民革命战争时期有功人员勋章、奖章的决议（草案）时，删去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主席的领导下，同全国人民一起，英勇地进行长期的革命战争”一句中“和毛泽东主席”6个字。本篇二就是毛泽东为此写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上述决议草案上的批语。



1954年11月，毛泽东在广州越秀山和身边工作人员合影。

毛泽东等祝贺中朝经济及文化合作协定签订一周年的电报^[1]

(1954年11月22日)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委员长金科奉同志，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内阁首相金日成同志，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外务相南日同志：

值此中朝经济及文化合作协定签订一周年之际，谨向朝鲜人民、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你们表示热烈的祝贺。

这一协定的签订和实施使中朝两国人民在并肩抗击美国侵略者的战争中所结成的战斗友谊获得了进一步的巩固和发展。中国人民以钦佩和欢欣的心情祝贺朝鲜人民在执行恢复与发展国民经济的三年计划中所获得的辉煌成就。

朝鲜人民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为争取朝鲜的和平统一所作的不懈斗争，一向为中国人民和中国政府深切关怀和同情。

[1] 这是毛泽东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名义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刘少奇、国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联名给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委员长金科奉、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内阁首相金日成、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外务相南日的电报。祝贺中朝经济及文化合作协定签订一周年。

朝鲜问题必须在尊重朝鲜人民的民族权利和有利于保障亚洲和世界和平的原则下获得解决。中国人民将继续全力支持朝鲜人民这一正义事业，直到最后的胜利。

中朝两国人民兄弟般的和日益巩固的友谊万岁！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毛泽东
中华人民共和国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委员长 刘少奇
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 周恩来
一九五四年十一月二十二日于北京

给黄炎培^[1]的信

(1954年11月23日)

任之先生：

十月三十日惠书收到。购粮事，我在京所闻，亦如先生所述。来广州时沿途调查，始知问题仍是有的，但一般尚好，据说比去年要好得多。“五反”余案，已请陈云副总理注意。尊恙如何甚念，尚希注意护养。此复。

顺致敬意

毛泽东

一九五四年十一月廿三日

[1] 黄炎培，字任之，当时任中国民主建国会主任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任之光
十月三十日事事忙。
购粮了，多在年底前。
言生无所述。半度同。
时沿途调查，仍生。
问题仍未解决，但一般

北京
黄炎培委员长
民政部中央人民民主革命军事委员会
元年四月十一廿日晚到
賸糧主及通書

致黄炎培
水深火热。此度。
任之光
十月三十日

好，接說比要好
的多。五反斗争已
告一段落。但对经济方
面。还是没有问题。
念，希望注意。

毛泽东致黄炎培信的手稿。

关于征求对兵役法 和勋章奖章条例的意见的批语^[1]

(1954年11月23日)

退彭德怀同志照办。

同意周恩来同志的修改意见。应召集在京的国防委员会委员
(主要是党外人士)开一次会,征集意见。

毛泽东

十一月廿三日

[1] 这个批语写在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部长彭德怀给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的信上。这封信是为报请审阅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兵役法和颁发中国人民解放军有功人员勋章奖章条例而写的。

开城工作今后交由朝鲜同志负责^[1]

(1954年11月24日)

金首相，并告志司^[2]：

过去由于谈判的需要，开城的工作一直由中国同志负较大部分的责任。在共同对外的斗争中，朝中同志都取得了若干经验，同时开城工作显然有长期化的趋势。在这种情况下，开城工作今后交由朝鲜同志负责，由您直接领导较为适宜。我们也考虑过由朝鲜同志负责时的若干具体困难，但这些困难是可以采取相互协作的办法求得解决的。您如同意上述办法，当即派现在国内休假的柴成文^[3]同志来平壤向您报告并请示，然后去开城和李相朝、丁国钰^[4]二同志商量具体执行的办法。

毛泽东

一九五四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1] 这是毛泽东给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首相金日成的电报。

[2] 志司，即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

[3] 柴成文，当时任朝鲜军事停战委员会中国人民志愿军代表。

[4] 李相朝，当时任朝鲜军事停战委员会朝中方面首席谈判代表。丁国钰，当时任朝鲜军事停战委员会中国人民志愿军代表团党委副书记。

毛泽东等祝贺蒙古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周年的电报^[1]

(1954年11月25日)

蒙古人民共和国大人民呼拉尔主席团主席扎·桑布同志，
蒙古人民共和国总理尤·泽登巴尔同志，
蒙古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长巴·贾尔卡赛汗同志：

值此蒙古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周年纪念之际，我们代表中国人民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谨向全体蒙古人民、蒙古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你们表示衷心的祝贺。

三十年前，蒙古人民在蒙古人民革命党的领导下以英勇的斗争彻底推翻了反动的封建统治，建立了人民民主的国家。由于蒙古人民的不懈努力和苏联无私的援助，蒙古人民已永远摆脱了贫困和落后，走上了经济繁荣和文化发展的光辉道路。中国人民深为蒙古人民的辉煌成就感到欢欣鼓舞。

[1] 这是毛泽东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名义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刘少奇、国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联名给蒙古人民共和国大人民呼拉尔主席团主席扎·桑布、蒙古人民共和国总理尤·泽登巴尔、蒙古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长巴·贾尔卡赛汗的电报。祝贺蒙古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周年。

祝蒙古人民在建设社会主义和保卫世界和平的事业中获得更大的胜利。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毛泽东
中华人民共和国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委员长 刘少奇
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 周恩来
一九五四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1954年，毛泽东会见蒙古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团团长、大人民呼拉尔主席团主席扎·布桑。

毛泽东、周恩来祝贺阿尔巴尼亚 解放十周年的电报

(1954年11月28日)

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人民议会主席团主席哈奇·列希同志，
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穆罕默德·谢胡同志，
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长贝哈尔·什图拉同志：

值此阿尔巴尼亚解放十周年之际，我们代表中国人民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谨向你们并通过你们向阿尔巴尼亚人民和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政府致衷心的、热烈的祝贺。

十年来，阿尔巴尼亚人民在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和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政府的领导下，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获得了巨大的成就。我们向阿尔巴尼亚政府和人民表示我们最好的祝望。

祝阿尔巴尼亚人民在为自己祖国繁荣发展和保卫世界和平而进行的斗争事业中获得更辉煌的成就。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毛泽东
中华 人 民 共 和 国
国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 周恩来
一九五四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于北京

关于军委扩大会的批语^[1]

(1954年11月30日、12月28日)

—

刘、周、朱、陈、邓阅，退彭德怀同志照办。会议请彭德怀同志主持，我不准备参加。

毛泽东

十一月卅日

[1] 本篇一是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军委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部长彭德怀1954年11月30日关于军委第十四次会议决定12月15日召开的扩大会的议程、到会人员和会议开法的报告上的批语。本篇二是毛泽东对彭德怀12月27日送审的军委扩大会的总结（草稿）的批语。总结报告的主要内容是：（1）为加速我军现代化建设，实行义务兵役制、军官服役条例和军官薪金制度。（2）为了减少军委领导单位，便于战时防空指挥和工作领导，全国划分十二个军区，各省军区仍然保留。（3）继继续执行各省公安部队由省军区统一领导的决定，为逐渐建立我国的警察制度，一部分公安部队逐步改为警察。（4）关于部队军事训练与干部军事学习问题，决定以部队军事训练工作为全军的工作中心，培养教育干部的学校工作则为中心的中心，并为加强这一工作的领导，设立军事训练总监部。（5）把从成分上政治上纯洁我军成员特别是干部作为一项严重的政治任务。（6）提高干部思想觉悟与防止腐化堕落。

—

退彭德怀同志。

在 13 页 7 行 “动机” 二字上，应加 “反动或反革命” 六字。其余均同意。

毛泽东

十二月廿八日

对卫生工作的指示^[1]

(1954年11月)

一、关于中央卫生部向中央的报告要点和中医工作指示草案，毛主席指示，这个报告写得很好，特别指出这次检查卫生部工作的方法很好，开了二十多次会，从下面提出许多意见，翻了个底，这样方能解决问题。单是上面讲话还是不够的，必须靠自下而上的批评，这样才能解决得透，解决得好。单从上面解决问题，总有一定的片面性；和自上而下的批评结合起来，看法才能全面，解决才能完全正确。他说，这种办法在今年夏季的全国财经会议用过了，解决了大问题；文委也用这个办法来检查卫生部的工作，结果也很好。这种办法应该提倡。

二、毛主席指出，卫生工作的队伍很大，单是国家卫生工作人员就有二十几万，他要管的是五亿多人口的生、老、病、死，这真是一件大事业，极其重要。因而我们的责任很重。

三、毛主席说，几年来全国卫生工作的成绩很大，但是缺点也很多很大。他指出，卫生工作最大的缺点是政治少了，政治工作少了，马列主义、社会主义太少了。

技术是不是多了？也不见得。医疗、医病都有许多问题没有很

[1] 这是对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讨论中央卫生部党组报告时所作关于卫生工作的指示的传达。

好解决。正因为政治太少了，技术也管不好。

毛主席最着重指出的是：党必须领导一切，必须领导卫生工作。他说，卫生部党委领导同志认为卫生工作是特殊的技术工作，中央不懂技术，我们所不能解决的问题，报告了中央也不一定有办法，因而许多重大问题没有请示报告；认为文委是文化机关，尽是文化人，不懂医学，因此，对文委领导有一种不够尊重的情绪。这些想法是完全错误的。毛主席说，从这种逻辑出发，朱总司令就不能当海陆空的总司令了，因为他不能开坦克、驾飞机、打大炮呀！但朱总司令完全能当总司令，因为我们是用政治来领导军事。毛主席说，“你不懂这一门，你就不能管我”，这种思想是相当多的，也不仅卫生部门有。在我们的军队中，军事不服政治管的问题，是经过长期斗争才解决了的。卫生部门必须用最大的力量解决这个问题。

我们的党要领导一切：要领导飞机大炮，领导生旦净丑，领导生老病死，就是说，要领导军事、经济、文教、卫生和其他一切工作。任何专门的东西，党都要去领导。譬如唱戏，党也要领导。毛主席说，□□□唱戏唱得好，但他唱的只是旦角，不唱生、净、丑角，旦角中他只唱青衣，别的也不唱。他是很专的，他不能领导别的。如果他来当主席，就当不好。但是我们的党领导他，领导戏剧艺术的发展和提高。

我们凭什么来领导？毛主席说，我们要用政治来领导。领导首先是政治领导，领导工作就是政治工作，离开政治就说不上领导。他们当卫生部长的，自己的职位就是做领导工作，也就是做政治工作。毛主席批评过去卫生部几位副部长的分工办法，谁管政治，谁管业务的办法是错误的。在旧中国，官僚们有所谓政务官、军事官之分。在我们这里，可不是这样，也不能是这样。凡是领导人都应

该政治领导。作为领导人只管技术，只记得技术，只管皮下注射肌肉注射，势必政治挤不进去了，没有政治领导了。做领导工作的人都要懂得党的工作，懂得做群众工作，决不能只管医务，不管政治工作。

卫生工作一定要受党的领导，决不能离开党的领导搞独立王国。毛主席问周总理，卫生部的重要文件经过政务院通过批准的多不多，周总理说很少。毛主席说，人家是独立王国，就不受你管！

四、毛主席也着重地批评了卫生部缺乏集体领导，并且指示了应该怎样进行集体领导。他说，□□同志积极负责，就是说骨干是好的。但单干、盲干就不好了。盲干就是忽视党的领导，忽视政治对业务的领导。单干就是不要集体领导。大家知道，集体领导是我们党的领导的最高原则。□□同志在自己的检讨中说在许多重要问题上，往往不经组织的认真讨论，即由个人决定，独断专行。毛主席指出，这种单干的作风就要把事情办坏，使自己孤立。这也不能说明个人的个性强，这不是真正的强，而是弱。毛主席指示，作为一个领导者，必须耐烦地和人家商量问题，遇事和群众商量，和上中下三方面商量。自己以为什么都正确，这是完全行不通的。领导者必须讲道理，有说服力，这样才算真强。党组开会要认真准备，要虚心听取大家的意见，要学习中央开会的办法。

五、毛主席着重指出，我们的医务部门领导人员中有浓厚的资产阶级思想，其具体表现就是那种不愿受党的领导、缺乏政治、群众观点薄弱、不要集体领导等思想。这种资产阶级思想在全国卫生队伍中相当普遍，我们一定要加以批判。

六、中央卫生部工作经过检查后，已开始有所转变。但同志们信心还不够，这首先领导上要有决心。毛主席指出，中央卫生部工

作的缺点和错误，□□同志当然要负主要责任，但也不能挂在□□同志一个人账上，其他同志也应负一定责任。他希望中央卫生部的领导工作要有个彻底转变。他问□□同志有这样的决心没有，□□同志回答说有这个决心。……毛主席说，这主要要提高思想转变作风，这次会议一定要开好，使大家有信心。

七、关于业务方针上的几个问题，中央对报告中所提出的各项方针任务基本上都同意。

关于中医问题，毛主席说，我认为中国对世界上的大贡献，中医是其中的一项。中医是在农业、手工业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西医是在近代工业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中医宝贵的经验必须加以继承和发扬，对其不合理部分要去掉。西医也有不正确的地方，也有机械唯物论。将来发展只有一个医，应该是唯物辩证法作指导的一个医。看不起中医是错误的。把中医提得过高了，也是不适当的。中医医院可以试办。中医进修问题，让他们学一些基础医学知识是可以的，但应该加入中医临床经验课程。医院可以请中医看病，治好了要向他学习。中西医的名称是不妥当的。

八、城市、工矿卫生，城市医疗要改革，要革命。

对周扬关于批判胡适问题 组织计划的请示^[1]的批语

(1954年12月3日)

刘、周、朱、陈、邓、陈伯达、胡乔木、邓拓^[2]、周扬同志

[1] 指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周扬1954年12月2日关于批判胡适问题的组织计划给毛泽东的报告。报告说，根据你昨晚谈话的精神，对原来讨论胡适问题的计划草案作了根本修改，并在下午召开的中国科学院院部与作家协会主席团的联席扩大会议上讨论通过了经过修正的批判胡适问题的计划草案。这个计划改为以批判胡适思想为主，讨论的题目也改定为：一、胡适的哲学思想批判（主要批判他的实用主义），二、胡适的政治思想批判，三、胡适的历史观点批判，四、胡适的《中国哲学史》批判，五、胡适的文学思想批判，六、胡适的《中国文学史》批判，七、考据在历史学和古典文学研究工作中的地位和作用，八、《红楼梦》的人民性和艺术成就及其产生的社会背景，九、关于《红楼梦》研究著作的批判（即对所谓新旧“红学”的评价）。关于讨论会的组织和活动方式，改为以个人研究为主，采取较灵活的组织形式和讨论方法。凡讨论会的主要文章，都在《人民日报》发表。为了领导这次讨论，已正式成立了一个委员会，由郭沫若、茅盾、周扬、邓拓、潘梓年、胡绳、老舍、尹达等组成。

[2] 刘，指刘少奇。周，指周恩来。朱，指朱德。陈，指陈云，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邓，指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陈伯达，当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胡乔木，当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邓拓，当时任《人民日报》总编辑。

阅，照此办理。

毛泽东
十二月三日



1954年，毛泽东和朱德、刘少奇在中南海。

在缅甸驻华大使为吴努访华 举行的招待会上的祝词

(1954年12月4日)

我请大家举杯：

为中缅两国人民的友好团结、和平共处，
为亚洲和平和国际的和平，
为缅甸联邦总统巴宇博士的健康，
为吴努总理的访问中国和他的健康，
为今天宴会的主人吴拉茂大使和他的健康，
干杯！

在中宣部关于毛泽东思想 应如何解释的通知稿中加写的一段话^[1]

(1954年12月5日)

在写文章做讲演遇到需要提到毛泽东同志的时候，可用“毛泽东同志的著作”等字样。

[1] 毛泽东这段话加写在中共中央宣传部1954年12月5日关于毛泽东思想应如何解释的通知稿中以下一段文字之后：“关于‘毛泽东思想’应如何解释的问题，今后可用口头答复如下：党章已明确指出：‘毛泽东思想’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它的内容和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同一的。毛泽东同志曾指示今后不要再用‘毛泽东思想’这个提法，以免引起重大误解。我们认为今后党内同志写文章做报告，应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办理。至于讲解党章和过去党的重要文件决议时仍应按照原文讲解，不得改变，但应注意说明‘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避免对两者有不同内容的可能误解。”中宣部这个通知下达之后，有的省委曾对通知中毛泽东加写的这句话电询中宣部“毛泽东同志”是否为“毛泽东思想”之误。中宣部于12月25日复电说：“原文系同志，并无错误。意思即是说，在需要提到毛泽东同志的一般观点或意见的时候，可用‘毛泽东著作’的字样去代替‘毛泽东思想’的字样。”

对全国文联、作协主席团 联席会议决议^[1]等的批语

(1954年12月8日)

周扬^[2]同志：

均已看过。决议可用。

[1] 指准备提交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席团、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1954年12月8日召开的扩大的联席会议讨论通过的《关于〈文艺报〉的决议》稿。决议稿有六点：（一）改组《文艺报》的编辑机构，重新成立编辑委员会，实施集体领导原则。（二）责成《文艺报》新的编委提出办法，坚决克服错误，端正编辑方针，使《文艺报》成为具有明确战斗方向和切实作风的刊物。内容应以文艺批评为主，同时对人民的文化艺术生活发表评论和介绍，力求扩大和密切文艺和广大人民生活的联系。（三）全国文联主席团责成中国作协主席团改进对《文艺报》的领导工作。《文艺报》在工作上应与文化部建立密切联系。（四）责成《人民文学》同中国作协领导的其他刊物及地方分会的刊物加强文艺批评工作，并提出开展文艺批评和自由讨论的具体计划。（五）责成中国作家协会、中国戏剧家协会、中国音乐家协会、中国美术家协会和所属各地方协会的机关刊物以及各省市文联所属机关刊物的编辑机构，根据本决议的方针进行工作检查，并改进工作。（六）中国作协主席团应在1955年春节前召开作协第二次理事会，讨论改进作协的领导工作。这个决议在1954年12月9日《人民日报》上发表。

[2] 周扬，当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副主席。

你的讲稿^[1]是好的，在几处地方作了一点修改，请加斟酌。郭老讲稿^[2]很好，有一点小的修改，请告郭老斟酌。“思想斗争的文化动员”这个题目不很醒目，请商郭老是否可以改换一个。

毛泽东

十二月八日早

[1] 指周扬准备在1954年12月8日全国文联、作协主席团扩大的联席会议上作的题为《我们必须战斗》的讲话稿。内容是：（一）开展对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二）《文艺报》的错误；（三）胡风的观点和我们的观点之间的分歧。这个讲话稿在1954年12月10日《人民日报》上发表。

[2] 指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席郭沫若准备在1954年12月8日全国文联、作协主席团扩大的联席会议上作的题为《思想斗争的文化动员》的讲话稿。内容是：（一）坚决地展开对于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思想斗争。（二）广泛地展开学术上的自由讨论，提倡建设性的批评，并提出十六字目标：明辨是非，分清敌友，与人为善，言之有物。（三）加紧扶植新生力量。根据毛泽东的建议，这个讲话稿的题目后来改为《三点建议》，在1954年12月9日《人民日报》上发表。

关于攻击一江山岛时机的批语^[1]

(1954年12月11日)

彭德怀、粟裕^[2]同志：

因美军正在浙东海面作大演习，攻击一江山时机目前是否适宜，请加考虑。

毛泽东

十二月十一日

[1] 这个批语写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军区1954年12月9日关于进攻一江山岛作战计划方案给军委的报告上。

[2] 彭德怀，当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部长。粟裕，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

和缅甸总理吴努的谈话

(1954年12月11日)

毛泽东（以下简称毛）：吴努总理大概可以看到，我们的方针是同你们友好。五项原则^[1]是一个大发展，还要根据五项原则做些工作。我们应该采取些步骤使五项原则具体实现，不要使五项原则成为抽象的原则，讲讲就算了。现在在世界上就有两种态度，一种是讲讲算了，另一种是要具体实现。英美也说要和平共处，但是它们是讲讲就算了的，真正要和平共处，它们就不干了。我们不是那样。我们认为，五项原则是一个长期方针，不是为了临时应付的。这五项原则是适合我国的情况的，我国需要长期的和平环境。五项原则也是适合你们国家的情况的，适合亚洲、非洲绝大多数国家的情况的。对我们来说，稳定比较好，不仅是国际上要稳定，而且国内也要稳定。

我知道吴努总理曾经同刘少奇委员长谈过缅甸国内的情况。我们希望你们国内和平。至于具体地如何取得国内和平，那要你们自己处理。如果我们在这个具体问题上表示态度，那就不妥当了。

共产党的问题不是一个国家的问题，而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因为大多数国家都有共产党。因此各国都要自己处理自己的问题。

在你们国内也有对我们不友好的党派、团体和个人，在别国如印度、印尼也有。但是我们不好干涉，不好对这些党派、团体和个

[1] 五项原则，指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1954年12月11日，缅甸联邦总理吴努来中国访问。图为毛泽东和吴努在谈话。

人说，他们不应该反对我们。每一国都有几种党。对于这几种党，我们不能表示反对哪些党，赞成哪些党。我们只能以每一国的政府为对象来解决问题。希望你们谅解我们为什么采取这种态度。

吴努（以下简称努）：这是一个很正确的态度，任何别的态度都是不正确的。我完全同意主席的意见。

毛：缅甸人民和中国人民都看到我们所采取的步骤，例如五项原则和会谈公报^[1]中所解决的问题。在我们两个民族、两个政府和

[1] 指1954年12月12日在北京发表的《中缅两国总理会谈公报》。主要内容是：重申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指导两国关系的坚定不移的方针；在两国适当城市互设总领事馆；开辟航空线，恢复公路交通并缔结邮电协定，促进两国的经济、文化交流；保护双方侨民的正当权利和利益，勉励侨民尊重侨居国法律和社会习惯；通过正常的外交途径解决两国边界问题。

两国人民之间，我们不去区分党派，而是把我们的共同问题初步解决了。

中国也有各种党派和团体。中国的各种党派是有差别的，并不是在一个水平上，有领导和被领导的分别。中国各民主党派承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也有各种团体，有工人的团体，甚至有资本家的团体。但是缅甸政府、吴努总理和吴拉茂大使对中国各党派只能一律平等看待，不能表示满意这一个党，不满意另外一个党。否则就会引起一些党的不满意。

我们对于缅甸也是一样。如果我们用政府的名义对缅甸的任何一个党表示态度，我们就会得罪这个党和一些群众。

既然已经谈起了这个问题，我们愿意说，我们希望缅甸国内和平。吴努总理说缅甸的内战已经成为很重的负担。我看你们自己是否能够谈谈，看看是否能取得妥协。如果能够这样，缅甸就能把全部精力放在建设上。我们将很高兴看到这一点。作为我个人的建议，你们自己先非正式地谈谈，试试看，不要把路堵死。最好是先非正式地、试探性地谈谈，如果谈得拢，最好，如果谈不拢，就暂时放一下，以后还有机会再谈。

我们对西藏的办法，可以供你们参考。我们准备在很长的时期内同西藏地方政府谈，同他们商量。关于西藏的社会改革，我们不是坚持现在一定要做，如果同他们商量了以后，他们说可以，我们就做一点，他们说不可以，我们就暂时不做。当然，中国的经验只能供你们参考，因为我们两国内部的情况不同。各国都应该根据自己的条件来处理自己的问题。

在这里也可以同时谈谈革命的问题。一个国家靠外国的帮助，靠别国的党的帮助，而取得革命的胜利，在历史上是很少见的。东

欧各国，是因为苏联军队同纳粹德国作战时占领了这些国家，不然的话，靠外国的帮助，靠外国输出革命，而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我们就是在这个意义上说，革命不能输出。但是这并不是说，一个国家的革命不受外国的影响。像缅甸、印度、印尼、巴基斯坦和锡兰^[1]这几个国家的独立，也不是完全不受外国影响的。但是缅甸的独立，并不是由于任何外国在人力、物力、财力方面的帮助而取得的。

我们看到中美洲危地马拉就有不同的情况。美国在那里进行干涉，帮助反对党在别的国家组织军队打进危地马拉，而美国大使又在危地马拉内部策动。我们决不会干这种事。我们决不会在云南边境组织军队打进缅甸，并且由姚仲明^[2]大使在缅甸内部策动。姚大使决不会干这种事，如果他干这种事，我们一定马上撤他的职。

在缅甸的华侨中也有激烈分子，我们劝他们不要干涉缅甸的内政。我们教育他们服从侨居国的法律，不要跟以武装反对缅甸政府的政党取得联系。我们在华侨中不组织共产党，已有的支部已经解散。我们在印尼和新加坡也是这样做的。我们嘱咐缅甸的华侨不要参加缅甸国内的政治活动，只可以参加缅甸政府准许的一些活动，如庆祝活动等等，别的就不要参加。否则会使我们很尴尬，不好办事。

我们在泰国有三百万华侨，我们的方针也是一样。泰国对我们不友好，原因不在于我们。我们实在是想搞好同泰国的关系。我们同泰国如此邻近，按道理应该搞好关系。外国报纸怀疑我们搞傣族自治区是要侵略泰国，是要建立什么“自由泰国”。傣族在云南省有

[1] 锡兰，今斯里兰卡。

[2] 姚仲明，1914年生，山东东阿人，当时任中国驻缅甸大使。

三十万人，他们组织一个自治区^[1]。在广西省的壮族有七百多万人，他们也组织一个自治区。我们还有好几十个这样的少数民族自治区域，例如，朝鲜族、蒙古族的。我们也准备在西藏建立一个自治区。我国少数民族的种类很多，但人数总计不到四千万。我们并不搞“自由泰国”，也不想打进泰国。那样的说法是不符合事实的。我们不是如此想的，不是如此准备的，也不是如此干的。

我们很想同泰国建立外交关系，同它互相承认。如果泰国愿意的话，它也有资格在昆明设立领事馆。

泰国说怕我们侵略，但是缅甸也怕啊！而缅甸的做法却是搞好同我们的关系，并且来看看我们是不是要侵略缅甸。可是泰国却连看都不愿意来看。如果泰国在昆明设领事馆，他们可以到我们的傣族自治区去看看。

希望吴努总理把我们的意思向泰国当局说一下。

努：我已经答应了周总理。我将在曼谷过一夜，会见到泰国的总理。我不仅会告诉他，中国总理表示愿意同泰国建立外交关系，而且我还会进一步告诉他，中国的这种意愿是真诚的，这一点是我在这次访问中发现的。我希望尼赫鲁^[2]总理会全力支持我这种说法。

毛：我们同尼赫鲁总理谈过，但是没有说得这样详细，没有说得这样多。希望吴努总理把我们今天说的转告尼赫鲁总理。如果你们两位一起同泰国当局谈这件事，使得中泰两国之间也能有像中缅之间这样的关系，我们将会很高兴。

努：我一定尽力来做。

[1] 1953年我国在云南省曾建立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区和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后分别在1955年、1956年改为自治州。

[2] 尼赫鲁，当时任印度总理。

毛：我现在说说大国小国的问题。我们认为，国家不应该分大小。我们反对大国有特别的权利，因为这样就把大国和小国放在不平等的地位。大国高一级，小国低一级，这是帝国主义的理论。一个国家不论多么小，即使它的人口只有几十万或者甚至几万，它同另外一个有几万万人口的国家，也应该是完全平等的。

这是一个基本原则，不是空话。既然说平等，大国就不应该损害小国，不应该在经济上剥削小国，在政治上压迫小国，不应该把自己的意志、政策和思想强加在小国身上。既然说平等，互相就要有礼貌，大国不能像封建家庭里的家长，把其他国家看成是它的子弟。艾德礼^[1]先生批评美国对危地马拉的做法是，就像一个中世纪家庭的父亲替他的儿子找一个自己看得中的媳妇。不论大国小国，互相之间都应该是平等的、民主的、友好的和互助互利的关系，而不是不平等的和互相损害的关系。

现在南北美洲的情况就像一个中世纪的家庭，美国是家长，其他国家是它的子弟。我们在亚洲不要这种关系。过去日本是想这样干的，它说的是共存共荣，但实际上是要剥削和侵略人家。

我们同缅甸已经有了五年的相互关系。可以再看五年，再进行五年的共处和合作，来看看我们究竟是讲讲算了，还是要真正实行的。

你们的态度很好，你们有话，有怀疑和不满意的地方，就讲出来。以后我们两国之间还会发生一些问题，互相之间还会有些怀疑和不满意的地方，希望我们互相都讲出来，以便采取措施，解决问题。这样就可以使我们的关系更好，使我们的友好合作更发展。

[1] 艾德礼，英国前首相，当时任英国工党领袖。

努：坦率地说，过去我们是不敢有什么话就讲出来的，怕的是我们被误会是英国、美国的走狗，怕的是反对我们的党正是这样向你们报告的。不过现在我们互相见面以后，互相进行了讨论和有了了解以后，我们就不再怕有话直说了。这是我这次访问所取得的最大成就之一。昨天在周总理家里会谈以后，我已经把这一点告诉了我的朋友周总理。

昨天我甚至请求周总理释放美国飞行人员，这是我通常不会做的也是不应做的一件事，因为这有干涉内政之嫌。但是由于我同周总理互相有了很好的了解，因此我提出之后，并没有引起周总理的误会，这使我很高兴。

毛：释放总是要释放的，但是现在不能释放。我们对犯间谍罪的外国人是不杀的，犯同样罪的中国人就会被判处死刑。但是他们犯了罪，我们不能不执行法律。

我国是一个大国，原因就是人口多，地方大，但是并不强。吴努总理去看过我们的汽车厂，我们连一辆汽车都出不了，此外连一架飞机都不能造，那末强在哪里呢？但是，即使我们再弱，美国要把它意志强加在我们身上也是不行的。过去我们在延安，就没有屈服过。在解放战争中，我们也曾把侵入我们地区进行间谍活动的美国人逮捕起来。不论美国多强，能产多少钢，能出多少辆汽车和多少架飞机，我们也是不会屈服于它的压迫的。对于友好的国家，我们的态度像兄弟一样。对于压迫我们的国家，只要它们一天继续如此，我们就一天也不屈服。

这些美国间谍乘的飞机是在中国境内，在东北打下来的，但是美国说他们是战俘。真正的战俘是二万多名朝中被俘人员，他们被

扣住不放，并被交给了李承晚^[1]和蒋介石。这是毫无道理的事，令人愤慨的事。

像我们这一类国家受过很多气，亚洲、非洲国家都是多年来受帝国主义大国的气的。这些帝国主义国家主要的就是英国、美国、法国、德国、日本。我们现在还在受气。总有一天，我们真正独立起来，把自己的国家搞好了，就可以少受一点气。

你们的国家并不小。你们有近两千万的人口，相当澳大利亚的两倍多。你们国家的面积很大，相当于九个到十个锡兰。你们的国家有各种物产，人民勤劳聪明，各种事业都能逐步地办，例如制造汽车和生产钢铁。你们的国家大有可为，我们愿意看见你们的国家兴旺起来。

努：谢谢。

毛：假如亚非各国都能如此，到那时候就不会由几个大国称霸了。整个亚洲的人口超过世界人口的一半。亚洲的地方也是好地方，有两个洋：太平洋和印度洋。

努：缅甸的情况是很特殊的。最好是中国共产党派一些公正的人士到缅甸研究一下情况，我们不仅会很高兴地接待他们，还会给予他们各种便利。他们可以实地研究一下缅甸政府的立场以及缅甸人民对叛乱分子的感觉。

毛：我们派观察团到缅甸去，是不妥当的，会使外界得到不好的印象。我们的大使和领事可以根据报纸上的材料和公开的文件进行研究。他们不能同反对派直接联系，但是可以通过合法的党派来间接了解反对派。我们的大使馆进行这种研究，正像你们的大使馆

[1] 李承晚，当时任南朝鲜即韩国总统。

在这里进行研究一样。至于你们自己的纠纷，我们是不能介入的。

努：你们是应我们的邀请而来的，不是违背我们的意志而来的，因此不是干涉内政。如果我们请求的话，你们甚至可以派军队来，也不是干涉内政。

毛：不能说凡是政府愿意的，就不是干涉内政。有四种情况：

第一，同盟国家为了反对侵略，和共同的敌人作战时，一个同盟国家的军队可以到另一个同盟国家的土地上去，这不是干涉内政。

第二，一个国家到另外一个国家的土地上去建立军事基地，附带军事和政治条件的援助和贷款，在另外一个国家建立的宗教机关进行间谍活动等，都是干涉内政。

第三，纯粹属于内政范围的事，如民族之间或党派之间的斗争，如果外国介入，就是干涉内政。

第四，请外国的教授和专家，这不是干涉内政，这是互助。

第二、第三种情况是干涉内政，因为侵害了一国的民族利益。

如果我们派观察团到缅甸去观察民族之间和党派之间的纠纷，缅甸政府可以不认为是干涉内政，但是缅甸别的民族、别的党派就会有不同的看法，别的国家也会有不好的观感。

努：我没有预见到这一点，那末就不提我的建议了吧！

毛：我向吴努总理提出建议，不是以政府工作者的身分，而是以党的工作者的身分。我不仅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还是中国共产党主席。我是以中国共产党主席的身分向缅甸反法西斯人民自由同盟主席吴努提出建议。

刘少奇委员长和我都同吴努总理讲了一些中国经验，这是朋友之间交换意见。至于缅甸政府是否照办，那完全要由缅甸政府根据自己的情况来定。我们同缅甸做生意，决不以缅甸政府对哪一个党

关系较好作为条件。

努：我把主席和刘委员长对我提出的建议，看作是大哥哥们对一个小弟弟提出的建议。大哥哥是比小弟弟更有经验的。当我相信对我提建议的人是诚实、真诚而且是为他们的人民献身的，我就像小弟弟对大哥哥一样的谦恭，听取他们的建议。

毛：我们不是大哥哥同小弟弟的关系，我们是同年同月同日同时生的兄弟。况且，缅甸取得独立是在一九四八年，还比我们早一年。

努：我非常高兴能有机会进行这些会谈。曾经有过一个时候，我不知道在中国会遇到怎样的人，害怕会遇到像希特勒那样的人，讲话的时候拍桌高喊。但是我现在发现，我的恐惧都是毫无根据的。对于这几次恳切的谈话，我感到十分高兴。

毛：任何人都从不了解到了解，这是很自然的。



1954年12月11日，毛泽东设宴招待缅甸联邦总理吴努和夫人，并和朱德、刘少奇、周恩来观看缅甸贵宾赠送的礼品。



1954年12月11日，毛泽东在北京观看缅甸总理吴努赠送的礼物。

祝贺捷克斯洛伐克总统萨波托斯基 七十寿辰的电报

(1954年12月16日)

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总统

亲爱的萨波托斯基同志：

当您七十寿辰之际，请接受中国人民和我个人的衷心祝贺。

您为捷克斯洛伐克劳动人民的解放事业进行了长期而英勇的斗争，并作出了卓越的贡献。目前捷克斯洛伐克人民在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和您的领导下，正在把自己的祖国建设成为日益繁荣幸福的国家，并为保障欧洲和平和安全进行着不懈的斗争，中国人民对捷克斯洛伐克人民的这种正义事业表示深切的同情和支持。

祝您在领导捷克斯洛伐克人民为建设社会主义和维护世界和平的事业中获得更大的成就，并祝您健康长寿。

毛泽东

一九五四年十二月十六日 北京

给黄炎培^[1]的信

(1954年12月17日)

黄先生：

惠书及大文^[2]收到，已付几个同志传阅，须稍待方能璧还，乞
谅为幸。顺颂

日安

毛泽东

十二月十七日

[1] 黄炎培，当时任中国民主建国会主任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2] 惠书，指黄炎培1954年12月15日给毛泽东的信。信中谈了他于1954年11月15日去北京医院做前列腺手术的情况和最近时期工商界的情况。关于工商界的情况，信中说：自强调爱国守法以来，工商界多少有些进步，但问题还有，有些还很严重，其中中小工商业较难导向国家资本主义，而以中小商业为尤甚。河北将棉布统销和私营布商的全行业改造相结合，分为维持、转业、改造三种处理方法，是很好的典型，如果各地按其不同情况参酌进行，当能完成改造私营工商业的任务。大文，指黄炎培写的《关于思想问题的四点答问》一文。

给章士钊^[1]的信

(1954年12月17日)

行严先生：

惠书^[2]敬悉。

某君事因有些人不同意，故未能提名。此复
顺致敬意

毛泽东

十二月十七日

[1] 章士钊，字行严，当时任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

[2] 指章士钊1954年12月9日给毛泽东的信。信中建议将王冷斋安排进第二届全国政协委员名单中。毛泽东复信中所说的“某君事”即指这件事。王冷斋，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时任宛平县县长并担任中日谈判的中方首席代表，建国后任政协第三、四届全国委员会委员。

给毛泽荣^[1]的信

(1954年12月18日)

胜五弟：

你的信收到了。

你要求明年四月再来北京一次，我认为可以。还有毛仙梅^[2]想来，你可和他一道来。在北〈此〉住一个月回家。

寄上人民币贰百万元^[3]，以助日用。顺问
近安

毛泽东

一九五四年十二月十八日

[1] 毛泽荣，又名胜五，毛泽东的堂弟。

[2] 毛仙梅，毛泽东的堂弟。

[3] 这里是以当时流通的人民币计算的。按中国人民银行1955年3月1日起发行的新人民币折算，合200元（新币1元等于旧币1万元）。

给郭耿光^[1]的信

(1954年12月18日)

耿光先生：

十二月六日的信收到。寄上人民币贰百万元^[2]，以助急需。此复。顺候

大安

毛泽东

一九五四年十二月十八日

[1] 郭耿光，1927年前在湘潭做小生意时，曾掩护过毛泽东。

[2] 这里是以当时流通的人民币计算的。按中国人民银行1955年3月1日起发行的新人民币折算，合200元（新币1元等于旧币1万元）。

关于政协的性质和任务的谈话提纲^[1]

(1954年12月19日)

性质、会期、任务。

(1) 外交；(2) 内政——选举；(3) 向党委和国务院提意见（社会主义改造）并加以协商；(4) 协调各民族各党派团体及其他人员间的关系；(5) 学习。

[1] 毛泽东的这个谈话提纲，写在政协第二届全国委员会1954年10月16日分组讨论情况简报的首页上。这份简报，汇集了分组讨论政协章程草案的主要意见，涉及政协的性质和任务等问题。10月19日毛泽东召集参加政协会议的部分党内外人士座谈，对这些问题谈了自己的意见。

关于政协的性质和任务^[1]

(1954年12月19日)

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后，有些人认为政协的作用不大了，政协是否还需要成了问题。现在证明是需要的。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五百五十九人当中，当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一百四十人，只占总数的四分之一，还有四分之三不是人大代表，可见通过政协容纳许多人来商量事情很需要。虽然全国和地方的人民代表大会、国务院和各省市人民委员会各方面都容纳了许多人，但是还需要政协全国委员会和政协地方委员会。

主要的问题是政协的性质问题，是国家机关还是人民团体？

政协的性质有别于国家权力机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它也不是国家的行政机关。有人说，政协全国委员会的职权要相等或大体相等于国家机关，才说明它是被重视的。如果说，那末共产党没有制宪之权，不能制定法律，不能下命令，只能提建议，是否也就不重要了呢？不能这样看。如果把政协全国委员会也搞成国家机关，那就会一国二公，是不行的。要区别各有各的职权。

政协是全国各民族、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国外华侨和其他爱国民主人士的统一战线组织，是党派性的，它的

[1] 这是毛泽东邀请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座谈政协工作的谈话要点。

成员主要是党派、团体推出的代表。

政协的任务是什么呢？

一、协商国际问题。像过去的抗美援朝，现在的美国占领台湾问题，包括将来如发生外国侵略等，都需要商量。这类事大概每年都会有。这些事国务院要办，外交部和国防部要办，但有些问题，比如艾德礼、尼赫鲁、吴努^[1]要来访问，我们需要先商量商量，取得一致方针，召集什么会好呢？人大常委会不太好，还是政协常委会好。国务院的人都可以去参加，不是以机关资格，而是以个人资格。过去经过政协，各民主党派发表了支持抗美援朝斗争的联合宣言^[2]，还为解放台湾发表了联合宣言^[3]。反对战争，保卫和平，这一条有很多文章可做，有些人大常委会不好做，国务院做不完，要由政协来做。

二、商量候选人名单。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和地方同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候选人名单以及政协各级委员会组成人员的人选进行协商，它有这种权利。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是人民选举的，但各党派、团体要先进行协商。

三、提意见。当前主要是对社会主义改造的问题提意见。资本主义工商业、农业和手工业都要改造，这就发生各方面的关系问

[1] 艾德礼，英国前首相，当时任英国工党领袖。尼赫鲁，当时任印度总理。吴努，当时任缅甸总理。他们分别于1954年8月、10月、12月来中国访问。

[2] 指1950年11月4日中国共产党、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国民主同盟等11个民主党派联合发表的《各民主党派联合宣言》。

[3] 指1954年8月22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为解放台湾联合宣言》。

题。选举也是有各方面的关系。还有文教、学习也有各方面的关系。比如对《红楼梦研究》的批判也值得协商。主要是批判唯心论问题。将来一万年以后，也还有唯心论，因为社会经济制度、生产关系陈旧了，就有一批人要出唯心论。新旧之间的矛盾，一万年后也还有。社会主义改造是很繁杂的，各种工作就要协商。



1954年12月21日至25日，全国政协二届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宣言》，推举毛泽东为政协名誉主席，选举周恩来为主席。图为毛泽东在会上讲话。

我接到了很多来信。这次由广州回来，经过五个省都找各省的负责同志开了会，调查了农村情形。有人说农民每天只有六两^[1]米，这没有反映真实情况。实际上，说农民苦的是富农，他们拿这

[1] 这里用的是旧的市制重量单位，旧制1斤为16两。1959年6月25日国务院发布关于统一计量制度的命令，其中说：“市制原定十六两为一斤，因为折算麻烦，应当一律改为十两为一斤。”

些话来反对统购统销。农村中有百分之七十的农民，他们过去是贫苦的，是拥护统购统销的。我亲自问过一些农民，他们说每天有米十四两六，加上杂粮每天有一斤粮，不是六两。今年全国粮食产量三千四百亿斤，国家共征购七百七十亿斤，不到四分之一，其中主要是购的占五百亿斤，征的只二百多亿斤。购的部分国家出公道价，相当于卖给私商的价钱。有的县长、科长、乡长，自己有余粮不肯卖，山西甚至有存几万斤粮的富县长。

今年湖南有三百万户灾民，湖北有五百万户，都安置好了。政府跟着灾民走，每人每天供应一斤粮食，灾民在哪里，供销合作社就设在哪里，这是历史上没有过的。这证明了我们的组织能力，在前几年是没有可能的。

农村中，现在不是征粮问题，也不是灾民问题，而是商业问题。国营商业进得太猛，步子走快了，以致有许多人失业，没有安置好，中共中央已指示要放慢步子。工业原料问题，没有统筹兼顾，一定要统筹兼顾。需要多协商的还是社会主义改造问题，像农业生产合作社章程可以协商座谈，还有手工业、渔业等问题也可以谈。总之，国家各方面的关系都要协商。国民党的参议会才是投闲置散、虚应故事的，我们的政协是有事情做的。

宪法的实施问题，巩固人民民主制度问题，政协可以向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提意见。政协委员提意见，特别是发议论，说闲话，只要不是破坏性的意见，只要是建设性的意见，即使是错误的，提了也有好处。提意见是合乎章程的。

四、协调各民族、各党派、各人民团体和社会民主人士领导人员之间的关系。过去汉族的统治者不好，压迫少数民族，现在要改变。要调整各方面的关系，具体的事是协商候选人名单。

现在政协全国委员会的名单是否完全？完全的事情世界上是没有的。这次就把薛笃弼^[1]给忘了，将来可以补上。缺点哪年都有，可以改，可以补救。我们不姓蒋，不是“蒋家天下陈家党”^[2]，他们惜墨如金，是党派不叫党派，叫社会贤达。

五、学习马列主义。我们不提毛泽东思想。如果把毛泽东思想同马列主义并提，有人会以为是两个东西，为了不使发生误会，就不提毛泽东思想。列宁主义也是列宁死后别人提的。各国共产党都有一些自己的但仍是马列主义的东西。

学习是自愿的，不能强制。对马列主义有的人信得多，有的人信得少，比如有的政协常委他只爱国，不愿学习马列主义，也没有办法。要提倡努力改造思想，三勤夹一懒。

我们的国家制度是人民民主专政，民主是商量办事，不是独裁，但集中是必要的。现在还有对敌斗争，拘留条例主要是对付反动分子。对敌人是专政，要压迫他。对地主要剥夺财产，取消政治权利。几个民主阶级在共产党领导下压迫帝国主义分子、地主分子，我们是“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以暴易暴”“党同伐异”。

[1] 薛笃弼（1892—1973），山西运城人，曾任北洋政府司法部次长、国民党政府甘肃省省长、民政部部长、内政部部长、水利部部长等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上海市政协常委、第二届全国政协委员。

[2] “蒋家天下陈家党”，是对国民党一党专政和蒋介石独裁统治的贬称。陈，指陈果夫、陈立夫兄弟，他们先后担任过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委、组织部部长等职，是国民党CC系的首领。



1954年12月，毛泽东、周恩来、李维汉在全国政协二届一次会议主席台上。



1954年，毛泽东和青年代表合影。

给李济深^[1]的信

(1954年12月24日)

任潮先生：

十二月二十二日惠书^[2]收读。你的意见是对的，已告有关同志注意^[3]。此复。顺致敬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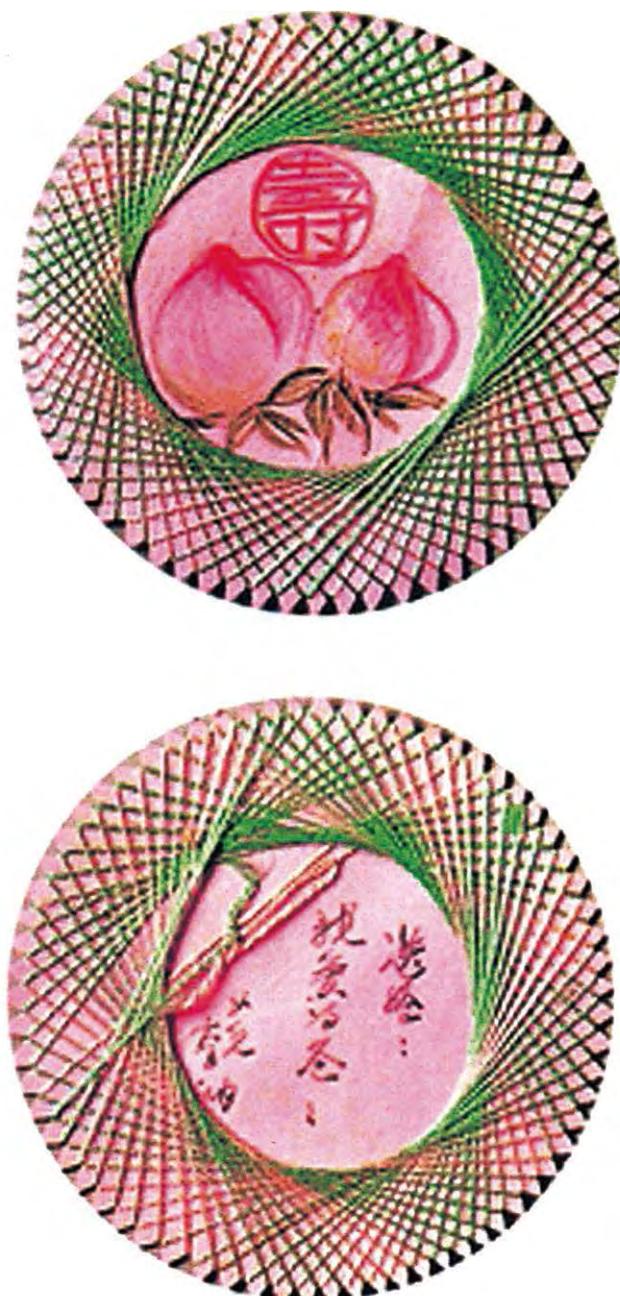
毛泽东

十二月廿四日

[1] 李济深，字任潮，当时任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委员会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2] 指李济深1954年12月22日给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的信。信中说：20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通过了1955年发行建设公债案，昨日并由主席公布了。这件事在法律手续上是正确的，但在步骤上我心里总有点不大自然。因为自人民共和国政府成立以来，政府凡有一件比较大的事，都先经过协商机关座谈一番，然后提交政府委员会通过公布，而于推行上比较更顺利。这次是否因为时间关系，又值政协第二届全国委员会开会，不便提出，故急于如此办理。现在兵役法又要提出了，是否照往例先交政协协商一番，于将来推行似亦有帮助。

[3] 毛泽东在李济深1954年12月22日来信的信封上批有：“刘、周、朱、陈、邓、彭、彭真、陈毅阅，请周酌处，退毛。”



毛泽东61岁生日时，李讷赠送给毛泽东的生日礼物——寿桃图书签。

给李达^[1]的信

(1954年12月28日)

鹤鸣兄：

十二月二十日的信及两篇文章^[2]，收到看过了，觉得很好。特别是政治思想一篇，对读者帮助更大。似乎有些错字，例如“实用主义者主张物质的第一性和意识的第二性”。此外，在批判实用主义时，对实用主义所说的实用和效果，和我们所说的大体同样的名词，还需加以比较说明，因为一般人对这些还是混淆不清的。宇宙“是一篇未完的草稿……”几句话，也须作明确的批判。你的文章通俗易懂，这是很好的。在再写文章时，建议对一些哲学的基本概念，利用适当的场合，加以说明，使一般干部都能够看懂。要利用这个机会，使成百万的不懂哲学的党内外干部懂得一点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未知以为如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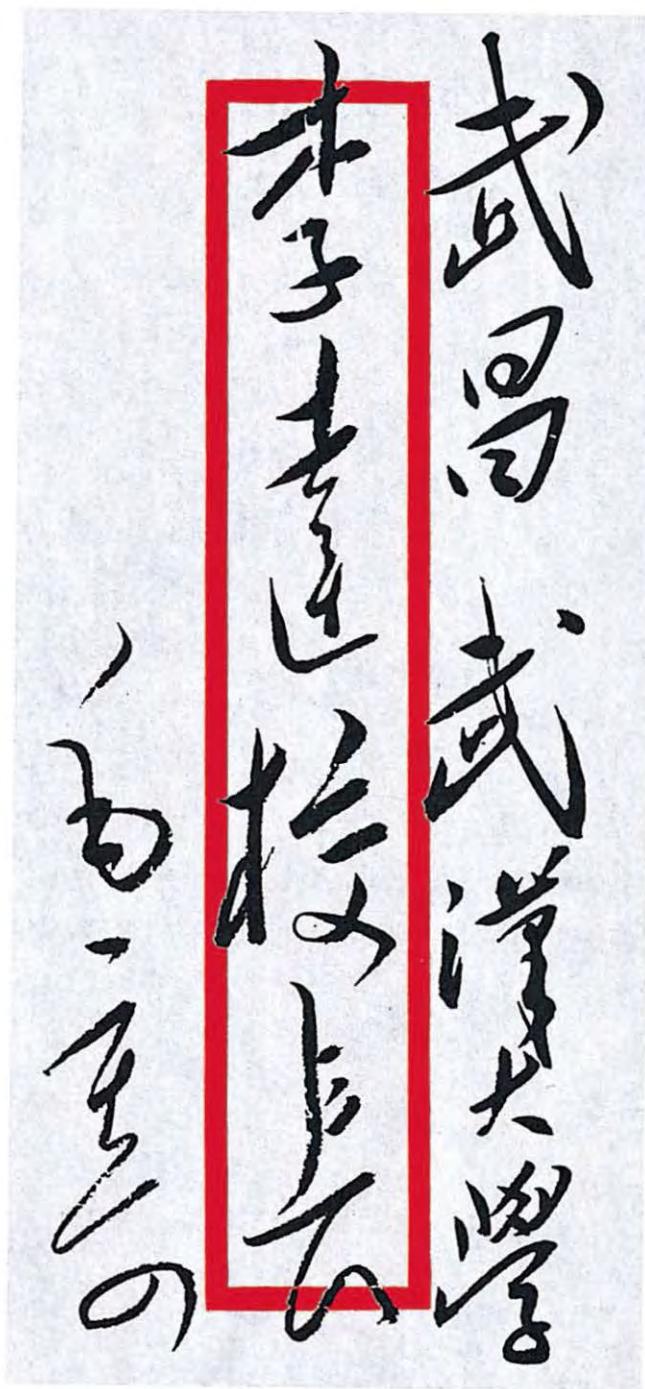
顺致敬意

毛泽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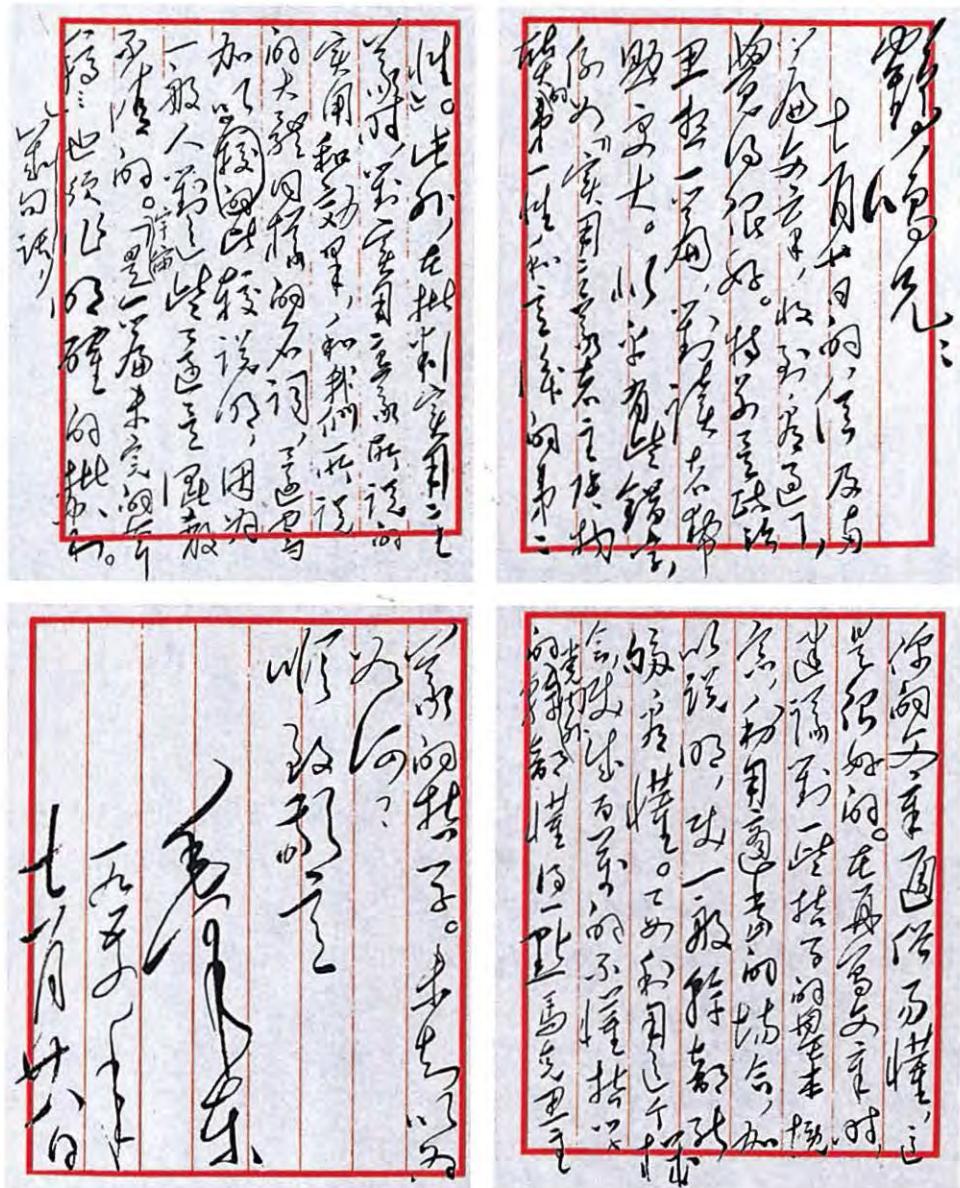
一九五四年十二月廿八日

[1] 李达，号鹤鸣，当时任武汉大学校长。

[2] 指李达写的《胡适的政治思想批判》和《胡适思想批判》。



毛泽东致李达信的信封。



毛泽东致李达信的手稿。

对韶山乡全体农民来信的批语和复信

(1954年12月)

—

刘、周、朱、陈、小平、子恢、伯达、尚昆^[1]阅，退毛。

韶山乡的情况，值得一阅。

韶山乡五百八十六户，去年卖余粮十二万斤，今年卖二十万斤，增加了八万斤，生活还比去年好。除此信^[2]外，现有四位农民来北京，受我招待，他们都说情形很好。

[1] 刘，指刘少奇。周，指周恩来。朱，指朱德。陈，指陈云，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小平，即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国务院副总理。子恢，即邓子恢，当时任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伯达，即陈伯达，当时任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尚昆，即杨尚昆，当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

[2] 指韶山乡全体农民1954年12月13日给毛泽东的信。信中说：“一年来，在党和您的正确领导下，您的故乡在实行国家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全乡共有五百八十六户，至今参加互助合作的五百二十户，组织面已达百分之九十二点五。去年全乡卖出余粮十二万斤，今年又卖了二十万斤，支援了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互助合作的道路，使全乡农民大家富裕，共同上升，增加了生产，改善了生活，并以更多的粮食支援国家建设。”

二

毛月秋^[1]，七十多岁，老党员，现受政府命看守我家乡的那个屋子。^[2]

三

月秋同志：

你的信，全体农民的信，收到了，十分高兴。请你转告韶山乡的党政同志及全体农民同志，感谢他们的好意。

毛泽东

一九五四年十二月廿八日

[1] 毛月秋，大革命时期曾在韶山任中共慈悦支部书记，新中国成立后在韶山毛泽东旧居做接待工作。

[2] 这段批语写在毛月秋1954年12月13日为转交韶山乡全体农民的信而写给毛泽东的信上。

对中央农村工作部关于 全国第四次互助合作会议的 报告的批语和修改

(1954年12月30日)

—

刘、周、邓^[1]再阅，即发。

在第九、第十、第十一页及其他地方增加了几句话。^[2]

毛泽东
十二月卅日

[1] 刘，指刘少奇。周，指周恩来。邓，指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国务院副总理。

[2]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1954年11月19日关于全国第四次互助合作会议的报告稿上加写的文字有4处，见本篇二、三、四、五，文中用宋体字排印的是毛泽东改写和加写文字。

二

党在农村的阶级政策是：依靠贫农（包括全部原来是贫农的新中农在内，这样的贫农占农村人口总数百分之五十到七十），巩固地团结中农，发展互助合作，由逐步限制到最后消灭富农剥削。

三

提出依靠包括原来是贫农现在已上升为新中农的人们在内的贫农这个口号，在互助合作的对象（已取得土地的雇农、贫农、中农）范围内，即占了绝对大多数，在农村人口总数内（包括地主富农）也是百分之五十至百分之七十，在人数上也是占优势的。

四

这里所说的中农是指老中农。老中农在农村人口总数中的比重，多者百分之四十，少者百分之二十，这个数目仅次于贫农，他们又有较好的经济条件，如果不好好地团结他们，挫折了他们的积极性，那就是极大的损失。

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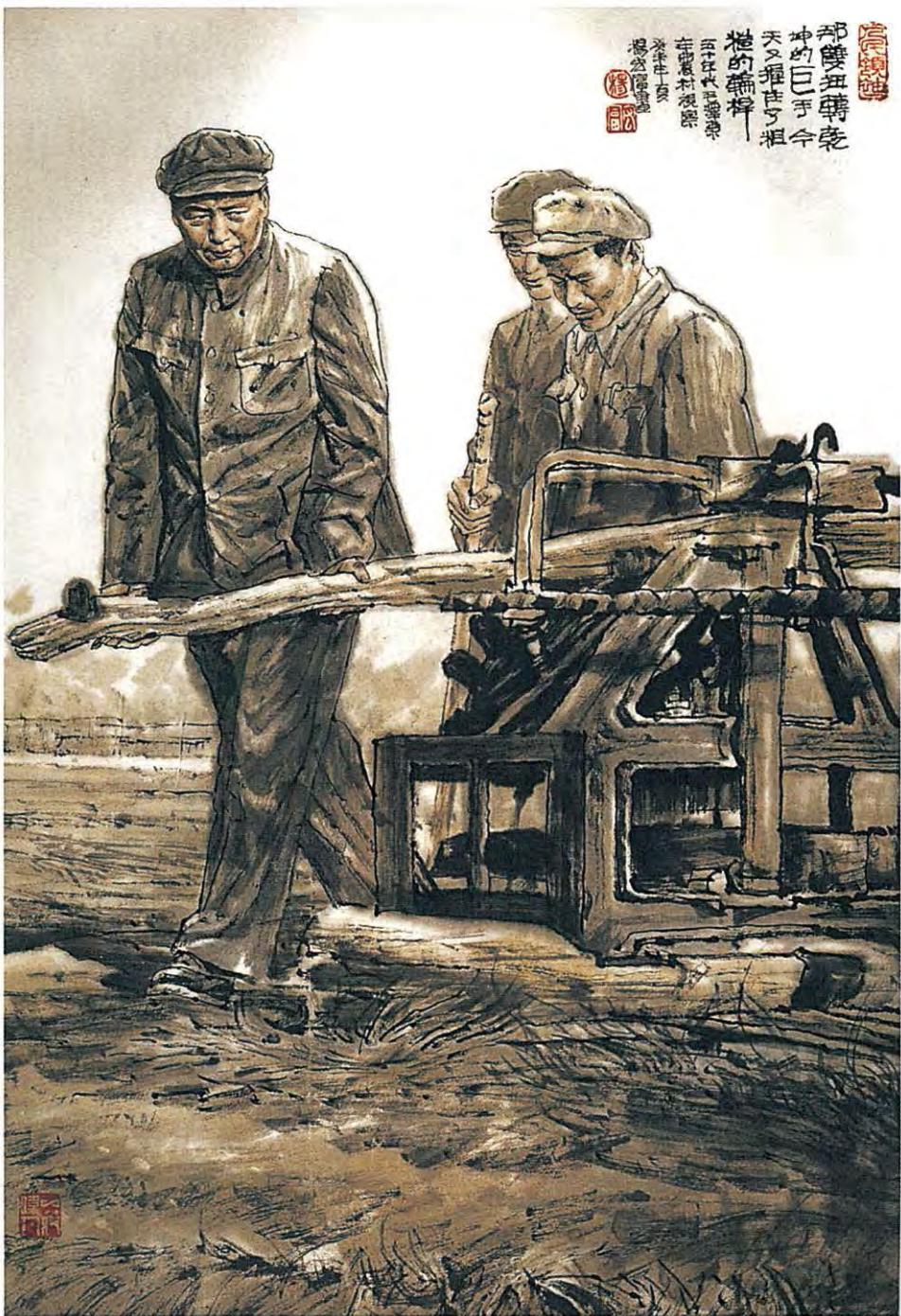
干部的提拔、撤换必须遵守社章所规定的民主手续。但应着重注意培养现在仍是贫农的以及贫农出身的领导干部，同时必须吸收老中农参加领导，并且不能太少，应有十分之三的数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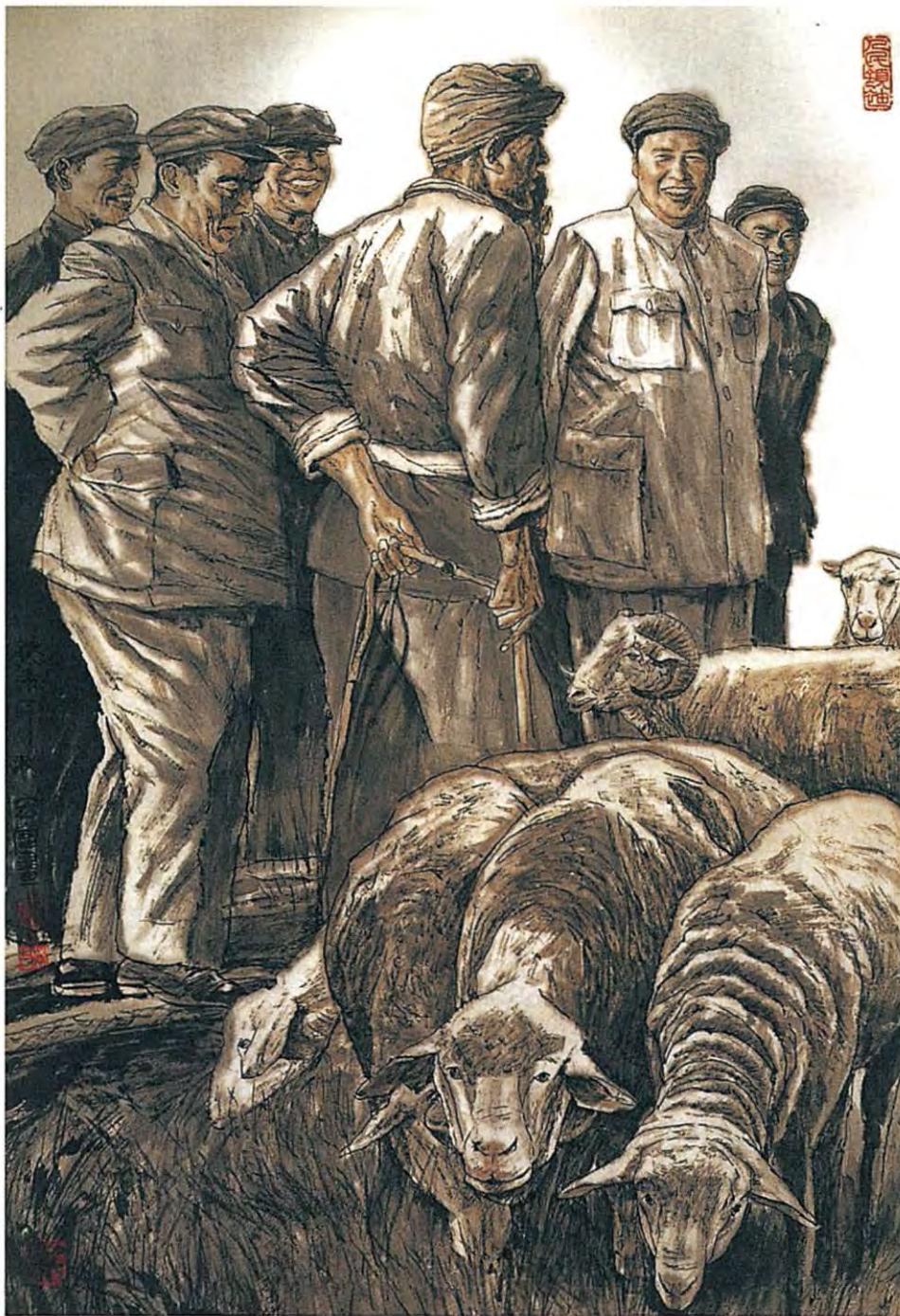
1954年，毛泽东在河北顺义（今属北京）农村考察。



1954年，毛泽东在河北农村和牧羊人交谈。



《那双扭转乾坤的双手，今天又握住了粗糙的轮杆》（中国画）



《与牧羊人交谈》(中国画)



《毛主席和牧羊人》(素描)



《毛主席在河北农村》(中国画)



《毛主席在农村》(油画)

关于阅看冯雪峰^[1]的诗和寓言的批语

(1954年12月31日)

—

此件^[2]送刘、周、朱、陈、邓、彭真、彭德怀、陈毅、陆定一^[3]各同志阅，退毛。

冯雪峰的诗及寓言数首，可一阅。如无时间，看第一篇《火狱》即可。

毛泽东
十二月卅一日

[1] 冯雪峰，当时任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

[2] 指冯雪峰写的诗《火》《三月五晨》和寓言《火狱》《曾为反对派而后为宣传家的鸭》《猴子医生和重病的驴子》。

[3] 刘，指刘少奇。周，指周恩来。朱，指朱德。陈，指陈云，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邓，指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彭真，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彭德怀，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陈毅，当时任中共中央委员。陆定一，当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

—

陈伯达、胡乔木、胡绳、田家英^[1]各同志阅，退毛。

冯雪峰的诗及寓言。如无时间，看火狱一篇即可。

[1] 陈伯达，当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胡乔木，当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毛泽东的秘书。胡绳，当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秘书长。田家英，当时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办公室副主任、毛泽东的秘书。

毛泽东、周恩来祝贺越南政府 还都河内的电报

(1954年12月31日)

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胡志明同志，
越南民主共和国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范文同同志：

值此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举行还都典礼之际，我们谨代表中国人民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向你们、并通过你们向越南人民和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表示热烈的祝贺。

越南政府还都河内，是由于英勇的越南人民在越南劳动党和胡志明主席领导下八年艰苦抗战获得辉煌胜利的结果，是由于越南政府一贯执行和平政策的结果。祝越南人民在新的一年中，在巩固和平，实现全国统一、独立和民主的斗争中和在恢复国民经济的事业中获得新的成就。

毛泽东
周恩来
一九五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于北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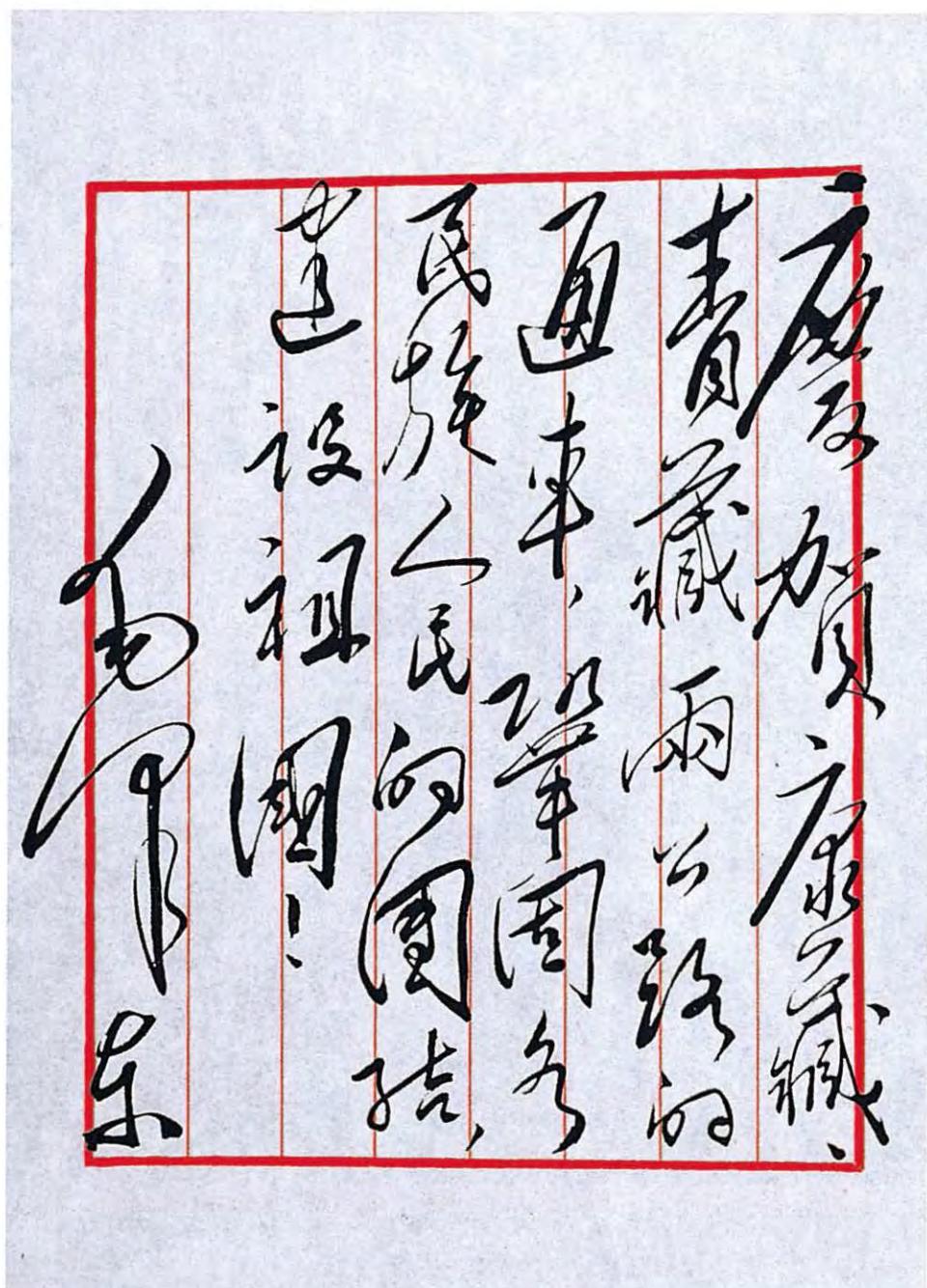
为庆贺康藏、青藏两公路通车题词^[1]

(1954年12月)

庆贺康藏、青藏两公路的通车，巩固各民族人民的团结，建设祖国！

毛泽东

[1] 这是毛泽东在授予康藏、青藏两条公路筑路人员的锦旗上的题词。



毛泽东为庆贺康藏、青藏两公路通车的题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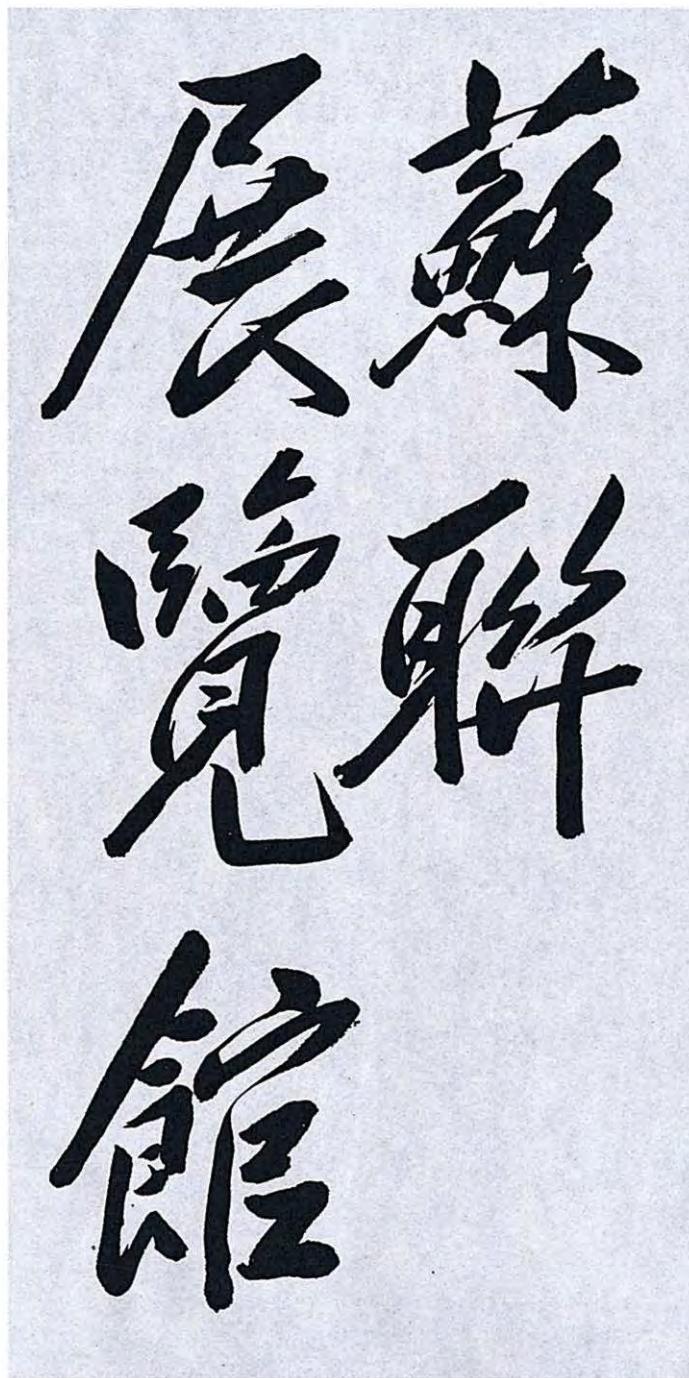
为加强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和外界的联系，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中央决定修建青藏、康藏公路。图为解放军修筑康藏公路。

为苏联展览馆题名^[1]

(1954年)

苏联展览馆

[1] 1953年10月15日，北京“苏联展览馆”工程动工，1954年9月竣工。毛泽东为其题写了馆名。



毛泽东为苏联展览馆题写的馆名。

1955



1955年，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

祝贺缅甸联邦国庆的电报

(1955年1月2日)

缅甸联邦总统巴宇博士阁下：

值此缅甸联邦国庆之际，我谨代表中国人民，并以我个人的名义，向缅甸人民和阁下致热烈的祝贺。并祝中缅两国之间的友好合作关系，在维护亚洲和世界和平的事业中，获得进一步的巩固和发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毛泽东

一九五五年一月二日北京

对中央关于统一战线工作指示稿的 批语和修改

(1955年1月10日)

—

少奇同志：

在第六页上加了一条^[1]，请审阅，此外还有一些修改^[2]。

毛泽东

一月十日

[1] 指毛泽东在审阅中共中央关于统一战线工作的指示稿时加写的第七条，即本篇二。

[2] 毛泽东对中共中央关于统一战线工作的指示稿除加写了第七条外，还将指示稿中的两处“毛主席”改为“毛泽东同志”，并在指示稿第三条谈到“政协各省、市地方委员会全体会议，每年至少应开会一次，对于有关国家政治生活和统一战线的重大问题，特别是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和人民委员会的候选名单、政协地方委员会的各种名单等，应提到适当的会议上进行协商”之后，加写了“这种对重大问题的协商会议每年至少要有四次，即平均每季有一次；此外还应有一些对若干个别问题的协商会议”一段文字。

二

必须指出，在强调加强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任务的时候，不要忘记又团结又斗争的原则。在民主人士中存在着的政治上的和思想上的错误倾向，必须加以分析，并在适当的时机用适当的方式向他们指出，有些应当提出批评，或加以讨论，以达帮助他们提高思想，改正错误的目的。认为在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中可以只要团结、不要斗争的想法是完全错误的。我们的任务是：既要反对关门主义的“左”的偏向，又要反对同错误思想和平共居的右的偏向。

关于同意国家不为 个人祝寿的建议的批语^[1]

(1955年1月12日)

退彭真。

同意这样处理。

毛泽东

一月十二日

[1] 这个批语写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彭真1955年1月3日给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的信上。信中说：黄炎培副委员长曾给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写信，提议国家不为个人祝寿。我觉得，借黄的提议，把国家做寿的例停止了为好，免得成了惯例，国家要一个接一个地为多人祝寿。如果中央决定接受黄的提议，废除已开之先例，我即把黄炎培的信在常委适当范围内传阅，并在和几个民主人士碰头时，用征求意见的方式作适当酝酿，非正式地和党外人士商得一致意见。

对中国作协关于公开印发胡风^[1] 给中央报告的部分内容的 说明的批语和修改

(1955年1月12日)

—

刘、周、邓^[2]即阅，退陆定一^[3]同志，照办。

毛泽东
一月十二日

作了一点文字上的增改^[4]。

[1] 胡风，当时任全国人大代表、中国作家协会理事。

[2] 刘，指刘少奇。周，指周恩来。邓，指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国务院副总理。

[3] 陆定一，当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

[4] 见本篇二，文中用宋体字排印的是毛泽东加写和改写的文字。

二

胡风在一九五四年七月向中共中央提出一个关于文艺问题的意见的报告^[1]，经中共中央交本会主席团处理。本会主席团认为该报告中关于文艺思想部分和组织领导部分，涉及当前文艺运动的重要问题，主要地是针对着一九五三年《文艺报》刊载的林默涵、何其芳批判胡风资产阶级文艺思想的两篇文章^[2]而作的反批判，因此应在文艺界和《文艺报》读者群众中公开讨论，然后根据讨论结果作出结论。现在决定将胡风报告的上述两部分印成专册，随《文艺报》附发，供读者研究，以便展开讨论。为便于读者研究，将林默涵、何其芳的两篇文章也重印附发。

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
一九五五年一月十二日

[1] 指胡风1954年7月向中共中央提交的《关于几年来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

[2] 指中共中央宣传部文艺处处长林默涵写的《胡风的反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思想》（载《文艺报》1953年第二号）和北京大学文学研究所副所长何其芳写的《现实主义的路，还是反现实主义的路？》（载《文艺报》1953年第三号）。

关于不能由政府向党委 下达内部命令的两个批语^[1]

(1955年1月13日、17日)

—

刘、周、邓、先念、陈毅、仲勋、尚昆^[2]:

这是财政部党组写给国务院，请它“批转各省市党委”的一个报告。这种请政府命令党委的观点是错误的，并且不止一个部如此，请作纠正。

毛泽东

一月十三日

[1] 毛泽东这两个批语，其一写在财政部党组1955年1月11日关于目前税务干部中贪污盗窃国家税款情况给国务院并报中央的报告上，报告末尾请求国务院将这个报告批转各省市党委；其二写在国务院第五办公室1955年1月14日关于全国财经会议拟讨论的主要议题和初步意见给各省市委、人民政府和国务院各有关部门并报中央的电报上。

[2] 刘，指刘少奇。周，指周恩来。邓，指邓小平。先念，即李先念，当时任国务院副总理。陈毅，当时任国务院副总理。仲勋，即习仲勋，当时任国务院秘书长。尚昆，即杨尚昆，当时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中央办公厅主任。

二

刘、周、邓、先念、陈毅、^{习[1]}、尚昆：

由国务院向各省市委下达命令的办法不妥，此类内部命令，似由国务院与党中央联名下达为宜。

毛泽东

一月十七日

[1] 习，指习仲勋。

在周扬关于同胡风谈话情况的报告上的批语^[1]

(1955年1月15日)

刘、周、小平阅，退周扬同志：

(一) 这样的声明^[2]不能登载；(二) 应对胡风的资产阶级唯心论，反党反人民的文艺思想，进行彻底的批判，不要让他逃到“小资产阶级观点”里躲藏起来。

毛泽东

一月十五日

[1] 这个批语写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周扬1955年1月15日关于同胡风谈话情况给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并转毛泽东的报告上。报告中说，昨晚胡风来谈话，表示承认错误，说他是以小资产阶级观点来代替无产阶级观点，思想方法片面，并有个人英雄主义，以致发展到与党所领导的文艺事业相对抗，并说希望不要公开发表他1954年7月给中共中央的报告，如要发表，也希望作些修改，并在卷首附上他的一篇声明。

[2] 指胡风1955年1月13日写的《我的声明》，主要内容是：一、1954年7月我向中央的报告中所表现的对党、对文学事业的态度，本人已初步认识到是错误的，有害的。二、这个报告对今天的文艺运动所得出的判断是带有很大的主观成分的，其中有些具体提到的情况和例证，当时没有很好地调查研究，后来发觉有不切实际之处，因材料已印好，来不及修正。对以上这些，我当负我应负的责任，希望同志们加以批判。



1955年1月15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作出了中国要发展原子能工业的战略决策。图为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接见铀矿地质人员。

对中央关于组织宣传唯物主义思想 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 演讲工作的通知^[1]的批语

(1955年1月24日)

可用。

毛泽东
一月廿四日

[1] 中共中央1955年1月下发的这一通知中说，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错误思想的批判已告一段落，对胡适派思想的批判已经初步展开，对胡风及其一派的文艺思想的批判亦将展开。这些思想斗争有极其重要的意义，这是通过对我国知识分子所熟悉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批判来具体地宣传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思想。向人民群众宣传唯物主义思想以提高他们的觉悟，是党的一项最基本的经常的任务。因此必须在大约500万有阅读能力的党内干部和党外知识分子中认真地进行教育，具体地批判唯心主义思想，树立唯物主义思想，才能通过他们来教育广大人民群众。为此，有必要采取演讲的方式，利用业余时间，向党内外500万知识分子讲解目前正在展

开着的思想批判的重要意义，结合当地干部和知识分子的思想状况，通俗地说明马克思主义唯物论的基本观点。具体办法是：一、在各大城市，由当地省市委负责，利用公共场所，指定一批有演讲能力的报告员，进行演讲，并组织全体干部和知识分子前去听讲。二、报告员除指定适当的党员担任外，也可请党外的马克思主义者担任。三、演讲的内容可以参照北京各报刊已发表的批判胡适、俞平伯、胡风等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论文，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批判资产阶级的唯心主义思想。四、北京各报刊已发表的有关思想斗争的好文章，将在中央宣传部出版的《宣传通讯》上陆续介绍。五、好的演讲稿可在当地报刊上发表或寄交北京的报刊发表。六、此项演讲应在2月开始。七、应当把演讲的地点和时间逐渐固定下来，并增加新的内容，使之逐渐成为向知识分子和干部宣传唯物主义、时事问题和重要政策等的定期讲坛。

祝贺印度共和国国庆的电报

(1955年1月24日)

印度共和国总统拉金德拉·普拉沙德阁下：

值此印度共和国国庆五周年之际，我谨代表中国人民，并以我个人的名义向印度人民和阁下致热烈的祝贺。愿中印两国间的友好合作关系在维护亚洲和世界和平的事业中日益巩固和发展，并祝印度共和国繁荣，印度人民幸福。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毛泽东

一九五五年一月二十四日于北京

关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 报告稿给陈云^[1]的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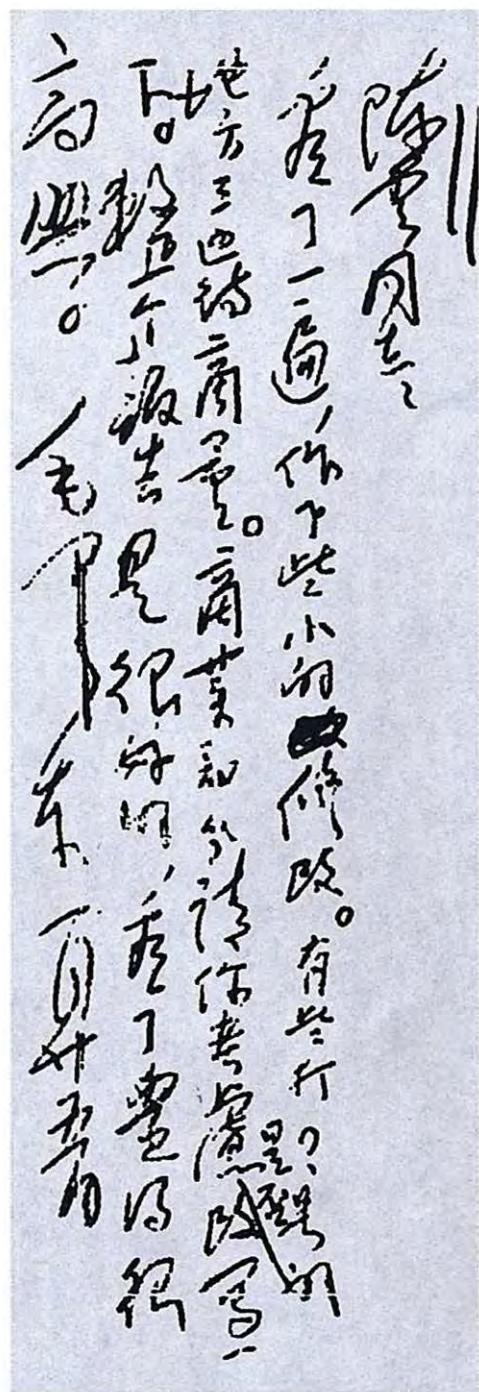
(1955年1月25日)

陈云同志：

看了一遍，作了些小的修改。有些打？号的地方还待商量。商业部分请你考虑是否改写一下。整个报告是很好的，看了觉得很高兴。

毛泽东
一月廿五日

[1] 陈云，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1955年3月21日，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陈云代表中央作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报告。



毛泽东致陈云信的手稿。

对彭德怀在军委扩大会议上 总结报告的批语^[1]

(1955年1月26日)

请少奇同志处理。^[2]

毛泽东
一月二十六日

[1] 这是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军委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部长彭德怀1955年1月26日呈送报告上写给刘少奇的批语。

[2] 彭德怀1954年12月29日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总结报告讲了9个问题：（一）为加速我军现代化正规化的建设，实行义务兵役制、军官服役条例和军官薪金三大制度。（二）为了减少军委领导单位，便于战时防空指挥和工作领导，全国划分12个军区，各省军区仍然保留。（三）公安部队整编问题。继续执行各省公安部队由省军区统一领导的决定。为逐渐建立我国的警察制度，一部分公安部队改为警察的方针应肯定不变。（四）部队军事训练与干部军事学习问题。1954年1月全国军事系统党的高级干部会议已决定，以部队军事训练工作为全军的工作中心，培养教育干部的学校工作则为中心的中心。这是因为部队军事训练成绩的优劣，各级干部学习军事科学成绩的优劣，将是决定今后我军战斗力高低的基本标准。为加强这一工作的领导，设立军事训练总监部。（五）纯洁内部问题。把从成分上政治上纯洁我军成员特别是干部作为一项严重的政治任务。（六）提高干部思想觉悟与防止腐化堕落问题。（七）培养20万个有战斗经验的初级干部。（八）建立武装力量监察部。（九）国防工事构筑等问题。中共中央政治局1955年1月26日会议修改通过这一总结报告。刘少奇1月27日批示：“彭德怀同志阅后，交尚昆同志发出。”

对梁漱溟^[1]《告台湾同胞》 一文的批语^[2]

(1955年1月27日)

刘、周^[3]阅，退陆定一同志。

陆拟各点均可不改，只在文尾倒数第三行第二删去“事不宜迟，……”几句。此文可以广播，并可在北京、香港两处报上发表。

毛泽东
一月廿七日

[1] 梁漱溟，当时任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

[2] 这个批语写在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1955年1月19日关于修改和发表梁漱溟《告台湾同胞》一文给周恩来的请示报告上。陆定一在报告后附送了他对该文的几点修改意见。《告台湾同胞》后来发表在1955年2月3日《人民日报》和1955年2月5日香港《文汇报》上。

[3] 刘，指刘少奇。周，指周恩来。

接受芬兰驻华大使孙士敦 呈递国书时的答词

(1955年1月28日)

大使先生：

我很高兴地接受您所递交的芬兰共和国总统的国书，并感谢您所转达的芬兰共和国总统的友好愿望。

四年来，中芬两国间的经济联系和文化交流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获得了很大的发展。大家知道我们两国政府和人民的友好交往几年来是以多种形式进行的，特别令人满意的是两国贸易关系和文化联系顺利发展的情况，两国贸易年年都有发展而且贸易协定都是圆满完成的。一九五二年中国杂技团的访问芬兰，一九五三年以吉科宁^[1]夫人为首的芬兰文化代表团访问中国和一九五四年七月中国对外贸易部雷任民副部长应芬兰政府邀请访问芬兰都在两国人民中间留下了深刻而良好的印象，大大地增强了中芬两国人民的友好感情和和平合作的信念；中芬两国的友好合作的关系充分证明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是可以和平共处和友好合作的。现在我们两国已将双方公使馆升格为大使馆并互相派遣了大使，这标志着我们两国的友好关系的进一步的巩固和发展。

[1] 吉科宁，1953年任芬兰共和国外交部长。

中芬两国有着维护和巩固和平的共同愿望，而两国间经济文化交流的增进，也必将有利于世界和平的维护和巩固。我们相信，中芬两国间的贸易关系和文化交流，将不断加强和发展。大使先生，我对您所表示的两国代表人物多作直接接触的愿望，表示欢迎。

我热烈地欢迎您出任芬兰共和国驻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特命全权大使。在您为加强中、芬两国友好合作的工作中，您定将获得我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协助。

我预祝您在工作中获得成功，并祝芬兰共和国的繁荣、芬兰人民的幸福和芬兰共和国尤·库·巴锡基维总统的健康。

原子弹吓不倒中国人民^[1]

(1955年1月28日)

中国和芬兰是友好的国家。我们的关系，是建立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之上的。

中国同芬兰从来没有发生过冲突。在欧洲国家中，在历史上，中国只同英国、法国、德国、沙皇俄国、意大利、奥匈帝国、荷兰等国有过战争，都是这些国家从老远跑来侵略中国的，比如英法联军和包括美国、日本在内的八国联军对中国的进攻。参加侵朝战争的有十六个国家，其中有土耳其、卢森堡等国。这些侵略国家都说他们是爱好和平的，却把朝、中两国说成是侵略国。

今天，世界战争的危险和对中国的威胁主要来自美国的好战分子。他们侵占中国的台湾和台湾海峡，还想发动原子战争。我们有两条：第一，我们不要战争；第二，如果有人来侵略我们，我们就予以坚决回击。我们对共产党员和全国人民就是这样进行教育的。美国的原子讹诈，吓不倒中国人民。我国有六亿人口，有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美国那点原子弹，消灭不了中国人。即使美国的原子弹威力再大，投到中国来，把地球打穿了，把地球炸毁了，对于太阳系说来，还算是一件大事情，但对整个宇宙说来，也算不

[1] 这是毛泽东在芬兰首任驻中国大使孙士教递交国书的时候谈话的要点。

了什么。

我们有一句老话，小米加步枪。美国是飞机加原子弹。但是，如果飞机加原子弹的美国对中国发动侵略战争，那末，小米加步枪的中国一定会取得胜利。全世界人民会支持我们。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果，在俄国把沙皇、地主和资本家扫光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果，在中国把蒋介石和地主推翻了，东欧国家和一些亚洲国家也解放了。美国如果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那末，算它要打八年或十年吧，其结果是美国和英国及其他帮凶国家的统治阶级要被扫光，世界上大部分地方都要变成共产党领导的国家。世界大战的结果，不是有利于好战分子，而是有利于共产党和世界革命人民。他们要发动战争，那就别怪我们搞革命，也就是他们口口声声所说的我们搞“颠覆活动”。他们不搞战争，还可以在地球上多存在一些时候。他们发动战争越早，他们在地球上被消灭也就越早。那时候就要建立人民的联合国，可能设在上海，也可能设在欧洲一个什么地方，也可能还设在纽约，如果那时美国好战分子已被扫光的话。

给杨树达^[1]的信

(1955年1月29日)

遇夫先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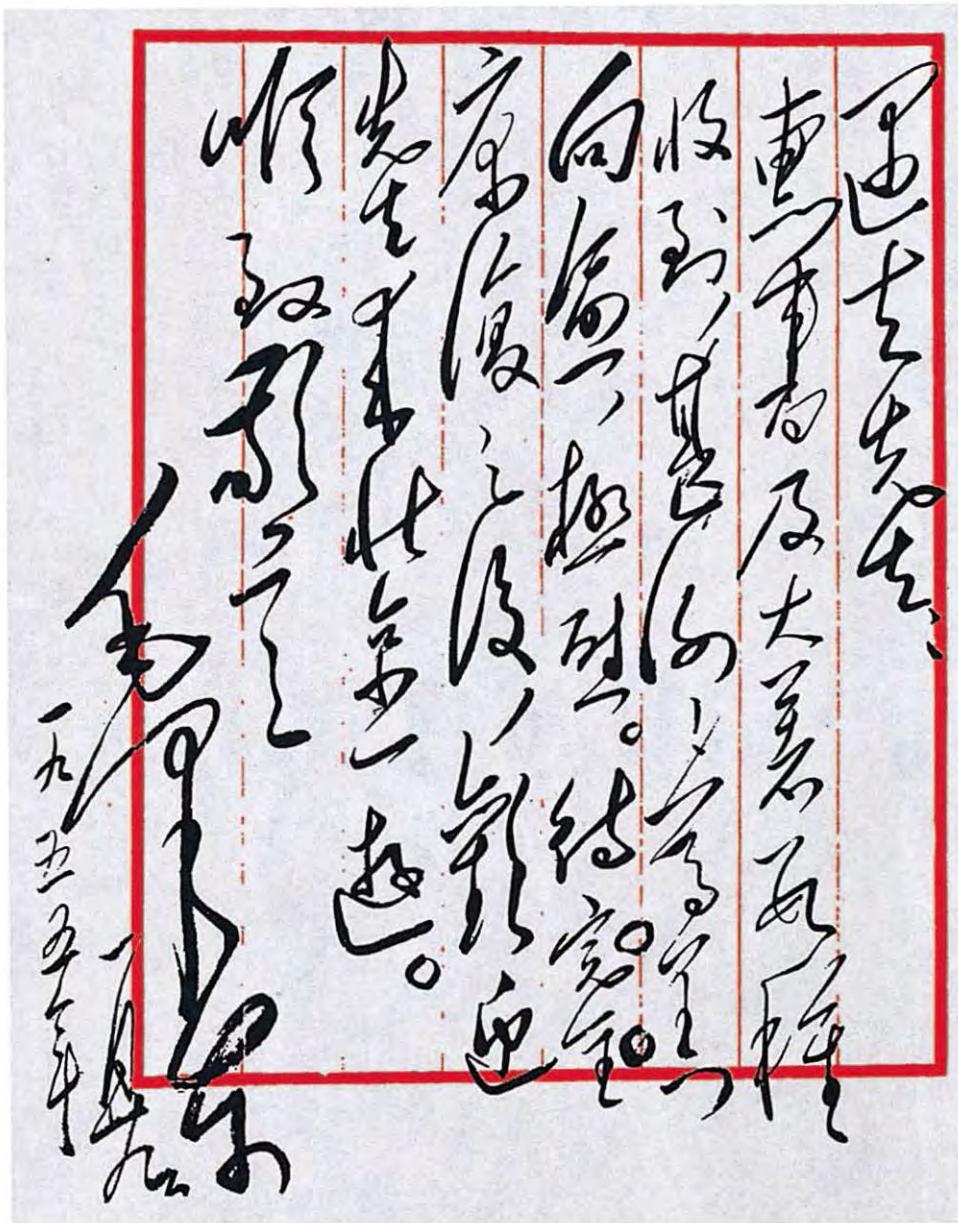
惠书及大著数种收到，甚谢！尊恙向愈，极慰。待完全康复之后，欢迎先生来北京一游。

顺致敬意

毛泽东

一九五五年一月廿九日

[1] 杨树达，字遇夫，早年在长沙任教时和毛泽东相识，后一直从事文字学教学和研究工作，当时任湖南师范学院教授。



毛泽东致杨树达信的手稿。

给章士钊^[1]的信

(1955年1月30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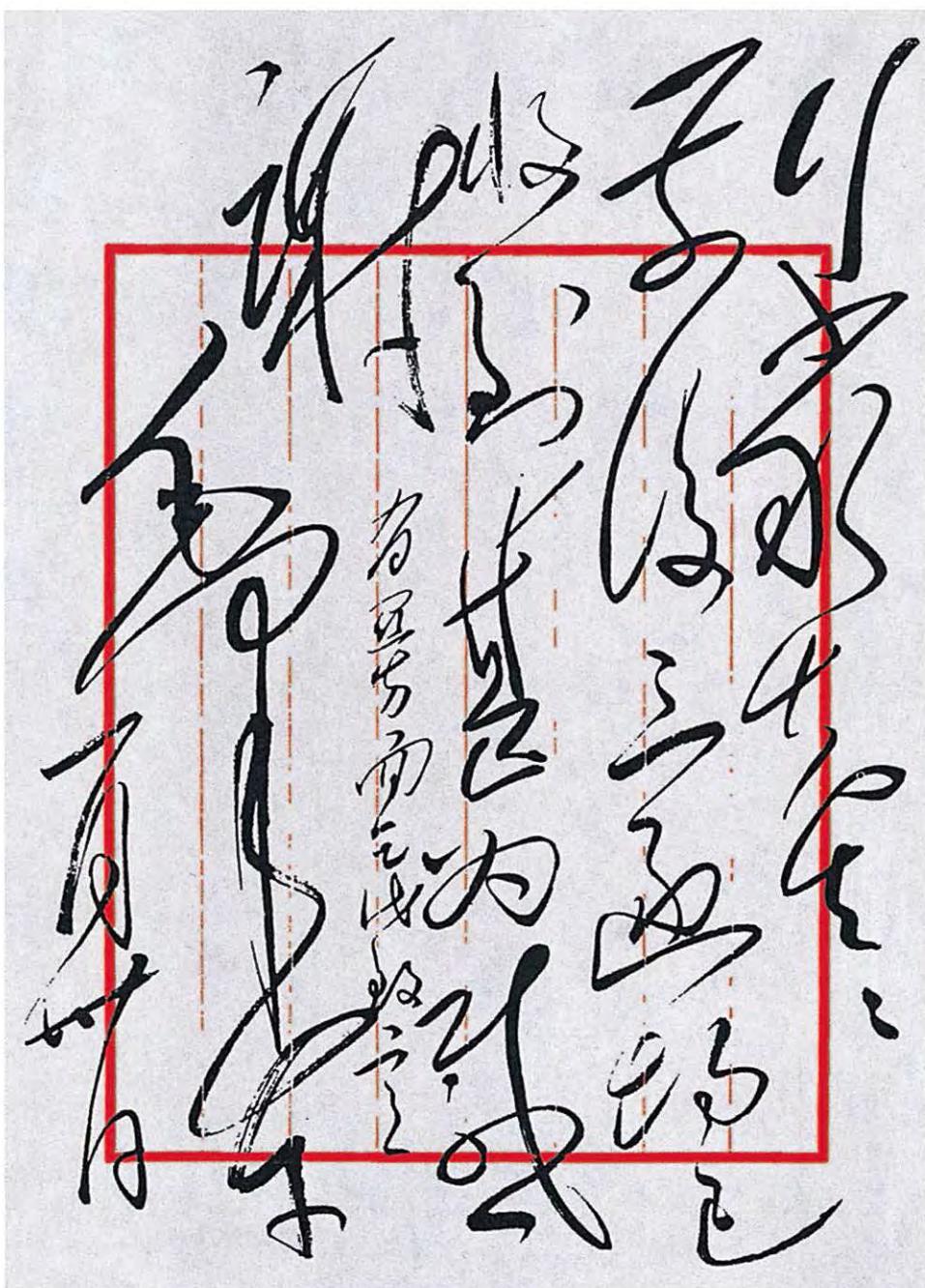
行严先生：

前后三函均已收到，甚为感谢。有关方面乞代致意。

毛泽东

一月卅日

[1] 章士钊，字行严，当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



毛泽东致章士钊信的手稿。

在金韫颖《自述》上的批语^[1]

(1955年1月)

—

周总理阅，并请考虑是否须酌予处理。

毛泽东

—

走进了人民群众，变成了一个有志气的人。

[1] 本篇是毛泽东在清朝末代皇帝爱新觉罗·溥仪的妹妹金韫颖的《自述》上的批语。其中：一写在毛泽东办公室工作人员关于《自述》的内容简介上，二写在《自述》的最后一页上。金韫颖在东北解放后曾在通化摆烟摊维持生活，1949年来北京，后参加街道工作。她写的《自述》由章士钊转送毛泽东。1955年1月章士钊在给毛泽东的信中说，“特献一满洲女子之自述册子，备公作太平广记观，为几余涤虑之助”，并请求对金韫颖“优予提振”。

关于改善法院审判作风的批语^[1]

(1955年2月1日)

少奇同志：

此件^[2]可以批发全国县以上各级党委及政府党组，并登党刊，借此引起法院——工作人员注意——改善审判作风。至于错判“放蛊”事件，不过是不良作风表现在若干案件上面而已，应使重

[1] 这个批语写在最高人民法院党组1955年1月21日关于报送湖南省人民法院对绥宁县“放蛊”案件的检查给中央的报告上。

[2] 指湖南省人民法院1954年10月28日关于绥宁县“放蛊”案件的检查报告。报告中说，在湘西绥宁、靖县、会同等边远县份，自解放前就有“放蛊”的迷信传说，其中以绥宁最为严重。所谓“放蛊”，传说是把蜈蚣、鸟烟虫、甲甲虫等有毒的昆虫烤焦碾成粉末，由“蛊婆”事先藏在指甲内，偷放在饮料和食物中，谁吃了就要中“蛊”。这个传说使绥宁一带群众深为恐惧，一些区乡干部也深信不疑。该县人民法院盲目受理了大量的所谓“放蛊”案件，在审理过程中，又只重口供，不重证据，甚至采取逼供、诱供等错误的审讯方法，乱捕乱押，结果造成大量错判。不但对被告造成冤狱，而且由于对“放蛊”案件的判处，实际上在法律上承认了“放蛊”的存在，支持了迷信传说在群众中的传播。报告说，全省各级法院应对过去判处过的“放蛊”案件全部进行检查，凡属错判应即平反，并深刻检讨错误根源，认真订出改进审判工作的具体办法。报告还建议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请卫生部门配合宣传科学的医务知识，解除对“放蛊”迷信的疑惧，以遏止“放蛊”的继续流传。

点放在改善作风。

毛泽东
二月一日

关于蒋军从大陈岛撤退时 我军不要向港口一带射击的批语^[1]

(1955年2月2日)

彭德怀^[2]同志：

在蒋军撤退时，无论有无美〔舰〕均不向港口及靠近港口一带射击，即是说，让敌人安全撤走，不要贪这点小便宜。

毛泽东

二月二日

[1] 这个批语写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司令部1955年2月1日关于海岸炮兵使用的建议给中共中央军委的请示电报上。

[2] 彭德怀，当时任中共中央军委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部长。

对陆定一^[1]关于处理保加利亚文版 《毛泽东选集》稿费问题的报告的批语

(1955年2月3日)

照办^[2]。

毛泽东

二月三日

退回为好。

[1] 陆定一，当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

[2] 陆定一1955年1月7日给中共中央秘书长邓小平并报毛泽东的报告中说：外交部转来保加利亚共产党出版社付给毛泽东的保文版《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稿费7299400元支票一张，请示如何处理。过去匈牙利出版《毛泽东选集》第一卷时，也送过稿费，外交部征询我们意见，我们认为以转送匈牙利为宜。这次保方送来《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的稿费，我们建议转送保党中央，并建议今后凡此类问题均将稿费转送各该国兄弟党。

给陈嘉庚^[1]的信

(1955年2月3日)

嘉庚先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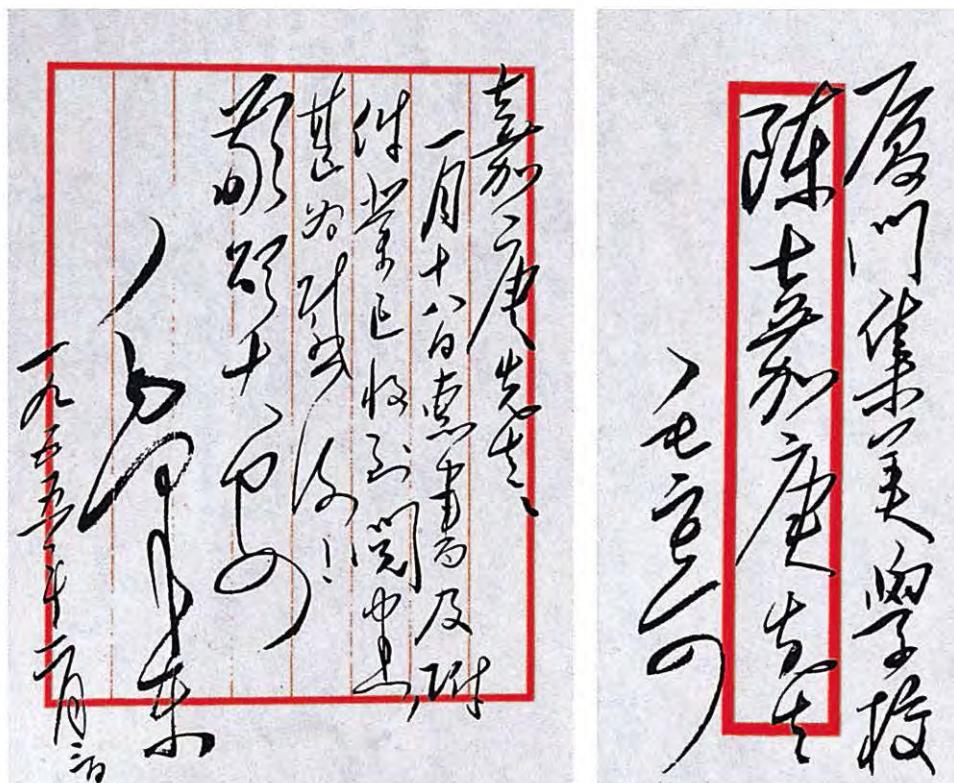
一月十八日惠书及附件业已收到阅悉，甚为感谢！

敬颂大安

毛泽东

一九五五年二月三日

[1] 陈嘉庚，当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



毛泽东致陈嘉庚信的手稿。

对周敦祥^[1]来信的批语和复信

(1955年2月3日)

—

将此信^[2]转寄湖南省委统战部，看是否能在省参事室及文史〔馆〕给以位置。

毛泽东

二月三日

—

敦祥先生：

来信收到。尊况甚表同情。已请湖南省委统一战线部酌量设法

[1] 周敦祥，五四时期曾加入毛泽东领导的新民学会，1955年4月后被安排为湖南省文史研究馆馆员。

[2] 指周敦祥1955年1月10日给毛泽东的信。信中说，1921年她曾和张国基一起到南洋办教育，1935年回国。新中国成立后因找不到正式工作，曾想到华北革命大学学习，后因华北革命大学从第四期停办，学习未成，工作不得，经济困难，个人生活也无法维持，希望毛泽东能给她介绍一个工作。

为助，未知能如愿否，你可就近接洽。如有急切困难，尚望见告。

顺祝进步

毛泽东

二月三日

对错发《华东军区首长电贺解放一江山部队》的新闻的批语^[1]

(1955年2月6日)

彭^[2]，并粟裕同志：

应召集有关人员（包括新华社）开一次会，具体规定实行军委一月十二日指示^[3]的办法，并对华东军区有所批评与指示。

毛泽东

二月六日

[1] 这个批语写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粟裕1955年2月1日给中共中央军委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部长彭德怀并报军委、中央的检讨报告上。报告说，1955年1月20日《人民日报》登载的《华东军区首长电贺解放一江山部队》的新闻，是在主管首长不在的情况下，由秘书擅自答复同意发表的，这是严重的无组织无纪律行为。同时，发布这个贺电也违反了中央军委1955年1月12日关于战报与军事新闻发布问题的指示和周恩来总理关于此类贺电和嘉奖令对外发布宜用国防部名义、对内发布宜用军委名义的指示，造成了不良影响。今后当遵照中央军委的指示，克服分散主义和官僚主义，以防止类似事件的再次发生。

[2] 彭，指彭德怀。

[3] 指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1955年1月12日关于战报与军事新闻发布问题的指示。

关于请邓小平^[1]督促进行 全党干部审查问题的批语^[2]

(1955年2月8日)

刘、周、陈、邓、彭真^[3]同志阅。

此件值得看一下。全党干部审查问题，请小平同志督促进行。

毛泽东
二月八日

[1] 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国务院副总理。

[2] 这个批语写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罗荣桓，副主任谭政、傅钟、肖华、甘泗淇1955年2月8日关于军队审查干部工作的初步情况给毛泽东、彭德怀并中央、军委的报告上。

[3] 刘，指刘少奇。周，指周恩来。陈，指陈云，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邓，指邓小平。彭真，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关于公布中国人民解放军 军官服役条例的命令^[1]

(1955年2月8日)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服役条例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于一九五五年二月八日第六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毛泽东

一九五五年二月八日

[1] 这是毛泽东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名义发布的命令。

给毛森品^[1]的信

(1955年2月10日)

森品兄：

惠书收到。

寄上人民币二百万元^[2]，以为尊恙医疗之助。为了实行你的节约主张，希望你不要来京。

顺祝进步

毛泽东

一九五五年二月十日

[1] 毛森品，毛泽东少年时期在湖南省湘乡县东山学校读书时的同学。

[2] 这里是以当时流通的人民币计算的，按中国人民银行自1955年3月1日起发行的新的人民币折算，合200元（新币1元等于旧币1万元）。

给张之江^[1]的信

(1955年2月11日)

之江委员：

惠书早已收到。本想约谈，因循未果。近日查询，知先生已返上海，只好待之将来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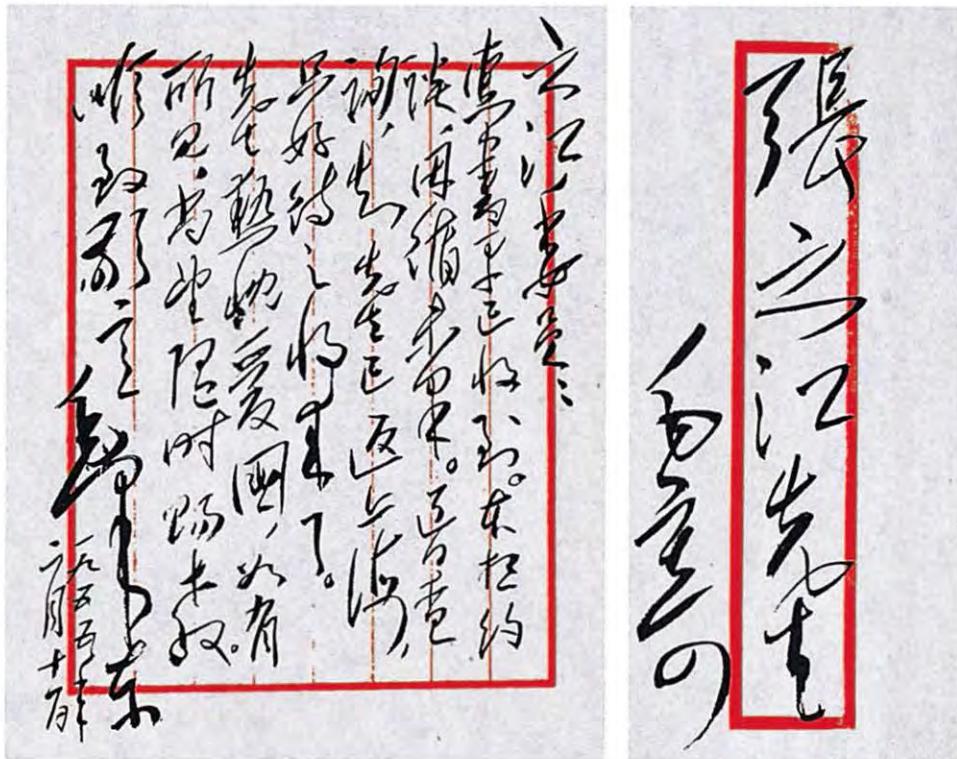
先生热忱爱国，如有所见，尚望随时赐教。

顺致敬意

毛泽东

一九五五年二月十一日

[1] 张之江，当时任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



关于公布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 在中国人民革命战争时期有功人员的 勋章奖章条例的命令^[1]

(1955年2月12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中国人民革命战争时期有功人员的勋章奖章条例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于一九五五年二月十二日第七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毛泽东

一九五五年二月十二日

[1] 这是毛泽东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名义发布的命令。

毛泽东等祝贺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 签订五周年的电报

(1955年2月12日)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克·叶·伏罗希洛夫同志，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部长会议主席尼·亚·布尔加宁同志，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兼外交部长

维·米·莫洛托夫同志：

值此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五周年之际，我们代表中国人民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谨向你们、并通过你们向伟大的苏联人民和苏联政府表示热烈的祝贺。

五年来，中苏两国间政治、经济、文化的全面合作有了广阔的发展，苏联政府和苏联人民给了我们正在从事社会主义建设的中国人民以全面的、系统的和无微不至的援助。苏联政府先后帮助中国新建和扩建共达一百五十六项的巨大工业企业，派遣大批优秀专家帮助中国建设，几次给予中国优惠贷款，将中苏共同管理的中国长春铁路和苏联机关于一九四五年在中国东北境内由日本所有者手中所获得的财产无偿地移交中国，将中苏合营企业的苏联股份出售给中国，并决定把中苏共同使用的旅顺口海军根据地和该地区的设备交由中国完全支配，最近，又建议在促进原子能和平用途的研究方

面给予中国以科学、技术和工业上的帮助。这种友好的合作和真诚的援助，极大地推进了我国建设事业的发展，并向全世界显示了这种新型国际关系的伟大生命力。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中国人民深切地感到这种兄弟友谊的无上珍贵，我们谨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苏联政府和苏联人民的伟大援助表示衷心的感谢。

中苏两国友好同盟的巩固和发展，对保证我们两国的安全和维护远东和世界的和平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中苏两国的和平政策，推动并促成了朝鲜的停战和印度支那和平的恢复，使国际紧张局势有了一定的缓和，鼓舞了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中国人民热烈地支持苏联为建立欧洲集体安全体系、反对武装西德而进行的斗争。中苏两国愿同日本建立正常关系，并积极支持日本人民走上独立发展和国际合作的道路。中苏两国的真诚合作不仅符合于中苏两国人民的利益，同时也符合于亚洲、欧洲和世界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它是维护远东和世界和平的可靠保证。

美国侵略集团和它的追随者正在到处推行战争政策，制造国际紧张局势。目前美国在台湾地区对中国的侵略行为和战争挑衅，这是对中国安全的严重威胁。它引起全世界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的正义谴责。中国人民解放自己领土台湾的斗争是正义的。正义的事业是任何力量也阻止不了的。中苏两国的友好同盟，在新的国际紧张局势下，在反对侵略、保卫和平的事业中必将日益发挥它的重大作用。

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是一个伟大的和平条约，是中苏两国间伟大友谊的标志。五年来的事实证明了这个条约在促进世界和平和人类进步方面的伟大作用，今后的生活和实践将更加显示出这个条约的巨大力量和无限光辉。

为了中苏两国人民的共同繁荣，为了远东和世界和平的巩固，
愿中苏两国间的伟大友谊日益发展。

中苏两国人民永恒的、牢不可破的友谊万岁！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毛泽东

中华人民共和国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委员长 刘少奇

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 周恩来

一九五五年二月十二日于北京

在苏联驻华大使馆为庆祝中苏友好 同盟互助条约签订五周年 举行的宴会上的讲话

(1955年2月14日)

我庆祝中苏两国的伟大的合作。

这种合作是为了发展社会主义事业的合作，是为了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计划的合作，是为了国际和平的合作。我相信，这种合作还会进一步加强。

在我们中苏两个伟大的国家的合作之下，我相信，帝国主义的侵略计划是要被粉碎的。

我们大家可以看到，在我们中苏两国的伟大合作下，一切帝国主义的侵略计划，没有不能被粉碎的。它们一定要被彻底粉碎。只要帝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我们和全世界人民就一定要将它们从地球上消灭干净！

为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同志的身体健康干杯！



1955年，毛泽东观看莫斯科“小白桦树”舞蹈团演出后会见演员。

关于第一个五年计划纲要给刘少奇等的信

(1955年2月20日)

刘、周、陈、邓、彭真^[1]同志：

五年计划纲要第二稿，我已看过一遍，有些意见，已告陈伯达^[2]同志。请你们即于日内分别找伯达谈一次，将你们看过后的意见告诉他，或将你们修改的本子交给他，连同其他同志的意见，由他汇集起来，加以修改，加上地方计划一章，于本月底或下月初印出第三稿。那时我们可以看第三遍，可于三月十日左右印第四稿，即可作为基本定论。

明后天我开始看高饶问题文件^[3]，看完再集谈一下。

毛泽东

二月二十日

[1] 刘，指刘少奇。周，指周恩来。陈，指陈云，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邓，指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国务院副总理。彭真，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2] 陈伯达，当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毛泽东的秘书。

[3] 指准备在1955年3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通过的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决议和关于高饶反党联盟的报告等文件。

毛泽东等祝贺苏联军队 建军三十七周年的电报

(1955年2月21日)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克·叶·伏罗希洛夫同志，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部长会议主席尼·亚·布尔加宁同志，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兼外交部长维·米·莫洛托夫同志：

值此苏联军队建军三十七周年之际，请接受我们的热烈祝贺。

光荣的苏联军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曾以无敌的威力摧毁了法西斯势力，保卫了欧洲和世界文明，对人类进步的事业作出了无可估量的贡献。现在，正当帝国主义战争集团加紧制造国际紧张局势、准备原子战争、进行战争挑衅、严重地威胁世界和平的时候，强大的和久经考验的苏联军队乃是保卫世界和平的不可战胜的力量。

根据中苏协定驻守旅顺口海军根据地的苏联军队，五年来，在维护远东和世界的和平和安全的事业中，起了重大的作用，对中国人民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给了有力的支援。现在，当他们根据一九五四年十月中苏联合公报即将撤离旅顺口海军根据地的时候，我们谨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人民向苏联政府和伟大的苏联人民及其军队，致衷心的感谢。

祝苏联军队在加强自己祖国的国防力量和维护世界和平和安全的事业中获得更光辉的成就。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毛泽东
中华人民共和国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委员长 刘少奇
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 周恩来
一九五五年二月二十一日于北京

对邓小平^[1]关于高岗、饶漱石 反党联盟的报告稿的批语和修改^[2]

(1955年2月、3月)

—

刘、陈、彭真^[3]、小平阅后，交恩来同志：

高、饶联盟文件已看了一遍，全文可用，作了一些修改，主要是从第九页起括掉了两段^[4]，因为我觉得这个问题不宜这样地在这里辩论，括掉后似乎要好一些，请你们斟酌。刘、陈、彭、邓各同

[1] 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

[2] 本篇收入毛泽东对邓小平准备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作的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报告稿的三个批语，其中：一写在中共中央办公厅机要室1955年1月22日印发的《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问题的报告》（三次稿）上；三写在3月10日印发的《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报告》第三次修正稿上；四写在3月19日印发的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文件之一《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报告》上；二是毛泽东在1月22日印发的《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问题的报告》（三次稿）上加写的一段话。

[3] 刘，指刘少奇。陈，指陈云，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彭真，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

[4] 毛泽东删掉的报告稿中的两段话，主要是批驳高岗捏造事实，制造谣言，攻击某些中央领导同志等问题的。

志的修改意见，请于日内即交恩来，以便明日或后日谈一下。

毛泽东

二月廿一日

—

我们党内曾经出现过陈独秀、张国焘等著名的大叛徒，他们都是阶级敌人在我们党内的代理人，我们曾经进行严肃的斗争驱逐了这些叛徒。有些同志觉得高饶反党联盟是难以理解的现象，这是不了解党的历史、阶级斗争的历史和现状的原故。

三

即送胡乔木^[1]同志：

此件你阅后请送恩来同志阅，最好能于今天或明天在政治局会议上通过，今晚或明晚即印发党代表会议参加者。

毛泽东

三月十二日

[1] 胡乔木，当时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毛泽东的秘书。

四

退邓小平同志：

在第二页，第十一页，第二十二页，第二十九页，第三十页上有点修改^[1]。

毛泽东

三月廿二日

[1] 毛泽东对1955年3月19日印发的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文件之一《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报告》所作的主要是文字上的修改，其中：在第2页上，毛泽东将原报告中“我们的党已经成为执政党”一句，改为“我们的党已经成为在全国范围内执政的党”；在第11页、第30页上，将原报告两处说的“高岗、饶漱石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野心家”，删去了其中的“个人主义”四个字。在第22页上，将原报告中“饶漱石的右倾投降主义思想，对山东省的工作造成了特别严重的危害”一句，删去了其中的“特别”二字，并在旁边批道：“这里不要‘特别’二字，因为饶对上海的危害也许比山东还大些。”在第29页上，将原报告的第五项中“中央政治局认为”一句，改为“中央委员会认为”。

和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1]的谈话

(1955年2月23日)

毛泽东（以下简称毛）：庆祝你们这个民族的节日。你们在北京过藏历年^[2]，我们很高兴，全国人民都高兴。我们汉人也有两个年，一个是阴历年，这是历史上很长时间内保留下来的习惯，到现在绝大多数人还都过阴历年。另外一个是阳历年。

达赖喇嘛（以下简称达赖）：我们今年在内地过了三个年。

班禅额尔德尼（以下简称班禅）：我们已经去东北参观了，我不久将要去华东参观。在东北参观中，看到了许多重工业的建设，感到我们的社会主义工业化会很快地建设成，感到无限的高兴。

毛：我们的国家是一个落后的国家，工业很不发达，有许多机器我们自己还不能制造，我们没有大量的钢。但这不要紧，我们可以建设，再过五十年，我们就可以建成一个像样子的国家。我们的国家过去是常受人欺侮的国家，欺侮我们最可恶的是美帝国主义。我们的国家本来是地大物博，人口众多，自然条件及气候也好，只是过去由一些坏人在这里领导，政治上不好，因而各方面比一般的先进的国家落后一百多年。

[1] 达赖喇嘛，即达赖喇嘛·丹增嘉措，当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班禅额尔德尼，即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当时任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

[2] 1955年2月23日，是藏历木羊年的新年。

在我们的国家里，许多地方还很落后，西藏也是落后的，这是应该承认的。我们承认落后是有好处的，我们可以向先进的国家学习，向苏联学习。这样，我们向先进的民族和国家学习，在我们内部各民族互相学习，亲密团结，共同建设，那末我们各民族都有希望，全国都有希望。

达赖：我们到每个地方参观的时间虽然很短，但由于是亲兄弟般的关系，所以在很短的时间内相处都很融洽。

正如主席指示的，我们西藏各方面的条件都很落后。但我们可以向主席保证，在您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我们一定做好西藏的各项工作，不断地提高。

毛：落后不要紧，在汉人地区也有许多落后的地区，和西藏一样，将来都要搞好。

班禅：过去由于国民党反动派和帝国主义的压迫，西藏是很落后的，但是我们在毛主席的领导下，有信心团结西藏人民，发展西藏的各项建设事业，使它进步。

毛：我有信心。在你们两人的领导下，西藏的事情一定会做好，但不要急，慢慢地来，做事情要取得大多数的同意。固然在三五年之后，做好事还会有人反对，但反对者不是老百姓，而是贵族、官员、头人和寺院的堪布^[1]等。你们应该像老师一样地去教育他们，要耐心地团结他们。

你们根本不前进，我们是不赞成的。我们欢迎你们进步，但是你们应该根据实际情况，和大家团结一致地搞工作，不能因在内地看到了一些建设发展情况而着急。过去有些共产党员去苏联参观，

[1] 堪布，藏传佛教寺庙中教职名称。

看了苏联的先进情况，回来后也有些急，想一下办很多好事，但条件不成熟，好事办成了坏事。

做事情应广泛地和大家商量。比如藏钞问题^[1]，起初噶厦^[2]不同意，你们向他们解释，征求他们的意见，这样做很好，你们很会办事。我们在中央办事也经常征求地方政府的意见，和你们商量，请你们放心，我们不会强迫你们办任何事情。

[1] 西藏和平解放后，藏钞与人民币币制不统一带来的一些问题，妨碍了西藏经济的发展。中央有关部门和西藏工委同西藏地方政府协商，停止印发和逐渐收回藏钞。1955年1月，达赖喇嘛和阿沛·阿旺晋美提出，请中央财政提供400万银元交西藏政府兑换收回藏钞，同时请中央财政每年提供70万银元补助西藏地方财政赤字，在西藏地区逐渐过渡到单一使用人民币，得到了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的同意。1959年西藏叛乱平息后，藏钞由中国人民银行西藏分行进行收兑，完全停止了流通。

[2] 噶厦，当时西藏地方政府的最高行政机构。

在达赖、班禅^[1]为庆祝藏历木羊年新年 举行的宴会上的祝酒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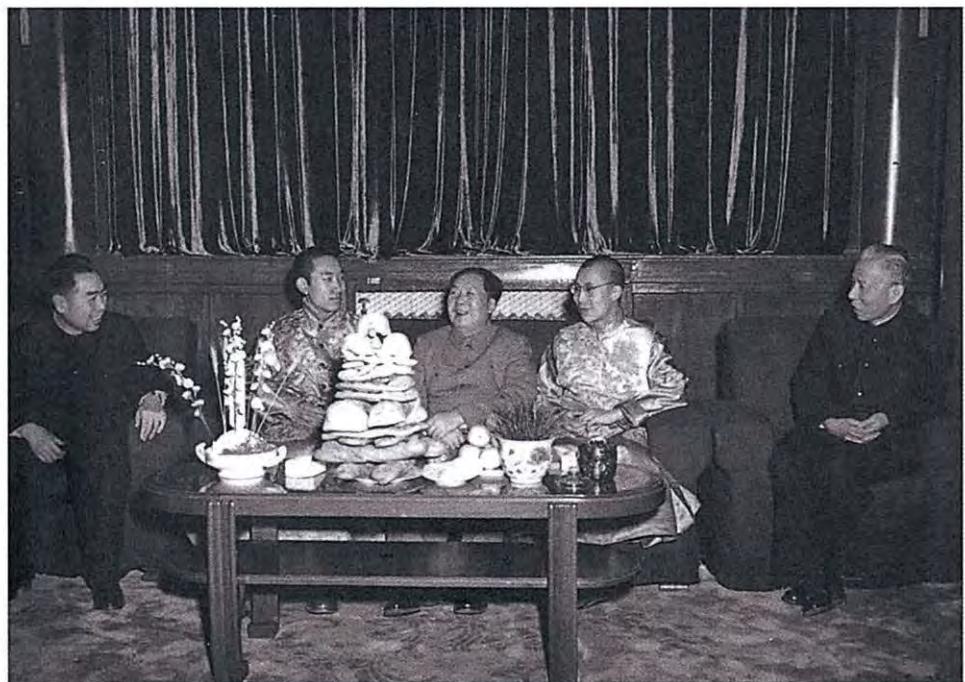
(1955年2月24日)

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各位先生、各位同志：

当着藏族新年的时候，让我们向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祝贺，向西藏全体在京人员祝贺，向西藏和其他地区的全体藏族人民祝贺！我们大家应当努力，进一步加强和巩固我国各民族间的团结，进一步加强和巩固汉、藏民族间以及藏族内部的团结，共同建设我们伟大的祖国。

让我们为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的健康，为西藏全体在京僧俗人员的健康，为我国民族的大团结而干杯！

[1] 达赖，即达赖喇嘛·丹增嘉措，当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班禅，即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当时任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



1955年2月24日，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出席庆祝藏历木羊年新年宴会。图为宴会前毛泽东和达赖喇嘛·丹增嘉措、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在一起交谈。

关于注意处理群众自愿入社问题 给林铁^[1]的信

(1955年3月5日)

林铁同志：

此事^[2]请你予以处理。这是我的卫士回他的家乡安平县从那里带回的一封信。这种情况恐怕不止安平县一个乡里有，很值得注意。

毛泽东
三月五日

[1] 林铁，当时任中共河北省委第一书记、河北省省长。

[2] 指毛泽东的卫士带回的一封群众来信中反映的河北省安平县一个村在实现农业合作化过程中，简单化地用“跟共产党走，还是跟老蒋走”一类的大帽子压群众入社，造成农民生产积极性下降的问题。

不能承认“两个中国”^[1]

(1955年3月5日)

尼·谢赫鲁晓夫同志：

您经由尤金^[2]同志转来的电报，已于二月二十八日收到了。

我们同意苏共中央的意见，即现在就台湾和其他中国岛屿地区的局势问题更详尽地交换意见，并共同确定一个大致的行动计划，是适时的。我们也同意您来电中提出的关于实施解放台湾任务的基本方针。

目前在中国沿海岛屿地区的军事情况是：蒋介石军队已经从中国浙江省沿海各岛屿全部撤退，留下的尚有福建省的马祖和金门诸岛共十三个岛屿。在马祖诸岛上，现有蒋介石军队四千人，在金门诸岛上，有五万一千人，连其他小岛在内，总共约有六万余人。

为了有把握地进行解放马祖和金门诸岛的军事行动，我们正在积极修建福建省的军用公路和机场。这些准备工作，大致需要半年至一年才能完成。从江西省鹰潭连接到福建省厦门的铁路约需要三年到四年工夫才能修通。

我们认为，即使夺取马祖和金门的准备工作做好，是否就发起军事行动，也还要看当时美国军队在沿海岛屿地区的具体情况再

[1] 这是毛泽东写给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的复信。

[2] 尤金，当时任苏联驻中国大使。

定。马祖方面敌人兵力小，防御力量弱，金门方面敌人兵力稍多，但逼近大陆。目前在台湾海峡靠近沿海岛屿地区，美国想长期维持一个包括数艘航空母舰的庞大舰队是很困难的。美国又很难以自己的地面部队代替蒋介石军队防守马祖和金门。

从这种军事形势看来，在中国沿海岛屿地区保持紧张的局面，对敌人不利，而对我们有利，因为敌人不知道我们将在何时何地打击他们，较大的主动操在我们手里。如果沿海岛屿被我们以军事行动夺回，或者敌人主动撤走，或者经过国际谈判撤走，这当然对我们是有利的。但在我们面前将是台湾海峡，我们自己知道，在美国军事力量留在那里的时候，我们是不会发动解放台湾和澎湖列岛的军事行动的。这样，在沿海岛屿问题解决以后，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将自然地和缓下来，关于台湾问题，也就很难谈判出什么结果了。正是因为我们目前尚未发起解放马祖和金门的军事行动，而台湾和沿海岛屿地区的局势一直在紧张，这才使得美国特别急于要英国替它试探，看看有无如艾登^[1]所说的“和平解决”的可能。

艾登二月二十八日来信的重点，是问我们是否愿意“私下地或公开地声明”，“不准备用武力来达到”我们的要求。艾登想以我们的保证交换蒋介石军队自沿海岛屿撤退。

当我们在三月一日回信中阐明立场后，艾登觉得双方之间还没有进行讨论的共同基础。于是，艾登决定不来北京会晤。但是，紧张局势将会继续下去。我们估计，英国仍然会对此事继续进行活动的。

美国想要我们答应不以武力解放台湾和沿海岛屿，来交换沿海

[1] 艾登，当时任英国首相。

岛屿的撤退，从而在事实上承认美国对台湾的霸占，并在事实上造成“两个中国”的形势。

印度不承认“两个中国”，认为台湾主权属于中国，蒋介石军队应从沿海岛屿撤退，台湾和澎湖列岛问题经过谈判寻求和平解决的途径。

英国摇摆于美国同印度之间，但基本上靠近美国。

根据上述分析，我们觉得，利用印度压英国使美国让步，较之英国和美国企图把对台湾问题的解决控制在它们自己手里要对我们有利些。

我们设想，在亚非会议期间，我们将有可能同印度、缅甸、印度尼西亚做更多的接触，利用同这三国主要是印度的接触和会谈去创造解决台湾地区局势问题的机会，也许对我们有利。这样做法，当然并不排斥同英国接触，特别是苏联同英国的接触，而主要是使解决沿海岛屿的问题同苏联政府建议举行的十国会议联系起来。我们认为，为了促成十国会议，需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多方面地进行外交活动。

解放台湾应该分两个步骤：第一步是解放沿海岛屿，第二步（可能需要很长的时间）是解放台湾本岛。解放台湾是中国的内政，因为美国武装干涉中国解放台湾，造成台湾地区的危险局势，所以才需要同美国进行谈判，要求它放弃干涉和撤离台湾和台湾海峡。

我们认为迫使美蒋势力从马祖金门等沿海岛屿撤退，对我们将是一项很大的胜利。利用美蒋感到威胁而经过国际会议首先取得这些岛屿，也许是可能的。

这种国际会议除了坚决不能让蒋介石参加外，最好不要同联合国有任何联系，如果在外交谈判发展到某个阶段，苏联很难避免同

印度、英国一起接受联合国的委托，进行斡旋，也要使联合国仅仅委托调解，此外不再过问，尤其是不要给联合国以过问台湾问题的任何机会。

此外，因为我们在国际会议以前和在国际会议上坚决不能同意美、英国人用沿海岛屿交换台湾澎湖造成“两个中国”的要求，这种情况可能使国际会议要经过许多曲折才能开成，而这一点我们是不能让步的。即是说，我们宁可让美国人在一个时期内事实上占领台湾而不去进攻台湾，但不能承认美国的占领合法化，不能放弃解放台湾的口号，不能承认“两个中国”。如果美国人满足这种状态，也许它愿意让出沿海岛屿，以换得一个不合法的暂时的安定状态。

谨致

共产主义的敬礼！

毛泽东

一九五五年三月五日

给周敦祜^[1]的信

(1955年3月6日)

敦祜同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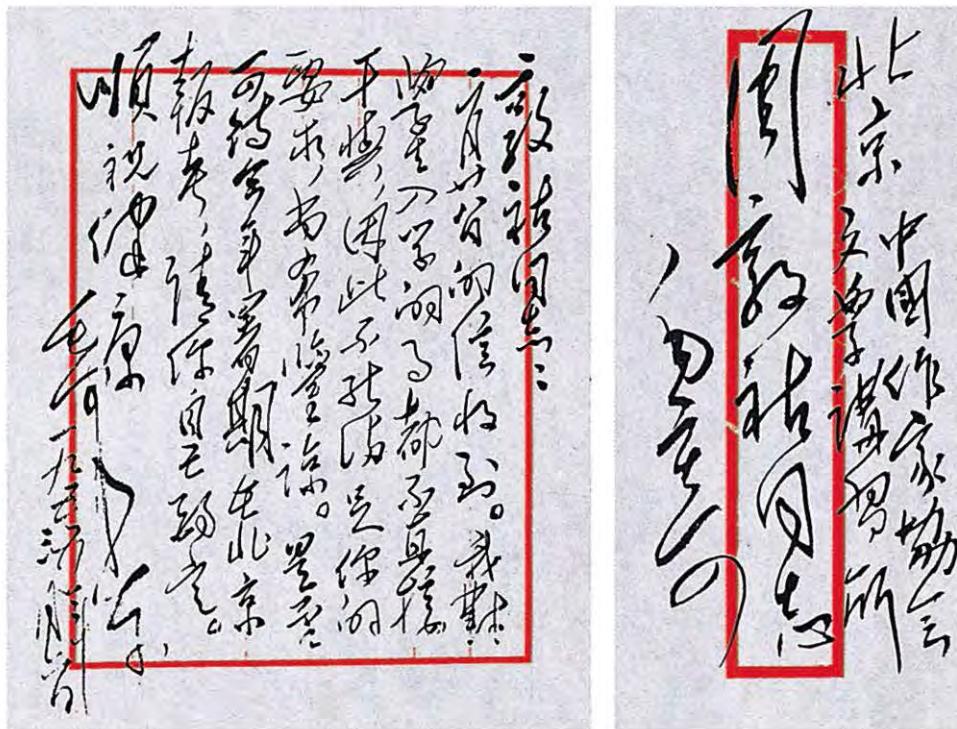
二月廿八日的信收到。我对学生入学的事都不直接干涉，因此不能满足你的要求，尚希鉴谅。是否可待今年暑期在北京报考，请你自己酌定。

顺祝健康

毛泽东

一九五五年三月六日

[1] 周敦祜，早年在长沙读书时和毛泽东相识，当时在中国作家协会文学讲习所工作。



毛泽东致周敦颐信的手稿。

和达赖喇嘛^[1]的谈话

(1955年3月8日)

毛泽东（以下简称毛）：你就要走了，今天我来看看你。你们走的事情都办好了吗？还有些什么需要我帮你解决的问题吗？

达赖喇嘛（以下简称达赖）：我们准备在十二日由这里出发，去西北各地参观后就回去。现在走的准备工作已经做好了，再没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如果临时还有什么需要，我一定提出来。

毛：我们要向先进的国家和民族学习，学习对本民族有用的东西，但不是所有的方面都要学别的民族，而要保持本民族的特点。比如，我们中国的文工团到外国去演戏，演我们民族的戏剧、歌舞，大受别国人民的欢迎；如果我们全学外国的戏剧等在外国演出，人家是不欢迎的。一个民族能在世界上在很长的时间内保存下来，是有理由的，就是因为有其长处及特点。

我们的国家是很落后的，落后于先进的国家约一百多年。帝国主义常欺侮我们，就是因为我们没有大量的钢，没有大量的机器，自己还只能造很少的汽车，飞机也只能造一两架教练机。但是经过三个五年计划之后，我们就能在工业方面打下一个底子。

听说你去东北参观后，对苏联帮助我们的工业建设很满意，是

[1] 达赖喇嘛，即达赖喇嘛·丹增嘉措，当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这样吗？

达赖：过去我只听说苏联给我们的国家许多无私的援助，但实际上怎样，没有见到，只能凭想像。这次亲眼看到了苏联对我们的真正无私的帮助，想去苏联大使馆致谢。

毛：我听到这一点之后，感到你的眼光大，不光是看到西藏，而且看到全国的事。全国有好事你就喜欢，这就是说在你的思想上不光是想着西藏。你很有希望，比我年轻。我们要将全中国都搞好，再把眼光放大，要把全世界都搞好。佛教的教义也有这个思想。佛教的创始人释迦牟尼^[1]是代表当时在印度受压迫的人讲话的。他主张普渡众生，为了免除众生的痛苦，他不当王子，创立了佛教。因此，你们信佛教的人和我们共产党人合作，在为众生（即人民群众）解除受压迫的痛苦这一点上是有共同之处的。当然有许多不同之点。

在内地有一个观音菩萨，人们将她的像塑得很美丽、庄严、慈祥，人们对她十分信仰，认为她是大慈大悲、救苦救难的神。西藏也有观音菩萨吗？

达赖：西藏有观音度母，塑像也很美丽、慈祥，像一个十五六岁的少女。

毛：关于那天你所提的把在西藏工作的汉族干部当成自己的干部的观点是对的。在西藏工作的汉族干部是去帮忙的，不是代替的。实行区域自治是真正的自治，主要是依靠西藏自己的干部。但为了取得汉民族的帮助，我们可以向自治区内派少数的汉族干部去全心全意地帮忙。我们曾对派去西藏工作的汉族干部强调说，要全

[1] 释迦牟尼（约公元前565—前486），佛教创始人。原为古印度北部迦毗罗卫国的王子。

心全意地去帮忙，为了帮忙，性命也可以放弃，要把忙帮好，不准帮坏。但在这一点有些人的思想上还不通，不愿在那里工作，天天喊叫要回来，这还是为汉族打算，而没有为藏族打算，给东西时也设法少给一些等等，都是为汉族打算。有些人主观主义严重，很急躁，觉得别人落后，看不惯人家，实际上他们忘了自己也落后过。现在汉族较进步一些，也是从落后过来的。但是两千年之后的人看我们，那我们又很落后，就像我们现在看孔夫子^[1]十分落后是一样的。孔夫子没有见过汽车、飞机，当然更不会开汽车和飞机，也不会开人民代表大会。可是我们就进步了，我们现在能坐汽车和飞机，也会开人民代表大会。社会总是不断进步的。

你们这次解决了许多具体问题，很好。你感到怎么样？

达赖：我们在这里的人都很满意。但是噶厦^[2]由于对情况了解得不清楚，还有些怀疑。

毛：很好，你们回去后应该将情况向他们讲清楚。将来的自治区成立时，他们还会有一些怀疑，主要是怕对他们的利益有损害。

两个司曹^[3]现在怎样？在筹委会^[4]中能不能将他们放进去，或者将来在全国政协委员会安排一个位置。开会时他们愿来，我们欢

[1] 孔夫子，即孔子（公元前551—前479），名丘，字仲尼，陬邑（今山东曲阜）人，春秋末期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儒家的创始人。

[2] 噶厦，当时西藏地方政府的最高行政机构。

[3] 两个司曹，指因支持、策划非法“人民会议”的活动于1952年4月被撤销代理司伦职务的鲁康娃·泽旺饶登和本珠仓·洛桑扎西。

[4] 筹委会，指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1955年3月9日国务院第七次全体会议通过《关于成立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的决定》，确定达赖喇嘛·丹增嘉措任主任委员，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张国华分别任第一、第二副主任委员，阿沛·阿旺晋美任秘书长。

迎，不愿来就算了。总之，我们不能忘记他们。

今天因为你快要走了，我来看看你，最后还有一句话告诉你：凡是派去西藏工作的汉族干部，有和你们搞不来的、团结不好的，你告诉我，我们就调回来。

达赖：主席突然到这里来，我像是在做梦。经过和主席的几次见面谈话，我的内心起了极大的变化。我回去之后，一定把这些指示变成实际行动，有什么事一定向主席直接报告，同时也请主席给我各方面的指示。回去后有张国华^[1]等人在那里工作，我一定打开以往应付的局面，真诚地互相帮助，共同努力工作。

毛：我们对西藏民族寄予的希望很大，将来会对我们有很大的帮助。这点要说清楚，民族之间的帮助是互相帮助。西藏民族在政治上给我们的帮助很大，民族团结搞好了事情就好办。这次你们来到北京和去各地参观，汉族人民对你们很重视，在招待、欢迎各方面都表现了我们是团结得很好的。比如拿国防来说，西藏对我们的帮助也是很大的。将来在经济上西藏也会对我们有很大的帮助。你们那里过去是一片大海，这是几千万年以前的事。现在我们用的石油是由几千万年以前海洋或湖泊里动物死后在地下慢慢变化来的，因此，在你们那里可能有大量的石油，同时还有各种矿产，将来开采后对国家建设很有用。

[1] 张国华，当时任中共西藏工委第一副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西藏军区司令员。

和班禅额尔德尼^[1]的谈话

(1955年3月9日)

毛泽东（以下简称毛）：你身体好吧？听说你以前身体不太好，现在怎么样？

班禅额尔德尼（以下简称班禅）：现在完全好了。

毛：你这次准备到上海参观吗？

班禅：这次本来计划到上海、杭州去，奉主席指示现在还要到广州去参观。

毛：很好。你们到广州去，一定要到虎门^[2]去参观，这个地方很有历史意义。你们问他们，他们会给你们介绍的。

班禅：今天主席特别到这里来，对我们很关心，我们特别感谢。

毛：你们要走了，我来看看你。

班禅：我们过去几十年没有回到西藏去，这一次能够回到西藏主要是由于毛主席的领导。

毛：这不是我个人，这是由于共产党的领导，解放军的帮助，

[1] 班禅额尔德尼，即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当时任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

[2] 虎门，位于广东省南部，珠江主要出海口之一。清道光年间，林则徐曾在虎门销毁英商向中国贩运的鸦片，并率领中国军民抗击英国侵略军。这里留有销烟池、炮台等遗迹。

同时也是由于你们自己的努力，西藏人民的欢迎而来的。

事情要慢慢地来，拉萨政府和你们中间有些问题，不是这次都解决了吗？

班禅：我回到西藏后，达赖喇嘛^[1]也很关心我，虽然我们相互之间有些问题，但是这次在首都，都获得解决了。

毛：你们的任务很大，你们要拥护他们，他们也就拥护你们，这样团结就会搞好的。

班禅：是的，我们一定要根据主席的指示，这样去做。

毛：你们过去有点不放心，怕我们光要前藏不要你们。

你们的政策搞对了，你们能主动地拥护他们，主动地让步，能让达赖喇嘛当主任，你当副主任^[2]，计晋美^[3]能主动提议让阿沛当秘书长^[4]，这是很好的，比我们共产党来提出要好得多。这样今后的事情就好办了。拉萨有好多官员，也有好多寺庙，其中有许多人，对一些问题不一定都同意达赖喇嘛的意见，因此你们办事，要照顾到他们的困难，慢慢地来，不要急，一切事情，慢慢地搞通再办是有好处的。你们怕拉萨，西藏人怕汉人，总是小的怕大的，这个不奇怪。由于过去汉人的反动统治阶级统治你们压迫你们，造成了不好的影响，所以产生了对汉人害怕，印象不好。因此，我们今后必

[1] 达赖喇嘛，即达赖喇嘛·丹增嘉措，当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2] 1955年3月9日国务院第七次全体会议通过《关于成立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的决定》，确定达赖喇嘛·丹增嘉措任主任委员，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张国华分别任第一、第二副主任委员，阿沛·阿旺晋美任秘书长。

[3] 计晋美，即詹东·计晋美，当时任班禅堪布会议厅委员会主任委员。

[4] 阿沛，即阿沛·阿旺晋美，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西藏军区副司令员、西藏地方政府噶伦、昌都地区人民解放委员会副主任。

须很好地多办些好事，才能使西藏人民慢慢相信汉人是帮助他们的，不是搞他们的。过去我同张经武、范明^[1]都谈过，要他们对我们的干部讲，我们进藏是诚心诚意帮助的，不是代替的，而且帮助还要帮助得好，不能让人家不舒服。同时我也对他们讲，要以这两条来考验我们的干部。虽然这样，但是你们也应该对他们进行帮助，随时提出意见，不对的要改正，如果不改正，你们可以提出意见，把他们调回来。

不能只说汉人帮少数民族的忙，少数民族同样是帮助汉人的。西藏有这样大的一块地方，又有很多资源，西藏民族和汉族很好地团结和互相帮助，所以你们受到祖国各方面的欢迎。我们人民解放军进了西藏，给西藏人民做的事情还不多，修通了两条公路^[2]，办了两个小学^[3]，给藏民打了一些防疫针，但也给你们带来了三个问题，物价上涨，牦牛在运输中有死亡，一个时期采购不等价。

班禅：过去虽然有点问题，物价上受点影响，但是对我们的帮助是很大的，例如开办人民医院，发放各种贷款。就是从运输上来说，既给脚价，牦牛死了又给赔偿。尤其在经济上，我们西藏主要产羊毛，过去从牧区运到农区，农区运到印度，不但得不到合理价格，反而遭受哄骗或卖不出去，但自解放后，中央以高价进行收购。以上这些，对我们的帮助是非常大的。

毛：这些帮助只能说是才开始，不过今后会逐年扩大起来的。西藏地方蕴藏有很多物资，就从经济上来说，也不单是汉人帮助西

[1] 张经武，当时任中共西藏工委书记、中央人民政府驻西藏代表。范明，1914年生，陕西临潼人，当时任中共西藏工委副书记。

[2] 指康藏公路和青藏公路。

[3] 指拉萨小学和日喀则小学。

藏的，是互相帮助的。

班禅：西藏解放几年来，国家对我们帮助确实是很大的。

毛：应该帮助。你们发展了对国家有好处。比如新疆有稀有金属，内蒙古有森林、铁矿等，对国家都是有好处的。有些矿产在我们汉人地区没有的，但是在你们少数民族地区有。

班禅：我们西藏听说也有铁矿和其他矿产，有些地方没有人居住，还是很大的荒地，现在唐古拉山附近已经发现了煤矿，将来还会发现许多矿产。

毛：你们很有希望，应该有信心。

班禅：对西藏的建设，我们是有信心的。今天在国务院开会，对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的成立，以及我们内部悬案问题的解决，对西藏建设事项的帮助等，都通过了决定或批复，问题解决了。这对我们西藏今后的团结统一和发展都是有很大好处的。

毛：这些问题都解决了。这些问题的解决，和平协议^[1]起了很大的作用。达赖过去害怕我们。你们过去也是害怕的，不然你们也不会跑到香日德。

班禅：我们过去受了反动派的欺骗宣传，我们不了解真实情况，是有些害怕。

毛：是的。昨天我和达赖喇嘛谈话时，达赖说他的哥哥在外国不回来怎么办？我说：你不害怕，你回来了，这是对的。他害怕，不回来也可以，他不害怕了，回来也好。有些人对我们不了解，他们还要十年八年地看我们。这需要我们做好工作，而且长期地做好工作。你们十二号离开北京，要回到西藏还得很长时间吧？你们回

[1] 指1951年5月23日在北京签订的《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

去路上收礼收不收钱？

计晋美：过去我们来时，沿路老百姓送的礼，有的退还，有的给了寺庙，让他们做点好事。

毛：是不是收一点，表示一下？还是采取收两块赏三块的办法好？你们今后有些开支，国家可以帮助。你们如果不收礼，老百姓既能见佛爷，又能不花钱，这样老百姓会对你们更好。

（汪锋^[1]向毛泽东汇报达赖、班禅曾给拉卜楞寺写信劝止送礼和准备铺张欢迎达赖、班禅的情况。）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这样做很好，这样的问题和他们商量一下就能很好解决了。

你们两位和代表团的很多人来，出席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政协会议，又在各地进行了参观，以后恐怕你们四年要来一次。现在路通了，三个月能打一个来回，既能开会又不耽误工作。如果像这次你们来回要一年的时间，那会就很难开。

班禅：我这次和达赖喇嘛来北京开会，这是从前没有过的，对我们内部团结和整个工作来说，都有好处的。今后路通了我们要多多来的。

毛：将来香日德那边有了飞机场就好了。

班禅：是的。

毛：你这次来是第二次吧？

班禅：是的，五一年来过一次。

毛：五一年你是多少岁？

班禅：十四岁。

毛：你今年是十八岁了，你家是哪里？

[1] 汪锋（1910—1998），陕西蓝田人，当时任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

班禅：是循化县。

毛：是不是拉卜楞寺那里？

班禅：不是，离拉卜楞寺很近。

毛：你这次要到拉卜楞寺去吗？还回循化县吗？

班禅：是的。

毛：回家看看很好。西藏小学课本是用什么文字？

张经武：完全是藏文，汉文和英文是选修科。

毛：这样很好。（向张经武）过去我说过你们进藏以后，要学习藏文、藏话，你们现在学得怎样？

张：我们大家都学，但是抓得不紧，只是参加了训练班的学得可以。

毛：不仅要学藏文而且要学藏话。拉敏·益喜楚臣^[1]这次没有来，以后有机会要来，这次你们回去代我问他好。

[1] 拉敏·益喜楚臣（1913—1977），西藏拉孜人，当时任班禅堪布会议厅委员会主任委员。

对卫立煌 《告台湾袍泽朋友书》^[1]的批语

(1955年3月13日)

刘、朱、邓^[2]（请小平办）：

此件以一字不改，照原文待卫到广州时即行发表为好。在广州发表时，即送香港登报，并登广州报纸。同时由新华社发来北京，播发北京及全国登报，并发口语广播，译成外文发表。此件完全可用，不须要修改。

毛泽东

三月十三日

[1] 卫立煌，原国民党军将领，解放战争后期，担任国民党军东北“剿总”总司令，因没有积极执行蒋介石的作战命令，被软禁于南京。1949年1月蒋介石引退后卫去香港，1955年3月回国，并发表了《告台湾袍泽朋友书》，全文载《人民日报》和香港《文汇报》。

[2] 刘，指刘少奇。朱，指朱德。邓，指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国务院副总理。

关于不要全国人大代表工作费的批语^[1]

(1955年3月14日)

尚昆^[2]同志：

此项工作费，我不需要使用，应交给中央。此次送来的以及以后的，均请你交给中央会计机关。

毛泽东

三月十四日

[1] 这个批语写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1955年3月7日关于津贴全国人大代表工作费给毛泽东的通知上。通知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工作费，从1954年9月份起算，至1955年3月份共7个月，计人民币350元（每月50元），特随函一并送上，请查收。

[2] 尚昆，即杨尚昆，当时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中央办公厅主任。

关于马祖等岛屿敌人撤走时 我军不要攻击的批语

(1955年3月14日)

彭德怀^[1]同志：

马祖及其他任何岛屿敌人撤走时，我均应让其撤走，不要加以任何攻击或阻碍。此点请予考虑确定，指示华东及福建。

毛泽东

三月十四日

[1] 彭德怀，当时任中共中央军委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部长。

给黄炎培^[1]的信

(1955年3月14日)

任之先生：

三月十一日惠书^[2]收读。民建开代表大会，很好，谨致祝贺。农村粮食问题已采取措施，下一年度可以缓和下来，目前则仍有些紧张。

顺致敬意

毛泽东

一九五五年三月十四日

[1] 黄炎培，字任之，当时任中国民主建国会主任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2] 指黄炎培1955年3月11日给毛泽东的信。信中向毛泽东报告了中国民主建国会将于4月1日召开全国代表大会的准备情况，信后附有他对失业问题和农村粮食问题的意见。关于农村粮食问题，信中说：最近有人从家乡来，反映一般居民生活苦，尤其是农民特别苦，农民说：我们吃不饱，哪有力气去种田呢？而一些村干部工作作风不好，总疑心农民家有藏粮，致使民间有怨声。

对卫立煌来电^[1]的批语和复电

(1955年3月17日)

尚昆^[2]:

应发一电表示欢迎。由华南分局派适当干部好好护送来京。如他愿意在广州长沙武汉郑州等处（或走上海天津）看看建设情况，应先电告各处好好引导招待，并表示热情欢迎态度。

毛泽东

三月十七日早

[1] 卫立煌，字俊如，原国民党军将领。解放战争后期，担任国民党军东北“剿总”总司令，因没有积极执行蒋介石的作战命令，被软禁于南京。1949年1月蒋介石引退后卫去香港，1955年3月回国。1955年3月16日，卫立煌从广州致电毛泽东：“立煌昨日返回祖国，平安抵穗，谨电致敬，并问候刘委员长、周总理、朱副主席及中央各位先生。”

[2] 尚昆，即杨尚昆，当时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中央办公厅主任。

二

广州华南分局即送卫俊如先生：

三月十六日电报收到。先生返国，甚表欢迎，盼早日来京，借图良晤。如有兴趣，可于沿途看看情况，于本月底或下月初到京，也是好的。

毛泽东

三月十七日

電
南
廣州 華南局即送衛
後如
三月十六電報收到。先生回國甚
喜歡迎，盼早日來京，藉圖良晤。
如有興趣，可找沿途看情況，
於本月底或下月初到京也是好
的。毛澤東三月十七日

毛泽东复卫立煌电的手稿。

对杨树达^[1]来信的批语和复信

(1955年3月17日)

—

转科学院，请令有关单位予以注意。

—

遇夫先生：

二月十四日惠书^[2]收读。序言已看过。并将大函转付科学院方面，请他们予以注意。此复。顺祝健康！

毛泽东

三月十七日

[1] 杨树达，字遇夫，早年在长沙任教时和毛泽东相识，后一直从事文字学教学和研究工作，当时任湖南师范学院教授。

[2] 指杨树达1955年2月14日给毛泽东的信。信中要求毛泽东看一下他写的《耐林庚甲文说》自序，其中批评了中国科学院在审查该书稿中有官僚主义作风。

关于修改和印发《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开幕词》的批语

(1955年3月20日、21日)

一

尚昆^[1]印若干份，在明天下午开会时，在会场上临时分发各代表，每人一份。校对清楚，勿使有错。

二

尚昆同志：

此件又有些修改，请重印，时间还来得及吧？

修改的地方是：第二页末行加了两个字；第六页第六行后加了一段；第七页第七行去掉两个字，第八行去掉六个字，加上一个字；第八页第五行加了四个字。请注意校对勿讹。

毛泽东

三月廿一日上午九时半

[1] 尚昆，即杨尚昆，当时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中央办公厅主任。

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1]

(1955年3月)

开幕词

(1955年3月21日)

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各位代表同志们：

我们这次全国代表会议有三个议事日程：第一，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和关于这个计划的报告；第二，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报告；第三，关于成立中央监察委员会。

中央委员会根据列宁关于过渡时期的学说，总结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经验，在我国国民经济恢复阶段将要结束的时候，即一九五二年，提出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这个总路线就是在大约三个五年计划的期间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同时对于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改造，以求达到在我国建成社会主义社会的目的。党的总路线以及党为着实现这个总路线而采取的各项重要的政策和办法，已经在事实上被证明是正确的。依靠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的努力，我们的工作是有很大成绩的。但是我们在工作中也有缺点和错误。我们的许多办法不

[1] 这是毛泽东1955年3月21日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

可能在一切方面都规定得很恰当，这应当在实行中根据新的经验加以补充和修正。



1955年3月，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讨论通过了“一五”计划。图为毛泽东在会议上致开幕词。

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是实现党的总路线的一个重大的步骤。这次党的全国代表会议应该根据实际经验，认真地讨论这个计划草案，使它的内容能够比较妥当，而成为切实可行的计划。

在我们这样一个大国里面，情况是复杂的，国民经济原来又很落后，要建成社会主义社会，并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我们可能经过三个五年计划建成社会主义社会，但要建成为一个强大的高度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国家，就需要有几十年的艰苦努力，比如说，要有五十年的时间，即本世纪的整个下半世纪。我们的任务要求我们必须很好地处理我国人民内部的关系——特别是工人阶级和农民之间的关系，很好地处理我国各民族之间的关系；同时，必须很好地继续发展同伟大的先进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的亲密合作，也要发展同资本主义世界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的合作。

我们经常说，不要因为我们的工作有成绩就骄傲自满起来，应该保持谦虚态度，向先进国家学习，向群众学习，在同志间也要互相学习，以求少犯错误。在这次党代表会议上，我感觉仍然需要重复地将这些话说一遍。鉴于高岗、饶漱石的反党事件，骄傲自满情绪在我们党内确实是存在着，在有些同志的身上这种情绪还是严重的，不克服这种情绪，就会妨碍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社会这个伟大任务的完成。

同志们都知道，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出现，不是偶然的现象，它是我国现阶段激烈阶级斗争的一种尖锐的表现。这个反党联盟的罪恶目的，是要分裂我们的党，用阴谋方法夺取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而为反革命的复辟开辟道路。全党在中央委员会团结一致的领导下，已经把这个反党联盟彻底地粉碎了，我们的党因此更加团结起来和巩固起来了。这是我们在为社会主义事业而奋斗中的一个重大的胜利。



1955年3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致开幕词。

对于我们的党说来，高岗、饶漱石事件是一个重要的教训，全党应该引为鉴戒，务必使党内不要重复出现这样的事件。高岗、饶漱石在党内玩弄阴谋，进行秘密活动，在同志背后进行挑拨离间，但在公开场合则把他们的活动伪装起来。他们的这种活动完全是地

主阶级和资产阶级在历史上常常采取的那一类丑恶的活动。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上说过：“共产党人认为隐秘自己的观点与意图是可耻的事。”我们是共产党人，更不待说是党的高级干部，在政治上都要光明磊落，应该随时公开说出自己的政治见解，对于每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表示自己或者赞成或者反对的态度，而绝对不可以学高岗、饶漱石那样玩弄阴谋手段。

为着建成社会主义社会这一个目的，中央委员会认为有必要在这个时候按照党章成立中央监察委员会，代替过去的纪律检查委员会，借以在新的激烈的阶级斗争时期加强党的纪律，加强对各种违法乱纪现象的斗争，特别是防止像高、饶反党联盟这一类严重危害党的利益的事件重复发生。

鉴于种种历史教训，鉴于个人的智慧必须和集体的智慧相结合才能发挥较好的作用和使我们在工作中少犯错误，中央和各级党委必须坚持集体领导的原则，继续反对个人独裁和分散主义两种偏向。必须懂得，集体领导和个人负责这样两个方面，不是互相对立的，而是互相结合的。而个人负责，则和违反集体领导原则的个人独裁，是完全不同的两件事。

目前的国际条件对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是有利的。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是强大的，内部是团结的；而帝国主义阵营则是虚弱的，在它们那里有不可克服的重重矛盾和危机。虽然是这样，但是我们应该了解：帝国主义势力还是在包围着我们，我们必须准备应付可能的突然事变。今后帝国主义如果发动战争，很可能像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那样，进行突然的袭击。因此，我们在精神上和物质上都要有所准备，当着突然事变发生的时候，才不至于措手不及。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国内反革命残余势力的活动还很

猖獗，我们必须有计划地、有分析地、实事求是地再给他们几个打击，使暗藏的反革命力量更大地削弱下来，借以保证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安全。如果我们在上述两方面都做了适当的措施，就可能避免敌人给我们的重大危害，否则我们可能要犯错误。

同志们！我们现在是处在新的历史时期。一个六万万人口的东方国家举行社会主义革命，要在这个国家里改变历史方向和国家面貌，要在大约三个五年计划期间内使国家基本上工业化，并且要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完成社会主义改造，要在大约几十年内追上或赶上世界上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这是决不会不遇到困难的，如同我们在民主革命时期所曾经遇到过的许多困难那样，也许还会要遇到比过去更大的困难。但是，同志们，我们共产党人是以不怕困难著名的。我们在战术上必须重视一切困难。对于每一个具体的困难，我们都要采取认真对待的态度，创造必要的条件，讲究对付的方法，一个一个地、一批一批地将它们克服下去。根据我们几十年的经验，我们遇到的每一个困难，果然都被克服下去了。种种困难，遇到共产党人，它们就只好退却，真是“高山也要低头，河水也要让路”。这里就得出一条经验，它叫我们可以藐视困难。这说的是在战略方面，是在总的方面。不管任何巨大的困难，我们一眼就看透了它的底子。所谓困难，无非是社会的敌人和自然界给予我们的。我们知道，帝国主义、国内反革命分子以及他们在我们党内的代理人，等等，都不过是垂死的力量，而我们则是新生的力量，真理是在我们方面。对于他们，我们从来就是不可战胜的。只要想一想我们自己的历史，就会懂得这个道理。我们在一九二一年刚刚建党的时候，只有几十个人，那样渺小，后来发展起来，居然把国内的强大敌人给打倒了。自然界这个敌人也是有办法

制服它的。不论在自然界和在社会上，一切新生力量，就其性质来说，从来就是不可战胜的。而一切旧势力，不管它们的数量如何庞大，总是要被消灭的。因此，我们可以藐视而且必须藐视人世遭逢的任何巨大的困难，把它们放在“不在话下”的位置。这就是我们的乐观主义。这种乐观主义是有科学根据的。只要我们更多地懂得马克思列宁主义，更多地懂得自然科学，一句话，更多地懂得客观世界的规律，少犯主观主义错误，我们的革命工作和建设工作，是一定能够达到目的的。

结论

(1955年3月31日)

同志们：

大家发言已经完了。我就下面的几个问题讲几句话：关于这次会议的评价，五年计划，高饶问题，目前形势，八次大会。

一 关于这次代表会议的评价

绝大多数同志认为，这次会议开得很好，是从延安整风以来的又一次整风会议，发扬了民主，开展了批评与自我批评，使得我们互相了解更多了，思想更加统一了，使得我们有了共同的认识。本来我们是有共同认识的，但是在若干问题上，我们中间还是有不同意见的，经过这一次会议，统一了我们的认识。在这个基础上，在这个思想的、政治的以及许多政策的共同认识的基础上，就可以使

我们党更好地团结起来了。正如恩来同志所说，如果说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同它以前一个时期全党的思想、政治上的整风，奠定了我们党的统一思想的基础，在这个基础上取得了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这种民主革命的胜利，那末，这一次会议就会使我们取得社会主义的胜利。

这次会议证明，我们党的水平是大为提高了，不但比十年前的七次大会时期大进了一步，而且比一九四九年的二中全会、一九五〇年的三中全会时期大进了一步。这个情况是好的，这次会议表明我们是进步了的。

我们进入了这样一个时期，就是我们现在所从事的、所思考的、所钻研的，是钻社会主义工业化，钻社会主义改造，钻现代化的国防，并且开始要钻原子能这样的历史的新时期。全党同志钻得有深有浅，在座的同志也是这样。像医生一样，有的能够开刀，有的不行。有的打针能够打静脉，有的就不能，只能打皮下。有一些医生连皮下都不敢动手，就在那个皮上面。虽然有些同志没有钻进去，但大多数同志是在钻，看样子有许多人是钻进去了，就是有一点内行的味道了。在这次会议上，我们也可以看到这样的情况。这是极大的好事。因为现在我们面临的是新问题：社会主义工业化、社会主义改造、新的国防、其他各方面的新的工作。适合这种情况钻进去，成为内行，这是我们的任务。所以必须对那些钻不进去的人、浮在皮面上的人进行教育，使他们都成为内行。

反对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斗争，将促使我们党大进一步。

我们要在党内外五百万知识分子和各级干部中，宣传并使他们获得辩证唯物论，反对唯心论，我们将会组成一支强大的理论队伍，而这是我们极为需要的，这又是一件大好事。



1955年3月，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召开。图为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讲话。

我们要作出计划，组成这么一支强大的理论队伍，有几百万人读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即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反对各种唯心论和机械唯物论。我们现在有许多做理论工作的干部，但还没有组成理论队伍，尤其是还没有强大的理论队伍。而没有这支队伍，对我们全党的事业，对我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社会主义改造、现代化国防、原子能的研究，是不行的，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因此，我劝同志们要学哲学。有相当多的人，对哲学没有兴趣，他们没有学哲学的习惯。可以先看小册子、短篇文章，从那里引起兴趣，然后再看七八万字的，然后再看那个几十万字一本的书。马克思主义有几门学问：马克思主义的哲学，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阶级斗争学说，但基础的东西是马克思主

义哲学。这个东西没有学通，我们就没有共同的语言，没有共同的方法，扯了许多皮，还扯不清楚。有了辩证唯物论的思想，就省得许多事，也少犯许多错误。

二 关于第一个五年计划

同志们认为，在讨论五年计划的时候，大多数同志的发言很好，大家是满意的。其中有一部分发言特别好，他们讲透了问题，有点专家的味道了。但是，中央各部门的发言中间，有一部分内容较差，分析和批判不够；地方同志发言中间，也有一部分是较差的，分析和批判是不够的。另有一种情况，就是在有些同志发言中间，对严重的浪费问题以及别的错误，只是揭露了现状，没有说明如何处理。对于这些发言，有些同志不满意。我以为这些不满意是有理由的。

我希望，所有的省委书记、市委书记、地委书记以及中央各部的负责同志，都要奋发努力，在提高马克思列宁主义水平的基础上，使自己成为精通政治工作和经济工作的专家。一方面要搞好政治思想工作，一方面要搞好经济建设。对于经济建设，我们要真正学懂。

这次会上，地方要求中央解决的许多问题，凡是中央已经有了规定的，应当积极解决。其他的问题，由秘书处会同提议的同志，研究解决办法，报告中央处理。

中央各部门要求地方协作的事也不少。中央部门在各地方办的事业，要请地方党委给以监督和帮助，特别是在政治思想工作方面。地方党委有责任帮助中央在地方所办的事业去完成任务。所

以，不仅地方对中央有要求，中央对地方也有要求。只有中央各部门和地方党委齐心协力，分工合作，第一个五年计划才能够完满地实现。

三 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

第一点，有人问：究竟有没有这个联盟？或者不是联盟，而是两个独立国，两个单干户？有的同志说，没有看到文件，他们是联盟总得有一个协定，协定要有文字。文字协定那的确是没有，找不到。我们说，高岗、饶漱石是有一个联盟的。这是从一些什么地方看出来的呢？一、是从财经会议期间高岗、饶漱石的共同活动看出来的。二、是从组织会议期间饶漱石同张秀山配合进行反党活动看出来的。三、是从饶漱石的话里看出来的。饶漱石说，“今后中央组织部要以郭峰为核心”。组织部是饶漱石为部长，高岗的心腹郭峰去作核心。那很好嘛！团结得很密切嘛！四、是从高岗、饶漱石到处散布安子文私拟的一个政治局委员名单这件事看出来的。在这件事上，安子文是受了警告处分的。高岗、饶漱石等人把这个名单散布给所有参加组织会议的人，而且散布到南方各省，到处这么散布，居心何在？五、是从高岗两次向我表示保护饶漱石，饶漱石则到最后还要保护高岗这件事看出来的。高岗说饶漱石现在不得了了，要我来解围。我说，你为什么代表饶漱石说话？我在北京，饶漱石也在北京，他为什么要你代表，不直接来找我呢？在西藏还可以打电报嘛，就在北京嘛，他有脚嘛。第二次是在揭露高岗的前一天，高岗还表示要保护饶漱石。饶漱石直到最后还要保护高岗，他要给高岗申冤。在揭露高岗的中央会议上，我说，北京有两个司令部，一

个是以我为首的司令部，就是刮阳风，烧阳火，一个是以别人为司令的司令部，叫做刮阴风，烧阴火，一股地下水。究竟是政出一门，还是政出多门？从上面这许多事看来，他们是有一个反党联盟的，不是两个互不相关的独立国和单干户。

至于说，因为没有明文协定，有的同志就发生疑问，说恐怕不是联盟吧。这是把阴谋分子组成的反党联盟同一般公开的正式的政治联盟和经济联盟等同起来了，看作一样的事情了。他们是搞阴谋嘛！搞阴谋，还要订个文字协定吗？如果说，没有文字协定就不是联盟，那末高岗、饶漱石两个反党集团内部怎么办呢？高岗跟张秀山、张明远、赵德尊、马洪、郭峰之间，也没有订条约嘛！我们也没有看见他们的文字协定嘛！那末连他们这个反党集团也否定了！还有饶漱石跟向明、扬帆之间，也没有看见他们的条约嘛！所以，说没有明文协定就不能认为是联盟，这种意见是不对的。

第二点，受高、饶影响的同志和没有受他们影响的同志，各自应当采取什么态度？受影响的，有浅有深。有些是一般性的，被他们扫了一翅膀；少数几位同志是比较深的，同他们谈了许多问题，在下面有所活动，替他们传播。这两者是有区别的。但是，所有这些人，不管有浅有深，大多数同志在这个会议上都已经表示了态度。有的表示得很好，受到全场的欢迎。有的表示得还好，受到大部分同志的欢迎，但是有缺点。有的表示得不够充分，今天作了补充。有的全文讲得还好，但是有某些部分不妥当。不管怎么样，这几种人总之已经有所表示了，我们应当一律表示欢迎，总算有所表示嘛！还有个别同志要求发言，没有来得及，他们可以用书面向中央写一个报告。还没有讲的人，问题不严重，就是被扫了一翅膀的，知道一些事情，他没有讲。至于已经发了言的人，是不是也还

有一些是留了尾巴的？那末现在我们决定，不论是关于五年计划还是关于高饶反党联盟问题，所有的发言、报告，都可以拿回去修改，字斟句酌，在五天之内，把那些没有讲完全的，或讲得不妥的，再加以修改。不要因为在这一次会议上没有讲妥，我们就抓住他的小辫子，将来使他下不去。你还可以修改，以你最后修改的稿子为准。



1955年3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

对这些同志，我们应当采取这样的态度，就是希望他们改正错误，对他们不但要看，而且要帮。就是讲，不但要看他们改不改，而且要帮他们改。人是要有帮助的。荷花虽好，也要绿叶扶持。一个篱笆要打三个桩，一个好汉要有三个帮。单干是不好的，总是要有人帮，在这样的问题上尤其要有人帮。看是要看的，看他们改不

改，但单是看是消极的，还要帮助他们。对受了影响的人，不管有深有浅，我们一律欢迎他们改正，不但要看，而且要帮。这就是对待犯错误同志的积极态度。

没有受影响的同志，不要骄傲，谨防害病。这一点极为重要。前面讲的那些同志，可能有些是上当，有些是陷进去比较深，因为犯了错误，他们可能有所警觉，以后不再犯这类错误。害了一次病，取得了免疫力。种了一次牛痘，起预防作用。但是也不能保险，还可能害天花。所以，最好是三年五年再种一次牛痘，就是开我们这种会。其他的同志就不要骄傲，谨防犯错误。高岗、饶漱石为什么对这些人没有惹呢？有几种情形：第一种是他们认为是他们的敌人的人，当然不去传播；第二种是他们看不起的人，认为无足轻重，现在不必去传播，将来“天下大定”了，那些人自然跟着过来的；第三种是他们不敢惹的人，那些人大概是免疫力比较强，他们一看就不对头，虽然这些同志并不被认为是他们的敌人，也不是无足轻重，但是他们不敢去惹；第四种，就是时间来不及。这个瘟疫散播也要时间，再有一年的工夫不揭露，有些人那就难保。所以不要逞英雄：你看，你们不是惹了一点骚吗，而我可干净啦！再有一年不揭露，保管有不少的人是要受他们影响的。

我认为，以上就是受高、饶影响的和没有受影响的两部分同志应当注意的地方。

第三点，在原则性的问题上，在同志之间，对于违反党的原则的言论、行动，应当经常注意保持一个距离。他们那些话，他们那些行动，不符合党的原则，我们又看不惯，在这一部分问题、这一部分情况上，就不要打成一片。对其他的问题，符合党的原则的，比如五年计划，关于高饶反党联盟的决议、报告，以及各种正确的

政策，正确的党内法规，这样一些言论、行动，当然要积极支持，打成一片。对不符合党的原则的，就应当保持一个距离，就是说，要划清界限，立即挡回去。不能因为是老朋友，老上司，老部下，老同事，同学，同乡等而废去这个距离。在这次高饶反党事件中，以及在过去党内的路线斗争中，都有过许多这样的经验：只要你以为关系太老了，太深了，不好讲，不保持一个距离，不挡回去，不划清界限，你就越陷越深，他们那个“鬼”就要缠住你。所以，应当表示态度，应当坚持原则。

第四点，有些同志说，“知道高、饶一些坏事情，但是没有看出他们的阴谋”。我说分两种情况：一种是听到高岗、饶漱石讲了许多不符合党的原则的话，甚至高岗、饶漱石还同他们商量过一些反党活动问题，那就应当看出来。一种是普通知道他们一些坏事情，而没有看出阴谋，这是难怪的，那是很难看出的。中央也是到了一九五三年才发现他们的反党阴谋。经过财经会议、组织会议，以及财经会议以前的种种问题，看到他们不正常。财经会议期间，发现了他们的不正常活动，每一次都给他们顶了回去。所以，以后他们就完全转入秘密了。对这个阴谋、阴谋家、阴谋集团，我们是到一九五三年秋冬才发现的。对于高岗、饶漱石，长期没有看出他们是坏人。这种事情过去也有过。井冈山时期有几个叛变分子，我们就从来没有想到他们会叛变。恐怕你们各位都有这种经验。

我们应当从这里得出一条经验，就是不要被假象所迷惑。我们有的同志容易被假象所迷惑。一切事物，它的现象同它的本质之间是有矛盾的。人们必须通过对现象的分析和研究，才能了解到事物的本质，因此需要有科学。不然，用直觉一看就看出本质来，还要科学干什么？还要研究干什么？所以要研究，就是因为现象同本质

之间有矛盾。但假象跟一般现象有区别，因为它是假象。所以得出一条经验，就是尽可能不要被假象所迷惑。



1955年3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

第五点，骄傲情绪的危险。不要逞英雄。事业是多数人做的，少数人的作用是有限的。应当承认少数人的作用，就是领导者、干部的作用，但是，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作用，有了不起的作用的还是群众。干部与群众的正确关系是，没有干部也不行，但是，事情是广大群众做的，干部起一种领导作用，不要夸大干部的这种作用。没有你就不得了吗？历史证明，各种事实证明，没有你也行。比如没有高岗、饶漱石是不是不得了呢？那还不是也行吗！没有托洛茨基，没有张国焘，没有陈独秀，还不是也行吗！这些都是坏人。至于好人呢，没有你也可以。没有你，地球就不转了吗？地球还是照样地转，事业还是照样地进行，也许还要进行得好些。孔夫子早已

没有了，我们中国有了共产党，总比孔夫子高明一点吧，可见没有孔夫子事情还做得好一些嘛！

有两种人：一种是老资格，在座的不少，资格很老；一种是新生力量，这是年轻的人。这两种人中间哪一种人更有希望呢？恩来同志今天也讲了这个问题，当然是新生力量更有希望。有些同志，因为自己是老革命，就骄傲起来，这是很不应当的。比较起来，如果说允许骄傲的话，倒是青年人值得骄傲一下。四五十岁以上的人，年纪越大，经验越多，就应当更谦虚。让青年人看到我们确实是有经验的：“这些前辈，确是有点经验，不要看轻他们，你看他们那么谦虚。”四五十岁的人了，因为得了许多经验，反倒骄傲起来，那岂不是不像样子？青年人就要发议论：“你们那些经验就等于没有，还不是跟小孩子一样。”小孩子有点骄傲情绪，那是比较合理的。上了年纪的人，有了这么多经验，还骄傲，把尾巴翘得那样高，可以不必。俗语说：“夹紧尾巴做人。”人本来是没有尾巴的，为什么要夹紧尾巴呢？好比那个狗，有翘尾巴的时候，有夹尾巴的时候。大概是打了几棍子的时候它就夹紧尾巴，大概是有了几批成绩的时候它的尾巴就翘起来了。我希望，我们所有的同志，首先是老同志，不要翘尾巴，而要夹紧尾巴，戒骄戒躁，永远保持谦虚进取的精神。

第六点，戒“左”戒右。有人说，“‘左’比右好”，许多同志都这么说。其实，也有许多人在心里说，“右比‘左’好”，但不讲出来，只有诚实的人才讲出来。有这么两种意见。什么叫“左”？超过时代，超过当前的情况，在方针政策上、在行动上冒进，在斗争的问题上、在发生争论的问题上乱斗，这是“左”，这个不好。落在时代的后面，落在当前情况的后面，缺乏斗争性，这是右，这个也

不好。我们党内不但有喜欢“左”的，也有不少喜欢右的，或者中间偏右，都是不好的。我们要进行两条战线的斗争，既反对“左”，也反对右。

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问题，我就讲这么几点意见。

四 关于目前形势

国际形势，国内形势，党内形势，这三种形势怎样呢？是光明面占优势，还是黑暗面占优势呢？应当肯定，不论国际、国内、党内形势，都是光明面占优势，黑暗面占劣势。在我们这个会场上也是如此。不要因为有很多人作了自我批评，以为就黑暗了。这些同志是着重讲了他们的缺点错误，没有讲他们的长处，哪一年参加革命，哪里又打了胜仗，哪里有工作成绩，这些话都没有讲。专看他们这一篇检讨，那末就黑暗了。其实，这是一面，在很多同志身上，这是次要的一面。这跟高岗、饶漱石和张、张、赵、马、郭五虎将不同，他们不能适用这个估计：光明面占优势。高岗有什么光明面占优势呀？他是全部黑暗，天昏地黑，日月无光。至于我们的同志那就不同，略有黑暗，这个东西可以洗干净，用肥皂多洗几回。

为什么要提出准备对付突然事变，准备对付反革命复辟，准备对付高饶事件的重复发生呢？这是说，从最坏的可能性着想，总不吃亏。不论任何工作，我们都要从最坏的可能性来想，来部署。无非是这些坏得不得了的事：帝国主义者发动新的世界大战，蒋介石又来坐北京，高饶反党联盟一类的事件重新发生，而且不只一个，而是十个，一百个。尽管有那么多，我们都先准备好了，就不怕了。你有十个，也只有五双，没有什么了不起，我们都估计到了。

帝国主义拿来吓唬我们的原子弹和氢弹，也没有什么可怕。世界上的事情，总是一物降一物，有一个东西进攻，也有一个东西降它。看《封神榜》就知道，哪有一个“法宝”是不能破的呀？那样多的“法宝”都破了。我们相信，只要依靠人民，世界上就没有攻不破的“法宝”。

五 为胜利召开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而斗争

中央决定一九五六年下半年，召开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有三个议事日程：（一）中央委员会的工作报告；（二）修改党章；（三）选举新的中央委员会。明年七月以前要完成代表的选举及文件的准备工作。要求在这一年多的时间内，各方面的工作，经济、文教、军事、党务、政治思想、群众团体、统一战线、少数民族工作，都要大进一步。

我顺便讲一讲少数民族工作的问题。要反对大汉族主义。不要以为只是汉族帮助了少数民族，而少数民族也很大地帮助了汉族。有些同志总是在那里吹，我们可帮助了你们，就没有看到没有少数民族是不行的。我国百分之五十到百分之六十的地方，是什么人住的？是汉族住的，还是什么人住的？百分之五十到百分之六十的地方是少数民族居住的。那里物产丰富，有很多宝贝。现在，我们帮助少数民族很少，有些地方还没有帮助，而少数民族倒是帮助了汉族。有些少数民族，需要我们先去帮助他们，然后他们才能帮助我们。少数民族在政治上很大地帮助了汉族，他们加入了中华民族这个大家庭，就是在政治上帮助了汉族。少数民族和汉族团结在一起了，全国人民都高兴。所以，少数民族在政治上、经济上、国防

上，都对整个国家、整个中华民族有很大的帮助。那种以为只有汉族帮助了少数民族，少数民族没有帮助汉族，以及那种帮助了一点少数民族，就自以为了不起的观点，是错误的。

我们讲在这一年中各方面的工作要大进一步，就是要把已经揭露出来的缺点、错误加以改正。不要在这次会上许了愿，到明年召开“八大”时还照样有那么多缺点、错误，原封未动。所以要为召开“八大”而斗争者，就是要把缺点、错误改正，比如铺张浪费、大屋顶这样一些东西，认真地负责地改一下。不要在这里许了愿，一回去大家就把两脚一伸睡起觉来了。

有人建议一年或者两年开一次这样的会议，使同志之间互相监督，我认为可以考虑。谁监督我们这些人呢？互相监督是好办法，可以促进党和国家的事业迅速进步。是迅速进步，不是慢慢地进步。党的代表大会，十年没有开了。当然头五年不应当开，因为兵荒马乱，又开了“七大”，后五年可以开而没有开。没有开也有好处：高饶问题搞清楚再开，不然他们要利用“八大”大做文章。同时，我们的五年计划也上了轨道，过渡时期总路线也提出来了，又经过这次代表会议使大家在思想上更加统一了，为召开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准备了条件。在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上，不要每个人去检讨一篇，但对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还是要作公开的批评和自我批评。不实行马克思主义的这一条是不行的。

批评要尖锐。这次有些批评，我觉得不那么尖锐，总是怕得罪人的样子。你不那样尖锐，不切实刺一下，他就不痛，他就注意。要有名有姓，哪一个部门，要指出来。你没有搞好，我是不满意的，得罪了你就得罪了你。怕得罪人，无非是怕丧失选举票，还怕工作上不好相处。你不投我的票，我就吃不了饭？没有那回事。

其实，你讲出来了，把问题尖锐地摆在桌面上，倒是好相处了。不要把棱角磨掉。牛为什么要长两只角呢？牛之所以长两只角，是因为要斗争，一为防御，二为进攻。我常跟同志讲，你头上长“角”没有？你们各位同志可以摸一摸。我看有些同志是长了“角”的，有些同志长了“角”但不那样尖锐，还有些同志根本没有长“角”。我看，还是长两只“角”好，因为这是合乎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有一条，叫做批评和自我批评。

所以，定期召开会议，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这是一种同志间互相监督，促使党和国家事业迅速进步的好办法。建议各省、市委同志们考虑，你们是不是也可以这样做？你们不是学中央吗？我看这一点是可以学的。

最后，我请同志们注意，也请全党同志注意：

为在一九五六年胜利地召开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而斗争！

为胜利地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而斗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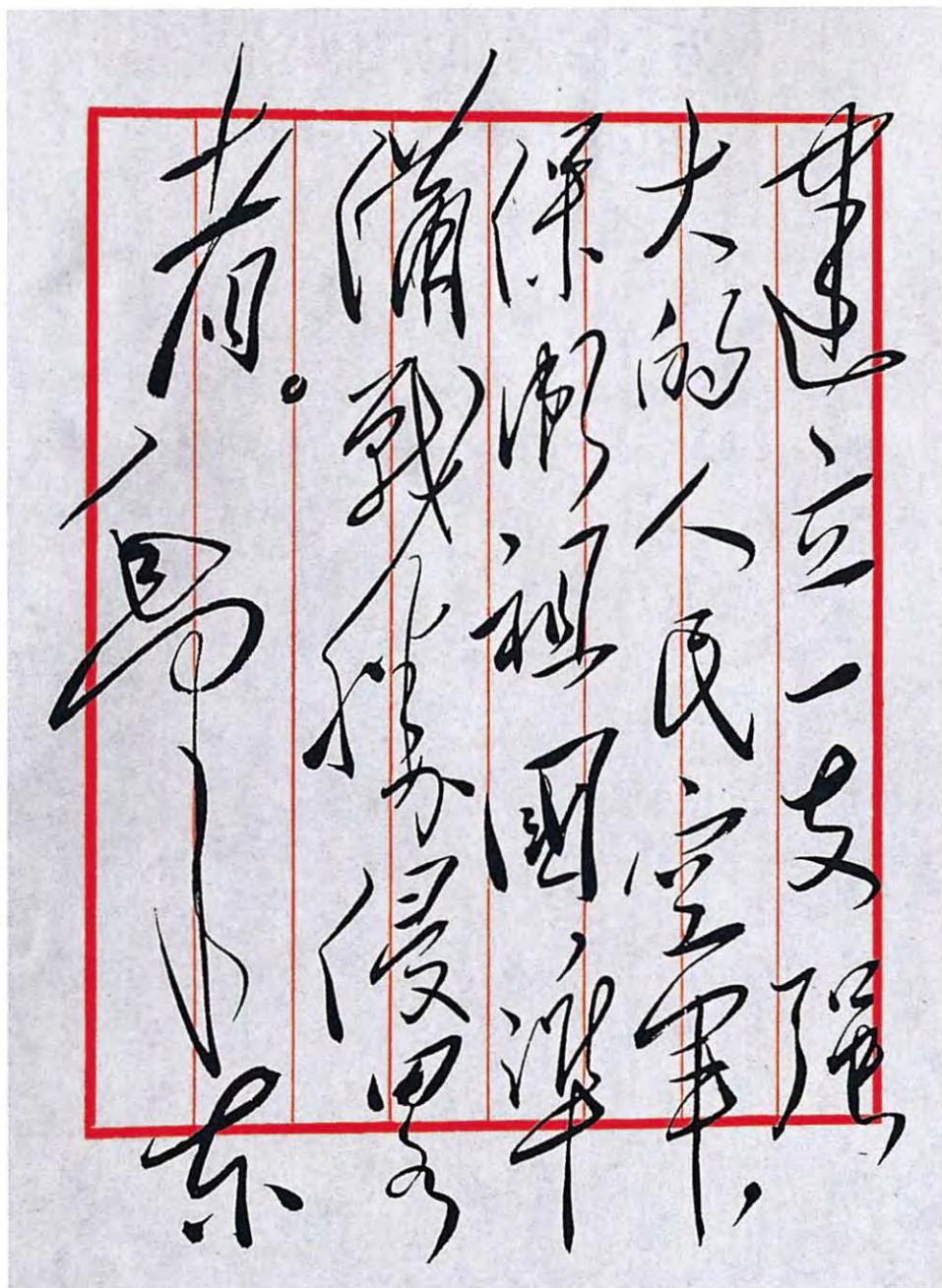
为空军首届英雄模范 功臣代表大会题词^[1]

(1955年3月)

建立一支强大的人民空军，保卫祖国，准备战胜侵略者。

毛泽东

[1] 这是毛泽东为1955年3月21日在北京开幕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首届英雄模范功臣代表大会的题词。



毛泽东为空军首届英雄模范功臣代表大会的题词。

对陈毅^[1]在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的发言稿的批语

(1955年3月23日)

退陈毅同志：

你的发言稿，看了一遍，觉得很好，可以和应该那样说，不算过火。在第廿一页上，我加了几个字^[2]，我感觉，饶漱石^[3]的罪恶，可能不比高岗^[4]小一些。

毛泽东

三月廿三日

[1] 陈毅，当时任中共中央委员、国务院副总理。

[2] 陈毅发言稿第21页上讲到：“反党分子高岗，是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首脑人物，他的反党罪行比饶漱石更严重一些。”毛泽东把这句话改为：“反党分子高岗，是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首脑人物，他的反党罪行从某一点上看，或者说比饶漱石更严重一些。”

[3] 饶漱石，曾任中共中央委员、华东局第一书记、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华东行政委员会主席、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1953年阴谋分裂党，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1954年被揭露。1955年3月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通过决议，开除他的党籍。

[4] 高岗，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东北局书记、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东北行政委员会主席、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1953年阴谋分裂党，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1954年被揭露。1955年3月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通过决议，开除他的党籍。

关于在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 印发两篇文章的批语

(1955年3月28日)

邓小平^[1]同志：

两篇文章^[2]送上，请即印发各代表。两篇印在一起，加上一个总题目叫《两篇可看的文章》。

毛泽东

三月廿八日

[1] 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

[2] 指1955年3月24日《人民日报》刊载的胡琦、力峰写的《从红星工厂事件中看中共天津市地方国营工业局委员会的责任》一文和1955年3月25日《光明日报》择要刊载的苏联伊萨耶夫少将写的《实力政策的虚妄》一文。胡琦、力峰的文章介绍说，中共天津市地方国营工业局委员会，由于犯了只管业务不问政治的错误，致使所属的红星工厂厂长处处限制党支部的活动，把一批坏分子提拔为厂里的各级干部，打击了党员干部的积极性，影响了生产计划的完成。伊萨耶夫的文章节译自1955年2月5日苏联《新时代》杂志，介绍了近年来美英等帝国主义国家鼓吹所谓实力政策，即用假想中的美国军事优势来对全世界发号施令，事实证明这一所谓的实力政策是虚妄的。

对刘少奇在全国代表会议上的 发言提纲的批语

(1955年3月)

即退刘少奇同志：

题目可不要“提纲”二字。

毛泽东

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 结论的提纲

(1955年3月31日)

就下面的问题讲几句话：

这次会议的评价；

五年计划；

高饶问题；

目前形势；

八次大会。

(一) 关于这次大会的评价：

绝大多数人认为这次会议开得好，是从延安时期整风以来的又一次整风会议，发扬了民主，开展了批评与自我批评，使我们互相了解更多，有了共同的认识，在这个基础上就可以更好地团结起来了。

这次会议证明：我们的水平是大进一步了，不但比十年前的七次大会时期大进了一步，而且比一九四九年的二中全会、一九五〇年的三中全会时期大进了一步。

我们是进入了这样的时期：

钻社会主义工业化，

钻社会主义改造，

钻近代化的国防，

并且开始要钻原子能的时代了。

虽然钻的有深，有浅，也有些人并未钻进去，但大多数同志是在钻，看样子是有许多钻进去了，快要成为内行了，这是极大的好事。

反高、饶联盟的斗争，将促使我们党大进一步。

我们要在党内外五百万知识分子和各级干部中宣传和获得辨〈辩〉证唯物论，反对唯心论，我们将会组成一支强大的理论队伍，而这是我们极为需要的，这又是一件大好事。

（二）关于五年计划：

（1）同志们认为大多数的发言很好，其中有一部分发言特别好，认为满意；但中央各部门发言中，有一部分内容较差，分析和批判均不够；另一部分发言对严重的浪费问题只揭露了现状，没有说明如何处理；对这后面两部分人的发言认为不能满意。

（2）地方要求中央解决的许多问题，由秘书处会同提议的同志研究处理办法，报中央处理。

（3）中各〈央〉各部门要求地方协助的事项，请地方同志注意解决。

（三）关于高饶反党联盟：

（1）有人问：究竟有没有联盟，或者是两个独立国？

从财经会议高饶同时发动反对所谓刘少奇宗派的活动看来，

从组织会议饶漱石与张秀山配合反动〈党〉看来，

从饶漱石的话“今后中央组织部要以郭峰为核心”看来，

从高饶都利用安子文同志的那个名单看来，

从高岗两次向我表示保护饶漱石，饶漱石则到最后还要保护高岗一事看来，

他们是一个联盟，不是两个互不相关的独立国。

至于说，没有明文协定，说〈那〉是把阴谋分子的反党联盟，和公开的政治联盟，如像巴黎协定，东南亚协定等同起来。

须知高岗集团的张、张、赵、马、郭^[1]等人之间，饶漱石和向明、杨帆之间，也没有明文协定。

（2）受高、饶影响的同志和未受影响的同志各自应取的态度。

受影响的——有浅有深，少数尚未表示态度，但大多数已表示了态度，有表示得很好的，有表示得还好的，有表示得不充分的或有某些部分不妥当的，总之已有所表示，我们应一律表示欢迎，希望他们改正，不但要“看”，而且要“帮”。少数问题不大，没有来得及发言的，可书面写出交中央。

未受影响的——不要骄傲，谨防害病。

（3）在原则性的问题上，在同志间，对于违反党的原则的言论、行动应当经常注意保持一个距离，即划清界线，立即挡回去，不能因为老朋友，老上司，老部下，老同事，同学、同乡等而废去这个距离，不表示态度，不坚持原则。

（4）有些同志说，知道高饶一些坏事，但没有看出他们的阴谋，这是难怪的。中央到1953年才发现他〔们〕的阴谋，在此以前也是被骗的，瞎了眼睛；这种瞎眼睛的事还很不少。

从此得出一条经验：不要被假象所迷惑。

（5）骄傲情绪很危险：

以为游水可以不害感冒了，称了几个月英雄，害了一次大感冒，可见英雄是称不得的。

[1] 张，指张秀山。张，指张明远。赵，指赵德尊。马，指马洪。郭，指郭峰。

事业是多数人做的，少数人有作用，但也没有什么了不起。

没有你，地球还是照按〈样〉转，事业照样在进行，也许还要做得好些。

没有孔夫子，中国更进步了。

一种是老资格（像我这样的人），一种是新生力量，哪一种人更有希望呢？当然是新生力量。

比较起来，如果说骄傲，倒是青年人值得骄傲一下。

据说，年纪越大，越有经骄〈验〉，因此中年以上的人应该谦虚些，让青年看到我们确有些经验的，否则就不像样子了。

（6）戒“左”，戒右：

有人说，“‘左’比右好”；

其实又有人说，“右比‘左’好”；

超过时代，冒进，乱斗，这是“左”，不好；

落在时代的后面，缺乏斗争性，也不好。

我们党内不但有喜“左”的，也有不少喜右的，或者中间偏右，都是不好的。

两条战线斗争。

（四）目前形势：

不论国际、国内、党内形势，都是光明面占优势，黑暗面占劣势。

为什么提出准备对付突然事变，准备对〔付〕反革命复辟，准备对付高饶事件重复发生？

从最坏的可能性着想，总不吃亏。

（五）为胜利地召开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而斗争：

中央决定一九五六年下半年召开八〔次〕大会，有三个议事

日程：

- (1) 中央委员会的工作报告；
- (2) 修改党章；
- (3) 选举新的中央委员会。

明年七月以前完成代表的选举及文件的准备工作。

在这一年多的时间内，要求各方面的工作大进一步，已经揭露出来的各种缺点、错误，例如大屋顶，大浪费等等。

谢意

有人建议：一年或两年开一次这样的代表会议。可以交中央考虑，这是一种同志间互相监督，促使党和国家迅速进步的好办法。

党的代表会议和代表大会可以相间着开。

请全党注意：为在一九五六年胜利地召开八次大会而斗争，为胜利地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而斗争。

《毛泽东全集》52卷

本书经由主编张迪杰先生独家授权香港中文版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书 名：《毛泽东全集》第34卷
主 编：张迪杰
责任部门：《毛泽东全集》编辑委员会
编委主任：流 星
策 划：树 旺
出 版：润东出版社
承 印：润东出版社有限公司
经 销：润东出版社有限公司
电 话：(852) 23500066
电 邮：1236688@enricheast.com
网 址：www.enricheast.com
地 址：香港九龙湾宏光道7号兴力工业中心5楼09室
顾 问：润东出版社有限公司印制顾问组
组 长：言 臣
装 帧：平 装
开 本：170mm × 240mm 特16开
页 面：544面
版 次：2013年10月1日 第一版
印 次：2013年10月1日 第一次印刷
2013年11月1日 第二次印刷
印 数：500套
全集字数：2015万字
I S B N：978-988-12907-0-0
定 价：52卷 港币\$26,800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请与本出版社联络更换